

“大党治理与大国兴衰研究”丛书（第一辑）

高民政 主编

Revolution from the Bottom:

The Social Democratic Movement in the
Period of Gorbachev

来自下面的革命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
社会民主运动

薛小荣 高民政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大党治理与大国
高民政 主编

Revolution from the Bottom:
The Social Democratic Movement in the
Period of Gorbachev

来自下面的革命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
社会民主运动

薛小荣 高民政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来自下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 / 薛小荣，高民政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11 (2018. 6 重印)

(大党治理与大国兴衰研究丛书 / 高民政主编. 第一辑)

ISBN 978 - 7 - 201 - 12498 - 8

I. ①来… II. ①薛…②高… III. ①民主运动 - 研究 - 苏联 - 1985 - 1991 IV. ①D75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9472 号

来自下面的革命

LAIZI XIAMIAN DE GEMING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策划编辑 王 康
责任编辑 郑 玥
特约编辑 王 倩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5
插 页 2
字 数 4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10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一切已知的“来自上面的革命”之所以存在弱点和不彻底性，正是由于缺少来自下面的支持，缺少与群众协调一致的行动。既然缺少这些，那就必然需要自上而下的、或多或少带有强制性的措施。结果就出现了改造过程中的不正常现象，因而也就付出了高度的社会政治和道德“代价”。这次改革的特点和力量在于，它既是“来自上面”，也是“来自下面”的革命。这是它成功和不可逆转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

——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

总书记受制于国内外某些势力，他们为他设置了圈套，他被迫带领党的羊群走入那精神和肉体的屠宰场，只有他一人从那里走出来，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还发了财。

——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瓦·博尔金

目 录

导言 “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人论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	1
一、深刻总结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重大意义	1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原因分析	4
三、对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判断	10
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	13
第一章 社会民主运动的形成背景	19
一、思想成因:秘密报告	19
1. 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
2. 苏联的“解冻”与社会心理的变化	30
3. 改革语境中的苏共二十大及其象征	36
二、社会成因:60年代人	47
1. 苏联的“新一代”:思想与心理	48
2. 党内的“新生代”:改革的一代	53
三、政治成因:“公开性”	58
1. “公开性”与社会改革的民主化	59
2. “公开性”与社会舆论的激进化	64
3. “公开性”与社会生活的政治化	70

2 来自下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

四、生活成因:受歧视者	72
1. 知识分子与改革:变化的立场	73
2. 官僚特权与改革:社会的愤怒	80
五、民族成因:政治觉醒	85
1. 民族主义与苏联政治传统及结构	86
2. 吃亏的民族:变化了的民族心理	93
第二章 社会民主运动的人员构成	100
一、知识分子	100
1. 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	101
2. 体制内的“持不同意见者”	114
二、苏共党员	127
1. 政治民主运动中的苏共党员	128
2. 民族独立运动中的苏共党员	135
三、民族精英	141
1. 苏联政治内部的民族精英与民族主义	142
2. 民族精英与脱离苏联体制的独立运动	147
四、政治激进者	151
1. 改革派:激进的政治领导人	152
2. 改革派:激进的知识分子	159
五、社会失意者	166
1. 失业者	166
2. 社会青年	168
3. 知识分子	171
4. 政府工作人员	172
第三章 社会民主运动的组织类型	175
一、组织类型——社会群众组织	175
1. 群众性社会组织:从俱乐部到争取改革运动	176

2. “人民阵线”：政治反对派的民主“遮羞布”	183
二、组织类型——政治压力集团	187
1. 政治改革、政治派别与苏共党内的民主运动	188
2. “跨地区议员团”：政治反对派——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结合	189
三、组织类型——竞争性政党组织	195
1. 一党制的废止与多党竞争的政治局面	196
2. “民主俄罗斯”：走向联合的政治反对派运动	197
第四章 社会民主运动的活动方式	203
一、活动方式——集会游行	203
1. 改革时期的集会游行：法律的约束与失控	204
2. “波罗的海之路”：歌声、鲜花、手拉手的游行队伍	208
二、活动方式——操纵舆论	210
1. “公开性”与舆论改革	210
2. 《星火》主编——维塔利·科罗季奇：“人们已没有恐惧心理了”	217
三、活动方式——出版禁书	220
1. 思想文化领域的“解冻”：戏剧、电影与文学作品	221
2. “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与《古拉格群岛》	227
四、活动方式——制造事端	229
1. 流血的冲突：“不要把人们当成敌人”	229
2. 第比利斯事件：“反苏活动的演兵场”	231
五、活动方式——组织罢工	234
1. 工人：“觉醒的主人翁”	235
2. 罢工：从经济走向政治	238
六、活动方式——内部分化	242
1.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与政治多元化	242
2. “魔鬼的智慧”：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244

4 来自下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

七、活动方式——建立武装	246
1. 党的领导、共产主义与苏联军队	247
2. 政治运动、民族主义与军事力量	249
八、活动方式——西方支持	254
1. 方式一：制造舆论	254
2. 方式二：政治施压	260
3. 方式三：组织支持	262
第五章 社会民主运动的政治效应	264
一、社会情绪：挑动人民不满	264
1. 改革期望与苏联的社会心理变化	265
2. 社会情绪与社会民主运动极端化	270
二、社会共识：抹黑苏共历史	274
1. 戈尔巴乔夫：“不让历史留空白页”	274
2. 改革与历史：共识破灭与苏共形象	281
三、政治氛围：极端的民主化	288
1. 误读的西方民主：游行、罢工与政府的批评	288
2. 多元的社会力量：经济、政治与运动的野心	291
3. 遗忘的社会大众：生活、稳定与改革的苦果	296
四、政治团结：苏共政治分裂	301
1. 政治纪律、政治团结与苏联共产党	301
2. 民主化、改革分歧与党内政治派别	304
第六章 苏共的对策及其政治失败	312
一、戈尔巴乔夫：不用武力解决政治	312
1. 重塑执政合法性需要	313
2. 内外政策的理念展现	319
3. 改革形象的政治保证	321
4. 国内政治现实的妥协	323

二、宪法第六条:从一党制到多党制	325
1. 危机与退让:从一党制到多党制	325
2. 宪法修正案:多党竞争的合法化	329
3. 多党的企图:苏联共产党的毁灭	330
三、苏联共产党:“来自上面的革命”	331
1. 摆脱“永远不会犯错误”的观念	331
2. 破除官僚主义行政命令管理体制	334
3. 积极地培育发达的社会组织体系	338
四、社会的狂热:“来自下面的革命”	339
1. “公开性”与“民主化”:改革之力	339
2. 社会反抗的合法化:失控的“民主”	345
结语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	352
参考文献	360

导言 “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人论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

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引发的苏东剧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是20世纪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之一。这一事件从1989年东欧国家剧变开始，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基本结束，大体只经历了两年时间，其来势之凶猛、时间之短暂、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①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透过纷繁复杂的表层现象，揭示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深层根源，从而在吸取苏联改革失误以及由此引发的苏东社会主义剧变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思维，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中国怎么办”的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朝着既定的方向坚定前进。

一、深刻总结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重大意义

全面深刻地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既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现状及发

^①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3年11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1页。

2 来自下面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

展趋势的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走向的高瞻远瞩与战略思考,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讲,加强对苏东问题,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是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真理性的必然要求。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西方舆论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破产了”,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理想已“被埋葬”。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1989年出版的《大失败》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在思想领域”,是对历史发展作出了“根本错误的判断”。曾流亡英国的波兰哲学家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则称“马克思主义是本世纪最大的空想”。同时,苏东剧变造成各国共产党内部思想的大混乱,集中表现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泛滥,党内对有关党的性质、作用、前途、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产生分歧,出现许多模糊认识和错误想法。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已经过时?社会主义是否已经失败,而资本主义已经获胜?共产党还有无必要存在下去吗?怎样才能存在下去?还要不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等等。敌对势力别有用心地谬论和共产党内部思想的混乱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究竟还有没有现实的指导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人类解放的道路还是否科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但是如何解释苏东剧变这一“历史之谜”呢?这是我们在思想理论战线上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①。江泽民指出:“总结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有新的发展。”^②总结的不好,就有可能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就会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从现实意义上讲,加强对苏东问题,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为当前正处于深水期和攻坚期的中国改革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20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的

^① 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学习”(1999年),《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6页。

^② 江泽民:“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0年),《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兴起以及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国际经济竞争和科技进步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展开的长期较量与激烈斗争。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等一批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格局。而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的发展遇到了严重挫折。这样一个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进程,向人们、向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提出了许多重大课题:世界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应该如何如何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开辟光明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应该怎么加强自身建设才能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对于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来说,科学地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正确地回答苏东剧变带来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年摆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面前的“怎么办”问题,又一次严峻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对于我们来讲,汲取的最为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必须在实践中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寻找一条真正符合本国实际的建设道路,而不是从书本中、从模式里简单套取。苏东剧变的沉痛历史教训说明,“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①。在中国,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江泽民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在新的世纪、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下带领中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在于党能够深刻总结我国和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我们党能够继续执政和发展,社会主义

^①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在中国能够充满新的生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条宝贵经验。”^①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原因分析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体制因素

邓小平认为:“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②这是邓小平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总的看法。“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政治体制“不是很成功”^③,缺乏民主和监督,违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造成个人崇拜,导致精神生活畸形

“不是很成功”的地方主要表现在:高度集中的党内外体制,使权力过分集中,各级政府机关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党政机关容易脱离群众;事实上的干部委任制和干部终身制,滋长了官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党和国家监督机关的职能被削弱,专政职能加强,等等。同时,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模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苏联社会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之中,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由于政治权力的强行干涉,整个苏联社会的精神生活畸形发展。高度集中的文化体制严重压抑了学术理论的民主,剥夺了人们独立思考社会生活现象和创造性地分析事实的权利,造成了党和人民思维意识的保守与惰性,使苏共理论全面滞后与僵化。

(2) “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④

这是邓小平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总的

^① 江泽民:“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2000年),《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② 邓小平:“解放思想,独立思考”(1988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③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④ 邓小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8页。

认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发展阶段上的一种体制模式,它对促进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对于发展生产力而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纵向与沙俄时代比较,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面貌,经济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横向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快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是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这种体制统得太死,缺乏活力,地方和企业积极性受到扼制,职工积极性得不到发挥,更主要的是违背经济自身发展规律;工业化和全盘农业化的发展道路,使农、轻、重比例极不协调,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无法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造成工业生产效益低、投入产出比不佳等问题。从赫鲁晓夫开始,苏共领导人曾经试图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与歪曲,对社会主义认识得不清楚,苏共领导人只能对这一体制作一些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不可能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造。至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不是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而是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2. 理论原因

理论上的优势是无产阶级执政的首要条件,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就没有政治上的坚定。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思想原因就在于苏联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与曲解。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理论上的僵化与教条主义

邓小平认为主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搞清楚。1985年5月16日,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在这里,邓小平明确了两个意思:首先,无论是苏

^①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

联还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还没有认识清楚;其次,必须在实践中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七十多年的历史而观,苏联共产党一直没有真正搞清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社会主义运行机制的关系,也没有真正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导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斯大林模式一直在苏联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苏共既想改革,破除这一僵化体制,但又囿于没有正确认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误把作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表现形式的运行机制看作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使这一体制在实践中与根本制度发生冲突,日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戈尔巴乔夫虽倡言改革,但是和他的前任领导人一样,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一问题,因此在改革的实践中,使改革与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即要么实行改革,那就意味着要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要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那就是说要反对改革。这种错误的改革心理发生的根源就在于对这一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

(2) 理论上的曲解和偷换概念

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不仅没有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进一步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反而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曲解和偷换概念,从而导致了苏联社会的思想大混乱,以致无法有效抵御西方势力的思想入侵。江泽民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最近南斯拉夫政局的演变等事件,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执政党内和群众中发生思想变化、思想混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①从斯大林时期的中后期开始,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存在着严重的理解误区和形而上学的曲解,导致党的指导思想日益僵化与混乱。赫鲁晓夫时期,“三和两全”的路线方针更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这一路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抽象的人道主义,对以后的苏共领导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影响至深。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继承了赫鲁晓夫“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全盘接受了他的“人道主义观”,声称改革就是要“最充

^①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88页。

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在其各个决定性方面,即经济方面、社会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①。同时,戈尔巴乔夫还继承了赫鲁晓夫的“核时代观”与“三和”路线,并将其发展成为所谓的“对外政策新思维”。戈尔巴乔夫把这一认识理论化、系统化,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使苏共彻底抛弃了认识和辨别事物的思想武器。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指引下,苏东各国共产党进行了彻底的政治改造,根本改变了党的阶级奋斗目标、指导思想、组织原则,从而由共产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蜕变成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党的性质方面,把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成为“全民党”,否定了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奋斗目标方面,把共产主义改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要把苏联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在指导思想方面,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党,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旨在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在组织原则方面,抛弃民主集中制,主张“普遍的民主”,即没有集中的民主。实际上是想使共产党失去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成为一个派别林立、自由组合的组织和松散的政治议论俱乐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推行,使党变质,使社会变色,在苏东剧变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3. 党的原因

1989—1990年,东欧国家相继出现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物价上涨,拖欠西方国家大量债务,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羽翼日渐丰满,执政党内部陷入分裂。西方国家借机公开支持东欧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成立组织,并直接向东欧国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条件,召开圆桌会议。波兰的团结工会在这种背景下上台执政,拉开了东欧国家政治剧变的帷幕。接着如多米诺骨牌一般,东欧国家的执政党相继改组并在大选中下台。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此形势,邓小平明确指出,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出现,问题首先出在东欧国家的执政党身上。他说:“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①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邓小平在次年的“南方谈话”中更是提醒中国共产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②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苏联共产党指导思想混乱

苏东剧变之所以能够发生,在邓小平看来,主要是苏共长期忽视执政党自身的建设,缺乏一条坚定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一套健全的、马克思主义的抵御“西化”“分化”的战略与策略,因而导致党内和社会上思想混乱,继而使党组织涣散、分裂、失去战斗力。江泽民也认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垮台,最后苏联也解体了。除了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和国际敌对势力长期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等原因外,关键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危机时刻党内在政治上发生重大分歧,导致政治局面一发不可收拾。”^③

(2) 苏联共产党内部政治分裂

“苏共从党章中取消民主集中制后,党也就四分五裂了。”^④江泽民指出,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一些人更是想在我国搞出一点乱子,以图乱中取胜,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还采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中的办法,一些人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已钻到了相当的岗位,准备十年后同我们算账。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这还不值得我们极端注意和高度警惕吗?我们的同志头脑要清醒,而且要站在斗争的前线。”^⑤他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牢记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给世人

①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1989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页。

②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

③ 江泽民:“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001年),《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④ 同上,第226页。

⑤ 江泽民:“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1998年),《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2~113页。

提供的深刻教训”^①。同时江泽民特别强调,领导成员之间最忌讳的就是有人不但不去维护团结,反而挑拨离间、两面三刀,专门在班子里面搅和。海外有些报刊经常搞出一些挑拨离间、无中生有的东西,有的人往往不辨真假,信以为真,甚至加以散布,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有的人整天不干正事,专门造谣诽谤,写份材料用复印机一复印,到处发送,看起来好像各个方面都有反映,其实谣源就是他一个人。“对我们内部、对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这样的害群之马,一定要严厉查处,不能放任不管、姑息养奸。对搞挑拨离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大家务必保持警惕,绝不能让这种人钻到领导岗位上来。如果让他们得势,就会误党误国误民。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苏联党的历史上,都有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大家要牢牢记住。”^②

(3) 苏联共产党严重脱离人民

苏联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不仅表现为指导思想上的混乱,更为关键的则在于党与人民的分裂。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割裂了党群关系,弱化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③。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领导力量,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政治设计者、组织协调者、思想引导者和行动带领者,其力量源泉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离开了人民群众,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中国没有一种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很牢固,但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有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人心向背事关重大,失去了民心,党就有危险。”^④

共产党执政后,如何防止党脱离人民,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

① 江泽民:“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1998年),《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

② 江泽民:“领导干部要在思想、作风建设中作出表率”(1998年),《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9页。

③ 江泽民:“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2000年),《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7页。

④ 习近平:“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页。

人”，如何更好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共产党的一个严峻考验，也是共产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综观苏共执政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缺乏法律化的民主制度，即民主的选举制度、罢免制度、监督制度，无法从具体制度上保证党能够切实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反却在党内形成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特殊要求、特殊地位和特殊工作方式的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使苏共日益走上了腐化变质的道路，造成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中断，使党的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盛行，党缺乏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敏锐性，僵化保守、不思改革，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又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削弱了党的凝聚力，涣散了党的组织，弱化了党的战斗力。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民主化”“公开性”的旗帜下，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势力借此大肆诋毁、攻击、否定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成就，进而否定“十月革命”，破坏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使党在改革的大潮中失去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造成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

三、对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判断

如何看待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呢？中国共产党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 一个现状——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

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引发的苏东剧变，其直接后果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首先，从思想上来说，由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受到冲击与质疑，科学社会主义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究竟走向何方？等问题困扰着人们。其次，从现实力量对比上来说，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世界上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从政治地图上消失了，它改变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就世界范围内来说进入了低潮。同时，也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究竟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了强劲挑战。所有这一切都

表明,目前社会主义运动处在历史发展的低潮期,但是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暂时现象,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是真理,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仍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苏东剧变,对中国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关键是我们的精神状态要振奋,要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把握世界形势变化的本质,不被历史长河中的漩涡和逆流所迷惑。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低潮孕育着高潮。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低潮将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预示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只要我们坚守住社会主义阵地,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就是我们的贡献。

2. 一支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

以苏联为代表的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虽然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力量,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强力量。苏东剧变发生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去何从,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邓小平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他明确表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①，“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②。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早在苏东剧变的时候,邓小平就强调:“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只要“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只要中国“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③

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②③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0~321页。

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深刻的变革。1991年7月5日,江泽民在会见葡共总书记阿尔瓦罗·库尼亚尔时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是新生的社会制度,出现曲折是难免的。他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重要的是各党要认真总结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正是秉着“担子重,责任大”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不能因为苏东剧变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既定政策,而是要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江泽民说:“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的全部成果。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①1991年10月,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原主编博奇格雷夫的采访时,就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后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确表示,一些人预言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会失败,这起码是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欧模式,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与摸索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3. 一个趋势——社会主义长期性与艰巨性、必然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苏东剧变的发生只能说明苏联和东欧所实践的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失败,而不能说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失败。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划时代的新生事物,从其建立之日起,就处于一种摸索的过程之中,其间出现一些失误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①

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

苏东剧变留给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建设党。江泽民强调:“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在党和国家面临严峻考验的重大政治斗争中,我们党的队伍、党的组织总的来讲是好的,但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不及时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不消除党内存在的隐患,党和国家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从反面给我们提出了这个严肃课题。”^②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着眼于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1. 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

思想建党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与发展。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或放弃,也是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必然。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首先是从思想上的胜利开始的,“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也是从思想理论的僵化落后开始的,苏东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失败为我们提供了惨痛的教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这一原则。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活发

^①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383页。

^② 江泽民:“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2000年),《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7~548页。

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还将进一步发展。改革和建设中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特别是改革的深化引起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和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都带来深刻影响。旧的平衡打破之后,新的平衡尚处于建立和完善过程之中,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党如何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呢?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要求我们党首先必须在思想上有清醒的认识,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关键是要加强党性修养,严格党内生活。党性是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不可能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增强,也不可能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一个领导干部党性强不强、威信高不高,跟是否经受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密切相关;一个班子党性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也同有没有严格的党内生活密切相关。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这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观点,也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要求。

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做法,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执政党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会损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甚至失去民心,丧失政权。那么面对这些严峻挑战应该怎么办?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能不能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2.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在苏联政治体制中,苏共名义上是执政党,实质上是国家政权组织。

“整个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活动都以共产党一个党做骨干。整个国家的公共生活是停滞或前进,是倒退或转向,完全由党的会议决定。”^①统一的苏联共产党不仅肩负着捍卫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重任,而且也肩负着维护联盟国家统一的重任,因此改革必须依靠苏共的力量来进行。这既是现实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

然而苏联政治体制的这一结构性特点不仅决定了苏共既是改革的倡导者、领导者和推动者,是改革的主要领导力量,同时也是改革的主要对象,是改革的客体。因此在改革时期,苏共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也更为敏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苏共成为其政治上的反对派——苏共党内和社会上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势力和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各加盟共和国中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共同敌人。苏共既阻碍着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争夺国家政权,扭转国家发展方向企图的实现,又阻碍着各加盟共和国“地方精英”和民族主义势力摆脱联盟中央控制、走向完全独立的“雄心”的实现。而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发动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的地位,实际上就是使国家政权陷入混乱和瘫痪。维系联盟国家的支柱——苏共的瓦解直接导致国家政权的失控,造成社会制度的剧变,随后便是联盟国家的解体。这是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根本之处。因此,“苏联的制度之所以垮台,并不是因为那里有太多的国家,而是因为根本没有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政党取代了国家”^②。而“把共产党清除出政治舞台以后,一下子就使苏维埃社会失去了支撑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活动体系的基座”^③,使改革失去了控制。

在中国,邓小平在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之时便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

① [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第91页。

② [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当代欧洲政治思想》,黄华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6页。

③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序言第3页。

党的领导。”^①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主要原因是:首先,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党的领导。在改革中,要明确地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如何执政和如何领导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样的改革是党自己的事,不能靠别的什么力量来领导,只能而且必须依靠党来领导。其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核心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涉及党政关系,而且涉及党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的关系,还要解决领导干部终身制、干部队伍实现“四化”和发扬人民民主等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进行统筹处理,这些问题很难解决。再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特殊复杂性,涉及面广,关联的问题多,又直接牵扯很多人的利益,需要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下进行。这就需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及时解决可能引起不安定团结的因素,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些国家搞所谓‘休克疗法’,结果引起了剧烈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教训是很深刻的。”^②而中国的“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为稳步推进改革、顺利实现目标提供了保证”。“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失误,一旦出现就无可挽回、无法弥补。”^③可以说,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3. 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苏东剧变,其根源在于执政的共产党砍了列宁主义的旗帜,推行一条错误的思想路线。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亡党首先是从思想上开始的。从斯大林时期的中后期开始,苏共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存在着严重的教条理解和形而上学的曲解,不是根据现实

①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

②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3页。

③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2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4~35页。

生活的要求进行发展创新,而是在更多时候恰恰犯了列宁所说的“制定”社会主义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设想不分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全盘照搬,忽视苏联国情,在主观主义与唯意志论的作用之下,大搞社会主义的“直线式”进攻,企图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立即建成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适应了改革对马克思主义要求创新的现实需要,但他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只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抽出一些他认为“有用的东西”,连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费边的社会主义著作中的“积极内容”,社会党国际的纲领中“合理的内核”一起,甚至与康德哲学中的“伦理观念”、基督教教义中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一起,把马克思主义“融化”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使苏共失去认识事物、辨别是非的能力而成为理论上的“侏儒”,丧失了执政的思想根基。正如普里马科夫所言,由于苏共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具有不容争辩之科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转变成一种特殊的宗教,被宣布为唯一正确的科学流派,而一切其他流派均为异端邪说。马克思主义被反复确认为万能的学说,对千变万化的现实不需任何适应地保持着自己所有结论的正确性——而与之争辩的尝试均宣布为离经叛道。最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被神化了,实质上变成了圣像”^①,使马克思主义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最终导致思想的枯竭。

“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使苏共丧失了理论创新的意识和勇气,丢掉了改造主客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弱化了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与解决重大问题的理论能力。社会主义大厦的崩溃正是从苏共思想理论上的贫乏开始的。正如曾担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博尔金所言,导致党被削弱的最深刻原因是,苏共和社会失去了一个全民族的伟大思想。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教条。正是由于能够在苏联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把群众联合起来的创造性思想已消耗殆尽,党不能得到新的理论武装,而戈尔巴乔夫又提不出能够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切实有效的新思想,最终导致苏共彻底失去了社会领袖的地位并被迫解散。

^①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焦广田等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在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结合时代条件的变化,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最终形成了指导中国改革的伟大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更是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时刻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能把这说成是不改革。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有领导有步骤推进改革,不求轰动效应,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①

4.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只有把党自身建设好,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带领中国人民阔步前进,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所言:“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在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②

^①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②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第一章 社会民主运动的形成背景

在 74 年的苏维埃政权史上,以 1988 年为分水岭,苏联社会民主运动突然爆发出来,并迅速在社会上形成燎原之势,以其前所未有的破坏力量松动和摧毁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社会基础,最终在社会的冷漠中以至上的“人民”之名亲手结束了这一政权。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从社会民主运动形成的起因来看,它既是苏联社会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的结果,又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刺激下社会过度反应后不满和怨气的发泄,更有不可忽视的因素则在于:苏联政治生活的分化和政治力量的重组——为了从苏联共产党手中攫取新的政治经济权力而借助于“民主运动”形成的政治压力集团,以及由此转变而成的政治夺权势力。在社会民主运动的激情狂欢中,曾经恢弘壮阔、威严肃穆的苏维埃政权轰然倒塌。这一切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看来,一切都在于变化了的“社会”。

一、思想成因:秘密报告

无论是以今天的眼光去翻检苏维埃政权过去的历史,还是以作为社会民主运动参与者的当事人的亲身感受而言,不得不说,赫鲁晓夫主持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在会上所作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是苏联社会民主运动的思想起因,也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公开性”的“精神启示录”。

1. 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6 年 2 月 14 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所以要

召开代表大会并作出“秘密报告”的决定,在赫鲁晓夫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考虑就是如何对待斯大林的政治遗产,或者说如何评价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的地位。一方面,由贝利亚案件^①所引发的社会连锁反应:大规模的逮捕、流放、枪毙等违法行为是怎么发生的?赫鲁晓夫说:“在贝利亚被捕和就他的案件进行侦查之后,揭露出了那些对我们隐瞒的秘密动机,这些动机原先引发了极其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并使许多人死于非命。……我感到有必要揭开内幕,弄清楚侦查究竟是如何进行的,都是怎样逮捕的,一共逮捕了多少人,有哪些逮捕所需的原始材料,后来就这些逮捕进行的审讯又说明了什么?我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了这些问题,并建议详加分析。这些问题特别令我感到不安,因为我们已经在开始考虑举行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了。”^②另一方面,由对贝利亚案件的审查和深入思考,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对斯大林的疑问: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贝利亚的行为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赫鲁晓夫承认,这就是他当时在考虑贝利亚案件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时碰到的一个敏感问题:“此事怎么会发生?大家都了解斯大林的作用、他的个性、他的革命性、他对国家的功劳以及党所指出的他的品质。他完全有理由起特殊的作用,因为他确实具有与众不同的组织能力和智慧。他确实超过其他人。即使是今天,尽管我对他的行为方式和他滥用权力感到无法容忍,我也承认这一点。不过,比方说,假如他至今还健在,假如就他的所作所为应负的责任问题进行投票的话,那么我就会认为应当给他定罪。不过,也要对他有个公正的评价。这个人并不是手持利剑来征服我们的心灵和肉体的。不,他在生活中表现出了自己的优点,领导国家的能力,让人服从他的能力,提拔人的能力,以及其他作为

^① 1953年7月10日,莫斯科各报刊登了一则爆炸性消息:几天前,苏联共产党举行了中央全会,决定把贝利亚从苏共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去,并开除出党。同日,贝利亚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职务也被解除。12月18—23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秘密审理了贝利亚案件,宣布他犯有叛国罪、间谍罪、道德败坏和杀害忠诚于党和国家干部等罪状。贝利亚和他的亲信共七人被处死。

^②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43页。

一个重量级领导人所必备的品质。”^①于是，赫鲁晓夫向中央主席团建议，由曾经担任过《真理报》主编，被公认为是与斯大林亲近的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担任负责审查 20 世纪 30 年代公开审判案件的专门委员会主任。

作出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决定，不仅是要对过去的历史作一个彻底清查以示同旧的去决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展现苏联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政治威信和执政能力，这就是赫鲁晓夫的第二个考虑。他说：

为什么我们要成立波斯佩洛夫的委员会呢？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即将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这是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当承担起领导党和国家的重任。为此就应当准确地了解原来都干了些什么，斯大林对于某些问题的决定是如何产生的。这尤其涉及那些被捕的人。问题是，他们因为什么坐牢？今后拿他们怎么办？当时在劳改营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斯大林去世已经三年了。这几年我们未能同过去决裂，未能鼓起勇气，从内心里感到需要稍稍撩起帐子，看看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一切究竟有怎样的内幕？没完没了的逮捕、审判、无法无天、处决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本身受到自己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活动的束缚，尚未摆脱终身的压力，虽说想象都想象不到这一切处决都毫无根据，用法律的语言来说，这完全是在犯罪。^②

经过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决定由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大会总结报告。

1956 年 2 月 14 日上午 10 时代表大会正式召开。赫鲁晓夫宣布大会开幕。他说：“我们失去了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活动家：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克列缅特·哥德瓦尔特，德田球一。请起立纪念他们。”然而，赫鲁晓夫的举动却让与会代表产生了疑问。意大利共产党人维达利对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1144～1145 页。

② 同上，第 1147 页。

这一举动的第一反应就是吃惊。他说：“只起立默哀了几秒钟。我们吃惊地面面相觑。这是为什么呢？德田球一是何许人也？这又是一种多么令人奇怪的默哀仪式啊，进行得如此短促，就像他害怕或者羞于提及这些死者似的。”^①然而这种奇怪的场面却预示着新的政治风暴，赫鲁晓夫显然意图要贬低斯大林的地位。

在简短的默哀仪式过后，赫鲁晓夫开始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赫鲁晓夫的报告并未让人耳目一新。因为“这位第一书记是一个实践家，而不是理论家，他的听众中那些期望他能根据新的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注入一些思想的人或者是感到失望，或者只能对他的讲话作出他们自己的解释”^②。不过赫鲁晓夫很快就让代表们感觉到了“新意”。

在谈及斯大林时，赫鲁晓夫说：“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我们队伍失去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敌人曾经希望我们党的队伍会发生混乱，在它的领导机构中会发生纠纷，在执行对内和对外政策时会发生动摇。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党更紧密地团结在它的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并且更高地举起了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③其实赫鲁晓夫的讲话在这里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按照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精神，在总结报告中加进了这样一段话：“党的十九大后不久死神从我们队伍中夺走了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И. В. 斯大林，而在他的领导下党在三十年中实现了列宁的遗愿。”^④但在赫鲁晓夫正式报告里，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和“在他的领导下党实现了列宁的遗愿”的话却消失不见了。“在报告中没有一处引自斯大林的原文，而在以往的代表大会上，演说者们都用它们来点缀自己的发言，其中也包括赫

① [意]维·维达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王德树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②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588页。

③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8页。

④ [俄]И. В.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385页。

鲁晓夫的发言。”^①在维达利看来,“正是斯大林发现了赫鲁晓夫,并且像慈父一样手把手地指导他进行一系列的工作,直到他成为党的书记为止。如果没有斯大林,赫鲁晓夫大概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了”。然而在上百页的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甚至一次也没有引用斯大林的话,而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他是不断引用的。发生了什么事吧?巴西人一再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也看到同样的疑虑反映在我所认识的其他外国代表的意味深长的目光中”^②。

然而变化并非仅仅如此。在此后的中央主席团成员的发报告中,也处处体现了党的事业继承者们对过去历史羞羞答答的拙劣遮掩与谈及斯大林时的局促不安。事实上,当大会开始之时,当苏共新一代领导人步入会场之时,他们代表的政治形象已经与过去有了深刻变化:在敬畏的眼神中却饱含着同情的底色。“他们全都上了年纪,看上去就像是翻船落水的幸存者;他们代表着所有几经风暴而仍然活着的人们。”^③

米高扬发言时通篇都是对“某个人”(指斯大林)的指责。他讲到了近三年来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恢复的集体领导,说集体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原则,现在不得不强调它的重要性,是因为大约近二十年来实际上不存在集体领导,而盛行的是早被马克思和列宁申斥过的个人崇拜。在维达利看来,米高扬的发言算是“终于得吐胸中的块垒了”。但是“二十年来的独夫专制是无人扼制的——而同一个米高扬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谈吐又是多么不同啊!我在听米高扬发言的时候,想起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就在我离开里雅斯特之前,我重读过那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斯大林是共产主义的缔造者;斯大林是军队的领导者;斯大林是卫国战争的胜利者;斯大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集体农庄庄员;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是伟大的天才领袖等等。‘如果列宁今天能看到我们,他该多么高兴啊!’米高扬曾这样说过。一点不错!他完全可能要你汇报你这二十年的工作和他离开这个世界以来的情况!”^④

① [俄]Ю. Б.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385页。

② [意]维·维达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王德树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③ 同上,第17页。

④ 同上,第37页。

苏斯洛夫的发言则更加拐弯抹角。他说：“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十九大之前得到传播的个人崇拜的理论和实践给党的工作，无论是组织方面的还是思想意识方面的，都带来了严重损害。它贬低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党的作用，无视集体领导，破坏党内民主，压制了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独立性，导致一些人工作中无人监督、不负责任，甚至独断专行，妨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产生片面性，有时则错误地解决问题。”^①然而在维达利看来，苏斯洛夫的批评“为什么都不指名道姓呢？他攻击建筑师、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攻击宣传家还在翻崩得分子^②和民粹派的旧账；攻击经济学家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总是犯教条主义和书呆子气，经常引用‘某个人’的话，搬弄那些语录，等等。他们全都不敢面对现实而躲在故纸堆中，靠搜集语录、引用‘某个人’的言语过日子，这样就永远不会犯错误；他们宁肯关心戏剧、音乐和诗歌之类不会惹祸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属于过去的玩意儿”^③。

当会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维达利开始认识到，“这里有一个对斯大林的谴责逐步加成的计划。调子一天比一天尖锐，指责的内容也越来越具体”^④。马林科夫在发言时讲到党内生活中严重的不正常现象，讲到个人崇拜和各种错误等。“但是他在哪儿待过呢？他是斯大林的得力助手，也是贝利亚的至交。”^⑤莫洛托夫的发言则令人感到悲哀。“他脸色苍白，身着黑衣，系黑领带，看上去像一具刚复活的尸体。他的头看来几乎像个骷髅。这个人目睹过多少重要事件啊！代表向他表示热烈欢迎。他心平气和、从容不迫地讲话，而没有提到‘那某个人’。他至少在这里是尊重那位死者的。斯大林逮捕他的妻子时，曾把他软禁起来。他为了继续担任外交部长，不得不

① [俄]Ю. В.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393页。

② 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成立于1897年9月。崩得曾在成立初期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之争中转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国共产党（布）。

③ [意]维·维达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王德树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④ 同上，第40页。

⑤ 同上，第47页。

设法同妻子离婚。”^①伏罗希洛夫的发言博得了与会代表的阵阵掌声。“人们普遍感觉到,代表们只要有可能,就要对那些做过斯大林的同事后来又失宠的老近卫军成员表示深切的同情。看来人们对个人崇拜的历史迄今还没有很好地省悟过来;个人崇拜就是这样盛行了不是二十年,而是三十年!”^②事实上,无论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还是伏罗希洛夫,“历来都是唯命是从、百依百顺的;他们这样对待斯大林已长达三十年之久,从而使斯大林独揽政治、经济和内外事务的大权。不过,他们是直接的同伙,而且他们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同志消失,为这种镇压叫好,而且写文章为一切开脱。说他们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工具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是直接的同伙”^③。

会议的进程并不能让赫鲁晓夫满意。1956年2月14日,大会一致通过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决议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赞同中央委员会在它的总结所提出的建议和结论。^④但是有一个念头始终让赫鲁晓夫感到苦恼:“大会快要结束了。要通过决议。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东西。以后怎么办?我们还要对数十万受到处决的人,包括党的十七大选出的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负责。幸免遇难者寥寥无几,几乎党的全部骨干均受到了处决或者迫害。走运者、幸存下来的人是凤毛麟角。现在该怎么办呢?”^⑤于是,赫鲁晓夫在大会休息期间召开了中央主席团会议,提出了要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但是赫鲁晓夫的提议遭到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激烈反对。伏罗希洛夫说:“得了吧!这怎么行?难道可以原原本本地在大会上讲吗?这会对我党的威信、我国的威信产生什么影响呢?这是无法保密的。到时候会对我们提

① [意]维·维达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王德树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② 同上,第59~60页。

③ 同上,第47页。

④ 参见[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页。

⑤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49页。

要求。我们个人的作用怎么交代？”^①发现无法取得主席团成员的一致同意后，赫鲁晓夫不得不转向代表大会并向代表们提议听取自己的报告。他向中央主席团提出建议：“党的代表大会正在进行。大会期间，那条要求中央委员和中央主席团委员中的领导人保持一致的内部纪律已经失效。总结报告做过了，每个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都有权在会上发言陈述自己的观点，即使不符合总结报告精神的观点也可以讲。”^②

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冒险的，但这是他本性的一个特点。对千百万苏联人来说，其中也包括许多代表大会的代表，缅怀斯大林是神圣的，现在赫鲁晓夫企图给斯大林抹黑，他是置自己的威信于危险之中。因此他竭力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报告是以中央主席团的名义做的。在报告之后不安排讨论的决定更加深了这种印象。这样，赫鲁晓夫就预先防止了发言，因为发言使代表们立即知道主席团成员中有不同意见，这将导致对报告更为坦率和尖锐的批评”^③。尼克松也认为，赫鲁晓夫的举动“并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道德败坏的新事例，而是一场预谋的政治赌博的一部分。……他谴责的只是可能与他的政敌有牵连的那些罪行。实际上，他通过歪曲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历史来推动自己发动的大清洗运动”^④。赫鲁晓夫的政治冒险成功了。莫洛托夫对在中央主席团向赫鲁晓夫的让步是这样解释的：“我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势下，假如我们，甚至是我带着这样的看法发言，我们很容易被开除。这至少会在党的某些层面引起分裂。这种分裂可能会很深刻。就拿捷沃相，当时的黑色冶金部部长来说，他对我喊道：‘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是斯大林主义者，是的。驻中国大使尤金也是。在代表大会上他们俩来找过我……”一些大致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指责莫洛托夫：“在二十大上您为什么保持沉默？”……结果就是沉默意味着同意。在回答丘耶夫的意见——赫鲁晓夫的报告“彻底改变了全部政策”时，莫洛托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49～1150页。

② 同上，第1151页。

③ [俄]Ю. В.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396页。

④ [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尤德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77页。

夫说：“不是从他开始的……当然，这开始得更早。南斯拉夫问题是在1955年……我认为，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已经完成了转折……而我试图反对过，结果大家都反对我，大家，其中包括过了一年、一年半支持我的那些人。在代表大会之前就已发生了转折，由于完成了转折，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才能挑选对他喊‘乌拉’的班子。”^①

中央主席团最终决定补充一项议事日程：听取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于是，1956年2月25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在没有外国代表团参加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②赫鲁晓夫赋予了报告新的形式。“他决定要充满感情地作报告，要津津乐道破坏法纪的故事，把阐述的水平降低到庸人的小故事。”^③其效果显而易见：不仅是作为第一批听众的女速记员们边听赫鲁晓夫讲述边痛哭流涕，而且代表们也表现出赫鲁晓夫预想中的震惊：

代表们默默地听完了我的报告。可说是鸦雀无声。一切都来得太过突然。当然，应当明白，关于党员、功勋卓著的老布尔什维克和青年被施以种种暴行的讲述，令与会代表们听得目瞪口呆。多少好人死于非命啊！他们都是被提拔到各个工作岗位上的。这对全党和大会代表

^① [俄]Ю. Б.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397页。

^② 苏共中央曾经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的副本分送各级党组织并采取保密措施，不让这些材料留在地方上，要求将其归还苏共中央。但在分送给其他兄弟党的材料中，发生了泄露。赫鲁晓夫回忆：当时正好波兰的领导人贝鲁特去世，在波兰发生了动乱，文件落入那些对苏联不友好的人手中。他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了这个文件，对文件进行了复制。我甚至听说波兰人将其廉价出售。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不值几个钱。说得形象一点，在集市上，包括来自全世界的谍报人员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买到。这样，波兰同志就“帮了我们的忙”：这份文件被公之于世了。不过我们并未正式证实该文件的存在。记得当时有记者问我，就此问题您能够谈点什么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份文件，这个问题还是让美国情报部门、让阿伦·杜勒斯先生来回答吧。[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55页]1987年7月30日，苏共中央决定全文公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1989年4月5日，苏联首次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此之前，流传于世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是美国国务院于1956年6月4日发表的。

^③ [俄]Ю. Б.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396页。

说来都是一场悲剧。^①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都引起了很大争议。参加代表大会的维达利认为：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每个人都感到震惊。赫鲁晓夫想保全自己——但我不相信他会成功，因为与其他人相比，他本人更是斯大林的工具，是斯大林的同伙，是拍斯大林马屁的人。……过去发生的一切，以及今天正在发生的和将来还会发生的，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能单独归咎于现在已无法为自己辩解的斯大林一个人。这责任得由所有同他一起在苏联和国际组织中工作过的人共同来负；因为当时执行的政策尽管带有斯大林的深刻印记，但都是由我们大家制定出来并加以接受和贯彻的。我们大家无论是在上级机关或者下级机关，是在前线或者后方，都不同程度地对我们所起的作用应负直接或间接的一部分责任。^②

苏共党内思想上更是一片混乱。戈尔巴乔夫回忆说：

我在边疆区党委看到了中央的通报信，信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将那篇报告叙述了一遍。我赞成赫鲁晓夫的大无畏行动。我并未隐瞒自己的观点，当众表明了立场。但我发现机关中对于报告的反应相当混乱，甚至可以说是张皇失措。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整个党的工作、我国社会的整个体制都是建立在斯大林的威信之上的。一切都靠这个来说明和辩解。可如今“基础”垮掉了。每个机关工作人员所遵循的铁的纪律精神要求服从中央的新方针，但是远非每个人都能领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52页。

^② [意]维·维达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王德树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

会和理解这个方针。许多人不露声色,静观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等待下一步的指示。……在“上层”,有人是出于直觉,有人是完全自觉地,反正大家当下就明白了,批判斯大林,就是批判体制本身,就是对体制的存在构成威胁,因而也威胁到当权者的平静安宁。最初贯彻二十大决议的会议上,各级领导人听到人们提出的“你们当时都到哪里去了”之类的问题,这一点就更明显了。^①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来说,秘密报告更是掀起了政治狂潮。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罗波夫后来讲道,党的二十大刚刚结束,当时的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就突然邀请他去打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拉科西用俄语说道(他显然指望谈话内容传达到莫斯科):“这么干不行。没有必要仓促行事。你们在代表大会上干的事情,那是一场灾难。我还不知道它在贵国和我国会怎么表现出来呢。”^②

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发表50年之后,美国学者格雷弗·弗将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暴行的论据归纳为57个,然后逐一进行批驳,斥其为满纸荒唐。^③事实也的确如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无论从分析方法还是叙事手段上都缺乏严谨的论证。戈尔巴乔夫指出:“如果认为苏联社会历史上悲剧事件的原因仅仅在于‘恶棍’斯大林的个人品质,那就相反地无异于成为‘个人崇拜’的俘虏。既然问题在这里,那么只需将坏领导人换成好领导人,我们就可以保证不会重犯错误。赫鲁晓夫仿佛在对大家说:我老实地讲出过去的事情,没有任何隐瞒,相信我吧,跟着我吧,一切都会好的。换句话说,建议大家以一种崇拜来代替另一种崇拜,却无意去触动体制的基础。”^④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3~54页。

② 同上,第54~55页。

③ 参见[美]格雷弗·弗:《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马维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代前言第3页。

④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6~57页。

尽管对报告存在着各种潜在的质疑甚至敌意,但是赫鲁晓夫仍然坚持认为:

问题提得绝对正确而及时。我不仅不像有些人可能认为的那样感到后悔,而且感到满意,因为我准确地把握了时机,坚持要做这样的报告。因为完全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当时依然在休克的状态中,而且仍然把人关在监狱和劳改营里。简而言之,我们在1953年就搞出了一个关于贝利亚所起作用的说法,即贝利亚应对斯大林生前出现的滥用权力行为完全负责。这也是休克的结果。我们当时怎么都无法摆脱所谓斯大林系人民之父、天才等观念。马上就认为斯大林是刽子手和恶魔,这办不到。因此在审判贝利亚之后,我们囿于下面的说法,我们是为了替斯大林恢复名誉才搞出这个说法的:有错的不是上帝,而是上帝的侍者,是他们向上帝谎报军情,所以上帝才降冰雹,降雷电,降灾难。人民受苦受难,并不是因为上帝想这样,而是因为侍者尼古拉、先知伊利亚、贝利亚等不好。我们尽量为斯大林洗刷、辩白,同一条俄国谚语完全背道而驰,那条谚语为:黑马是刷不白的。毫无疑问,这是一匹黑马,我们却依然想把它刷白。^①

2. 苏联的“解冻”与社会心理的变化

无论如何,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标志着苏联社会一个新的开始。“党的二十大的主要成果,是它开始了党去除污点并回归到列宁和我国其他优秀儿女曾为之奋斗的生活准则的过程。”^②与其模糊地说是苏共二十大开启了新的生活,不如更准确地说是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上作的秘密报告引起了苏联社会的心理震动和思想变化。“1956年春天到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53页。

^② 同上,第1159页。

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成了全国某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动。”^①

代表大会之后的时期开始被称为“解冻时期”^②。赫鲁晓夫说：

爱伦堡使用了“解冻”这个字眼。他认为斯大林去世后人们的生活开始解冻。这样来形容那个时期，我当时并不完全赞成。毫无疑问，出现了一些松动。如果用警察式的语言来表达，那么我们放松了控制，人们说话比原来自由了。然而我们身上是两种情感在斗争。一方面，这样的松动反映了我们国内新的情况，我们在往这方面努力。另一方面，我们当中有人根本不想解冻，他们责备说：假如斯大林活着，他是绝不会允许这样做的。反对解冻的声音清晰可闻。而爱伦堡在他的作品中善于十分准确地发现当前的倾向，对于奔驰的时代做出描述。我认为，他所用的字眼反映了现实情况，尽管我们当时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批判。^③

尽管秘密报告是作为内部文件传达的，但是关于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批评的消息仍然不可避免地在苏联社会传播起来。“苏联人民第一次广泛地获得有关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的信息。至今小心隐瞒的事或在难得公布的材料中‘有限’通报的事，现在像洪流般涌向人们的意识，而他们早就想知道国家级的决定是怎么作出的。接见他们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由于信息来自于直接目击者及内部会议的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② “解冻”是由爱伦堡发表在《新世界》1954年3月号的中篇小说的名字命名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当时发表的小说的名称与正面理解代表大会相适应，把代表大会看成是使苏联社会结束“冰冻”状态的事件。爱伦堡在小说中没有粉饰地描写生活，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外省城市和工人村镇的食品匮乏，城市住房的简陋，农村生活的艰难上。通过画家的形象嘲笑了现实的“粉饰者”，那个画家靠画“生产”题材得到高额报酬，而与此同时，只是画风景画和有着患病的妻子的天才画家却过着贫寒的日子。而在1955年发表的小说第二部中，爱伦堡描写了新时代的“正面特点”。作家要人相信，人们“开始挺直腰杆”，经常和大胆地在会议上发言。见Ю. В.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418~419页。

③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507~1508页。

参加者,因此它能被人相信。”^①

秘密报告对苏联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文学、艺术、音乐等最先对秘密报告的影响作出了反应。剧院舞台上开始上演根据考涅楚克的剧本《翅膀》排练的话剧,其中一位女主人公囚禁归来。话剧结尾的歌曲里说,国家“张开了翅膀”。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生活象征的爵士乐也开始流行。作为苏联第一支爵士乐队的组建者和独唱演员的人民演员——乌乔索夫的唱片重新开始出售。文学、绘画和雕刻中的抽象主义流派重新盛行。作为雕塑家的涅伊兹韦斯和诗人的叶夫图申科坚决支持抽象主义。另外,从1956年起,一些反映国内战争的电影《第四十一个》《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共产党员》《凭列宁的介绍信》《列宁的故事》等开始放映。社会生活上的变化最显著地体现在青年身上。时髦的发式、服装、音乐、生活方式成为青年们关注的对象。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和大学生国际联欢节,对苏联青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多年以来的第一次,苏联青年能够与外国的同龄人自由地接触。参加过联欢节的那一代人就说:“莫斯科联欢节的结果,不是‘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胜利,而是自由的西方和摆脱了斯大林主义束缚的苏联欧亚大陆的相互结识。”^②

如果说文学、艺术、音乐等仅仅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和超越,那还不至于引起苏联官方的警惕。但是,“解冻”在描述正面的理想的时候,其重点不是培塑人民对当下社会生活的信心,而是回到了对斯大林之前国家的过去的美化。“当时反映革命的过去的电影如一股洪流……在这些影片中……革命的——斯大林前的——时代本身……以非常浪漫化的形式呈现,那是自由的建设生活的时代(既是全民的,也是个人的),是可以怀念的时代。要是我在其中,在这些过着丰富多彩生活的人中间多好。”^③那时的人们很少有人会深思:“对过去的各种浪漫主义的理解包含的不仅仅是反抗当

^① [俄]Ю. Б.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415页。

^② [俄]亚历山大·佩日科夫:《“解冻”的赫鲁晓夫》,刘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300页。

^③ [俄]Ю. Б.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419页。

今生活的因循守旧,而且也与逃避当前现实问题、回到逝去的过去这一点相关。革命浪漫主义往往以反常的但又是合乎规律的方式带有反向的特点。‘解冻’的革命浪漫主义破坏了苏维埃政权几十年中积淀下来的不公正和不合理,同时又使二十大前积累起来的历史经验化为乌有。”^①于是,代表大会后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出现的对革命年代初期的浪漫激情的怀念,“不可避免地导致复活斯大林时期已被批驳的革命的虚无主义,好像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同情在赫鲁晓夫身上苏醒了”^②。

于是,党的机关本能地感到了惊恐:

党的机关工作者都具有在警察国家中生活的长期经验,多年来这里不论是历史还是文学(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幌子下),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对可怕的现实情况作即使是模糊的影射。这些胆战心惊的人,同反复捉摸那些新的、令人兴奋的书藉和文章的读者一样,都清楚地懂得,对过去的谴责常常包含着对当今的批评。要挡住这股洪流,为时已晚;但无论如何他们要控制住。他们尤其担心,而这种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一旦要对那些曾经支持斯大林消灭无辜的牺牲者的人采取惩办措施的话,不管是采取开除出党的办法也罢,或者在更坏的情况下采取追究刑事责任的办法也罢,就会引起一连串的事情和行动,谁也无法预料会有怎样的结果。^③

作为始作俑者,赫鲁晓夫开始为他打开的“魔盒”感到害怕:

苏联领导层,其中也包括我,在决意迎接解冻的到来和有意识地去促进解冻的同时,也有点害怕解冻:可别因为解冻,一场春汛劈头盖脸地朝我们袭来,弄得我们穷于应付。事态的这种发展在任何政治问题

① [俄]Ю. Б.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419页。

② 同上,第420页。

③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596页。

中都是可能的。

朝我们袭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害怕失去对全国的控制，对于从领导层的角度来看不合时宜的情绪，我们遏制其发展蔓延，不然巨浪就会汹涌而来，冲毁一切。我们担心领导人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能，无法使变革的进程依然局限在苏维埃的航道之内。我们想解放人们的创造力，然而是要让新的创作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就像民间所说的：又想要，又扎手，妈妈也不准。就是这个情况。^①

于是，对“解冻”的害怕使赫鲁晓夫开始重新扎紧社会的“口袋”。1962年12月在与知识界的座谈会上，赫鲁晓夫严厉批评了涅伊兹韦斯内。“连粗话也用上了，我说他给自己起这个姓不是没有用意的。他的姓使我有些感到恼火。”^②即使是涅伊兹韦斯内后来表示要从抽象主义转到现实主义，赫鲁晓夫也不改他对抽象主义的蔑视。与此同时，开始强化对文学创作的书报检查制度。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一批作家的作品先后被以各种理由禁止在苏联国内出版。尼克松说：

在“解冻”时期，赫鲁晓夫容许文艺在表现形式上有更大的自由，但是他自己却保留着什么该批判、什么不该批判的决定权。斯大林时代的许多恐怖事件遭到了攻击，但那些延续到赫鲁晓夫时代的事件却不受攻击了。赫鲁晓夫严格实施文艺方面的规定，他知道要是给了知识分子一点自由，要防止其滚雪球似地不断扩大是很困难的。有一次，他对一批作家说，1956年如果匈牙利政府干脆打死几个挑起不满的作家，那场革命本来是可以制止的。他绷着脸，两眼盯着这些作家说，如果苏联发生类似的情况，“我是不会手软的”。^③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508页。

② 同上，第1509页。

③ [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尤懿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76~277页。

然而当“解冻”已经渐渐演变成为一场“春汛”的时候,严厉的管制再也无法管控人们变化的心理。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社会开始广泛流行这样一则笑话。据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说,当赫鲁晓夫在共产党会议上发言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时,听众席中有人给他递了一张条子,问他:“当时你在哪里?”赫鲁晓夫在扩音器里念了这张条子,并大声说:“这张条子是谁写的?请站出来!”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显然这个人不打算站出来。“好吧!”赫鲁晓夫决心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那时,我就在你现在待的地方。”^①这则笑话的流行证明了,人们对党的领导人的高尚和英勇的信任动摇了。“赫鲁晓夫报告以后,越来越多人认为,领导人想的首先是自私的利益。赫鲁晓夫的报告加强了厚颜无耻和不信任的情绪,强有力推动了苏联社会的道德和思想被侵蚀的进程。赫鲁晓夫的报告掺杂着使人气恼的真相和诬蔑诽谤,引起了社会上的慌乱不安。”^②

然而“无论如何,二十大给社会一个极大的推动,它为重新评价内外政策、分析历史事实奠定了基础”^③。戈尔巴乔夫说: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赫鲁晓夫揭露“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行动。的确,他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分析太少,主观的成分太多。将极权主义问题归结为外部原因和独裁者的坏性格,这是个便当而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揭示出其深刻的根源。赫鲁晓夫的个人政治算盘也是一目了然:他率先揭露“个人崇拜”,立刻就最亲密的竞争者和对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冻结起来,这些人和他恰好都是斯大林的亲信。

所有这一切都不错,然而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说来,他的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仅暴露出整个我国社会极其严重的状态、其中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扭曲性质,

① [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尤懿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77页。

② [俄]Ю. B.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424页。

③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而且暴露出缺少最起码的法制。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作赫鲁晓夫的功劳、他的支持者的功劳。^①

3. 改革语境中的苏共二十大及其象征

无论怎么说,苏共二十大在苏联政治史上已经成为具有独特意义的象征符号,并被不断地演绎成为充满玄机的政治神话。“赫鲁晓夫将真正的事实与许多歪曲历史真实和逻辑的杜撰掺杂起来,由此创造的神话成为摧毁社会意识的强大工具,其毁灭性之大还因为二十大的神话是20世纪最持久的神话之一。”^②以至于时过境迁50年之后,英国《每日电讯报》将秘密报告赞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演讲”。因撰写赫鲁晓夫传记而获2004年普利策新闻奖的威廉·陶布曼在《纽约时报》撰文称,赫鲁晓夫的这一讲话是事件史册上最值得表彰的“伟大的英勇行为”^③。

尽管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的中央全会上被罢免了所有职务,成为一位“特定养老金领取者”^④,但是历史却也正因为赫鲁晓夫个人的政治遭遇而赋予了其在苏联体制下改革的政治意义。当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时,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消失了的“赫鲁晓夫”慢慢闪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② [俄]Ю. Б.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413页。

③ [美]格雷弗·弗:《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马维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页。

④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670页。

现,并在改革的初期从一个“被认为不存在的人”^①开始与列宁一道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圣像”。

1985年4月27日,苏联红军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索罗金海军上将在纪念打败纳粹德国四十周年的文章中列举了一批“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的名字,其中出现了“赫鲁晓夫”。这一举动打破了勃列日涅夫以来的政治禁忌,因而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意义。舆论认为:“二十年来,苏联几乎是禁止提赫鲁晓夫的名字的,可是今天却公开称他是‘杰出的’苏联领导人之一。看来这是为这位‘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创始人恢复名誉而采取的行动。”^②7月23日,苏联电视台播放了赫鲁晓夫在1957年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一个特写镜头。尽管这个镜头一闪而过,但这是戈尔巴乔夫3月上台以来的第二次。

苏共二十七大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政权的日益巩固,其推动改革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决,而其面临的改革阻力也越来越大时,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在舆论的眼中开始成为改革的“政治孪生子”。

1987年《新时代》周刊第5期发表文章认为,戈尔巴乔夫要把改革深入推进下去,必须首先对苏联过去的两次改革进行深刻总结。^③

文章指出:

翻阅报纸或打开电视机都可看到,到处都在为执行苏共第27次代

① 在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时期,赫鲁晓夫被看作是不存在的人。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只有两次正式提到过赫鲁晓夫的名字。一次是批评他的回忆录在美国发行,第二次是不引人注目地宣布他死去的消息。安德罗波夫在掌权后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主张保留历史本来面目,指出“哪些是好的,但是还有哪些是不好的”。安德罗波夫授权发表了至少三篇文章,把赫鲁晓夫描绘成为受尊敬的战争领导人,虽然这些文章并未承认他在政治方面的成绩。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曾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接受过勋章。在契尔年科时期,则根本没有提到过赫鲁晓夫的名字。相反,契尔年科在1984年却给忠于斯大林而坚决反对赫鲁晓夫的莫洛托夫恢复了名誉和党籍。不过,在1985年2月底,契尔年科由于身患重病无法理事的时候,情况有了些许变化。苏联电视台播放的关于印度前总理尼赫鲁生平的纪录片中出现了赫鲁晓夫的镜头,而在过去20年里,常常放映的这部电影却没有他的镜头。莫斯科电影院放映的另一部纪念斯大林在1945年6月出席庆祝胜利的阅兵式的纪录影片也有赫鲁晓夫的镜头。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曾是《消息报》主编,现在获准在一家对外政策刊物上发表他的回忆录。

② 法新社莫斯科1985年4月27日电。

③ [苏]《新时代》,1987年第5期。

表大会的决议而斗争，一切都在变化，大家都在开展批评。我对此衷心欢迎，但心情是沉重的。

我不能不回想起苏共二十大时的情况。苏共二十大是一次清扫风暴，它曾使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学会了思考、行动和提出不同意见。带着困惑、痛苦和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厌恶感情，我和我这一代人看到了我党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这次代表大会的思想是如何被埋到官僚主义的沙漠中去的。

我们当时没能恢复党和国家生活中列宁主义准则的生气勃勃的民主精神。向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捍卫者们挑战的赫鲁晓夫，很快就开始允许甚至鼓励对自己的吹捧。勃列日涅夫无疑是个具有健全思维的人，但他也允许别人把自己变成偶像。

我回想起1965年的经济改革。当时决定摆脱扼杀城乡经济的行政部门的束缚、过分的集中和琐碎的监督现象。开始扩大企业的权利，实行经济核算和学习把计划与商品货币关系结合起来。但后来又回到无人负责、无穷无尽地修改计划指标的老路。

为了使目前的改革获得成功，应当回忆并弄懂，1950年和1965年的两次改革为什么以失败而告终。共同的答案是因为我们不坚决、采取治标办法和不善于坚持到底。我们一只手交出权力，另一只手又把它收回。我们通过了新法律，但又不触动旧指示。我们开始讲真话，但只讲一半。每一个治标办法、每一项停留在纸上的决议都是改革的敌人筑防的堡垒。

1987年3月4日，英国《情报文摘》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同尼基塔·赫鲁晓夫相比的话会怎么样？这是还记得赫鲁晓夫的苏联人，尤其是科学院成员这样一些比较能言善辩的人提出的一个问题。

同戈尔巴乔夫一样，赫鲁晓夫认为自己是一个改革家，而且还同戈尔巴乔夫一样，他喜欢直接求助于人民，尤其是在遇到党的统治集团设

置的障碍或在政治局遇到障碍的时候。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开朗性格对他有所帮助,而赫鲁晓夫是一个依赖实际行动获得成效的粗鲁和善于随机应变的农民。的确,赫鲁晓夫是干了实事。当需要采取行动时,他不会犹豫。他执政不久就同贝利亚发生了直接冲突。贝利亚曾是克格勃负责人。赫鲁晓夫为了向政治局、全党和全国表明他是当真的,就把贝利亚枪毙了。随后,他在一次党代会上发表长达几个小时的讲话,谴责神一般的人物斯大林。

赫鲁晓夫执政时间像戈尔巴乔夫现在这样长的时候,他不仅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谴责贪污现象和低效率,而且还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清洗。但是,赫鲁晓夫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不仅无视手持长刀的人,而且对他们不屑一顾。这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一伙人。1964年,他们在赫鲁晓夫没有提防的时刻发难。赫鲁晓夫受到冷落,被剥夺了一切。因此,苏联又出现了20年的新斯大林主义以及工业、经济和技术停滞不前的局面。

如今,好容易才又有了一个新官上任。尽管戈尔巴乔夫富有魅力,他到目前为止取得了什么成就呢?人们发现,戈尔巴乔夫讲话很大胆,但是行动很谨慎。他也许对手持长刀的人记忆犹新。

1987年3月19日,苏联政治科学协会副主席、《文学报》著名评论员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教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最近一个时期,我们的文件中没有对赫鲁晓夫个人和他所领导的那一段时期进行正式的评价。我可以谈谈个人的看法,但完全不是官方的看法。我那时在党中央工作,我直接观察到赫鲁晓夫的活动及其后果。他有积极的方面,也有弱点和缺点的方面。积极的方面是苏共二十大决定反对个人迷信。弱点和缺点恰恰在于经济改革和我们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方面。这些弱点和缺点同他个人的素质有关,他是很活跃的人,但文化水平不高,特别是缺乏专门知识。我想,我们党将不得不重新评价我党历史上所有的人,但这需要研究,从历史的观点来看

问题,免得将来又回头来重新评价。”^①

1987年4月30日,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室主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布坚科在苏联新闻社出版的《苏联一览》发表了关于苏联社会改革问题的谈话。他在谈话中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错误,肯定了赫鲁晓夫主持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在反对个人迷信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当时开始的社会更新过程。布坚科指出,以往的许多错误,都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搞个人迷信时期产生的现象有关。因此,苏共不得不在二十七次之后,在1987年的一月全会上重新对这一时期进行评价,以便彻底弄清今天的问题。谈到目前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时,布坚科说:恰恰是当时那些不许把揭露和谴责个人迷信的苏共二十大决议贯彻到底,实际上中断了苏联社会生活更新过程的势力,现在还是不想变革,阻挠变革。他强调:“如果今天不彻底弄清这种势力的本质和立场,不给予打击的话,苏联的改革还会停滞,还会走回头路。”^②

1987年7月30日,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总编辑在会晤《读卖新闻》记者时明确表示,苏共中央已决定全文公布作为批判斯大林的发轫点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他说,虽然具体的刊载日期还未定,但将在“今年11月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作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报告之后的可预见的将来刊登”。同时,对于苏共中央发布《秘密报告》是否会给人们造成冲击的忧虑时,这位总编辑认为不会对人们造成什么冲击。因为“就斯大林的错误,已发表过大量的论文及回忆录,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新东西”^③。

1987年9月1日,日本外务省情报调查局长新井弘一在《新国策》上撰文指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会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④新井弘一说,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相同之处在于:一是两人都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赫鲁晓夫执政时,苏联刚刚结束了斯大林长期的严酷政治,国内人民疲惫不堪;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受执政长达17年的勃列日涅夫政策的影响,

① 新华社莫斯科1987年3月19日电。

② 新华社莫斯科1987年4月30日电。

③ 香港《文汇报》,1987年7月30日。

④ [日]《新国策》,1987年9月1日。

苏联经济和社会停滞不前。二是两人都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赫鲁晓夫提出了非斯大林化政策,戈尔巴乔夫则推行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又有不同之处:文化水平和所处的时代不同。赫鲁晓夫是矿工的儿子,是斯大林时代的领导人;而戈尔巴乔夫是有学问的大学毕业生,是战后派领导人;最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有了赫鲁晓夫倒台的教训,不会重蹈覆辙。从最近两年看,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讲话大胆,言辞激烈,同赫鲁晓夫有相似之处,但行动非常慎重,国内改革也只限于制度内调整,而未触及制度本身。

在广泛的舆论准备之后,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1月2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了《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政治报告。在谈及赫鲁晓夫时,戈尔巴乔夫第一次给予了全面评价。^①他说:

在五十年代中期,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变革之风吹到国家上空,人民振奋起来,活跃起来,变得更大胆,更有信心。批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恢复社会主义法制都要求党及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拿出很大的勇气。开始摧毁以前对内对外政策中的刻板公式,摧毁三十至四十年代所确立的发号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赋予社会主义以更大的活力,强调人道主义理想和价值观,在理论和实践中恢复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

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一九五三年)和七月全会(一九五五年)决议的核心是力求改变经济发展的先后次序,是联系与劳动成果挂钩的个人利害关系的刺激因素起作用。于是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发展农业、住房建设、轻工业、消费领域和与满足人的需要有关的一切方面。

总之,无论在苏联社会中,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发生了良好的变化。然而也犯了不少主观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使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复杂化了,在很大程度上也损害了一些先进创举的名声。问题在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87年11月2日电。

于,对内对外政策和党的建设的崭新任务常常用唯意志论的方法,利用老一套的政治和经济办法来加以解决。但是在那个时期进行的改革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依靠广泛发展民主化进程。

戈尔巴乔夫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响应。

1988年1月7日,《莫斯科真理报》发表文章赞扬莫斯科的一个郊区取消以勃列日涅夫命名的名字,赞扬赫鲁晓夫是现代化的莫斯科的建设者,说现代化的莫斯科市有一大部分是在他执政期间建成的。文章指出:“切列穆什金区的外观是同赫鲁晓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赫鲁晓夫身居党领袖的高职,还天天过问市里的事务。”又说:“赫鲁晓夫喜欢建设。由于他的功劳,莫斯科不仅有切列穆什金区,而且有其他一些低层建筑的地区。”这篇文章是苏联新闻界对赫鲁晓夫的罕见的赞扬。^①

1988年1月15日,莫斯科《新时代》周刊发表署名为V. 沃罗比约夫的呼吁信,要求把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重新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宫墙旁边已故苏联重要领导人的附近。沃罗比约夫在呼吁信中说:“我阅读了大量有关葬在克里姆林宫宫墙边的非凡人物的情况,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赫鲁晓夫的坟墓不葬在那里。”“我认为,赫鲁晓夫同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一起载入史册,因为那次代表大会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勇敢地奉行了一种使社会民主化的政策,并组织了中亚处女地的开垦。他还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②

1988年2月24日,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顾问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在《文学报》上再次发表其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在名为“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的文章中,布尔拉茨基认为:“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无比重要,而且也许是最复杂的时期。说重要是因为,它直接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以及如今的民主进程相呼应。说最复杂是因为,它所涉及的10年起初被称为‘光荣’的时期,而后又被斥之为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时期。”^③

① 路透社莫斯科1988年1月7日电。

② 路透社莫斯科1988年1月15日电。

③ [苏]《文学报》,1988年2月24日。

他称赞赫鲁晓夫 1956 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秘密报告”谴责了斯大林的罪过。赞扬赫鲁晓夫加强了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了农业和工业,并改革了司法制度。不过,布尔拉茨基的言论被外界广泛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对赫鲁晓夫的最新认识。2月25日的《华盛顿邮报》就明确指出:“苏联和西方的许多学者认为,对赫鲁晓夫的这种新的认识和评价是来源于戈尔巴乔夫本人。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位在赫鲁晓夫‘解冻’期间开始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政治领袖。虽然他比赫鲁晓夫更有教养,受过更好的教育和政治上更精明,但是许多分析家一致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与经济改革计划是脱胎于赫鲁晓夫当年流产了的努力。”^①

从 1989 年 3 月起,思想理论杂志《论证与事实》周刊开始刊登由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保存和提供的赫鲁晓夫回忆录。3月号出版的《苏共中央通报》首次公布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是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越来越触及苏联的政治制度,赫鲁晓夫改革的象征意义已经从冲破旧的管理体制的努力转向为警惕党内保守派的抵制和可能发生的政变了。

1989 年 4 月 17 日,在由电影工作者协会组织的纪念赫鲁晓夫诞辰九十五周年的莫斯科集会上,经济学家加夫里尔·波波夫说,赫鲁晓夫是攻击共产党垄断权力并且是扩大农民和全国公众权利的第一位领导人。美国历史学家和苏联问题专家斯蒂芬·科恩在集会上说:“赫鲁晓夫是党内反斯大林主义运动之父,这场运动已成为今天改革的驱动力量。没有赫鲁晓夫就不可能有戈尔巴乔夫。”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建议戈尔巴乔夫应该记住他的改革前任的命运。“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自己。现在的改革也是依赖于两三个人。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黑暗势力近来更加活跃了。”^②

1989 年 8 月 18 日,《莫斯科真理报》发表题为“今天会不会出现 1964 年 10 月事变?”的文章。^③指出:

① [美]《华盛顿邮报》,1988 年 2 月 25 日。

② 路透社莫斯科 1989 年 4 月 17 日电。

③ [苏]《莫斯科真理报》,1989 年 8 月 18 日。

今天再没有比讨论有关我国社会未来的政治预测更热门的话题了。人们普遍都在提出这样的问题。同时,包括报刊在内,有时越来越经常地讨论政治方针要发生非“右”即“左”的急剧变化的可能性。如实地说,归根到底指的是政变,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机构的更迭,或至少指的是迫使这个领导机构改变管理国家的方针。在我国实际生活中的划阶段的事件中,大概只可以把1964年10月的日子里发生的有关势力预先策划的强制性地撤换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的事情相对地算作是政变。重温一下哪怕是稍微有点像政变的形势,即1964年10月的形势,是更加有意义的。

当年,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集团想除掉赫鲁晓夫,而且他们也这样做了,事先说服最有威望的中央委员,并且事先取得了当时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的支持。我们应当懂得,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当然不能只归结为幕后情节和“克里姆林宫宫廷”密谋。1964年十月政变的基础仍然是那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因素,即社会上存在着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感到不满的势力和当时刺激这种不满情绪的各种条件的总和。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60年代初我国社会上的各个主要社会集团吧。

我们从党和管理机关说起。当年的许多党和苏维埃工作者一回想起赫鲁晓夫提倡的“新作风和新方法”,至今仍会出一身冷汗,机关大变动、各部门改组、破坏了牢固的机关联系与职能。赫鲁晓夫的干部政策也是难以预料的,他常常随意独自决定高级领导人的命运和升降。他的根据年龄轮换干部和规定担任高级职务的期限的许诺也叫人害怕。部队将领和官员不满的是,由于裁减苏联武装力量,许多军人被迫退休,而退休金的数额大大减少了。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则由于赫鲁晓夫取消贝利亚的领导和对其干部进行清洗,使这个部门曾经很高的威望几乎降到零点。

由此可见,国家管理机构已经完全具备准备政变的社会基础。当然,这个斯大林的纪律(不能议论,只有执行!)培养出来的机构从来都

不会向政变迈出主动的一步,然而它的不满无疑鼓舞了中央全会的组织者。

工人同城市居民一样,越来越明显地对赫鲁晓夫持不断否定的态度。肉类和奶类产品急剧涨价,拒绝偿还公债,不断修改完成生产定额的计件工资。通货膨胀1961年货币改革以后变得特别明显。国营商店货架上开始看不到肉,其他食品也出现脱销。国家一些地区爆发的骚动证明了工人的不满,报刊对此未作任何报道,政府对工人使用了武器,派出了坦克。

农民应当感谢赫鲁晓夫,因为他的农业政策同斯大林剥削农村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60年代初农村的情绪是公开反赫鲁晓夫的。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个人宅旁园地受到限制,饲养“多余的”牲畜被禁止,这大大地破坏了农民富裕的物质生活,改变了农民世代代的生活方式。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评意识的代表完全赞同人民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渴望民主变革和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很快确信自己的希望是幻想。很明显,赫鲁晓夫没有打算取消斯大林式的政治制度,他所能做的最多只是减少这个制度的镇压性质。党和国家机构的发号施令仍然控制着言论和思想自由。总之,赫鲁晓夫的道德声望到1964年10月已经下降到最低点。剩下的就只有一件事——进行“宫廷政变”,结果也就这样做了。

今天任何比较都不尽善尽美。然而政治理论家向来是求助于过去历史情况的经验,并把它运用到现在的和将来的事件上。

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的目的是要对社会进行真正的革命性改造:取消管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把全部权力交给经过革新的各级苏维埃,使经济关系真正现代化。这种改革进程本身具有爆炸性,有引起根本改变今天政治方针可能性的危机程度。

列宁认为,政治危机的特点是存在着三种彼此相关的客观因素:(1)对现有生活条件的不满情绪比平时更加严重;(2)“上层”(政权)的危机;(3)“由于上述原因……被整个危机形势和‘上层’本身所驱使而

采取独立的具有历史意义行动的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让我们从列宁的评述角度来看今天的社会形势吧。

1989年的形势比25年前无可比拟地更加严重了。1964年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目前的民族间冲突和生态问题。现在通货膨胀的规模、食品和商品市场上的现状、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猖獗、贪赃受贿等情况。而且社会紧张情况具有加剧的趋势,各民族共和国正在发生的动乱、罢工和全国许多地区成立罢工委员会,都极其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上层”(政权)危机是党今天所遇到的危机,并表现于三个方面:(1)党在无党派居民心目中的威望大大下降。入党的人数明显减少,一些工人和职员拒绝入党而退党的人数增加等;(2)居民,包括一些普通党员对党的机构普遍不满;(3)地方党的机关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不断发生对抗。

今天,我们中有许多人在问:党还能控制社会局势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党的机关的活动能力和威信,而这这就要求坚决地革新他们的工作和干部组成。

改革将使苏维埃获得全部权力。谁将进入这种人民政权机构呢?会不会发生执政党被排除在外的情况呢?苏维埃在继续向民主法制国家前进的同时,能否有效调节社会上正在发生的进程呢?国内会不会出现不同政权结构并存的形势呢?最后一个问题大概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

两种政权只会更加混乱,使国家面临国内冲突危险。而这离宣布紧急状态、建立救国紧急委员会、终止宪法、解散议会等情况就不远了。但是,目前两种政权的因素已经存在。除官方的政权机关之外,已经建立一些准备夺取政权的非正式的联合会,如人民阵线、劳动集体联合会、罢工委员会等等。不管其建立的目的如何,今天它们客观上已经起了破坏安定的作用(罢工就是明显的例子)。

应该严肃地思考一下列宁关于政治危机的第三种因素。我认为,正是改革所唤起的群众的这种政治积极性是防止1964年十月全会上所发生的那种政变的可靠屏障。今天的“阴谋家”比25年以前更难“以人

民的名义和受人民的委托”来说话和行动。时代不同了,人民也不同了。但是,也有一些势力准备随时蛊惑人心,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并保证立即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是些什么人呢?是“右倾分子”?“左倾分子”?很可能那些今天打着民主旗号的人,明天就会宣布自己是武力和紧急措施的“拥护者”。1964年的“宫廷政变”之所以成为可能,就因为人民脱离政治。今天,全国已经觉醒,在独立自主地创造历史。我们需要经验,要学会分辨真伪,分辨建设性纲领与蛊惑宣传,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

当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中央全会上被解职的政治命运被媒体和舆论不断放大并预言为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动之时,戈尔巴乔夫使改革开始具有了自己的意义:放弃苏联共产党对政权的垄断,摧毁现存的官僚极权制度,使苏联社会走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意义的更替也表明:改革的性质和方向已经发生转移。由改革所引发的社会民主运动开始在以“自由”“公正”的旗号下向苏联共产党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攻势。

二、社会成因:20世纪60年代人

如果只是简单地认为社会民主运动就是改革进程中群众的自发性行为,或者一小部分政治异见者和权力觊觎者煽动的结果,那就无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准确分析和把握社会民主运动发生的主要因素。其实,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看,社会民主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犹如星火燎原般地滋生蔓延,除了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松绑外,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整个苏联社会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深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指出:“现在居住在苏联的每15个人中,就有14个是在革命后出生

的。”^①这个数字并不是单纯的人口学统计,而是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它表明了随着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们的纷纷离世,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已经成为苏联政治生活的革命底色随着下一代人的成长中而不断褪色。于是,以苏共二十大为主要标志,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关键性转折作用的“60年代人”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60年代人”既包括以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新生代领导力量,也包括经历过六七十年代苏联高速发展阶段的战后一代,还包括60年代后出生并经历了社会发展停滞后面临着个人发展挑战的青年人。总之,无论是苏共领导阶层还是社会芸芸众生,苏共二十大带来的思想风暴已经成为其观察苏联政治命运以及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决定自己立场的风向标。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正是在这一统称为“60年代人”的苏联新生代中间发生发展起来的。戈尔巴乔夫说:“还在70年代,许多人就懂得,如果在思维和心理方面,在工作的安排、工作作风和方法方面,在各处,既在党内,也在国家机关和领导层中不发生急剧的变化,那是不行的。而这种变化已经发生了,其中既包括在党中央,也包括在政府内。”^②

1. 苏联的“新一代”:思想与心理

1985年3月11日,当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他所面对的苏联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事实上,还在1984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给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1984年12月10日,戈尔巴乔夫在全苏意识形态工作学术实践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同时代的人,是具有高度文化、受到高度教育、有广泛的精神兴趣、见识广和经历多的人。现在的这几代人经历过十月革命、工业化和集体化、卫国战争和战后不平常的几十年。在具有这么丰富的社会经验的社会中生活和工作的人,不会接受问题的简单化回答,会敏锐地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45页。

② 同上,第26页。

看出由于不善于或害怕揭示社会发展的实际矛盾而产生的假象,看出他们操心和不安的那些问题的根源。我们必须同他们讲真话,因为真话容不得拐弯抹角、吞吞吐吐、空泛和装腔作势的讲话。讲真话,同样既要避免夸大成就、掩盖过失,又要避免对缺点津津乐道。

我们的意识形态面向理智、高尚情感和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生活令人信服地证明:党对苏联人发表的公开而诚实的讲话,将永远是容易理解和得到支持的,得到用劳动和社会积极性、坚毅勇敢精神和英雄气概所给予的支持。在我们建设、巩固和保卫社会主义时是这样,今天也还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①

接着,戈尔巴乔夫尤其强调了要根据青年人的思想变化加强针对性教育。他说: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诞生的苏联人民的新一代今天开始了积极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我们制度的历史成果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自然和不可分离。苏联青年在不断改善的物质条件下,在四十年的和平局势中成长和受教育。他们已经习惯于把我们的现实生活不是同过去,而是同社会主义的最高准则相比较。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当代思想状况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共同关心的是,培养青年准备劳动、参加国防工作,坚持教给他们现代军事业务,用热爱我军和忠于军人义务的精神培养他们。^②

事实上,当戈尔巴乔夫通过全苏意识形态工作会议来强调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适应变化了的苏联社会的时候,以青年为代表的苏联“新一代”已经显现出其在思想、行为与心理上的变化。苏联青年占全苏人口一半以上,其中在工业部门占 32%,在非生产部门占 28%,每年有 300 万青年补充

① [苏]《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年)》,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页。

② 同上,第31页。

到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的队伍。^① 大多数青年都能做到助人为乐,注意文明礼貌,有一定的觉悟和爱国热情,但是当代青年的社会行为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以至于一部分人特别是老年人认为,当代青年“今不如昔”。1986年4月12日召开的苏联共青团第十二次中央全会就认为,青年中存在很多问题,如酗酒、依赖别人的消费心理、趣味低下、兴趣狭窄、文化素养差。具体来说,青年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不关心政治。这种现象无论在各部门的青年或者是大学生中似乎是比较普遍的问题。不少青年“对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一无所知”,大学生中许多人缺乏政治热情,只要进入高等学府就心安理得,学习上不甚刻苦,谈恋爱和同居现象也较普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许多青年人对长期以来那“政治说教”的宣传感到厌倦,另一方面由于苏联社会的封闭使青年人无法了解外界的真实情况,他们所了解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就是每天宣传机构所讲的罢工和失业。可实际上等他们长大后不仅面临繁重而枯燥的工作,更可怕的是还将面临残酷的“待岗就业”。于是,青年一接触现实,幻想即破灭,结果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对现实生活采取无所谓冷漠态度。

第二,追求物质享受和西方的生活方式。当代苏联青年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社会上有一部分青年人“精神空虚,缺乏崇高的生活理想”,这些人只是抱着“捞一把的哲学”,他们“对西方一切着迷”并“不惜一切手段为个人捞取物质福利、名誉地位和特权”。有些青年人“挥霍无度,寻找工资高而又清闲的工作”,追求西方流行音乐或低级的舞蹈形式,在一些地区“迪斯科俱乐部”不断增加;有些青年“对婚姻和家庭采取轻率的态度”,莫斯科市的离婚案中三分之一以上是青年夫妇,而且有上升之势。据合众国际社报道,在莫斯科市郊,在远离外国游客和克里姆林宫的地方,有一座青年俱乐部。从市中心驱车前往要花大约四十五分钟时间。这座俱乐部不大,没有激光灯,也不像巴黎豪华的舞厅,但每天都吸引了数百名青年人。这个俱乐部不像外交官和外国游客光顾的迪斯科舞会,要用外汇购买门票,这里只要有卢

^① 参见[中]《参考消息》,1986年3月3日。

布就行。常来这里跳舞的年轻人自称为“游手好闲的人”。他们是苏联青年中“迷惘的一代”。不过他们的祖辈都是工人和农民,他们的父辈是上层分子。不少人的父辈在政府各部工作,有的在研究所或工厂任要职。满头亚麻色头发、身穿超短裙的女大学生叶连娜说:“我们并不希望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我们并不只想结婚,生孩子,吃饭,睡觉。”她又说:“我们只是为眼前而活。一切都会变。我们不关心政治,喜欢到这里来跳舞。不过就连这里的一切马上也会消失。我们是‘迷惘的一代’,因为他们(政府)不理解我们。我们比他们像我们这种年龄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要多得多。我们希望看看世界。”另一位姑娘玛莎说:“我们是没有远大理想的人。”^①

第三,宗教在青年中的影响有扩大之势。苏联很注意抓无神论的宣传,书店中有不少宣传无神论的书籍和材料。但是近年来信教青年人数有所增加。据估计,大学生中约有1%~3%的人信教,特别是沿海地区更为明显。据苏联报刊的调查,这些青年并非真正信奉上帝,他们接受宗教影响的原因,一是宗教家庭的影响,从小受宗教的熏陶;二是由于个人生活上遇到挫折感到空虚和失望,有的则“看破红尘”,对生活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想从宗教中寻找安慰。也有一些完全是出于好奇。

然而不管苏联“新一代”有着何种表现,其在总体上却表现出与现行意识形态教育规范的背离。

1985年3月25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了“莫斯科的新一代”评论。^②文章指出:

如果说存在苏联对大众文化的官方态度的话,那就是:不能战胜,就加入。以大约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传入莫斯科的爵士乐为例,六十年代初,政府对爵士乐作了两点结论,第一点,这种主要源于美洲的音乐……是危险的。它的复杂节奏和不规则的重音使其具有明显的颠覆情调。其二,即使作了多年努力,也未能将其扼杀。怎么办呢?接收它。这便是一年一度的莫斯科爵士音乐节的开始。如今,这里每年由

① [中]《参考消息》,1986年5月7日。

② [美]《新闻周刊》,1985年3月25日。

共青团主办大约八十个爵士音乐节。而在俱乐部、酒吧间或咖啡厅，几乎听不到爵士乐。

这对真正的音乐似乎干扰太大，不过，大众文化对苏联政权来说是未可预断的——在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统治下大概也是如此。尽管西方报界进行种种推测，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是肯尼迪之辈，预言苏联现政权是大众文艺的卡米洛特（传说中是英国亚瑟王宫廷所在地。比喻象征灿烂的岁月或繁荣昌盛的地方——本报注）是不现实的。官僚机构仍不相信一切自发的群众运动；甚至更糟的是，最受人民欢迎的流行作品是美国西部电影。

在政府里，印有美国人名字的短袖圆领衫是热门货。因此，国营工厂也在圆领衫上印上了自己的厂名。尽管如此，俄国人仍渴望搞到地道的外国货。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什洛莫·兰布罗扎回忆起自己身着一件波士顿学院圆领短袖衫在莫斯科街头漫步的情景。他说：“一个小伙子要把我带到一家商店，给我买一件俄国最高级的衬衫，换我身上穿的那件圆领短袖衫。”

近十年来，苏联的衣着已有改进，但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仍然存在：城里人晚上外出不需要打扮。索科尔教授说：“晚上九点以后，街上冷清清的。人们倒是去音乐厅听音乐，去剧场欣赏芭蕾舞，观看歌剧，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可是，散场后，他们不上咖啡厅或逛夜总会。”即使有消磨时间的夜生活，人们也会觉得那些音乐是索然无味的。不过，在波罗的海地区、立陶宛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本报注）举行的音乐节上可以听到优美的“先锋”队爵士乐。

俄国的大多数爵士乐属于这一类。俄国的摇摆舞曲也是这样。像“地球人”和“时间机器”乐队用爱国主义的主题冲淡了轻柔的摇摆音乐。“地球人”乐队开创了以电影作背景的表演形式，不过他们的服饰是滑稽可笑的，一副西方嬉皮士打扮：一套米黄色西服，一件圆领衫和一双旅行鞋。

在俱乐部里，苏联的摇摆乐相当流行。不过在苏联欣赏摇摆乐是要花钱买票的。许多摇摆乐队得到工厂的赞助。工厂工会的中年领导人对

哪些东西可以接受(从乐队队员的服饰到演奏内容)都有最后发言权。在苏联最受欢迎的乐队是“亲笔”乐队,它之所以颇负盛名,在安德罗波夫取缔摇摆音乐期间也安然无恙,主要是由于得到文化部的正式承认。

尽管人们在谈论“新一代领导人”,但事实上一个多疑的政府仍然想自上而下地对大众文化加以控制。

2. 党内的“新生代”:改革的一代

苏联社会民主运动形成的社会土壤的第二个显著变化就是苏共党内新生代领导阶层思想上的开明与政治上的包容。正如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顾问、苏联政治科学协会副主席布尔拉茨基所言:“戈尔巴乔夫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就像斯大林后出现赫鲁晓夫不是偶然的一样。戈尔巴乔夫是战后一代领导人,他受过很高的教育,知识面广,不仅知道本国的成就和问题,而且对国际情况也比较了解。他对过去的错误没有责任,因此他能放手地解决一些问题。而且,他还有新的观点和新的思维,这是新一代领导人。”^①

美国《新闻周刊》在题为“莫斯科的新一代”的文章中继续说道:^②

笼罩在克里姆林宫上空近七年的死亡阴影已经消失。苏联较年轻的一代领导人在受压制多年后,现在正开始慢慢地取代政治局里的那些老朽。按西方标准看,五六十岁的领导人并不太年轻,但是,戈尔巴乔夫有可能改变莫斯科的基调和方向。即使是最温和的改革也可以使一个非常冷漠而刻板的社会焕然一新。

西方观察家只能对新一代将带来哪些变化进行推测,而且他们的看法总是不一致。由于莫斯科新上任的一些领导人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恐怖,所以有些苏联问题专家担心,这些人在外交方面也许要比他们的前任更加轻率。而另一些苏联问题专家则认为,这些年轻的领导人所受的正规教育要比勃列日涅夫一代人多得多,他们对外部世界也

① 新华社莫斯科1987年3月19日电。

② [美]《新闻周刊》,1985年3月25日。

许显得更有见地,而且不那么多疑。不管怎么说,新一代不会马上改变苏联社会,无论是在外交方面还是在内政方面都是如此,因为苏联制度总是千方百计地反对变革,它不喜欢离经叛道的人。

在政治方面,戈尔巴乔夫的同时代人大多数是中层官僚,前不久才被选进中央委员会,有不少人对西方还不熟悉。当戈尔巴乔夫采取行动巩固自己的权力时,受提拔的苏联政治领导人大概都是安德罗波夫保护的人——像戈尔巴乔夫本人一样——他们之中有一些人过去是不受重用的。

.....

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国外是友好开朗的访问者,在国内是镇定慎重的官员。

在访问西方国家时,戈尔巴乔夫像美国南波士顿的政治家一样能说会道,从容不迫,使群众为之倾倒。他既像装卸工人那样刚强有力,又有迷人的微笑。戈尔巴乔夫身高五英尺十英寸,爱穿深色西服,喜欢聊天。当他会见普通群众时,常常提出一连串问题:你生活得怎么样?受过什么教育?做什么工作?拿多少钱?自己有房子吗?而且总能记住每个人的名字。

但是,莫斯科的普通老百姓却很难见到他。平常只有当他的“吉尔”轿车在加里宁大街专供苏联要人车辆通行的车道上奔驰而过时,人们才能透过车窗窥见他的尊容。他每天早晨七点半到达办公室,晚上十点左右回家。

戈尔巴乔夫奋发好强,现在终于升到苏联最高层,成为政治局里的第一把手。见过他的西方人几乎一致认为,他机智、坚定、难以对付。在他去年十二月访问伦敦期间,每当主人批评苏联不尊重人权时,他就谈北爱尔兰问题。在参观不列颠博物馆时,他说,如果英国人不喜欢马克思主义,那他们可以责怪他们那间阅览室,因为马克思曾在那里著书立说。

戈尔巴乔夫以注重纪律闻名于世。去年,他曾不费吹灰之力说服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取消了访问西德的计划,因为莫斯科认为,进

行这种访问是不合适的。

戈尔巴乔夫生于一九三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小,不能参加战斗。战争结束时,他只有十四岁。二十四岁那年,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一九七八年,克里姆林宫任命他负责全国农业。他很幸运,一直处于受保护的地位。苏共中央书记库拉科夫过早的逝世(终年六十岁)为戈尔巴乔夫进入政治局开辟了道路,勃列日涅夫将他调到莫斯科工作;到了安德罗波夫时期,他便青云直上。安德罗波夫扩大了他的权力,让他既管经济,又管外事。据一些莫斯科人士说,在安德罗波夫逝世之前的半年中,戈尔巴乔夫曾是安德罗波夫和领导集团之间的联系人。当时就有人推测,他可能接替安德罗波夫,但是,老人控制的政治局后来选中了契尔年科。不过,戈尔巴乔夫却负责意识形态工作,成了既定接班人。

戈尔巴乔夫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期间的做法使一些苏联知识分子相信,他能容忍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莫斯科纷纷传说这样一件事:苏联有一部名叫《稻草人》的电影,文化当局只允许在小电影院放映,但是,戈尔巴乔夫认为,这部影片值得让广大观众一看,于是下令在大电影院放映,结果卖座率一直很高。

一九八四年,戈尔巴乔夫至少是赞成经济改革的主张的。他在农业方面一直在大力实行一项重大改革,即把农业工人组成作业队,使生产和劳动报酬挂起钩来。有些苏联经济学家批评这项改革不痛不痒,但是,与党内那些墨守成规的人相比,这项改革说明戈尔巴乔夫是富有革新精神的。

事实上,仔细研究一下戈尔巴乔夫发起改革时的战友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利加乔夫、雷日科夫还是雅科夫列夫,都经历了赫鲁晓夫的政治解冻并对之表示了深深的心理认同。

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56年举行了二十大,我第一次用心去聆听党,它的声音是这么响亮,这么诚实,这么痛苦和坦率,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再

像过去那样我行我素。56年12月接收我加入苏联共产党。”^①事实上，“二十大的召唤相当强大”。当时还是新西伯利亚科学城苏维埃区委书记的利加乔夫指出，那时“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因与劳动集体、城市和州里的劳动人民直接、频繁地接触很受人们敬仰”。总的来说，这是一位独特的政治人物。他具有政治嗅觉，能捕捉到人民所想的主要东西，迅速地找到与人们的接触点，能说话生动，不用讲稿，确实能“信口而说”。赫鲁晓夫是人所期望的扰乱教条主义安宁的人，因为在这种安宁下掩盖着思想和行动的停滞。利加乔夫认为：“赫鲁晓夫执政初年是革新创举、敢作敢为的创造性时期。”^②而对于被称为改革“精神教父”的雅科夫列夫来说，亲身参与苏共二十大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彻底发生了转变。作为苏共中央学校工作部指导员的雅科夫列夫获准参加了1956年2月25日的代表大会闭幕式。正是在闭幕式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让雅科夫列夫感到震惊，“赫鲁晓夫刚刚讲了几句斯大林的罪行，我就感到浑身发冷。当时我是个怎样的人呢？年纪轻轻，对于马列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尚未完全消失，我是抱着这个信仰经过卫国战争的。对于所许诺的人间天堂的到来，我还抱有希望。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对于童话般未来的着迷产生了多么强大的愚弄和欺骗作用啊”^③。在雅科夫列夫的精神世界里，正是赫鲁晓夫“这一勇敢的行动促使我对尼基塔（民间就是这样称呼他的）心存感激”^④。

可以说，赫鲁晓夫改革的夭折及其不经意间撒下的思想种子已经在苏共党内开始生长，只待合适的时机。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经济学家加夫里尔·波波夫在1989年4月17日由电影工作者协会组织的纪念赫鲁晓夫诞辰九十五周年的莫斯科集会上说：“目前改革的领导人都是在他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人，这是赫鲁晓夫的一座纪念碑。”^⑤

① [俄]Ю. Б.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416页。

② 同上，第417页。

③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20页。

④ 同上，第219页。

⑤ 路透社莫斯科1989年4月17日电。

作为改革的发起者,戈尔巴乔夫清醒地认识到了党内新生代领导力量中存在的改革冲动。事实上,在赫鲁晓夫改革失败以后,虽然经历了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但是党内的革新力量已经在孕育成长。“二十大使体制经受过一次重大的变革,但并未完成;随后又着手对体制搞过一些革新的尝试,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开始阶段。但有一事实,即党内在不断成长起来一批或者一个阶层的潜在的革新者,这个阶层一次比一次行动更加大胆,而且能得到苏共党内更加广泛的支持,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证明,苏共作为执政党尽管保守主义甚重,意识形态僵化,但终归还是经受住了这场伟大的变革。”^①戈尔巴乔夫说:

在“最高层”有那么几个人坚信必须实施变革,而且准备亲身去冒这巨大的风险:他们开始了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针对高度集中、官僚主义盛行、意识形态僵化,且成功扎根已有70年历史的那个体制的根本性改造。同我一起开始这一事业的那些党的领导成员与各地区、各社会阶层、政治流派、党内的许多派别都有联系。他们知道,在苏共党内和社会上有利于革新的情绪相当强烈。据此他们信心十足,因为我们着手的并非堂·吉珂德式的行为,是会得到支持的,总之,改革不是一天两天的宣传活动,也不是中彩摸奖的口号。我国是历尽艰辛才得到这个机会的。

还应当看到,“改革运动”只有在发端于党内的条件下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任何别的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组织,想发挥类似的主动精神,那是注定会徒劳无功的,会遭到社会“政治核心”所排斥,也会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对现行制度的蓄意诋毁。

这就是说,只有兴起于党的怀抱之中、由党的领导人来推行的事情,正统派人士才能勉强地容忍,不过总还得小心谨慎才是。而要是这样的事从一开始便发轫于旁门别路,就会寸步难行,必将被扼杀于萌芽状态。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7页。

这时候,社会就已经像是一口蒸汽锅炉。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党自己给已逐步把社会的其他阶层全都卷了进来的变革过程定调子;要么保留原来的体制,不作任何变动,任其存在下去。到那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强有力大爆发。应当关切的还有这样的情况:改革体制,也就是将其逐步重建,只有手中握有权力的杠杆才做得到。^①

三、政治成因:“公开性”

苏联社会民主运动的兴起与蔓延,最大的动力就是戈尔巴乔夫倡导并始终加以维护的“公开性”。那么什么是“公开性”呢?从字面上看,意为“公开讲话”或“公布事实”。据马特洛克分析:“这个俄语词没有确切的英语对应词,这就使美国弄不清楚该政策的真实含义。它并不像某些外国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是指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而是指官方机构的运作应该是开放的,因而它同我们的概念‘透明度’相似。其目标不是新闻媒介的自由,而是为政策的变化进行更为有效的宣传。”^②如果用一则笑话来形容“公开性”的含义,那就是揭开盖子,对人民讲真话,让人民知道真相。

有一天,俄国革命后的几位领导人同乘一列火车去某地,当列车行至中途时,铁轨突然到头了。这时几位领导人提出了什么建议呢?

斯大林:把犯人从劳改营拉来修铁路。

赫鲁晓夫:只需把列车后面的铁轨移到列车前头。

勃列日涅夫:把车厢的所有窗帘都拉上,坐在位子上前后摇动。

戈尔巴乔夫:每个人都走出车厢,高喊:“没有铁轨了,没有铁轨了。”^③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昶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8页。

^②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③ [美]《新闻周刊》1987年1月5日。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公开性”就是改革的象征。“公开性已成为国际上的称谓。它是伟大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象征,并成为世界语汇中与‘改革’一词一起排列的词汇。”^①戈尔巴乔夫宣称:“我们需要公开性就像需要空气一样。我想再次强调指出,扩大公开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并不是玩弄民主的把戏,而是党的原则立场。”^②“这些东西一经宣布,就应该成为苏联生活方式的准则。没有这些东西,任何根本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③

1. “公开性”与社会改革的民主化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改革就是要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与公正,使人民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应当通过社会民主化使人民参加改革进程。如果说到改革的实质,那么我可以把这一实质简单地归结如下:我们应当在每个劳动集体、每个党组织、每个州、共和国、部门、每个中央主管机关,在全党创造一种前提,使我们的人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④

但是有一股力量却阻碍着社会民主与公正的实现。这股力量就是充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官僚机制。戈尔巴乔夫指出:“如果谈到阻碍机制的政治方面,那就不能不指出这样一种奇怪现象:有教养的、有才干的、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可能性,不能利用其实际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经济中的障碍机制及其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⑤

①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③ 同上,第95页。

④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6—1987.6)》,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⑤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2页。

为了破除这股阻力,只有通过“公开性”,才能冲决官僚机制的障碍,才能培养人民的独立思考能力,才能保证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这是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的现实政治考虑,也是戈尔巴乔夫政治理念的体现。“实质上,公开性也就成了吸引人们参与政治和使他们参与建设新生活的手段,他们的参与完全符合改革的实质。公开性不仅创造了实现已确定的改革的条件,而且有助于克服对改革政策的抵制。由于公开性,我们得以在社会意识中实现有利于民主、自由文明的人道主义价值的深刻的心理上转变。对于那个时期的基本成就不可逆转的保障之一就在这里。”^①

那么在社会改革民主化进程中,“公开性”是如何体现的呢?集中起来讲,就是要真正保障人民的批评权利。“我国人民成长起来了,他们身上蕴藏着智慧和创造力,而我们在解决国内问题时还没有利用这一点,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行政方法和发号施令上。要知道,我们高高在上的一些人,或是处在某些领导岗位上的人,听取劳动人民、普通党员和工程师、专家的建议和意见时没有表现出耐心,甚至没有把人家的话听完。这已是各行各业的普遍现象,甚至是各级党的机关的普遍现象。他们以为,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对这一切都厌烦了,他们疲倦了。他们以其全部表情表明,你别再说下去了。如果讲话者继续说下去,他们就会说:你走吧,干你自己的事情去吧。没有你,我们也会弄清这里的情况的。”^②因此,戈尔巴乔夫始终认为,改革最大的障碍是保守的官僚机制。

1985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突然乘飞机前往列宁格勒视察。“这是他上台以来第一次到外地视察,也是继勃列日涅夫之后走出莫斯科到外地同群众见面的第一位苏联领导人。”^③在为期两天的视察活动中,戈尔巴乔夫走上街头,与列宁格勒市民展开交谈。这一举动在瞬间表明:“他抛弃了苏联领导人过去那种‘深居克里姆林宫、高高在上’的僵硬形象,以一种同群众在一起的新领导人的形象出现在民众面前。”^④戈尔巴乔夫超越党的官僚机

①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②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6—1987.6)》,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6~87页。

③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5年5月16日电。

④ [日]《每日新闻》1985年5月18日。

构从而建立起党的领袖与群众直接对话的第一次努力实现了。5月17日,戈尔巴乔夫在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严厉批评了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对待改革的干部。他指出:“我们似乎应当向我们的全体干部提出希望:认清时势的要求,改变工作方式。但是,凡是不想改变工作方式,尤其是阻挠解决新任务的人,就应干脆走开,别再碍事。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的利益置于整个社会的利益之上。”^①此后,戈尔巴乔夫又先后于1985年6月27日视察基辅、9月6日视察秋明州和托木斯克州、9月7日视察哈萨克及西伯利亚与乌拉尔边疆区,1986年4月7日视察古比雪夫市、4月8日视察陶里亚蒂市。

然而一连串的视察活动结束后,戈尔巴乔夫突然发现,轰轰烈烈的改革只停留在苏共中央的决议上!地方根本无动于衷!一切迹象都表明:改革遭遇到了阻力!1986年6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猛烈地批评了那些继续因循守旧,死死抱住无效工作方式的人”,要求党必须继续对“不负责任、官僚主义和其他消极现象展开斗争”。戈尔巴乔夫说:“文牍主义绝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请看一下我们搞的一切检查都是什么吧。不过是研究资料、报表、记录、活动计划,不过是查明问题是否讨论过和是否就此问题作出了相应决议。总之,习惯于同文件打交道,而不是同人打交道,而且还是通过文件来看人。至于人们如何劳动,如何生活,想些什么,他们有哪些问题,情绪如何,所有这一切都被弃之一边。要知道党的工作的实质就在于此。如果党及各级组织不形成对缺点、对怠慢工作、对华而不实和空谈不容忍的气氛,就谈不上任何改革。”^②

为了推动改革,戈尔巴乔夫又于1986年7月26日视察符拉迪沃斯托克、7月29日视察阿穆尔共青城、7月30日视察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9月18日视察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戈尔巴乔夫远东之行的一系列讲话表明:要破除官僚主义,推进改革深入发展,必须使人民行使批评的权利。

在1986年7月31日召开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对党员干部提出要求:“应该改变工作作风。应该表现出尊

^① 《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年)》,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2页。

^②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6—1987.6)》,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重人民,尊重人民的意见,真正地接近人民,而不是装模作样。应该真正到人们中间去,倾听他们的呼声,同他们会面,把情况告诉他们。当解决某项任务时,越是困难,越应该更经常同人民会面,同他们在一起。我们的人民是富有同情心的,人民是极好的,再没有这样好的人民了。最大的支持是我们人民的支持,最大的政治积极性是我们人民的积极性。”而要获取人民的支持,就必须实行“公开性”。

针对党员干部对“公开性”的疑惑,戈尔巴乔夫解释道:“有人常说:中央委员会干嘛要这样大张旗鼓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公开性呢?我可以对你们说,我们现在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反而只有好处。人民感觉到力量骤增,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更大胆、更积极了。而且,你们也知道,那些企图避开我们法律的人全都立即安静下来了。因为当舆论的力量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没有任何力量能比它强大。而舆论的力量只有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广泛的公开性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我们需要用公开性来保障代表大会任务的完成以及像弗·伊·列宁所希望的那样让人民真正参与管理国家的所有事务。”^①

为了保证人民的批评权利得到落实,戈尔巴乔夫在会上鼓励报刊不要害怕“公开性”,不要害怕人民的批评。他说:“许多城市和州的地方报纸有点沉默。中央的报纸在大声疾呼,支持一切好事,批评一切疏漏和缺点。而地方报刊却保持沉默。”^②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同志们,不必害怕公开性。我们是强大的,人民赞成社会主义,赞成党的政策,赞成变化,赞成改革。总之,不许用搞运动的尺度和老一套传统对待公开性。公开性不是一次性的措施,而是苏联当代生活的准则,是一个经常不断的过程。”^③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舆论工具并不是表达人民的意志、反映他们的意见和情绪的一种渠道。但是,这是公开性的最有代表性的和群众性的论坛。党关心使这个论坛能发出公民的自信的声音,使它不仅仅报道全国进行的讨论,而且能保证决定的正确性,决定是否符合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然后是对这些决定的执

^{①②}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6—1987.6)》,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③ 同上,第72页。

行情况进行民主监督。”^①

随着改革推进力度的加大和保障公民言论权利的法律的起草，“公开性”在促进社会民主化方面日益显现出对官僚主义的积极效用。

1987年6月30日，苏共中央书记格·拉祖莫夫斯基向最高苏维埃提交了《关于对妨碍公民权利公职人员不合法行为向法院起诉法》草案。拉祖莫夫斯基解释说，尽管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采取了加强法制的措施，可是“时至今日仍不断发生严重背离法律准则的事情，包括在解决涉及人的切身利益问题时严重背离法律准则的事情”。官僚主义、因循拖延、待人冷酷无情、耍官腔的表现尚未克服。起草这项法律就是为了同这样一些不良现象作斗争。新法律“将有助于更加积极地确立社会公正原则，促进公民实际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加强国家纪律，教育公职人员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应当保护社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因而也就是保护每个苏联公民的权利与自由”^②。同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也向最高苏维埃提交了关于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的法案。葛罗米柯指出：“目前正在苏联进行的广度和深度宏大的改革，要求越来越充分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民主潜力。”扩大在苏联由全民讨论社会和国家生活重要问题做法的这一法律，正是抱着这个目的。葛罗米柯强调：“公开性帮助我们注意力集中在妨碍我们前进的社会中的困难、缺点及滥用职权上。公开性有助于克服这些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开性正日益成为苏联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进一步扩大公开性，打算通过一系列法律文件。今天提交给代表们讨论的这一法律，是这类文件中的第一个。”^③这项法律的通过，将极大地促进苏联民主的发展和公民更广泛参加管理国家、利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苏联科学院国家和法研究所所长弗拉基米尔·库德里亚夫采夫认为：“目前进行的司法改革要求全面更新立法工作，从质量上改变司法机构的活动，提高人们的法律水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将使加速进程和改革建立在牢固的法律基础之上。”^④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91页。

②③ 塔斯社莫斯科1987年6月30日电。

④ 塔斯社莫斯科1987年7月4日电。

随着一系列“公开性”措施的不断出台,以致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面对社会出现的勃勃生机,戈尔巴乔夫不禁欣然写道:

目前,公开性是社会正常精神道德气氛不可分离的特征,这种气氛可以使人更深刻地了解我们过去如何,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努力干什么,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因而能够自觉地参加改革。

社会气氛的民主化和沿着社会经济改革道路加快前进步伐,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发展了公开性。当然,这一进程的基础是党的政策。但是,如果政治方针的实施不被群众所理解,事业就会停滞不前。群众应该了解生活的所有矛盾和复杂性。取得了哪些成绩,是什么在阻碍发展,在干扰我们,使我们迷失方向,有关这一切的全面真实的情况,劳动群众都应该知道。

人们确实对公开性感兴趣了。而且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想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想知道谁在工作和干得怎样,而且也因为日益确信公开性是对毫无例外的一切管理机关的活动进行全民监督的有效形式,是纠正缺点的强有力杠杆。

因此,社会的精神力量调动起来了。理智和良心和谐地迸发出来,开始夺取腐蚀心灵的消极和冷漠态度的阵地。^①

2. “公开性”与社会舆论的激进化

在戈尔巴乔夫的不断鼓励支持下,苏联国内的社会舆论迅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以报刊为代表的舆论工具上面。早在戈尔巴乔夫刚刚就任总书记时,他就非常强调报刊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的功能。1985年6月18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主编、国家电视台负责人、经济和意识形态刊物的主编和塔斯社社长时发表讲话。戈尔巴乔夫强调,公众对经济中的缺点的批评应该是“开诚布公的、具体的,并且是建设性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89页。

的”。强调了在使公众从心理上对“新的生活要求和党关于加快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方针”有所准备的方面,报刊、电台和电视台所起作用的重要性。戈尔巴乔夫说:“宣传机构应该使公众相信,需要加强纪律性、组织性和法治。”^①

随着改革进程的加深,报刊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刊发群众来信所揭露出来的问题,而应该直接参与其中。戈尔巴乔夫强调,舆论工具不仅要保障人民批评权利的落实,更要在改革的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戈尔巴乔夫说:“国内开展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反映在各种报道中,而且越来越涉及舆论工具的工作本身。我们的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逐渐地好像解冻了,触及一切新的题目。”^②戈尔巴乔夫要求,在“一切新的题目”上,报刊必须要有自己的立场。于是,报刊的言论开始变得“更尖锐了,它们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以前‘受禁的’题材,公开阐明的观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对我们的发展和我们改革的所有迫切问题公开进行辩论。所以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和必不可少的。虽然发表和接受这一切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无论是在舆论上,还是在党内都如此”^③。

然而当报刊开始有了自己的立场并且考虑经济利益后,其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却越来越偏离苏共传统,从而引起苏共党内稳健派的不安。1987年7月7日,《苏维埃文化报》发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利加乔夫视察该报时与新闻工作者会面的讲话。利加乔夫说:

大家知道,根据党的倡议,我国艺术生活组织中实行的新东西,一方面是为了发展主动性,提倡创作探索,根本扩大创作组织、创作集体、艺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的权利和自主权;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它们对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和价值所负的责任。

今年我同萨拉托夫艺术界人士见过面。谈到现在有些文章和讲话断言,在改革条件下,在创作领域内,艺术性和创新应放在首位。的确

① 路透社莫斯科1985年6月18日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91页。

③ 同上,第78页。

应千方百计提高创作劳动的艺术水平。应当消除目前还相当多的肤浅的作品。我想再重复一遍,这只是创作的一个方面,虽然是一个重要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思想内容。说到底,党的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的统一,才能保证艺术创作的价值。这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遗憾的是,很多作品背离了这一原则。特别是列宁格勒拍摄了纪念梅哈尼克牧师的文献片。多么低下的思想和艺术格调啊。

整个来说,民主化、公开性、批评与自我批评进程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正如预料,在改革与更新的浪潮中,沉渣也随之泛起了。出现了一些十分活跃的人,这些人有时企图用自己令人怀疑的思想和打算来取代我们的精神财富。不久前拉斯普京来找我。在交谈中,他对所谓的大众文化的侵略和低劣的音乐作品泛滥感到不安。

不久前在苏联作家协会全会上,更早一些时候在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会议上,苏联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对某些消极现象表示不安。指出,在一些作品中根本见不到“共产党员”这个词,文学批评往往也不屑于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正面英雄人物(不是模式化的人物,而是正面人物),好像这一切如今已经不时兴了。

这里应弄明白下述一点。党有意识地采取了艺术创作以及我们整个生活民主化的方针。民主化是改革和前进的主要杠杆。但是,不管人们(自家的“革新者”也好,外国人也好)向我们提出什么样的模式和新东西,我们都不会背离艺术的阶级性和现实性原则,不会背离文化、精神领域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共产主义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不言而喻,报刊要和创作协会一样,应坚持明确的思想立场,坚持我们党的精神生活社会主义原则,揭露和消除无思想性和庸俗现象以及企图把西方资产阶级大众文化的毒素贩运到我们生活中的做法。

现在,社会正进行积极的进程,虽然往往也充满矛盾。文学艺术工作者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这样多的问题和矛盾,这样丰富多彩的有关人的积极性方面的材料。党迫切需要文化工作者大胆地干预当代生

活,创作反映社会改革的作品,在文学艺术中塑造为改革和加速而奋斗的鲜明形象。

我们需要富有建设性的公开性。我们大家都应当学会在民主条件下生活与工作。这不是口号,而是当代的迫切要求。坦率地说,在党政机关、文化机关还有不少工作人员没有学会这一点。至于各创作协会的成员,其中有些人还缺乏辩论、讲策略、尊重其他人意见的修养。公开性也是一种文化素养。

为了根除小集团作风,应当采取认真而坚定的措施。应当揭露各种不正当行为、无原则性以及企图拉一伙打一伙的行径。不言而喻,应当公开地、开诚布公地做这项工作,要对有这类现象的创作组织、机构、编辑部公开点名批评。

利加乔夫在讲话中明确要求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更多地着眼于苏联历史上的积极因素,而不是通过揭露过去的所谓“黑幕”来博取大众眼球。

然而对利加乔夫的这番讲话,戈尔巴乔夫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并不认为,关于批评是否太多了,是否需要如此广泛的公开性,民主化会不会产生不合心意的现象等问题的争论,是什么消极现象。这些争论本身就贯穿着对我们社会稳定性的关心。要知道,可能有高谈民主,高谈公开性,并加以歪曲的情况。也会有人似乎是赞成新事物,而一旦要采取行动,就对发扬民主、批评、公开性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和保留。”对舆论界因利加乔夫讲话而引起的慌乱,戈尔巴乔夫更是明确强调:“苏共中央是否将通过报刊和舆论工具在公民积极参加下继续实行公开性方针——这样的问题已不复存在。我们需要公开性就像需要空气一样。”^①为了安抚舆论界,戈尔巴乔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于7月10日召集苏联主要报刊的主编们进行了6个小时的座谈,讨论在他发起的改革过程中报刊所起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指出:“应该继续公开报道过去和现在的有争议的问题。”^②

在这之后的公开场合中,戈尔巴乔夫不断把对不同意见报刊无原则地揭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② 路透社莫斯科1987年7月13日电。

露历史问题的做法斥责为官僚主义。他说：“我们这里还有不少工作人员，他们对舆论工具的批评继续作出极为病态的反应，在评价这样或那样的文章和广播电视节目时，夹杂进个人的嗜好、陈旧的经验和对社会利益的错误理解，他们有时简直是不理解报刊在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往往用西方宣传工具对这篇或那篇批评文章的反应来吓唬人。他们说，看呀，西方正等着我们的自我批评，并用这种批评转过来反对我们的国家，使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威信扫地。我不知道别人会怎样，反正我不害怕这一点。以批评的态度重新认识自己的经验，这是有力量的表现，而不是软弱的表现。正是这种态度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则。”^①因此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苏联生活方式的准则。必须认真对待批评。“批评是一副苦药。但是有病就必须吃药。虽然皱眉头，但也要吃。而那些认为可以像吃药一样把批评按时间分成几份来进行的同志也是不对的。那些认为停滞现象已经完全克服、现在该停一停的人也是不对的。在批评问题上刹车，就是损害改革。”^②

在戈尔巴乔夫的强力推进下，苏联的主要报刊开始以前所未有的主动性显示出“公开性”的威力，并且昭示着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入斗争。

1987年7月25日，英国《经济学家》以“公开性原则的第二阶段”为题发表评论。^③文章指出：

戈尔巴乔夫加速了公开性原则的进程。他发起的将更多的事情公诸于众的运动的第一阶段主要涉及揭露问题，揭开贪污腐化现象的盖子，坦率地讨论苏联经济的僵化问题，揭露酗酒和吸毒现象等等。公开性原则的第一阶段是属于爱调查研究的新闻工作者的。公开性原则的第二阶段则属于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它超越揭露问题的阶段，开始面对更棘手的一些思想领域。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处于关键阶段。现在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95页。

② 同上，第96页。

③ [英]《经济学家》，1987年7月25日。

仅仅揭露过去干错的事,或者在指明前途的时候使用像“改革”这样一些时髦的词再也不够了,必须制定详尽的改革计划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不仅涉及要研究新的思想,而且涉及要为下述问题寻求答案:这些思想中哪些思想是与共产主义一致的,哪些是不一致的。在上月举行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号召“在理论战线作出重大的突破”,他也需要在对付党内仍然顽固反对改革的人方面取得突破。他通过将公开性原则推进到第二阶段,正在试图使改革保持强盛的势头。

《莫斯科真理报》本月有一篇文章争论说,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是俄国树立的那种贫穷的社会和经济样板造成的,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对国内的政策失误提出批评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对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提出批评却是件新鲜事。苏联报界越来越公开地提及斯大林时期,这也是新鲜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恢复基本事实和弄清俄国怎样才能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当然是在不放弃共产主义的前提之下。

关于经济问题的辩论最为热烈。上月什梅廖夫写的一篇文章不仅是对苏联经济弊病所作的讽刺性描述,而且它坦率地谈到了这样的看法:苏联人以前过于盲目,或者过于害怕,所以不可能公开地讨论问题。什梅廖夫写道,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类发现“工作措施不比利润更有效”。关于苏联的农庄,“在现有体制的范围内设想出来的任何措施”都不大可能有什么效果。他还认为,暂时付失业救济金比公司继续给破坏提高效率的人照发工资要好,《文学报》上月刊登的一位参加圆桌讨论会的人评论说:“所有制的问题,今天不如昨天清楚。”

辩论的重新兴起使一些人公然提出这样的疑问:公开性原则是否走得太远了?克里姆林宫意识形态问题负责人利加乔夫是提出这些怀疑的人之一。利加乔夫是“改革”的支持者,但他希望谨慎地进行改革。他在本月早些时候视察《苏维埃俄罗斯报》周报时说,公开性应该是“建设性的”,他并且对“沉渣”泛起感到痛惜。

3. “公开性”与社会生活的政治化

然而无论是利加乔夫的担忧,还是戈尔巴乔夫的盲目乐观,“公开性”的闸门一旦放开之后,立刻就会在死寂般的苏联社会引起不可预测的化学反应。“公开性和改革使大量的利益群体压抑已久的失落感——民族主义者的、经济的、环境的、文化的、宗教的——得以宣泄,这些宣泄在旧制度中找不到具有政治效验的抒发途径。”^①

社会生活迅速被报刊舆论揭露出来的“历史黑幕”所激怒和愤慨。于是,戈尔巴乔夫憧憬的生动活泼的社会生活出现了。“人民正从往日的冷漠中摆脱出来,满腔热情地投身于社会生活。在这方面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人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有的地方召开大会或组织游行。总之,民主化进程不排斥这种社会活动的自发表现。我们已经告别了那种时代,那时这种自发活动会引起官僚们的恐惧并遭到行政当局的禁止。尽管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辩论素养,有时发言的人还会遭到主席团的制止,而在某些文章中,作者还在清算个人恩怨或者盛气凌人地扣帽子。但现在大家已逐渐认识到,民主是与官僚主义对社会生活过分的限制不相容的。当然,任何一个自尊的社会都不会容忍无政府状态、肆意妄为和混乱。而我们自然也是如此。民主也是法制,它要求不论是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或是全体公民,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②

尽管戈尔巴乔夫强调在倡导“公开性”的同时要遵守法律,但是在已经严重情绪化、政治化的社会大众面前,这种对法律尊重的呼吁似乎是对民主的阻碍而显得苍白无力。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就在愤怒地指责中表示了他的无奈。切布里科夫指责“蛊惑人心的政客和煽动者千方百计地要诋毁党”。改革派主张共产党放弃权力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要把权力移交给“那些不喜欢社会主义的人,那些渴望建立君主政体并打着俄罗斯帝国的旗号走向普希金广场的人”。切布里科夫沉痛地说:这个国家正在分崩离

^① [美]杰弗里·庞顿、彼得·吉尔:《政治学导论》,张定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88页。

析,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生活在自由太多的条件下”。“现在,当我们的社会和政府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只有在各个方面加强纪律性才能拯救我们。当然,谁都不会听我的话,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社会不得不为这种公开性付出巨大的代价。”^①

1988年7月1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通过《关于公开性的决议》。决议对苏共党内关于“公开性”问题的忧虑视而不见,坚持认为“所有生活领域的公开性,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进程和使改革不可逆转的重要条件之一”^②。决议指出:

改革的头3年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社会组织、舆论工具活动中的公开性形势,开展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政治的开放性和真实性,使党和全体人民更好地了解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查清了阻碍因素,激励起强大的爱国主义力量为国家和社会主义积极地、勇往直前地工作。正是由于在社会生活中贯彻了公开性,帮助我们深刻地、客观地、在公众的参与下评价了国内形势,集体地制定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则性决议,保证了劳动者对苏共改革方针积极的关心和支持。^③

决议强烈批评了官僚主义对“公开性”政策的阻拦。

有人试图限制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和社会组织、各集体以及舆论工具工作中的公开性。在公开性道路上,往往设置部门的和地方的重重障碍。把某种缺点、滥用职权、官僚主义和专横跋扈现象以及其他不良现象公诸于众的愿望受到了行政上的阻挠。各类劳动者向党的机关和舆论工具申诉的来信没有减少。迄今为止,对批评进行迫害,甚至镇压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④

① 美联社莫斯科1989年6月28日电。

②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61页。

③ 同上,第160页。

④ 同上,第161~162页。

决议最后强调：“谁也不能垄断真理，也不应垄断公开性。”^①决议号召全体党员、一切党组织向群众说真话，积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辩论文明，可热烈地和坦率地讨论任何问题，为发扬苏联人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思想创造良好的条件。

于是，人们开始走上街头，尽情地宣泄着对过去的指责和对在过去历史中曾经遭遇过不幸的人的同情，并把造成这一切灾难的源头指向了党！苏联的历史在撕碎旧的一页的同时翻开了新的一页。以至于作为公开性的主要理论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也不得不表示惊讶：扩大公开性的政策已达到什么都予以否定的破坏性阶段，“对一切都产生疑问并加剧社会上的悲观情绪”^②。

那么谁应该为这一切负责呢？1991年12月10日，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在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中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了猛烈抨击。克拉夫丘克说：“造成苏联今天的局面是谁的错？谁应该受到责难？苏联的解体是公开性时期开始的。这一点人人皆知，而且我们知道谁是苏联毁灭的发起人。”^③

四、生活成因：受歧视者

不得不说，在苏联社会民主运动兴起的生活土壤中，有一种情绪化、制度化的因素一直存在，并被不断地强制成为社会的习惯性行为。这就是广泛性的“受歧视者”的存在。如果从社会政治心理的角度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当一种被歧视对象和这种歧视性行为不断被制度建构从而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结构性部件存在的时候，那么对于统治者来说，要保证政权的稳固，唯一要做的就是不断对这一社会部件施加压力，以使其即使不能完全顺

①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64页。

② 美联社莫斯科1989年6月28日电。

③ 路透社基辅1991年12月10日电。

服也不能让其有行动的自由,从而避免其破坏掉整个社会结构的平衡。然而,对苏联社会来说,构成社会稳定的结构性部件恰恰就是两种类型的人: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被称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往往因其与政府在思想上的异见而饱受打压,作为芸芸众生的社会大众却又因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不检点”^①而受到法律惩处。受到惩戒的对象如果仅仅是个别的、单独的和孤立的,那么政府实施这种惩戒行为就是在维护大多数人利益上的正当权利。然而如果这种惩戒行为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政府行为的时候,这种行为就是滥用权力并会使社会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要想继续保证政权的存在,就必须不断地制造这种社会恐惧。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的时候,其实他面对的正是这种两难困境:强化控制就意味着极权官僚体制对改革的否定,并因此使社会停滞状态持续下去;放松控制就意味着极权官僚体制的瓦解,并因此带来政治上可能失去政权的巨大风险。戈尔巴乔夫的选择是:通过公开性来实现苏联社会的自我民主化,从而达到革除积弊、去腐生肌的目的。然而公开性的社会实践却表明:被解放了的知识分子释放的不仅仅是新思想、新思考,而且也是对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和政治反动。在被知识分子炮制的舆论刺激下,作为受歧视的社会大众也开始加入这一内部瓦解的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之中。在戈尔巴乔夫高呼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消除阴暗角落,因为那里会重新发霉,我们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东西又会逐渐繁衍”^②时,改革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知识分子与改革:变化的立场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随着苏联工业化水平和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而迅速膨胀起来。据统计,在全国总人口中,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1939年为16.7%,1959年为18.7%,1970年为22.7%,1982年为25.8%,1986年为26.2%,1987年达到4300万人。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① 比如俄罗斯人捷连科夫在1953年3月6日醉酒状态下说:“今天是一个多么好的日子呀,今天,我们埋葬了斯大林,又少了一个下流坯,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结果被逮捕,直到1954年8月4日才获释。具体情况见《苏联检察院对5810例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案件的司法复查(1953—1991)》,方琼、唐福山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89页。

以后,知识分子在苏联社会中的比重已经超过农民,仅次于工人而占第二位^①;到80年代初,40%左右的城市居民有高校毕业证书^②。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与壮大,成为苏联社会重要的政治集团。

但是这个重要阶层中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却与苏联共产党在思想领域长期存在着紧张的冲突关系。苏联的知识分子大致可以分为技术型知识分子和创作型知识分子两种类型。赫鲁晓夫说:“技术知识分子的问题稍微简单一些。党的机关同他们的关系也简单一些,因为这些人主要是针对为社会服务的具体对象发挥自己的精力和智力。他们并不通过自己的活动直接闯入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领域。对他们劳动的鼓励取决于他们将某个生产领域提高到一个新台阶的研制工作所能给社会带来的好处,相应这也决定着对这个人或者这批人的态度。”^③但是对于苏联共产党来说,同创作型知识分子的关系却是“最尖锐也最棘手”^④。所谓“创作型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哲学家、作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和所有类似他们的人。他们不创造人的机体存活所不可或缺的物质财富,然而他们鼓舞人们在所有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工作,也干预政治,并以文学、艺术和其他人文领域的形象来丰富人们的生活。既然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力求占据垄断地位,它对于将这批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的兴趣就无须解释了”^⑤。

事实上,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就与创作型知识分子存在着紧张关系。从1929年12月21日斯大林五十岁寿辰开始,苏联就强化了对党的书记的崇拜,“人们把他当成艺术界、学术界和科学界的最高领袖和天才”^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与创作知识分子的关系作了评价。他说:

① 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7页。

② 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20世纪60—90年代苏联各社会政治阶层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③④⑤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494页。

⑥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494页。

他(指斯大林)知道他们的社会意义。然而主要是他在每个具体的情况下抱着多么宽容、忍让和尊重的态度。斯大林满脑子的主观主义。而且,他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任何一个人的前途。他的主观主义有时对于某种创作流派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有时却起了束缚作用,使人们无法大显身手、施展才干,甚至把他们和他们的创作都葬送了。比方说,有没有这样的作家,他们没有感觉到这种压迫,创作中没有受到任何外部的或者内部的限制呢?我很难替他们说话。让他们自己说吧,我看未必。斯大林可是个暴君,他的意志决定着整个国家的政策。而所有的暴君对文学家的态度都不错,只是得有个条件:他们要对他和他的时代说好话。^①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内部开始通过设立新的机构组织来领导和控制知识分子的生活。1932年1月,苏共中央委员会责成文化部“系统地指导理论界的工作”并且登记、选择和教育有学识的科技“干部”。1932年5月7日,苏共中央组织局批准该部机构调整。“它的所属机构增加了35个左右,归口到12个处:党的书籍和政治出版物管理处、党校处、群众宣传处(下面又设若干科、分管少数民族地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学校处、科学研究机构处、技术宣传处、新闻处(分设两个科)、工人和集体农民文化处、定期刊物处(包括与党史有关的刊物)、科技出版物处、文学创作处、艺术处(包括电影)。”^②通过一系列组织机构的调整和重组,“党的机器完全能胜任它在30年代担任过的任务:创造一种官方哲学或法律理论,不允许有任何偏离;控制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创造活动和改写党史”^③。以致退休后的赫鲁晓夫谈及于此也是牢骚满腹。他说:

苏联人口中最受苦的一类人是我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物质生活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495-1496页。

②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493页。

③ 同上,第493~494页。

方面比其他阶层强。我说的是精神方面。搞创作的个人在其作品中再现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精神感受、他们同当局和周围环境之间的接触。这里作家往往陷入艰难的境地。开始干预他们的工作,控制他们,搞书刊检查。有人说我国没有书刊检查。这是无稽之谈!哄小孩的废话。我国不仅有最名副其实的书刊检查,而且我甚至要说那是极其严酷的书刊检查。^①

以至于多年以后负责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雅科夫列夫仍然清楚地记得赫鲁晓夫在1962年1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赫鲁晓夫的讲话强烈地表明了苏联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赫鲁晓夫说:

“你看,”他说道,“我们当然在这里听了你们的发言,也谈了谈。可是由谁来拍板呢?在我国,应当由人民来拍板。可人民是谁呢?那就是党。党是谁呢?是我们。我们就是党。也就是说,我们要来拍板。我来拍板。明白吗?”

“明白。”下面齐声回答。

“我还要换个方式给你们讲。往往是这样:上校同将军争论开了,上校讲得头头是道。对。将军听着,听着,似乎没有什么可反驳的。上校让他感到厌烦了,他便站起身来说道:‘听着,你是上校,我是将军。向右——转,齐步——走!’上校转身走开,去执行了。好吧,你们是上校,我呢,对不起,我是将军。向右——转,齐步——走!”^②

当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怎么处理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事关革命命运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回到那个万马齐喑、充满消极腐败气息的过去苟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504页。

^②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3页。

延残喘？还是主动松绑，发挥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的思想智慧从而推进改革？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戈尔巴乔夫指出：“列宁的文化革命把一个半文盲和简直是文盲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在停滞时期形成了反常的局面：我们的社会不能够以应有的方式利用这种巨大的文化潜力和创造能力。原因就在于发扬民主受到人为的阻挠。各种各样的禁锢、对工作中的新的创造性态度感到害怕等，不可能不产生影响。”^①因此，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对在新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缺乏准备，在这里也有察觉。因为我们是在这样的禁令下受到教育的——千万别出事，千万别发生什么问题。党的机关不应该允许在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出现分裂。……我们不能没有知识分子。但党不应该对他们发号施令。这是不能允许和有害的。否则将无法将人的因素调动起来。”^②

面对党内对知识分子尖锐的批评和煽动性报复言论的担忧，戈尔巴乔夫信誓旦旦地表示，这都是民主化进程中的自然现象，没有必要担心害怕。他说：

我对那些认为辩论过分激烈的人说，既不应当惊奇，也不应当愤慨，应当认为，这些代表大会是一种新现象，属于正常的现象。因为民主化到处展开，有时具有尖锐的形式。有人反驳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哲学家，自己最有权威，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正确，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工作。我的回答是：同消极的知识分子、同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的人打交道会更难。

像任何复杂的工作一样，没有情绪激昂的浪涛声当然是不可能的：在大转折时期，在革命时期，历来如此。现在我们大家就好像重新上一堂民主课。我们都在学习。我们现在还缺乏政治修养。哪怕是听取自己朋友、自己同志的意见，有时也不够耐心。大概，这一切都将过去。我们将掌握这门科学。最尖锐的问题都应当讨论，但要互相尊重。甚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97页。

^②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至在最极端的观点中也会有某种宝贵的、合理的东西,因为一个诚实地捍卫自己的观点并按照自己的方式为共同的事业操心的人,是会反映出生活的某些实际情况的。在我们这里,这不是对抗性斗争,而是探索,是辩论:我们应该如何走上改革的康庄大道,如何加快步伐并使步伐变得坚定,使变化不可逆转。因此,我不认为辩论、对各种观点加以比较是什么悲剧。这是正常的。^①

然而被政治松绑的知识分子立即就表现出对苏联现状的不满和激进化的倾向。1987年9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苏共中央举行舆论和宣传单位领导人会议讨论与执行关于筹备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的决定有关的一些问题时,对舆论界出现的各种不良倾向进行了严肃批评。利加乔夫说:

苏联新闻界积极促进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的进程,大力反对种种过时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在生活中树立积极的东西。苏共中央经常给予报界和文学界以大力帮助和支持。苏共中央曾就一系列报道作出过决定。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上,任何企图使实事求是的批评沉默下来的做法,都将一如既往受到坚决批驳。但某些出版物,正如公众所指出,不善于正确掌握方向,不善于把真实报道我们的历史同解决当前的改革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对个别历史时期进行片面报道。

在苏共中央六月(1987年)全会之后举行的舆论和宣传工具、创作协会领导人会议上指出,不能允许对我们的人民、对建设了社会主义并在同法西斯的殊死搏斗中捍卫了社会主义的那几代人采取不尊敬的态度。因此,要大力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宣传我们的真实面貌、我们的根源和我们由于革命、胜利及发展社会主义而得到的东西。

苏共二十七次和苏共中央历次全会的材料、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苏共中央就伟大十月革命七十周年致苏联人民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98~99页。

的呼吁书有助于正确认识我们的历史及其各个复杂时期。各编辑部集体和记者应经常看看这些文件。

苏共中央四月(1985年)全会以后,苏联报刊越来越积极地发表了一些反映不同意见的材料,这是民主和公开性的一种表现。但是也应当指出,某些编辑部总喜欢发表一些符合自己观点的东西。而对那些自己不同意的东西,要么是不发表,要么是在发表的同时又附上一篇编辑部的反驳性评论。结果出现了单行道的民主,应当消除这种现象。如果只根据某个编辑一个人的决定,而不是通过报刊编委会讨论就发表材料,这就完全超出了民主做法的范围。

提高讨论和辩论的水平是一项重大任务。应当尊重反对者的意见,不可轻率处之。因为这是为了加强苏联的生活方式而寻求真理。^①

但是戈尔巴乔夫不为所动。他说:“在公开性条件下,确实在文艺工作者出现了派性和不容异见的现象。在作家中间也有情绪偏激的时刻。我们已把中央的下述观点传达给他们:如果不去团结文艺创作知识分子,而是使对骂愈演愈烈,而且其参与者开始利用公开性、开放、民主来算账,为过去所受的委屈复仇,对批评进行报复,那是可悲的。”^②

实质上,戈尔巴乔夫猜测的可悲性结果已经显示出其预兆。被压抑多年的知识分子开始爆发出其独立思考所带来的巨大思想能量——负面能量。借助对“自由”“民主”口号的娴熟运用,制造舆论把苏联公众引向对苏维埃社会主义“专制”“特权”的自我否定,从而在思想根源上彻底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存在。“对操纵所做的准备工作,不仅在于摧毁某些观念和思想,而且在于构筑新的思想、愿望、目标。那是一些临时的‘服务性’构造物,其主要任务是在思想中引起混乱,使它变得不合逻辑、没有联系,使人怀疑原有的生活真理。这样就使人面对操纵而无力自我保护。”^③于是,思想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87年9月16日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98~99页。

③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的大崩溃开始了。利加乔夫指出：“对苏联持严厉批评态度的人是苏联人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这种受虐狂已发展到了过分的地步。”^①知识分子的活动已远远地超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最初预想而有了新的政治诉求——毁掉苏维埃制度。切尔尼亚耶夫指出：“对任何政权当局，俄罗斯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破坏情结’，这种情结不止一次地损害了本国进步事业，而在这里又得到了再现。这对民主阵营内的力量对比、对改革的整个进程有着悲惨的后果。”^②

2. 官僚特权与改革：社会的愤怒

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反对特权腐败从来不是一件单纯的追查刑事犯罪事件，而是一个撬动特权社会的政治杠杆。“在苏联历史上，刑事犯罪指控往往掩盖着事件真正的政治原因。”^③

安德罗波夫在其执政时期，甚至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对苏联社会中存在的普遍性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于是，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开始着手进行反腐败斗争。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特别是随着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梅杜诺夫的时候，安德罗波夫遭到了来自总书记的直接干涉：不允许再查下去！勃列日涅夫在看过安德罗波夫提交的一份报告后说：“看了安德罗波夫关于国内情况的阴暗报告我感觉完全病倒了，过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恢复不过来。他当然是想用他的报告把我送进坟墓。”^④这场冲突差一点儿以安德罗波夫的辞职而告终。冲突的导火索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另一位领导谢洛科夫——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引发的。谢洛科夫的告发得到了能够接近总书记的其他领导人的支持。“按照当时人们的印象，谢洛科夫是典型的

①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79页。

②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

③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11页。

④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18页。

‘苏联黑手党’的化身：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毫无原则、贪得无厌、为了达到目的毫不留情，他玩弄着勃列日涅夫对豪华汽车与其他奢侈品的嗜好。谢洛科夫耍弄这套手法的全部实质，就是要把他所憎恨和害怕的、为自己的信念而爱好刨根究底的安德罗波夫排除掉。他不无依据地觉得安德罗波夫清楚地知道那些‘黑勾当’。双方彼此都是怀恨在心的。但是勃列日涅夫的‘宫廷游戏规则’迫使他们在见面时还得带着微笑，更何况他们在市内的住处都在库图佐夫大街第26号楼，而且在同一个单元，也就是与勃列日涅夫的住房一个单元，不过是在不同楼层罢了。”^①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执掌苏联政权，他继续未竟的反腐斗争。在首先对莫斯科商业系统的腐败案件查处后，报刊开始大规模地谈论国家和党的机关内存在腐败现象的问题。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最严格的控制下开始的。1983年11月2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在苏联媒体上报道有关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对莫斯科执委会商业总局“美食家”商店工作人员的巨额受贿者进行刑事调查的结果》的决议说，应当“同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结果，《消息报》《莫斯科真理报》和《莫斯科晚报》三家报纸，受委托“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意后，刊登法院对莫斯科执委会商业总局‘美食家’商店工作人员中的巨额受贿者进行刑事调查方面的材料”。三家报纸刊登的材料成了大量侦探故事、剧本、故事片的素材，成了新的、已经提升到“地方”和“地区”层次的揭露性政论文的素材。“黑手党”一词在新闻媒体中出现后，“成了现代政治体制的定义之一”。^②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反腐政策，决心将其进行到底，以彻底清除党自身存在的弊病。这一政策得到戈尔巴乔夫战友们的支持。

一方面，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利加乔夫都对苏联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特权问题心知肚明，甚至还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在勃列日

^①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17页。

^②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69页。

涅夫时期,这些现象不仅不成为问题,反而成为一种政治风尚。在一些大型党组织和社会阶层中道德水准普遍下降,吃喝之风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影响极坏。博尔金到基层出差,看到那里有客必请,常常大摆宴席,不顾来宾而自己狂饮。他们向客人赠送礼品却总忘不了也给自己留一份。很难相信,有谁到企业参观视察以后,其汽车后备箱中没有放进“纪念品”。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经常提到他当时如何苦于接待无数前去度假的客人、想方设法款待客人和馈赠礼品之事。^①

不过,当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书记后,他也开始享受到体制所带来的一切好处。高级领导人的特权制度不只限于免费食品,他们的住房、别墅、汽车等费用也都由国家或党的预算负担。他们的住宅通常在设备齐全的高档楼房里,必要时配备警卫和各种服务人员。^②当然,一切待遇都是要根据他在党内的地位来决定的。成为中央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在体制内的相关待遇立即根据他的职级而有了新的调整。等待着戈尔巴乔夫的新的书记生活“是给他派的贴身警卫、停在大门口的吉尔车以及老广场上那间内设接待室和休息室的宽敞的办公室。开完中央全会回来,门口肯定已经挂上写有办公室新主人姓名的牌子,这是不成文的规定的要求。此外,在‘书记成套待遇’中,还有莫斯科市内住宅和郊外别墅,配有与卫队同属一个机构的训练有素的服务人员;两名轮换上班的秘书;1~2名助手;大名鼎鼎的卫生部第四总局及其属下的门诊部、医院和疗养院;‘克里姆林宫特供点’——食堂和食品店,它们所供应的东西,照当时的标准看来堪称神话般的美味佳肴”^③。

利加乔夫在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也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最后不得不屈服:不要特殊化。1983年4月,也就是利加乔夫被任命为组织部部长后,苏共中央总务部“赠送”给他一辆“海鸥”牌轿车。但利加乔夫非常不喜欢这个大的、特别豪华的轿车,因为他还不习惯坐“海鸥”,也不想坐着它在莫斯科市内到处走。所以利加乔夫马上给当时的苏共中央事务局局长帕甫洛夫写了一张条,“恳请拨给我一辆‘伏尔加’代替‘海鸥’。谢谢

①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② 同上,第259页。

③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53页。

您”。但是回答是出人意料的,也是严肃认真的,“你想另搞一套吗?大家都要‘海鸥’,你想同他们不一样吗?……叶戈尔·库兹米奇,不要另搞一套,使别的部长处于难堪境地。你这一级的工作人员应该怎么样,我们就怎样做吧”^①。

但是从勃列日涅夫后期开始,国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不得不有所为了。成为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决心来一个彻底扭转。出于树立权威的和启动改革的需要,戈尔巴乔夫决定用采取新的措施——坚决地反对腐败——来向人民表明他的立场——改革的人民性。“整个社会,其中也包括相当大量的党的积极分子,接受新的思想转折是有困难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像是一种不能允许的‘叛逆’,简直就是要完全否定自己了。有些人并没有对官方的各种设定的意义做过深入的思考,他们在诚实地劳动、战斗、生活,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向自己提出了问题:‘那我们过去为之奋斗的是什么呢?’要想让人们,让国家的公民懂得并且接受新的思想,需要时间,需要有能说服人的、透彻的解释,需要证明采取新的立场是有实际好处的。”^②戈尔巴乔夫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反腐政策——作为确立个人权力的一种手段,对部分国有机关施以高压,以证明下决心与贪赃受贿和玩忽职守作斗争。但是必须看到,1985年4月以后与以前的明显不同之处。首先,国内的社会情绪变了。《我们期待变革》——这是当时苏联最有名的摇滚乐歌手维克托·措伊唱的一首歌的歌名。国家需要变革。期待变革创造了一种普遍的乐观氛围。年轻的领袖受人信任。这几年,即使是明显不受欢迎的措施,诸如禁酒运动,或者赶超世界汽车制造水平的浮夸任务,引起的与其说是恼怒和怨恨,不如说是嘲讽掩饰下的对形势的理解。“戈尔巴乔夫表现了与贪赃受贿决一雌雄的决心,使大多数人成了他的同盟军。”^③

1985年7月9日,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召开了党中央机关全体人员大会。利加乔夫作了题为“关于乌兹别克共和国党组织情况”的报告。腐败

①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42页。

②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13页。

③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15页。

的事实令人发指。棉花的产量在增长,可是经加工后的纤维产量却逐年下降。盗窃国家财富的款额达数十万卢布。各类“领导人”人均拥有2~5处住宅,其中包括在城郊。他们个人可使用的轿车平均为5辆。在最近3年里,苏共中央总共收到3万封来自乌兹别克劳动人民有关这一问题的举报信件。没有一封信被认真研究过。对此谁也“不予以重视”。利加乔夫在报告中说,仅在一个卡什卡达里亚州,不得不逮捕了内务局的人,没收了这家“警察局”700万卢布的财物。在共和国的内务部里发现了一封信上的附笔:700个共产党员的“虚报名额”——为了显示党员人数的可观,担任所有州委主要职务的人彼此都是亲属。现在已有数千名党工作者被撤职,他们中约有一千五百人被送上法庭。“总之,这是一种多么离奇的在‘帝国’内部的彻底腐败……和彻底的胡作非为景象。”^①

然而“乌兹别克案”是作为政治案件产生的,它后来的发展完全符合苏联法律的传统——“以政治和党的需要为前提”。^②在“公开性”的浪潮中,受到俄罗斯广大阶层支持的对苏联社会中贪赃受贿现象的揭露逐渐变成了一种政治因素。魔鬼从被安德罗波夫打开一条缝的宝瓶里蹿了出来。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开始担心了。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调查过程中有可能“翻出”有损于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时名声的材料,这使他不得不解除费多尔丘克的内务部长职务。这种担心是现实的、普遍的,因为苏联的经营管理体制“在决策方面”带有犯罪性。犯罪性绝非经营管理者特点。“当不是经济实力、不是经营管理成效,而是部里或者从区委会到中央党机关官员的意见决定着机床、钢材和配套设备是否给企业,是否为扩大生产拨款,能不能再雇佣工人,能不能建厂、修运动场等等之时,在这种把全面‘分配资源’作为经营保障方式的条件下,犯罪性是经营管理方式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实际上,从每一个经营管理者、高级行政官员和党的活动家那里都能找到足以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的材料。这一点在苏联路人皆知。不过,对于那部分把经济体制中的矛盾当作个人发财手段的官员来说,自20世纪60

^①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②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13页。

年代初以来,这种威胁第一次变成了现实。”^①从1988年起,社会对于干部特权的批评越来越激烈。一些能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新闻冲破了政治桎梏。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当时最受欢迎的《星火》杂志的主编公开指责一些党的高级官员贪赃受贿。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贪官移交别墅、搬离国家疗养院和休养所的工作于1990年底结束。

然而反腐败斗争本来可以成为戈尔巴乔夫通过改革实现党的自我清洁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是在大规模的舆论宣传中,通过攻击苏联人的公正感和公平的理想,“把厌恶不劳而获的范式逐渐偷换为一种厌恶感,然后又偷换成对干部的仇恨,似乎他们成了剥削劳动人民的阶级。人们的不满情绪宣泄到与国家形象紧密相连的管理人员的身上”^②。结果,戈尔巴乔夫在反腐败的斗争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一切都是过去的错!一切都是这个体制出了问题!于是,改革的悲剧出现了。反腐败为新的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制度性契机。“改革的真正悲剧就在于,在苏共内部开始的我们社会的自我清洁过程,后来不仅变慢了,甚至是被歪曲了。对过去寄生在苏共和整个社会肌体几十年的那些贪赃枉法分子的撤换,转眼之间停止了。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又出现了更为可怕的、各种各样的贪赃枉法分子,他们抑制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和国家内部出现的健康开端。就像迅速繁殖起来的马铃薯甲虫一样,刹那间吃掉了马铃薯的嫩叶,新出现的寄生分子很快就扼杀了改革的萌芽。结果,已着手进行革新的国家失去了平衡,开始摇晃起来,随后跌入了深渊。”^③

五、民族成因:政治觉醒

苏联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运动的民族化。在“公开性”政

①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13~514页。

②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71页。

③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45~46页。

策的号召下,各民族的集体记忆迅速复活。伴随着中央政权控制的减弱,这一民族重塑的过程开始从语言文化、民族经济发展等权利要求逐渐转向民族身份认同和谋求政治独立。随着民族精英分子的政治觉醒和对权力的渴求,在追求民主的旗号下,一场声势浩大而又波及广阔民族独立运动开始兴起。于是,在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进程中,新政权的五花八门的反对派(从极端保守派到极端民主派)比新政权本身迅速得多地意识到:“在一个多民族的‘封闭帝国’里,民族主义是一把万能的政治钥匙,是人人都可利用的廉价燃料,可不难用来点燃人民激情的篝火,以便给任何混乱火上浇油。在街头骚动和集市骚动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示威,于是从此刻起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具有了政治的形式,开始愈来愈露骨地向戈尔巴乔夫的计划挑战。闯入他所提供的舞台的,压根儿就不是他所邀请的演员。”^①作为统一的多民族象征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被抽掉主要部件后轰然倒塌。

1. 民族主义与苏联政治传统及结构

民族主义对苏联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结构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事实上,当1922年12月31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成立之时,其中就存在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作为一种政治妥协的产物,苏联的成立始终未能解决列宁与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争论焦点:民族自决权。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其所肩负的革命使命就是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各民族平等的多民族国家。然而“布尔什维克试图将古老的王朝去帝国化,不允许它们四分五裂,成为单独的民族国家。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复制”^②。列宁和斯大林在成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根本目标上没有分歧。但是,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其他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上两人却出现了矛盾。秉持民族平等思想的列宁坚持认为,应该允许其他共和国以平等的身份和俄罗斯一起加入新成立的苏联。这样,就能够保证其他共和国和作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在政治上的平等。

同时为了确保这种政治平等的牢固性,列宁主张,加入苏联的各共和国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21页。

② [英]罗伯特·谢伟思:《斯大林传》,李秀芳、李秉中译,华文出版社,2014年,第174页。

拥有民族自决权利,也就是拥有退出联盟的自由权利。在列宁看来,这样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遏制“大俄罗斯主义”思想的蔓延及其在政治上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但是,斯大林不赞同列宁的主张。他认为,应该以俄罗斯共和国为主体基础,其他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其中,从而成立一个新的联邦国家。斯大林的这一想法在他向俄共(布)中央提交的《关于共和国联盟问题的议题草案》中有了明确表达。斯大林承认列宁关于民族独立的政治理念,即十月革命后,建立独立的民族共和国是革命的必然延续。但是,内战的爆发和帝国主义的干涉让斯大林感觉到,如果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再向前进一步,就会导致各民族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分离,就会造成“最后一点资源”的耗尽。在给列宁的信中,斯大林发出了警告:“我们现在到了这样的地步,中央和边疆区之间关系的现状,缺乏任何规章,处于完全混乱状态,正变得忍无可忍,产生着冲突、怨恨和愤慨,把所谓的统一联邦国民经济变得有名无实,在全俄范围使一切经济活动受到阻碍,趋于瘫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在形式上对于各独立的共和国并不是必须要执行的,而同时这些机构又经常撤销那些独立共和国中央机构的决定,这就会引起后者对莫斯科中央机关‘非法行动’的抗议……在这种情况下,俄共中央委员会一般是在地方中央机关已经下发了自己的命令,而这些命令随后又被莫斯科的中央机关废止后才进行干预,这就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拖延和停顿,而且在地方上引起非党员群众的困惑和共产党员们的愤慨。”^①因此,斯大林主张:“必须以合并成一个联邦的结果来完成使各共和国更加亲密的运作,实现军事、经济和外事(外交和外贸)的统一,同时保留各共和国内务的自治权。”^②

列宁坚决不同意斯大林通过强制性措施而是主张通过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来逐渐实现统一联盟下的各共和国之间的平等。1922年10月6日,列宁在给加米涅夫的便条上写道:“要绝对坚持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由俄罗

^① [俄]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叶卡捷林娜·雷巴斯:《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吴昊、张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7~328页。

^② 同上,第327页。

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绝对!”^①在12月30日口授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中,列宁痛惜地说:“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②他对联盟成立条约提出了尖锐批评:“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③

但是在1921—1924年列宁生病期间,在政治局里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没有列宁的未来”^④运作程序。斯大林关于联盟的主张实际上得到了其他党的领导人的赞同。

1922年11月3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赞同斯大林《关于共和国联盟》的报告,批准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并确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权“批准统一的苏联国家预算”。这一关键性的表述,使得“联盟的中央政府获得了实权”^⑤。

1922年12月16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欧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和《欧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

1922年12月30日,斯大林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宣告:“今天是苏维埃政权历史的转折点。它在已经过去的旧时期和已经开始的新时期之间竖立了一个路标。在旧时期,各苏维埃共和国虽然是同时行动,但是是各自为政的,它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问题;在新时期,各苏维埃共和国孤立存在的局面已经结束,它们正在联合成统一的联盟国家,以便顺利地同经济破坏作斗争,苏维埃政权所考虑的已经不只是生存问题了,而且还有如何发展成一支能够影响和改变国际

① [俄]列宁:“就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1922年),《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6页。

② [俄]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922年),《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9页。

③ 同上,第350页。

④⑤ [俄]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叶卡捷林娜·雷巴斯:《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吴昊、张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2页。

局势以利于劳动者的严重的国际力量的问题。”^①

1936年12月5日,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苏联《新宪法》。《新宪法》共有13章146条。1936年宪法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最终确立了按民族行政单位实行民族管理的政治体制。1936年宪法规定,苏联由11个加盟共和国组成。^②虽然宪法规定“每一加盟共和国均享有退出苏联之权”,但是斯大林明确表示:“在我们苏联没有一个共和国会愿意退出。”

为什么说“没有一个共和国会愿意退出”呢?

这是因为在斯大林看来,维护苏联政治结构平衡和稳定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是共产党而非其他力量。只要苏联共产党保持强大和统一,那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只是一种政治形式,而其政治运行实践则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制的本质。各加盟共和国实际只是中央的下属机构,并没有宪法规定所应享有的自主权。马特洛克分析了苏联国家制度的特性。他说构建起苏维埃帝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是完全吻合的。所有这些正是“缺席政治统治”的典型特征,通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它,那就是“帝国”。无论苏联体制还有些什么别的特征(它的确还有很多其他特征),它的确是一个帝国。不过,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帝国。罗马帝国、大不列颠帝国、法兰西帝国、西班牙帝国,它们都是因一国入侵另一国而产生的。结束于1917年革命的俄罗斯帝国亦是如此。侵略国成为其他殖民地所依附的“宗主国”。与之相反,“苏联帝国则是政党入侵的结果,该政党将官僚和意识形态合而为一。所谓宗主就是共产主义统治阶级,即官僚阶层,它没有国籍之分”^③。在这种政治安排下,一切都是由苏共中央来统筹安排,然后由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负责落实执行。通过党的机关系统,莫斯科的苏共中央牢牢地掌握了对地方各共和国全方位控制。

这种政治实践的长期运行,使苏共开始丧失对民族问题的警惕。对解

① [苏]斯大林:“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1922年),《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29页。

② 随着民族共和国的升格,苏联按民族属性形成的最终结构是: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区。

③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册),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决民族问题取得的成就,往往是用“洋洋得意的语气评价局势”^①。按照苏联官方的说法,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已经没有民族问题。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宣布:“过去遗留给我们的那种状况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②

然而真实的民族问题现状又是什么样呢?随着苏联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到了20世纪60—80年代,“在斯大林时期被阻隔的民族教育又焕发了生机”^③。据统计,从1965—1981年全苏联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人数平均增长了2.4倍,而少数民族地区的增长幅度超过了全苏的增长水平,其中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地区的人数增长2.6倍,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增长2.7倍,立陶宛、摩尔达维亚、塔吉克增长3.0倍,乌兹别克增长3.1倍^④;在1980—1981年间,至少有10个民族的学生对居民的百分比要高于俄罗斯人,他们当中有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卡尔梅克人、卡巴尔达人、哈萨克人。^⑤这种客观发展的情况表明:“随着教育与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现代化,每个民族都产生了本民族的知识分子,民族自觉性日益提高,对本民族历史渊源的天然兴趣也在增强。”^⑥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是一件好事。“这曾是那些为我国革命做好准备并在沙皇帝国的废墟上开始建设新社会的各民族革命家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戈尔巴乔夫也指出:“有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部分人堕入民族主义迷途,表现出民族局限性、民族攀比和傲慢态度。”^⑦尤其是在“公开性”的号召下,随着苏联共产党的自我改革及其对地方控制的减弱,曾经被压制的民族问题开始抬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45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等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科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43页。

③⑤ [瑞士]安德雷斯·卡佩列尔:《俄国——多民族的帝国:产生、历史与解体》,转引自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20世纪60—90年代苏联各社会政治阶层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④ 《1922—1982年苏联国民经济》,转引自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20世纪60—90年代苏联各社会政治阶层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230~231页。

⑥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45~146页。

⑦ 同上,第146页。

头。“克里米亚鞑靼人事件”^①就是这一问题的初始反应。

1987年7月25日晚,大约三百名鞑靼人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举行示威,要求重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示威者举着戈尔巴乔夫的画像,高呼要求会见戈尔巴乔夫等口号。苏联政府提出由少数民族问题委员会主席葛罗米柯会见他们,但遭到示威者的拒绝。为控制这次示威事件,莫斯科当局调来大量警察把示威者围了起来,并劝他们离开红场。26日上午,留在原地继续示威的只有一百人左右。上午8时过后,警方调来大批卡车和公共汽车将示威者围了起来,警察则排成人墙围住示威者,但没有抓人。7月以来,鞑靼人一直在为重返克里米亚家园而举行各种抗议活动,25日晚的抗议是最大的。7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在接见克里米亚鞑

^① 克里米亚鞑靼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民族:能干、好斗、坚强不屈。他们有在可汗的领导下同莫斯科人战斗了几个世纪的历史,在1571年的时候甚至包围了莫斯科。但随着鞑靼人的靠山土耳其的衰落,1783年克里米亚开始受俄国人的统治。沙皇当局让许多克里米亚鞑靼人移居国外,大部分去了土耳其。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统治俄国时,鞑靼人在1921年获得了自治共和国的地位,但很快感到十分失望。20世纪20年代末,鞑靼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受到攻击;而在30年代初期,作为斯大林的合作化运动的一部分,有三四万鞑靼农民被赶到了西伯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占领期间,有几千名鞑靼人在6个由德国人担任军官的营中服役,同当地的苏联游击队作战。但更多的鞑靼人在为苏维埃而战,而且得到了很高的嘉奖。但是在1944年5月德国人被赶出克里米亚几天之后,将近二十五万鞑靼人突然被全部驱逐出了克里米亚。斯大林政府以克里米亚鞑靼人勾结纳粹为由,把20万~25万鞑靼人放逐到中亚地区。1944年5月11日,鞑靼人根据国防委员会决定,从克里米亚迁居到中亚地区。当时,他们占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居民总人数的19.4%。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因为一部分鞑靼人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合作。的确,克里米亚被侵占后,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在辛菲罗波尔召开了穆斯林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以阿萨诺夫·别利亚尔为首的克里米亚政府。克里米亚鞑靼狭隘民族主义分子在克里米亚领土上成立了自卫队。据现有材料,当时有10个编制为200~300人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志愿营和14个同样用途的连。在这些部队的积极参加下,鞑靼人破坏游击队基地、烧毁附近林区的居民点,并杀害当地居民。这样,在游击队周围形成了“死亡区”。在有克里米亚鞑靼狭隘民族主义分子参与的讨伐行动过程中,有8.6万名克里米亚的和平居民被杀害,4.7万名战俘和8.5万人被赶往德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犹太人、希腊人和茨冈人几乎被灭绝。例如,在“红色”国营农场,第147营和152营的犯罪分子建造火炉,日夜焚烧活人。遗憾的是,国防委员会关于鞑靼居民从克里米亚迁居的决议,不仅仅涉及背叛者,而且还波及整个克里米亚鞑靼居民。正如目前认为的,这一决议反映了战争的严酷条件和克里米亚的具体环境以及当时的情形。但在任何情况下,克里米亚鞑靼居民全体迁居的法令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战斗,受到了苏联颁发的崇高国家奖赏。1967年,苏联政府就驱逐事件向克里米亚鞑靼人道歉,但不准他们返回克里米亚。虽然多年来有许多鞑靼人活动分子被捕,但鞑靼人一直为争取返回家园的权利进行着斗争。政府列出各种理由不让鞑靼人返回家园:鞑靼人搬走会损害乌兹别克的经济;在克里米亚为鞑靼人提供住房和安排工作有困难,但真正的原因或许是不愿意让这些鞑靼人回到距西方世界如此之近的地方去。

鞑人代表时说,政府已经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克里米亚鞑人公民在呼吁书和声明中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个委员会将认真研究他们的愿望并制定相应的建议,这些建议将成为解决问题的基础。^①

克里米亚鞑人事件的发生,在对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提出挑战的同时,也预示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几十年来一直被淡化和压制的民族问题再次成苏联共产党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1987年8月9日的《华盛顿邮报》对此发表评论。^② 文章指出:

西方外交官和苏联的活跃分子说,克里米亚的鞑人最近在这里举行的气势汹汹的抗议活动以及克里姆林宫变化不定的反应表明,各个民族和种族的要求可能是对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主张的最严重的考验之一,他们的要求曾长期受到压制,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主张使他们把这些要求公开提了出来。

近几个月来,官方容忍言论自由的程度受到各类人的检验,其中有力图发行独立刊物的持不同政见者,有崇拜牧牛神的教徒和自封的嬉皮士。但是,由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引起的民族主义示威对苏联国家的秩序和结构提出的挑战最为严重。

这个趋势是从去年年底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开始的。在一个长期担任哈萨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委书记的哈萨克人被俄罗斯人替换以后,在中亚城市阿拉木图发生了哈萨克人的骚乱事件。从那以后,至少发生了另外三次由民族问题引起的抗议活动,这些活动都反映了民众的情绪。

各种现象表明,如果民族主义的示威蔓延下去,苏联领导人可能面临大得惊人的不满情绪。

此间的一些西方和苏联观察家说,克里姆林宫看到的可能只是民族问题的开始。这些分析家说,更大程度的公开性必然意味着允许公

^① 塔斯社莫斯科 1987 年 7 月 27 日电。

^② [美]杰克逊·迪尔:《民族主义抬头使苏联的公开性受到考验》,《华盛顿邮报》,1987 年 8 月 9 日。

开发泄一部分民族主义情绪,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和文化政策可能加剧这一趋势。

一位西方专家说,勃列日涅夫“善于在少数民族之间搞妥协”,因此,在他统治的18年中,民族主义一直在控制之下。这位西方专家说,改革运动必然意味着减少流向少数民族占支配地位的欠发达共和国的资财,这可能迅速造成不满情绪。另外,戈尔巴乔夫强调在边远的加盟共和国推行俄语的做法虽然对于提高效率是重要的,但是也可能引起了不满情绪。

2. 吃亏的民族:变化了的民族心理

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谋求民族独立的政治趋向,既是在“公开性”刺激下民族历史记忆的集体再造的反映,同时又是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遭遇困境后各民族共和国的心理反应:也许脱离苏联,我们可以过得更好!

1922年12月18日,斯大林与《真理报》记者谈及各独立共和国联合运动时,解释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必要性。他说:

这个运动是怎样引起的,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帮助农民经济,发展工业,改进交通联络工具,财政问题,关于租让制和其他经济协定的问题,作为商品买卖者在国外市场上一致行动,——这就是产生成立共和国联盟的运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内战使我们各共和国内部的经济资源枯竭,另一方面没有较多的外资流入,这就造成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各苏维埃共和国中没有一个能够靠本身的力量来恢复自己的经济。现在,当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内战结束后第一次认真着手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当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次感到单靠各个共和国孤军作战十分不够而完全有必要联合行动并在经济方面联合起来的时候,当感到这种联合是真正恢复工业和农业的唯一途径的时候,这种情况就特别显著了。

但是要把各个共和国的经济活动真正联合起来,直到把它们联合

成统一的经济联盟,就必须建立一些能够沿着一条确定的道路指导这些共和国的经济生活的相当的常设联盟机关。正因为如此,这些共和国之间原有的经济协定和贸易协定现在就显得不够了。正因为如此,建立共和国联盟的运动会的发展超过了这些协定并提出了各共和国的联合问题。^①

但是斯大林所阐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的经济诉求及其合作基础,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却遭到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在进入1988年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迅速转向剧烈的政治改革,苏联的经济形势日益陷入困顿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88年4月24日发布研究报告称,苏联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仅增长0.5%,其中农业生产下降3.1%。民意调查的结果也显示:绝大多数莫斯科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经济计划没有带来什么好处。12%的莫斯科居民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他们家庭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了。40%的居民希望他们的家庭生活能在今后5年内有所改善;18%的居民认为,情况会越来越糟。^②更为糟糕的是,随着世界石油价格的下降、对外贸易的萎缩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导致的中央调控计划的混乱,民族地区对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抱怨也越来越多。

应该说,这种抱怨其实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民族主义的复苏和爆发。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布局既有经济上的考量,也有政治上的策略。从经济上来说,通过在民族地区集中发展部分工农业产业,既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又能够使民族地区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特色,从而在经济布局上形成全国一盘棋的经济统筹。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生产棉花,棉布却不能自己生产;土库曼斯坦产天然气,可是90%的居民用不上天然气;哈萨克斯坦是畜牧业基地,肉的供应却很紧张。中央迫使中亚国家向单一经济发展,把哈萨克斯坦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斯坦,又把乌兹别克斯坦适宜种粮食的土地划给哈萨克斯坦,把乌兹别克斯坦适宜放牧的土

① [苏]斯大林:“关于各独立民族共和国的联合问题”(1922年),《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114~115页。

② 合众国际社纽约1988年5月27日电。

地划给塔吉克斯坦”^①。曾担任过美国驻苏大使的马特洛克曾经描述过苏联计划经济的这一显著特点。他说：

我对那一年秋天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思考^②，显然，我认为自己亲眼目睹了殖民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尽管我们的官方东道主否认这一点，但对未被意识形态观察蒙蔽的旁观者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不是由当地人民自己作出，而是由莫斯科的“计划者”作出。这里的人，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土生土长的，唯一能做的就是贯彻上面的指示。“上面”就是莫斯科，它是至高无上的。这一政权是公开的、在当时也是非常好战的无神论者，它只符合卡尔·马克思和弗拉基米尔·列宁定义的“历史”。在我看来，当我们到来这个当时称做斯大林纳巴德的城市后，迎接我的那一片棉花正是这一帝国某些特征的强有力标志。

对于中亚而言，生产一定数量的棉花并以国际市场价格销售或供给当地棉纺厂，是有利可图的（我不敢肯定，因为它从未被尝试过），但建立一种单一经济以便为苏联其他工业区提供廉价的原材料，这肯定不符合这一地区的利益，也不会发生在考虑成本和效益的市场经济下。

只有在计划经济下、当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被视为殖民地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它只在没有私有土地的国家发生，因为私有者对保护其资本——土地自身的质量——有巨大的兴趣。国有财产理论上属于每一个人，实际则不属于任何人，至多是属于那些只对大规模生产感兴趣的中央计划者。

由于这一“体制”为棉花生产制定了越来越高的目标，因此不得不将日益匮乏的水用于棉花灌溉，对基本的经济因素（如资本投资的适当回收）或其对环境的影响则不加考虑，这样，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准和健康条件开始下降。此外，年复一年对产量提出更高要求为谎报材料提供了刺激因素，日趋严重的腐败使弄虚作假既可能又有利可图。

^① 左凤荣：《苏联史·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第9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62页。

^② 指马特洛克在1961年陪同国会参议员艾伦德访问苏联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

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在于,需求棉花的苏联纺织业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且不愿用硬通货从国外购买(实际上,这更为经济)。当你能迫使你的“领地”上的人为你生产廉价的原材料时,为什么还要花费硬通货去买呢?当局不准人们问:“谁因廉价而收益?”^①

于是,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单一化加强了其对中央政府的经济依附与政治服从。“这些共和国感觉没有平等地位,他们只是中央命令的执行者,根本谈不上有自己的经济自主权。这种单一性体制造成的权力不平衡潜藏着严重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②对于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两大主体共和国——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说,这种服从于全国经济需要的布局是尤其令人不满的。据统计,俄罗斯联邦在其领土内征收的销售税留给自己的比例是42.3%,乌克兰是43.3%,拉脱维亚是45.6%,摩尔多瓦是50%,爱沙尼亚是59.7%,白俄罗斯是68.2%,阿塞拜疆是69.1%,格鲁吉亚是88.5%,亚美尼亚是89.9%,塔吉克是99.1%,吉尔吉斯是93.2%,立陶宛是99.7%,乌兹别克是99.8%,哈萨克和土库曼是100%。^③

对俄罗斯来说,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视整个国家为自己所有,但又经常不满于将资源运往俄罗斯境外,特别是中亚地区。他们为苏联的规模和力量感到自豪,但又不满于共产党为维系这一帝国强迫他们作出牺牲。”他们强烈感到,他们与波罗的海人、中亚人、高加索人不同,许多人认为摆脱这些民族会使俄罗斯更加强大。反之,他们将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视为自己的“小兄弟”,认为在法律上没有理由将他们与俄罗斯分开。^④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俄罗斯人的“吃亏心理”随着局势的恶化而开始演变成为脱离联盟的离心倾向。

叶利钦正是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心理变化而获取了俄罗斯人的大力支

①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0~21页。

② 左凤荣:《苏联史·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第9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62页。

③ 同上,第408页。

④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3~24页。

持。1990年5月22日,叶利钦在向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作的政策讲话中说,俄罗斯联邦应有“真正的主权”,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他要求自由地管理它自己的资源和自主地同外国签订经济协议。叶利钦这番讲话激怒了一直试图维护和改造联盟的戈尔巴乔夫。5月23日,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进行了严厉谴责。他说:“在认真分析了叶利钦的讲话之后,人们得出结论,他的讲话代表着想以建立俄罗斯主权为掩护来搞垮苏联的要求。”戈尔巴乔夫指责叶利钦又回到了他最初提出的把俄罗斯分成几个国家的想法上去了,这可能会导致这个共和国人民之间发生冲突。戈尔巴乔夫说,这个发言“含有要使俄罗斯摆脱社会主义的因素”;“对我们俄罗斯人来说,对我们全国人民来说,社会主义的选择、苏维埃的权力不仅仅是字句的问题。这些是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念,我们的基本点”。他说,叶利钦要求把主权扩大到个人、工厂和市镇委员会,“是极其荒谬的,它将导致无政府主义和地区主义”^①。

面对戈尔巴乔夫的指责,叶利钦毫不退让。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在当选为苏联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后立即宣称,这是使“俄罗斯在社会、经济和精神方面获得新生”的开始。叶利钦说:“首先,戈尔巴乔夫总统将会作出非常不悦的反应,但是以后便会逐渐习惯于这种不可避免的事。”^②5月30日,叶利钦明确表示,俄罗斯共和国“必须保卫自己不受中央的支配”。他说:“宪法中规定加盟共和国拥有主权,我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脱离联盟,但是联盟必须知道我们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们必须首先寻求折衷办法。”叶利钦指出:“俄罗斯将在一切问题上都是独立的。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将高于联盟的法律,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将高于联盟的宪法。”^③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在当选俄罗斯联邦首位总统后就表现出了更加强硬的政治离心主张。叶利钦对美国记者说,他在访问美国会见布什总统时将告诉布什:“作为一个总统应当对苏联的形势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俄罗斯联邦将成为一个独立程度很高的共和国,包括对外政策。因此,最好的

① 法新社莫斯科1990年5月23日电。

② 美联社莫斯科1990年5月29日电。

③ 法新社莫斯科1990年5月30日电。

办法是既同戈尔巴乔夫又同叶利钦进行对话,而不要只顾及一个政治人物。”^①6月20日,在五角大楼与国防部长切尼会谈后,叶利钦说:“我是俄罗斯的总统,俄罗斯占苏联的70%,对俄罗斯的舆论应予以考虑。”^②事实上,美国人也确实满足了叶利钦的政治要求。在与布什会见后,两人一起在白宫草坪上发表讲话。对叶利来说,这“意味着美国把他当作国家元首对待”^③。

当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加盟共和国政治精英开始向中央政权发起冲击的时候,由“吃亏的民族”心理所滋养出来的民族独立愿望已经被在民族感情上进行的政治投机所代替。

纳扎尔巴耶夫指出:“正是在加盟共和国之中,俄罗斯联邦率先宣布自己的主权后,苏联解体就具有了不可逆转的性质。”^④戈尔巴乔夫曾经寄予希望的民族情感——“他们的民族属于一个族际主义大家庭,他们是这个在人类进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幅员辽阔而又伟大的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⑤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已经徒有其表。1990年7月16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通过的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更是给予了致命一击。曾经是苏联最初发起国的两个共和国都表示出了主权独立的愿望,苏联的解体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宣言宣称,乌克兰的国家主权是:“共和国在其领域内的权力是居统治地位的、自主的、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在对外交往中也是独立和平等的。”宣言说,乌克兰有权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内卫部队和国家安全机关。宣言着重指出:“乌克兰共和国公民一般在共和国境内服军役,未经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同意不得在乌克兰境外为军事目的服务。”乌克兰共和国庄严宣告:它有意在将来成为一个“不参加军事集团的永久中立国,并恪守三项原则:不生产、不扩散和不使用核武器”。大多数在会上发言的人着重指出,主权的概念不应当以退出苏联为目标。不应当割断各共和国间业已建立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其他联系,而应当维护和发展这些联系。在通过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6月18日电。

② 路透社华盛顿1991年6月20日电。

③ 美联社华盛顿1991年6月20日电。

④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时事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⑤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50页。

的文件中指出,乌克兰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将建立在根据平等、互相尊重、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缔结的条约的基础之上。^①

“八一九事变”后,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步步紧逼下,苏联的解体已经成为必然。其中,“对中央进行报复”的一种特殊愉快心情也起了一定作用,多年来这个中央即使不是被看作共和国各种灾难的根源,那么至少也是被看作对共和国领导限制和不愉快的监督的机构。^②

1991年8月27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一个帝国的分崩离析。^③

乌克兰反共的反对派领导人尤里·谢尔巴克宣称:“现已发生的事情是中央帝国的分崩离析,帝国政权结构完全被破坏。不能抱有幻想,苏联已不再存在了。”政治家们今天十分热切地谈到希望有一个由真正独立的国家组成的邦联,这些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货币、自己的对外政策,甚至有自己的军队。对一些政治家来说,一个核超级大国的分崩离析使人想象将来会出现边界战争的令人不安的景象,核武库会支离破碎,孱弱然而完整的经济会解体,还会出现某些正在缔造的国家恢复专制独裁制度的前景。拉脱维亚议会议员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说:“这种情况是极为可悲的,因为南斯拉夫发生的情况今后也会在这里重演。”另外,俄罗斯联邦领导人担心一旦联盟解体,叶利钦将很难阻止自己共和国的解体。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联邦,由几十个民族组成,其中许多民族强烈要求给予更大的自治权。联盟的消亡使西方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西方国家被迫努力去弄清在这里该与谁打交道。

① 塔斯社基辅1990年7月16日电。

②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

③ [美]《纽约时报》,1991年8月27日。

第二章 社会民主运动的人员构成

改革时期的苏联社会民主运动的人员构成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在戈尔巴乔夫的号召下,为了破除沉寂、冷漠、消极的社会心理,戈尔巴乔夫首先鼓动知识分子进行社会科学的创新。知识分子开始成为社会思想的引领者,也是社会民主运动最初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随着“公开性”“民主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政治氛围日益宽松的环境下,围绕改革展开的思想交锋,整个社会迅速分化、分裂,社会大众纷纷开始根据自身的利益取向而加入各种社会组织之中。一些冠以“俱乐部”“人民阵线”等名称的政治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社会民主运动由思想领域迅速转变成为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的人员构成是极其复杂的,因此导致这一运动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内涵:既是具有敏锐政治触觉的社会精英在国家转型过程中为攫取权力而裹挟社会民意的组织化行动,又是广大不满现状而希望通过集体行动来达成自身愿望的社会民众的群体性行为,更加不可忽视的是一小部分仇视苏联共产党统治的怀有敌视立场的人在社会情绪过激化情况下的采取的煽动性、破坏性行动。

一、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民主运动在思想上的引领者和行动上的组织者,是与其自身的阶层特点密不可分的。更确切地说,是与其在苏联历史上所扮演的“社会良心”的道德角色息息相关的。知识分子的这种角色在经历过斯大林时期的强权统治又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获得短暂的思想新

生后有了关键性的变化:在“解冻”的语境中,知识分子开始从政治受迫害者一变而为敢于向政治强权作斗争的“社会良心”。这一变化的过程就在于:

对相当大部分苏联历史的抹黑,同时又企图保留斯大林时期生活的许多方面,这就无法对苏联社会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回答。在知识分子中渴望寻求政治思想的非此即彼,那是无法纳入苏联宣传的陈腐公式的。在赫鲁晓夫“解冻”初年得到传播的某些思想,无论与苏联历史的20年代还是30年代都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因为它们与苏联革命及人们社会平等的概念是格格不入的。许多人在赫鲁晓夫的“解冻”中看到苏联体制及其社会平等原则瓦解了。爱伦堡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把“苏维埃人道主义”的口号与这样的概念联系起来:苏联社会中有全面发展的人,也有心灵的一半是“黑暗的”“未经培养”的人;有长着能经受“陡升”的坚强的肺部的人,也有有着“腐烂的肺部”的人。对“人道主义”的议论掩盖了这样的主张:有坚强肺部、能经受“陡升”的“浪漫主义者”具有优越性。实质上,在革命浪漫激情的掩盖下产生了知识分子优越的反动思想。后来二十大的神话产生了关于“二十大产儿”的另一个神话,这些产儿就是能领导社会运动向前的知识分子。^①

1. 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苏维埃政权史上,知识分子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赫鲁晓夫的“解冻”而带来的苏联国内政治环境的宽松,在知识分子中间促成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使与现政权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② 麦德维杰夫指出:“苏维埃国家在它的各个历史时期都被构建为一个专制型的专政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不同意党的政策的合法反对

^① [俄]Ю. Б.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421~422页。

^②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从这以后,在苏联和西方之间展开了一场冷战,形成所谓“帕斯捷尔纳克事件”。

派和对党的领导人的公开批评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各种批评和抗议形式正好在 60 年代末开始发展和增多了,我们的历史政论文章中人们把这种批评和抗议形式称作‘持不同政见者运动’。”^①这种紧张与其说是在政治制度上的对抗,不如说是在思想信念上的冲突。“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有许多人不仅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但他们的唯一武器就是言语、音乐和绘画。他们是用自己的文章、小说、歌曲来维护自己的信念的,而不是用暴力、监狱、劳改营和精神病院。我们的报刊那样广为宣传的‘苏联人民政治道义上的一致’,实际上不过是苏联宣传中的一个神话。甚至在我们国内曾处于金字塔顶峰的那些人中,有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一窍不通,但仅仅是由于提升职务和保持权力的需要而把自己宣布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②

“持不同政见者”由于大多批判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不赞成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垄断等而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他们人数虽少,但声誉高、影响大,不仅受到苏联社会内部不满现实者的广泛同情,而且也受到西方国家的吹捧而沦为其攻击苏联的工具。安德罗波夫说:“应该说,‘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名词本身就是宣传家们狡猾杜撰出来的,其目的在于蒙骗社会舆论。众所周知,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思想不同的人’。资产阶级宣传使用这个名词是打算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苏维埃制度不容许它的公民进行独立思考并迫害任何‘有不同想法的人’,即不像官方所规定的那样。”^③不过,就整个运动来说,这主要不是由外国煽动起来的,“它是由苏联社会和国家本身的缺点和弊病引发起来的,它的根还在斯大林时期的阴暗岁月里就扎下了,那里毫无人性的恐怖和国家的罪行成了家常便饭。这个运动也是对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恢复名誉和重新极力限制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宗教、民族团体的合法权利的企图的回答。这个运动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内状况、供应短缺和生产组织中的缺点的普遍不满,是由于苏联的党政等

①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② 同上,第129页。

③ [俄]安德罗波夫:“共产主义信仰——新世界建设者的伟大力量”(1977年9月),《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73页。

级制中许多环节上和各个级别中还存在着专横和腐败而产生的”^①。

“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苏联政府的严密管控。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苏联政府监控“持不同政见者”的主要机构。1967年7月3日,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在呈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一个克格勃的独立部门,其任务是“组织反间谍工作去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苏共中央政治局赞成安德罗波夫的建议。^② 1967年7月底,克格勃第五局成立。第五局接受的第一批案件中,就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案^③和安德列·萨哈罗夫案^④。苏联政府一般采取严厉批评、解除工作、开除出

①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29页。

② 同上,第87页。

③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9年11月,作家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形势,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销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

④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苏联原子物理学家,并曾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的研发,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萨哈罗夫开始关注他工作所牵涉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他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活跃于政坛,反对核武器扩散。1968年5月,萨哈罗夫发表了《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智力自由的思考》的文章,指出反弹道导弹是核战威胁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篇文章作为地下出版物被传播并在苏联境外出版后,萨哈罗夫被禁止参与与军事有关的研究。1972年,萨哈罗夫与同为有人权行动主义者的叶连娜·邦纳(ЕленаГеоргиевнаБоннэр)结婚。1973年,萨哈罗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翌年他获得了奇诺·德尔杜卡世界奖(Prixmondial Cino Del Duca)。197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他被苏联禁止离境领奖,他的妻子叶连娜在颁奖典礼上代他宣读演讲词。1980年1月22日,他因为示威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捕,随后他被流放到一个保密行政区高尔基,即现在的下诺夫哥罗德。在1980—1986年间,萨哈罗夫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声称他在高尔基的寓所经常被搜查和抢掠。1985年12月13日,欧洲议会设立了“欧洲议会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以奖励在维护人权方面的个人和组织。1986年12月16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展开重建和开放的政策,萨哈罗夫被释放。1988年,萨哈罗夫获得国际人道和伦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Humanist and Ethical Union)颁发的国际人道主义奖。之后,萨哈罗夫协助了苏联最早的一批独立政治组织的成立,并成为苏联反对势力中主要一员。1989年3月,萨哈罗夫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Съезды Советов),成为民主改革势力的领导者之一。

党、驱逐出国、送进精神病院以致搜查逮捕被判入狱等办法惩治持不同政见者。随着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政治环境的日趋保守,刑法典里出现了一项条款(第190条第一款),规定对散布损害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谣言和消息者,要进行惩罚。“这就为对犯罪的解释留下了广阔的天地,让克格勃得以为所欲为。现在持不同政见者成了主要敌人——这就是那些正直和有思想的人,民族的良心,捍卫民主思想、人权、公民权利的人。等待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是监狱。”^①据不完全统计,因从事反苏宣传与散布“攻击苏联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故意造谣诽谤”而被判罪的人数,在1956—1960年之间为4676人。1961—1965年被判罪的为1072人。其中1965年被判罪的总计20人,1966年为48人,1967年为103人,1968年为129人,1969年为195人,1970年为204人。1976—1980年总共为347人。^②

然而不论苏联政府采取何种的方式实施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其目的:“在苏联晚期,驱使知识分子对党以及领袖本人的‘慈父般的关怀’感激涕零的,不仅是斯大林时代养成的恐惧心理,而且还有无法克服的不知是先决性的、还是后天获得的那种力求得到上司器重的内心需要,至于已经多次描述过的御用知识分子对于执政者尤其是暴君的着迷综合征,就不在话下了。”^③但是,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哪怕其后又再关闭,都无法阻挡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独立思考。

推动这一变化的正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出于同西方特别是在同美国进行谈判以谋求缓和时的政治策略,戈尔巴乔夫需要在西方所关注的“人权”问题,特别是在“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上有所表示。1985年11月20日,在日内瓦举行美苏首脑会谈中,美国总统里根就人权问题与戈尔巴乔夫展开讨论。里根强调,如果苏联真诚希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在人身自由问题上必须认真考虑。只要苏联人不能

①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②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

③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自由地离境,苏联的犹太人和持不同政见者受到监禁,美国领导人就无法同苏联做交易,因为他们有政治压力。美国希望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切实措施。戈尔巴乔夫对里根的指责表示不同意。他对里根说,苏联公民享有广泛的自由:没有挨饿之苦,失业之愁;生老病痛有人照料。而美国人却没有这样的自由,少数民族更是备受虐待和欺凌。尽管这次历时 69 分钟的私下会晤由于这一话题导致不欢而散,但是,参与会谈的美国官员却认为,这次私下会晤还是出现了积极迹象:戈尔巴乔夫平心静气地同里根就人权问题交换了意见,不像苏联事先威胁的那样,人权问题根本不予讨论;戈尔巴乔夫没有因为里根提出人权问题而指责美国干涉苏联内政,这同苏联的公开宣传也不同。^①

为了表示在这一问题上的诚意,苏联政府于 1986 年 2 月 11 日宣布释放持不同政见者、犹太人阿纳托利·夏兰斯基^②。这一举动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关注。舆论认为,戈尔巴乔夫采取的这一行动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改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形象。自担任苏共总书记以来,戈尔巴乔夫一直想树立一种能作让步的“开明的”领导人的形象。释放夏兰斯基可以给西

^① 《参考消息》1985 年 12 月 14 日。

^② 被监禁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时年 37 岁)是在为争取移居国外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苏联犹太人的活象征。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作出的全部贡献始于 1973 年 7 月。当时,他希望移居以色列的第一次要求遭到拒绝,理由是他作为莫斯科一名电子计算机专家的工作使他有了解到“国家机密”。在那之后,他参加了其他犹太人的事业,会见西方报界记者,看望苏联各地的犹太人。1976 年 5 月他成了莫斯科一个监督赫尔辛基协议实行情况的小组的创始人之一,随后便扩大他的人权活动范围。他进行的人权活动,其中包括曾与另外 50 名犹太人在莫斯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苏联报界搞“反犹主义”,他遭到克格勃的多次警告,说他这是在自寻逮捕。但是,在报界对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恶毒攻击之后,1977 年 3 月 15 日,他被指责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收集情报,并被扣押在一个秘密地点达 16 个月。1975 年 7 月开始对他进行审讯,而他的妻子阿维塔莉则在西方率众开展一场坚定不移的争取他获释的宣传运动。阿维塔莉与夏兰斯基在一位莫斯科犹太法学博士主持下结婚仅 24 小时之后就孑身一人移居以色列,迄今已有四年多。在结婚之后的那一天就获得了出境签证,据报道,当时有人向她保证,她的丈夫随后也可以移居国外。在苏联当局宣布在夏兰斯基服完 3 年徒刑后还要接受 10 年强制劳动时,夏兰斯基说:“我现在在这里对我的妻子阿维塔莉、我的人民和俄国人民宣布,明年将移居耶路撒冷。”苏联加罪于夏兰斯基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也正式出来否认夏兰斯基曾为华盛顿收集过情报。3 年徒刑期满后,夏兰斯基被移到彼尔姆附近的三十五号劳改营去。1982 年 9 月,夏兰斯基进行一次长达 3 个月的绝食斗争,抗议他被关押期间条件恶劣。据持不同政见人士说,有关当局曾在长达 9 个月的时间里不让他母亲去监狱探望他,不让他领取他家人寄给他的邮包或信件,还被没收了一本祈祷书。

方舆论造成一种苏联在人权问题上抱有诚意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华盛顿在戈尔巴乔夫和里根 1986 年举行首脑会谈之前少了一种攻击莫斯科的手段。二是能够破坏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夏兰斯基作为犹太人全国运动和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的发言人,一直被美国犹太人组织视为他们事业的象征。夏兰斯基的离去使得苏联国内的反政府运动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引人注目。“苏联领导人期望西方把夏兰斯基获释看成是戈尔巴乔夫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的一种新的缓和措施。”^①

此后,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政策的实施,苏联国内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管制日益放松。1987 年 2 月 7 日,苏联在一周内释放了 42 名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从劳改营、监狱和流放地释放的人包括人权活动分子、宗教积极分子、争取向国外移民积极分子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2 月 9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雷德曼表示欢迎苏联释放持不同政见者,并希望莫斯科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让他们获得行动自由,并允许所有想移居国外的犹太人移居。雷德曼同时表示,美国将密切关注进一步的动向,而苏联政府在这一领域继续采取积极行动将对美苏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1989 年 2 月 5 日,苏联内务部宣布苏联已经释放所有政治犯,并首次邀请大赦国际来苏访问。5 月 5 日,苏共中央宣布对 20 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因被控进行反国家和反党活动而判刑的所有人撤销原判。1990 年 4 月 10 日,苏联向美国保证:苏联狱中已无政治犯。美国表示相信苏联的这一保证。至此,从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正式结束。

另一方面,出于对知识分子在改革中的思想创新作用的新认识而采取的政治转变。怎么看待“持不同政见者”的“政见”呢?应该说,“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主张中虽然有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主张正好切中了苏联社会的弊端。可以说,与体制内的学者相比,对于一心想要打破苏联社会僵化偏执的思想状态的戈尔巴乔夫来说,“持不同政见者”可以说是具有明显的思想优势。至少他们在思想主张上的政治勇气是体制内的学者所无法比拟的。

^① 法新社莫斯科 1986 年 2 月 11 日电。

戈尔巴乔夫认为,他所要进行的“改革涉及所有的人——从普通共产党员到中央书记,从工厂到部长,从工程师到院士。只有当改革成为全民的事业的时候,它才能够进行到底。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应该诚实地、认真负责地、全力以赴地做好本职工作。在这个运动中,越来越广大的人民阶层逐渐被触动,并投身于改革之中”^①。那么怎样才能启发和促动广泛的人民阶层参与到改革中来呢?戈尔巴乔夫认为,首先需要破除社会在人民思想和心理上的障碍。“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在以前的年代里形成的思维。”^②具体来说,这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障碍机制。这种机制“有很大能量,以致对迫切问题进行建设性分析的种种尝试和新的思想都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戈尔巴乔夫批评说:“宣扬成绩——真的和假的成绩的做法占了上风,同时又忽视普通劳动者和公众的正确要求和意见。在社会科学方面,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评价和推断却成为只能加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学术的、理论的和其他的讨论遭到阉割,没有这种讨论就不可能使思想得到发展和有创造性的生活。文化、艺术、政论乃至教育、医学也未能避免消极倾向。粗制滥造、形式主义、无谓的空谈也在那里露头了。”^③

那么在改革的初期,由谁来肩负起思想上的“破冰之旅”呢?戈尔巴乔夫通过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转变释放了这一强烈的思想解放信号。

1986年12月16日,被流放在高尔基市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安德列·萨哈罗夫突然接到戈尔巴乔夫亲自打来的电话。戈尔巴乔夫对他说:“回来干你的爱国主义工作吧!”^④戈尔巴乔夫说这番话时,尽管他可能会想到萨哈罗夫在科学院的工作,“但他的着重点显然在于向一个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变,在于改变苏联这个‘万马齐喑的国家’”^⑤。对戈尔巴乔夫的电话,萨哈罗夫并不感到惊奇。事实上,当萨哈罗夫在得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② 同上,第76页。

③ 同上,第17页。

④ [俄]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瓦西里·米特罗欣:《克格勃绝密档案》(下),王振西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531页。

⑤ 同上,第532页。

总书记后就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幸运。我们有了一个有才能的领导人！”^①

作为曾经被安德罗波夫视为“头号人民公敌”的萨哈罗夫的释放，迅速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1987年3月15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她希望在她本月底访问苏联时会见苏联科学家和主要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博士，以及另外两位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为198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精神病医生阿纳托利·科里亚金和宗教界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奥戈罗德尼科夫（他因进行“反苏活动”坐了9年牢之后于上个月才出狱）。“她的这些要求被认为是考验俄国新的公开原则的试金石。”^②

被释放的萨哈罗夫迅速投入戈尔巴乔夫希望他所从事的“爱国主义工作”之中。1987年12月2日，萨哈罗夫在《莫斯科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呼吁苏联立即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并且立即从阿富汗撤军，结束这个国家的血腥杀戮。他还呼吁克里姆林宫放弃反对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政策，并同华盛顿签订一项协议，把远程战略核武器削减50%。这封信是关于对下周将在华盛顿召开的苏美首脑会晤的希望的一组广泛报道中的一部分。萨哈罗夫说：“我个人认为下一步应是达成削减50%的战略进攻武器的协议。我肯定无需考虑反导弹防御问题及其他政治和军事问题便可达成这一协议。”他还说：“这种武器削减50%不会打破世界的战略平衡。”^③

1988年1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与萨哈罗夫会见中，耐心地听取了萨哈罗夫的意见，对他“十分尊重”。萨哈罗夫则向戈尔巴乔夫递交了一份希望政府释放的200名政治犯的名单。

1988年5月16日，萨哈罗夫等苏联10位著名知识分子共同致函苏共中央，要求推迟举行定于下月召开的党代表会议。萨哈罗夫在信中说，鉴于民主选举出席会议的代表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因此这次会议应推迟到秋天举行，“我们作此建议的目的就是想在苏联社会的全体成员中间激发一种对党的新事业的深切同情”。信中还说，出席会议的5000名代表不应根据党

① [俄]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瓦西里·米特罗欣：《克格勃绝密档案》（下），王振西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531页。

②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1987年3月15日。

③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7年12月2日电。

的官员名单选出,而应根据他们对改革的态度来选举他们;候选人应该以书面形式公布自己的政治思想;应允许部分非党员在会上参与投票,并应允许普通公民向会议自由提出建议。^①

1988年6月22日,萨哈罗夫在苏联30个城市大约三万人签署的一项致苏共第十九次全苏代表会议的呼吁书上签字。呼吁通过关于在首都建立一座斯大林主义牺牲者纪念碑的决议。

1988年6月25日,萨哈罗夫和其他一些前政治犯和知识分子要求为斯大林清洗运动的受害者树碑而发起的街头游行。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莫斯科发生的第一次非官方的政治游行。

1988年7月1日,在听取了萨哈罗夫等人的建议后,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说:“还有一个在代表会议前夕和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为受迫害者建造纪念碑的问题。你们可能都记得,在党二十二大的闭幕词中提到过这一点,当时得到支持。在党的二十七大会上也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没有作出实际决议。正如报告中所说,对无法无天时代的受害者恢复公正,是我们的政治义务和道德义务。让我们通过在莫斯科建造一座纪念碑来履行这项义务吧。我相信,这一措施将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支持。”^②7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建议,在莫斯科为斯大林统治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

1988年9月10日,萨哈罗夫发表评论说苏联的改革正在倒退。他说,虽然戈尔巴乔夫仍在推行他激进的改革,但他在一些领域已遭到了挫折。

1988年10月21日,苏联首次允许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哈罗夫首次出国访问,赴美参加11月初召开的研讨会。

1988年11月2日,萨哈罗夫在苏美学者在莫斯科举行讨论会期间向《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记者发表评论,强烈批评了戈尔巴乔夫建议中有关垄断权力的内容,说这将退回到可能导致出现新的斯大林主义时代的中央集权制。他说:“在一个不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让国家元首拥有如此大的权力是极其愚蠢的。实际上这是一种无限的权力。今天由戈尔巴乔夫

^① [美]《华尔街日报》,1988年5月16日。

^②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27页。

掌权,但明天可能由某个其他人掌权,不能保证某个斯大林分子不会继承他的职位。”“把权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对改革是极其危险的。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是我国的命运之所在。”萨哈罗夫说,目前进行的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只能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没有民主,改革就会走入死胡同,并且指出把权力移交立法机关是“重要的”。这种变革将在很长时期决定我们的生活。^①

1988年11月6日,萨哈罗夫抵达纽约时说,他希望苏美在不发生战争情况下使世界变得更好。11日,萨哈罗夫在纽约继续发表对改革的评论。他说,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政策需要得到支持,西方国家不应担心这种改革成功,而应担心它会失败。12日,萨哈罗夫从纽约打电报给设在赫尔辛基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权委员会,表示完全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著名人权组织“七七宪章”组织的国际研究会。13日,萨哈罗夫正式被主评为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14日,在华盛顿国际学者中心参加会议。《纽约书评》刊登了访美期间萨哈罗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评论。^② 萨哈罗夫说:

戈尔巴乔夫,我相信,就像苏联任何一位领导人一样,一步一步地在党和政府统治集团里面向上爬而获得权力,他自己曾经说过,他在一个“危机”时刻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我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有一套全面而有连贯性的计划去克服这个危机——一个他要实行的改革计划。

在我的印象里,他过去只是临时凑合一些“点子”不时同反对力量讨价还价,看一步,推行一步。因此,除了他所说的他想要做的事情之外,我不知道他是否有长远的目标。无论如何,他最近所做的,同他以前所说的并不一致。

……在政治方面,他最近的策略可以相当正确地形容为一项“透过不民主的方法去达成民主改革的运动”。以我看来,那是一项将带给苏联人民一个不民主结构、使苏联人民必须在一段长时间内不断斗争的

^① 美联社纽约1988年11月2日电。

^② [美]《美洲华侨日报》1988年12月9日。

极端危险的策略。我们指的是宪法改革、对最高苏维埃的间接选举、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身兼国家元首及党总书记的人的身上。请让我强调一点,共产党是国家的唯一政党。新草拟的宪法甚至未提起过政治多元化的可能性,亦无一项多党制的条款。

结果,最高苏维埃主席将有权在立法会期与会期之间发出实际有法律效力的“指导思想”。最高苏维埃将在完全不能被称为真正民主的环境之下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毫无疑问地,这些选举将完全由党和国家机制所控制。换句话说,二千二百五十名人民代表将只是花瓶,而其中四百人的被选入最高苏维埃,是完全不能被形容为民主选举,而选举人民代表的制度亦只跟“开玩笑”差不多。因此,被允许提名候选人的组织并不包括最新民众运动。

……戈尔巴乔夫一直采用的反民主手段,将来的结果无人可以预料,或者,他将能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克服所有反对他的人而实施他的计划。但问题是,戈尔巴乔夫除了面对主观障碍之外,还有客观的困难:从上至下,雄据着政治经济整个国家结构的行政命令体制和斯大林体制。这个体制、结构能在什么时候改变、怎样改变,甚至能否纠正一部分、改变一部分,完全不可逆料。或者,一个只改变一部分的制度会比旧制度更坏,因为部分改变会打乱“正常秩序”而带来危机。

例如,国家有一个计划——看来是经济改革的基础——要把工业完全置于自负盈亏。问题是,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这个制度能否有效;在产品没有自由市场、原材料没有自由市场的情形下,工厂能否运作。要想象将变成怎样的后果是很容易的。

随着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萨哈罗夫的政治活动舞台迅速扩大。

1989年3月21日,在此前曾经落选苏联人民代表的萨哈罗夫,在戈尔巴乔夫的帮助下,在增加苏联科学院候选人名额的基础上,萨哈罗夫获得了竞选人民代表候选人的资格。此前,苏联科学院在1月份只批准了8个候选人,其中没有萨哈罗夫。其后,根据选举法,科学院必须增选12名候选人。

可以说,苏联科学院为萨哈罗夫竞选人民代表候选人扫清道路。

1989年5月25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开幕。在所有竞选出来的代表中,戈尔巴乔夫承认萨哈罗夫是“最突出的人物”^①。萨哈罗夫发言要求大会废除一党专政,限制克格勃的权力并确立一个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在发言中,萨哈罗夫指责让戈尔巴乔夫掌握“实际上无限的权力是极其危险的”,批评戈尔巴乔夫无法断定自己到底“是官僚体制的领袖,还是‘改革’的领袖”^②。不过,萨哈罗夫也在大会上遭到其他代表的批评和指责。6月2日,一些怒气冲冲的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战士严厉批评萨哈罗夫。萨哈罗夫1989年2月在加拿大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苏联直升机飞行员曾受命向设伏的苏联士兵纵队开火射击,以免使他们被活捉。与会的人民代表切尔沃诺夫斯基在会议上宣布了阿富汗战争老兵的一份声明。声明称:“这是对所有参加阿富汗战争的老兵的尊严和声誉进行抹黑。”已身患“帕金森”病讲话困难的萨哈罗夫随后辩解说:“我并非有意要侮辱苏联军队。我尊重在伟大的爱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卫我们祖国的苏联战士。”^③

1989年6月17日,萨哈罗夫在荷兰对记者们说,西方国家对苏联领导人的改革所感到的“欣快”是非常“危险的”。萨哈罗夫说:“西方从非常明确的目标这个方面来说应该相信戈尔巴乔夫,但是,最重要的是不应该盲目信任他。”萨哈罗夫说,苏联人民最近对这个国家领导人的信任感已经大大下降,这主要是由于经常缺乏基本的消费品,有几个共和国出现了少数民族内部的争斗以及在这个国家缺乏“任何社会公正”。^④

1989年10月7日,《论据和事实》周刊发表民意调查显示,前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和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波波夫是苏联最得人心的人。对这一结果,令戈尔巴乔夫大为恼火。10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与新闻界代表会晤时主要批评了《论据和事实》周刊,训斥和指

①② [俄]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瓦西里·米特罗欣:《克格勃绝密档案》(下),王振西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532页。

③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9年6月2日电。

④ 法新社荷兰格罗宁根1989年6月17日电。

责他们反对共产党或者试图要他在政治上垮台。^①

1989年12月5日,萨哈罗夫呼吁全国11日举行罢工。目的是迫使最高苏维埃代表考虑取消宪法中关于共产党起领导作用的条款。

1989年12月12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开幕。萨哈罗夫再次发言要求大会对宪法第六条展开讨论,并坚决主张结束国家的一党专政。但是,戈尔巴乔夫对此不予理睬。

1989年12月14日,萨哈罗夫因心脏病突发骤然去世,享年68岁。不可否认,萨哈罗夫的猝死要部分地归咎于以前对他的迫害而对他造成的折磨,和在高尔基市流放期间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他很可能就是被这个极权制度害死的,”民主派记者维塔利·克罗蒂奇就这样说道:“令我欣慰的是,在萨哈罗夫去世前,他给了这个制度致命的一击。”^②

萨哈罗夫的去世并不是一个时期的终结。相反,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持不同政见者”已经迅速转变成为政治民主化时期的激进的“民主斗士”,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掘墓人。

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促成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像近代俄罗斯历史上各次重大转变(18世纪初期向西方的转变,1861年结束封建主义,1929年后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大跃进)一样,这次变革的力量主要也是来自最高层。戈尔巴乔夫富有改革的勇气,但却走错了改革的方向,他试图改革不能改的东西,结果是改变了苏维埃制度,并最终毁灭了苏联。但是,在改变苏联高层的政治意识方面,持不同政见者们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70年代中期的一份克格勃报告引述索尔仁尼琴的话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为反对苏联政权所作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上的准备”。尽管他们经受了挫折,但持不同政见者们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他们人数很少,又遭受迫害,除了来自自己信念的力量和勇气外,他们手无寸铁,而西方也

^① 美联社莫斯科1989年10月17日电。

^② [俄]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瓦西里·米特罗欣:《克格勃绝密档案》(下),王振西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533页。

只能给他们提供一点软弱无力的声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击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安全与情报部门向他们全力发起的要使他们保持沉默的运动。在20世纪最后的30多年中,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的进步知识分子能像他们那样为推翻反民主的政治制度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①

2. 体制内的“持不同意见者”

与“持不同政见者”相比,就苏联政治现实而言,对体制最大的危险其实来自于内部——“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②事实上,1986年12月,在戈尔巴乔夫的力主下苏联政府通过了一项政治议案,取消了对反对派的刑事诉讼。^③于是,“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走出劳改营和监狱。但他们的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卷土重来。很多人已经厌倦了‘为人权而斗争’,还有一些人则由于在西方有了名气,便跑到国外过起了太平日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正是在1986年由于对他们停止迫害而画上了句号”^④。在苏联时期曾经任职过苏共中央智囊——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对外情报局的普里马科夫就指出,许多摇撼苏维埃体制的持不同政见者,比如安德列·萨哈罗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姆斯蒂斯拉夫·列奥波尔多维奇·罗斯托罗波维奇^⑤等人,“他们从未成为苏维埃体制之一部分。他们批判这个体制,同这个体制作斗争,要求取消这个体

① [俄]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瓦西里·米特罗欣:《克格勃绝密档案》(下),王振西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533~534页。

②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③ 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突然亲自打电话把萨哈罗夫请回莫斯科居住,并给他安排两套住房和别墅,还允许并鼓励他从事政治活动。1988年1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萨哈罗夫,双方进行了3个半小时“热情友好”的谈话。

④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⑤ 姆斯蒂斯拉夫·列奥波尔多维奇·罗斯托罗波维奇,俄罗斯杰出的大提琴家、指挥家,1964年被授予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1970年10月31日,他写信给《真理报》声援被流放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而被禁止演出。1974年他带妻子和两个女儿逃离苏联,后定居美国。1978年他们被剥夺苏联国籍。1990年1月被恢复俄罗斯国籍。

制；——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外部’进行的，甚至在他们之中一些人还生活在苏联，直到被迫而出走国外的时候都是如此”^①。普里马科夫提醒人们注意，真正从思想的根底上动摇苏维埃体制的，恰恰是那些受到党的重用的人。他说许多研究者“极少提到那样一些人，其中包括身居并非低微官职的那些人；很少提及那些学术机构和报刊杂志，这些人和报刊不但反对那种大规模镇压的实践，而且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教条、官方理论准则之荒谬而陈旧的观念。这些‘体制内的’众多力量的积极活动，彻底促进了那些本质的合理变化的发生”^②。

戈尔巴乔夫到了莫斯科后，他就发现在党的高层其实已经存在着这种情况。他说：“勃列日涅夫时代晚期（决非斯大林时代）有一则奇闻几乎已被人遗忘，那就是不成文的禁忌：列宁的晚期著作不得再版，也不得‘未经批准地’摘录。列宁口授的一批著作甚至曾一度放在专门保存处锁起来，勃列日涅夫演讲稿写作者中的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几乎把‘大逆不道’的列宁语录当成地下传单塞进了正式讲话稿。理想化了的列宁，被党内秘密的民主派首先用作抵制斯大林主义复辟的工具。”^③而对雅科夫列夫来说，这位曾经的苏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他对党的领导人的助理们的这种“夹袋式”的小动作嗤之以鼻：“我曾多次见到为勃列日涅夫起草各种文件的我的朋友和同事是如何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地把某种新的东西、某些新鲜的概念写进那种用词千篇一律、充满刻板套话的标准文件里。当时有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认为所有这些‘机巧做法’会有助于开手‘领袖们’。唉！这类企图照例都是失败的，仅仅成为在扎维多沃晚间喝茶时悲叹的理由。”^④

不过，戈尔巴乔夫的到来却让党内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博尔金指出，党和国家的上层人物是那样的衰老，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向前看，没有能力思考祖国发展的前景。苏共二十六大之后已经可以看出，大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很可能活不到下一次代表大会。正因为如此，戈尔巴乔夫在政治

①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② 同上，第1~2页。

③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94页。

④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舞台上的出现才引起了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们的注意。“戈尔巴乔夫属于比较新的一代人,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有魅力,尚能鼓动起那些一直在苦苦寻找一位在实现社会上的改革思想的过程中可以依赖的领袖的人们。于是这些人(其实并非大家一齐也并非毫不犹豫)便把宝押在了戈尔巴乔夫身上,帮助他扬名,帮助他在曲折的仕途上步步升迁。”^①

尽管如此,作为“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仍然在思想一统的苏联社会存在着,而且是以官方“思想机构”的形式吸引着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当时主要有两个机构:一个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一个是苏联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是向党的最高领导层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提供政策咨询的机构。1985年普里马科夫接替雅科夫列夫出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他认为:“在努力克服官方意识形态强加的教条主义思维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起了很大作用。”^②它对那些工作在其他机构的,具有“进步意识”的学者非常有吸引力。^③另一个重要机构就是苏联社会科学院。它受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直接领导。其职责是教育和培训外国留学生,特别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其目标是为这些国家培育具有影响力的共产主义宣传者甚至领导人。普马利科夫对苏联社会科学院赞誉有加,他认为:“在完全停滞的年代里,苏联科学院乃是真正的‘自由思想的孤岛’。”^④

这些思想活跃的官方机构之所以能够长存,关键在于它受到官方的保护。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第一任领导是阿努沙万·阿尔祖马尼扬(任职于1956—1965年),他拥有保护该机构的能力,因为他的妻子是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的亲密伙伴米高扬的小姨子。在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政治生命结束后,阿尔祖马尼扬仍能保住其职位,这得益于他和勃列日涅夫在战争时期结下的情谊。^⑤1965年阿尔祖马尼扬去世后,与勃列日涅夫保持密切关系的伊诺泽姆采夫出任该所所长直到1982年逝世。伊诺泽姆采夫同研究

①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92~93页。

②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6页。

③⑤ [英]阿奇·布朗:《改变世界的七年》,韩凝等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134页。

④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人员有“君子协定”：所长可以保证研究人员们学术探索自由性，反过来学者们也必须遵守“游戏规则”，不给研究所制造麻烦。^① 其后，同戈尔巴乔夫有着密切关系而且思想激进的雅科夫列夫在 1982 年担任所长后，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要决策机构。

当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并努力破除“以往年代里形成的思维”的时候，寻求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人”的支持就成为改革的思想助力。雷日科夫指出，“设计师”“施工队”以及改革的其他意识形态专家和组织者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只有大多数或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支持改革，我国根本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才有可能得以实施。然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党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织一支可以说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联系逐渐变成形式上的和单方面的东西：总是从上到下、从党到群众，很少有自下而上、从群众到党的事情发生。此外，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开始给予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产生强大的影响。首先是电视、广播，还有日报、周刊、各种大小杂志。那么在这些机构工作，决定它们立场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人民精神生活的“气候”、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和公民的政治行为。在巨大的乃至后来是起决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这些人来决定”^②。

于是，被压抑多年的知识分子开始爆发出其独立思考所带来的巨大思想能量——负面能量。借助对“自由”“民主”口号的娴熟运用，制造舆论把苏联公众引向对苏维埃社会主义“专制”“特权”的自我否定，从而在思想根源上彻底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存在。“对操纵所做的准备工作，不仅在于摧毁某些观念和思想，而且在于构筑新的思想、愿望、目标。那是一些临时的‘服务性’构造物，其主要任务是在思想中引起混乱，使它变得不合逻辑、没有联系，使人怀疑原有的生活真理。这样就使人面对操纵而无力自我

① [英]阿奇·布朗：《改变世界的七年》，韩凝等译，新华出版社，2013 年，第 135 页。

②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12～13 页。

保护。”^①于是,思想的大崩溃开始了。利加乔夫指出:“对苏联持严厉批评态度的人是苏联人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这种受虐狂已发展到了过分的地步。”^②知识分子的活动远远地超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最初预想而有了新的政治诉求——毁掉苏维埃制度。切尔尼亚耶夫指出:“对任何政权当局,俄罗斯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破坏情结’,这种情结不止一次地损害了本国进步事业,而在这里又得到了再现。这对民主阵营内的力量对比、对改革的整个进程有着悲惨的后果。”^③

作为戈尔巴乔夫政治思想上最为亲密的助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就是体制内“持不同意见者”作为典型的代表。

谁也无法忽视雅科夫列夫在摧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体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没有戈尔巴乔夫作为总书记—总统的权势——他必须依靠戈尔巴乔夫才能获得权势。“这两个我们现实生活的罪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既是改革的‘设计师’又是‘施工者’,他们在一起参与阴谋的制定与执行,他们达成一致,相互配合,紧密协作,有机地相互补充。有时出于战术上的考虑还变换角色。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与雅科夫列夫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态度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④但是,雅科夫列夫拥有在整个改革时期谁也无法撼动的最大权力——思想的力量。无论是反对、痛恨他的人还是赞赏、肯定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改革的基本观点是雅科夫列夫提出来的。”^⑤也正是因此,雅科夫列夫“成了戈尔巴乔夫的邪恶智囊人物,诱使戈尔巴乔夫摧毁了他得以维系其权力的党组织”^⑥。

对雅科夫列夫来说,“改革运动从一开始起就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

①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②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79页。

③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

④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61~262页。

⑤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57页。

⑥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王为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698页。

生了矛盾。马克思主义宣布自己是关于建设体现社会公正的社会的学说。很少有人对此感到困惑：怎么会有关于专门研究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的学说。可是，古拉格群岛从肉体上消灭了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而半个世纪以来使人们同周围世界隔绝并配合以极度意识形态化的教育制度，最终完成了已开始的‘伟业’。真正相信可能建成‘人间天堂’的说法的几代人成长起来了”^①。雅科夫列夫开始尝试着对苏联共产党信奉的政治学说进行反思。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了雅科夫列夫以极大的触动。“赫鲁晓夫刚刚讲了几句斯大林的罪行，我就感到浑身发冷。当时我是个怎样的人呢？年纪轻轻，对于马列主义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尚未完全消失，我是抱着这个信仰经过卫国战争的。对于所许诺的人间天堂的到来，我还抱有希望。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对于童话般未来的着迷产生了多么强大的愚弄和欺骗作用啊。当然，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脑子里已经产生了某些模模糊糊的疑虑和不合时宜的问题，不过我劝自己说，这些问题并不是那么重要。我把它们赶到一边去，因为对于党的设想之‘壮丽’的信任，对于‘克里姆林宫智者’（他们比别人都更清楚该做些什么）的景仰仍然主宰着我的头脑，我驱赶着任何仿佛是不相干的思维。我心中感到一种令人压抑的空虚，却对严肃的结论以致行动尚未做好准备。”^②

苏共二十大以后，雅科夫列夫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学习。在美国的学习，对他的思想的转变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我比较年轻，具有非常矛盾的思想，在我头脑里已经扎下了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我回国了，尽管在思想问题上已向右转了。”^③于是，回国后的雅科夫列夫又一次遭遇了政治上的挫折。

从1968年起，雅科夫列夫成为苏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但是，他的政

①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

②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患录》，述戩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20页。

③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0~21页。

治命运在1972年发生了转变。1972年11月15日,《文学报》刊登了雅科夫列夫题为“反对历史主义”的文章。“他在文中猛烈抨击了俄罗斯自我意识的觉醒,错误地给它扣上了‘家长制残余、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大帽子。”^①雅科夫列夫的观点不能被当时的苏共领导容忍。于是,他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从苏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职位上被“流放”到加拿大,担任苏联驻该国的大使。马特洛克指出,雅科夫列夫曾有非常广泛的国外经历,他被任命为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在渥太华居住了10年。在那些年,莫斯科的谣言工厂称这一任命是从上层政治生活中“流放”,认为雅科夫列夫所写的一篇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文章导致了此事。然而,雅科夫列夫说,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他感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越来越困难。在其他事情上,他力图降低在他看来对勃列日涅夫过分的颂扬,而只学习属于勃列日涅夫本人首创的东西。当共产党官员攻击他没有事先清理他的文章时,他请求调到国外工作,如果可能,到英语国家工作。^②

雅科夫列夫在加拿大的任职长达十年之久,苏共中央将他与苏联政治生活隔离了,但却进一步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经历不仅对雅科夫列夫本人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他即将遇到的“贵人”——戈尔巴乔夫——来说也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他们对国内外的事情有着共同的想法。

1983年5月,戈尔巴乔夫出访加拿大。这次访问对雅科夫列夫和戈尔巴乔夫两人的影响都很大。对雅科夫列夫来说,这是他的一次极好的政治机会——作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的到访,可能会为他重返苏联政治舞台提供良机。因此,在雷日科夫看来,雅科夫列夫对到加拿大正式访问的当时还不起眼的政治局委员、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关怀备至。以于他在改革失败后总结原因时特别指出了这次会面的不同凡响。“雅科夫列夫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一般人,也不是政治局的普通成员,他在摧毁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事情上,留下了极为浓重的一笔……人们只能凭猜测来确定他在把戈尔巴乔夫推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起到了

①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35页。

②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82~83页。

什么作用。他们之间的交往密切,是从1983年开始的。”^①雅科夫列夫自己也说:“我同戈尔巴乔夫在农业部长韦兰农场里的谈话具有标志性意义。有些政治家和观察家认为这是改革的开始。”^②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次对加拿大的出访和同雅科夫列夫的交谈使他耳目一新,好像找到了思想上的知音。博尔金指出:“这次访问对后来《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作者了解西方世界发生的一切,了解关于国家发展的另一种观点,了解民主化、自由和公开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戈尔巴乔夫同我交谈时说,在加拿大,雅科夫列夫阐述了自己对苏联和世界发展的看法以及振兴我们社会的途径。这次访问对雅科夫列夫后来的命运也具有重要影响,戈尔巴乔夫出访之前,国内并没有急于调雅科夫列夫回国。”^③于是,当戈尔巴乔夫回国后,打算请求安德罗波夫将雅科夫列夫调回国内任职。这一请求遭到安德罗波夫的拒绝。

雷日科夫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一次,当我与安德罗波夫单独会见后,有人向他报告说,戈尔巴乔夫正等在接待室,应约来见他。我们收拾起文件,打算离开,可安德罗波夫请我留下。戈尔巴乔夫开始详细向总书记汇报他出访加拿大的情况。他肯定了这个国家的农业技术、肥料、储存和农产品加工。安德罗波夫认真听取汇报后,平静地说:如果您喜欢加拿大的农业,就想一切办法把咱们的也搞成那样吧。戈尔巴乔夫见总书记心情很好,于是决定向他建议,意思是我们的大使雅科夫列夫在加拿大已经待了10年,在那里待够了,也许该把他召回莫斯科了?……安德罗波夫突然严肃起来,很不客气地对戈尔巴乔夫扔下四个字:“让他待着!”……不久安德

①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

②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2页。

③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44页。

罗波夫死了,雅科夫列夫也就回到了莫斯科。^①

回到莫斯科的雅科夫列夫很快就得到了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重用。1985年7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时年63岁的雅科夫列夫被提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外电认为:“他是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外的新形象的设计者。”^②1987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了专门研究经济改革构想的全会。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组成发生了变化。雅科夫列夫、斯柳尼科夫和尼科诺夫成为政治局委员。外电评论:“雅科夫列夫获得提升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显然是得分。”^③

不忘“知遇之恩”的雅科夫列夫立即投入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伟业”之中。他长期领导“写作班子”的工作,“总书记的报告和讲话中的主要提法其实都是他的发明”^④。不仅如此,雅科夫列夫在制定改革的种种方案,为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选配干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认为,改革所遇到的全部问题在于具体的人,在于他们素质差,他们的行动不受监督,在于没有公开和民主选用各级干部。于是,在他私下写给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发展的无上命令”的长信中,雅科夫列夫论证了他的改革方案。其后的改革实践证明,这一方案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蓝本。

1985年12月底,雅科夫列夫给戈尔巴乔夫呈送了一份长篇变革方案。在方案中,雅科夫列夫力图论证把苏共分成两个党的必要性,甚至这是无上的命令。这样,两个党就可以构成民主竞争的局面,在这条路上,它们会自我更新,通过民主选举互换执政地位。社会也就能从中获得强大的活力。在这封题为“政治发展的无上命令”的长信中,雅科夫列夫认为:

①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23~124页。

②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7年1月28日电。

③ 路透社莫斯科1987年6月26日电。

④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93~94页。

一切日后改革的目标是人，“是人的所有相互关系和各种表现，即生产、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爱好、心理、健康，等等”。

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

今天问题不仅仅在于经济，尽管它是向前发展的物质基础。关键在于政治体制，确切地说在于政治体制怎么运作，怎么发展，怎么面向人，在于政治体制同人的关系，在于政治体制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服务作用。因此，必须1. 消灭言行脱节现象，使个人、集团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地融为一体。2. 根据每个阶段的具体历史条件，坚持不懈地充分实现民主主义。3. 使人发展成为在思想和行动上能自觉地团结其他人的、独立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使每个人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4. 切切实实地吸收所有人来改善地方和全国的生活。这是关系到解决头两项任务的主要关键。这里有着消除社会不满的基础，……

关于改革的基本原则：

1. 民主——这首先是选择的自由……2. 对生活的所有方面的革新要综合进行——从经济到民主的多种“形式上的”外表特征……3. 在关键领域(首先是党内)的改革要同时或甚至提前进行……4. 改革必须坚决进行，只应受现实可能性的限制，因为考虑到一系列国家职能要有一个逐步(尽管是在将来)消失的过程……5. 改革本身应该不只是从上面进行，而且应该由群众从下面进行。6. 吸收学术界的力量来研究并实施民主化的进程以及对民主化的中间成果进行监督。

关于选举：

选举不应该是推举，应该是选拔，而且是选拔优秀人才。可以对提名的候选人名额加以限制(但不应少于两个候选人)

代表应该依从选民的意愿，应该通过自己的嘴真正反映选民的意愿，而不是用选民的名义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样做的结果是：代表对群众的真正责任心、从属群众并受他们监督的程度空前提高。……这将首先特别有效地影响到使地方苏维埃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

关于公开性：

全面的公开性,就是及时提供包罗万象的信息,这是社会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消息灵通的人才能有创见地和富有成效地参与社会事务。要想号召不掌握广泛信息并处于不利于发挥这种创造积极性的社会气氛中的人们表现出公民积极性来,是不可思议的……

关于司法权:

司法权真正独立于其他各种权力……

关于人权:

与此同时,应切实保证行使个人的权利。应该制定人权及人权保障法……

关于经济问题:

……群众的切实参加经济的计划、管理和销售活动,建立积极的能自我发展的基础,这才能达到个人、集体和社会的利益真正的、有机的和始终不渝的一致……

几条建议:

……为了这些目标,有必要采取下述原则性的领导体制:1. 由苏联总统行使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2. 总统通过全民直接投票……3. 共产主义者联盟由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两个党组成……4. 总统下设两名副总统……5. 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6. 最高苏维埃的工作和职能具有特殊性,需要另作考虑……

最后,雅科夫列夫宣称:“这将是历史性的革命改革。这样时代要求的压力下将会减小。像个人的积极性、人员的更迭、同情性作斗争等问题的解决,将不会特别费劲。社会的政治文明将提高,也就会有实实在在的稳定局面。”^①

雅科夫列夫提出的上述方案,“无论如何不是政治局的意见。这些问题

^①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77~182页。

从来没有全面提出过,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会议上讨论过”^①。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实践中却正是按着这个方案一步一步走下来的。

戈尔巴乔夫非常欣赏雅科夫列夫的思想主张。于是,在总书记的支持下,这位新任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开始在借着“公开性”的名号大肆进行社会舆论调整——更换新闻领导。尽管主要的任命仍需要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但他能够主动提拔他所选中的人。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这一起悲剧性事件为雅科夫列夫提供了机会,把某些活力注入死气沉沉的苏联新闻媒介。当放射性尘埃开始沉降,这场巨大灾难的某些情况开始为克里姆林宫所知时,如果进行改革,那么显然过去那种过分保密的做法就不能持续下去了。苏联领导人的国际地位动摇了。由于未将真实情况告诉世界,正当他们最需要信誉的时候却失去了它。“切尔诺贝利事件仅仅是一个突出事例,长期以来,许多观察家已对这类问题掌握了很多情况:即使作为宣传工具,苏联的新闻媒介也一钱不值。报纸和电视迟钝单调,缺乏信息,根本引不起苏联公民的注意;如果他们想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就去收听外国的无线电广播。那些不收听外国电台的人,要等好几天才能得知有关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消息,而且即使到那个时候,这些消息也是很不完全的。”^②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使得戈尔巴乔夫深刻体会到了“公开性”带来的政治效应——增强了总书记的改革形象。于是,戈尔巴乔夫决定让雅科夫列夫承担更大的责任——与党的“二把手”利加乔夫一起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不管是出于平衡利加乔夫的权力也好,还是戈尔巴乔夫想进行意识形态改革,降低利加乔夫的抵制,雅科夫列夫都可以光明正大地插手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对戈尔巴乔夫的这种人事安排,博尔金是这样认为的:“让两位中央书记负责同一项工作,这在客观上使苏共的两位领导人发生了矛

^①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15页。

^②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5页。

盾。……总书记甚至还不无用意地为这场争斗推波助澜，他的用意就是让他们在这场争斗中两败俱伤，以后他们就会听话了。最初他并未意识到，在政治角斗场上进行的不是党的领袖人物的权欲之争，这是党的活动和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还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巩固苏维埃国家联盟还是瓦解这一联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是戈尔巴乔夫能马上明白所发生的一切的话，他也就不会自食其果，不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总书记天生不具备战略，他围着自己燃起的篝火起劲地忙碌着，不时地添上一把干柴，为那燃起的火苗高兴不已。”^①

很快，因安德列耶娃发表的《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引发的与利加乔夫的尖锐冲突，使雅科夫列夫成为最终的获胜者。虽然戈尔巴乔夫为了党内团结考虑，同时免去了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分管的意识形态工作，任命中央书记梅德韦杰夫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新负责人。但是，谁都知道，梅德韦杰夫与雅科夫列夫其实是一伙的。于是，“雅科夫列夫彻底地变成了苏联高层领导中右派激进主义的化身。他不顾现实，打乱了改革的节奏，危及改革的进程”^②。其实，如果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那么所有后续工作都应在一个整体方案的基础上进行，这一方案应计划缜密，考虑周全，具有基础性和系统性。但实际上恰恰没有这种方案。

克留奇科夫悲愤地指出：

在改革进程中，甚至连个完整的改革实施计划草案都没有，只是制订了一些涉及到个别领域的计划，但也是感情用事，政策摇摆不定！混乱无处不在，领导人只是凭感觉在作决定，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些决定杂乱无章、前后不一。现在清楚了，这样做是有预谋的，是为了掩盖他们企图破坏联盟、颠覆现行的宪法制度、破坏苏联国家体制真实计划。而这一计划，从一开始就被明确地、坚定不移地执行着。可以感觉到他们有高超的指挥艺术，准确地对一些关键性的目标进行致命的打击，向

^①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53～154页。

^②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

着隐秘的目的地一步步靠近。由雅科夫列夫开好头,然后由戈尔巴乔夫推向前进。有时,为了掩人耳目,两人也时常对换一下角色。苏联所发生的事件并不具有客观必然性,这是主观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由于一些人的行为所致。这一破坏进程的罪魁祸首就是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俩人。^①

二、苏共党员

与赫鲁晓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相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兴起的社会民主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苏共党员的大量加入。甚至从相当程度上讲,社会民主运动就是在苏共党员的鼓励、参与和直接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当然,作为一种政治身份,社会民主运动中的苏联共产党员更是一种宽泛的概念。在整个社会政治化的环境中,苏联共产党事实上几乎成为所有一切国家控制机构成员的唯一政治归属。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通常被理解为:“共产党组织及其机关决定一切社会领域、组织机构、企业、协会和工会等公众活动的发展。由于宪法肯定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就正式地把一个政党变成一个领导和控制一切公众生活的最高国家组织。过去人们只简单地把党的权力地位作为一种现实来接受,而现在却通过这种方式使之合法化。”^②要想进入苏联政治体制并获取相当等级地位,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是首要的前提条件。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为社会民主运动松绑的时候,苏共党员的大量加入既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党的民主化的自我革新的体现,同时又是党对社会民主运动发展走向的可控性的显示。事实上,以叶利钦于1990年7月12日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宣布退党为标志,以“民主俄罗斯”为主要代表的政治反对派正式在名义上脱离苏联

^①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62页。

^② [捷]奥塔·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蔡慧梅、谭美华、王健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7页。

共产党,宣称统一团结而不可战胜的苏联共产党被无情地撕掉了充满“无产阶级友情”的政治面纱。直到这个时候,苏联社会民主运动才真正走向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政治多元化的环境中展开权力争夺。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建议解散苏联共产党的举动只不过是对这一运动的最后总结。

1. 政治民主运动中的苏共党员

那么在政治民主化运动中,苏联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加入最终成为苏共政治竞争对手的其他社会组织呢?

总的来看,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发挥了作用。

一是政治信仰的迷失。十月革命以后,随着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俄国的巩固和加强,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东正教等)被布尔什维克的强力手段根除了可能存在的社会基础。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开始苏联社会唯一的指导思想,也成为苏联社会唯一的信仰来源。然而,苏联历史发展说明,仅仅依靠政治和经济上的行政式“清除”并不能彻底斩断苏联社会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也无法杜绝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苏联社会的滋生蔓延。

事实上,在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还没有几年的时间里,对官僚主义和可能形成的官僚阶层就已经引起党内的高度警惕。列宁指出:“我们这里官僚主义已经复活,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没有。许多工农没有文化,不识字,更谈不上较高的文化。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过去都忙于军事任务。无产阶级为完成军事任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同时不得不动员千百万农民去完成这项任务,而且必须吸收满脑子资产阶级观点的分子参加工作,因为再没有其他什么人了。因此,我们必须在党纲这样的文献中指出,官僚主义已经复活,应当不断地同它进行斗争。显然,在苏维埃机关中复活了的官僚主义也不会不在党的组织中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这是一回事。这就是说,既然我们意识到了,旧官僚主义这种坏现象可能在党的机构中表现出来,那么在党的

组织中有这种坏现象的各种迹象,就是很明显,很自然的了。”^①于是,官僚主义作为“包围状态”的后果,“作为小生产者涣散性和受压制状态的上层建筑,就充分暴露了出来”。^②

官僚主义对苏联政治生活中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它形成了一个由“各省各县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与此平行的党机关、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运输机关、陆军和海军的司令部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直属机构”构成的具有“宽阔和多方面”的“巨大的行政金字塔”。^③在这个统治结构的各个阶层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作为行政管理人员构成了国家政权的支柱。托洛茨基据此认为:“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党,现在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成了官僚的政治组织。剩下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构成这种‘积极分子’的泉源——即补充官僚队伍的后备军。”^④于是,已经行政官僚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获取了远远超出俄国历史上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没有的巨大权力的同时,也逐渐使权力侵蚀了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选择的根基——社会主义的政治灵魂。

从俄共(布)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在其后的历史演变中,在推动苏联社会取得物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一步步地丧失了自身曾经充满生机的政治活动能力和为社会提供信仰支持的政治思想能力。党已经习惯于通过自上而下的指令式的行政官僚机制开展工作,对上级的唯命是从成为判别意识形态忠诚的主要标准。于是,“一个人从生到死都一直在执政党关怀之下,关怀他的意识,也关怀他的良知。新闻记者、理论家、雇用的作家、特设的学校、批准的官方见解,以及无数的物质手段都被动员起来,被运用起来,以‘提高社会主义’”^⑤。

① [俄]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33页。

② [俄]列宁:“论粮食税”(1921年),《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8~219页。

③ [俄]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柴金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1963年,第99页。

④ 同上,第100页。

⑤ [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5月内部出版,第176页。

但是面对社会急剧变化的现实和人民急切盼望党能够给予积极的解释时,这样的做法又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戈尔巴乔夫说:“把现实说成‘没有问题’的做法起了不好的作用:造成了言行不一,产生了社会消极性和对提出的口号的不信任。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号召的东西,对讲坛上讲的东西,对报纸上和教科书中说的东西就开始不那么相信了。社会道德开始堕落,在革命的英勇时期,头几个五年计划时期、卫国战争和战后复兴时期锻造出来的人和人彼此同心同德的伟大感情削弱了,酗酒、吸毒和犯罪开始滋长,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公式化的‘大众文化’更严重地涌入到苏联社会,把下流无耻、低级趣味和精神空虚强加给我们。”^①于是,当有一种新的思想主张能够为人民解释造成今天这种困境的原因时,僵化封闭充满老套的意识形态就不得不在人民的选择下开始了政治退让。如果从思想上探究部分苏联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运动的根底,大底不外如此——政治信仰的迷失。

二是改革期望的空幻。如果说政治信仰的迷失是苏共党员从事社会民主运动的思想根由,那么通过深化改革以恢复党员对党的信任仍然是有着巨大政治机遇。因此,重塑党员的政治信仰,关键在于改革能否做到清除积弊、激浊扬清、真正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承认,从改革的发展历程来看,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这一点——必须使人民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的好处。只有通过关心、改善人民的生活,才能使人民对社会主义产生真正的信心,才能形成坚定的政治信仰。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他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时就明确指出:“党将坚定不移地奉行它所制定的社会政策。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个纲领性原则应当以越来越深刻而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显而易见,人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应当建立在他对共同事业不断增大的贡献的基础之上。哪里背离了这个原则,哪里就不可避免地会破坏社会公正,而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团结和稳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②

1985年4月23日,在召开苏共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及有关筹备和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7~18页。

^② 《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年)》,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举行代表大会的任务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只有依靠人民富有朝气的创造力量,依靠人民的智慧、才干和劳动,才能解决现阶段涉及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复杂的、大规模的任务。我们需要发动千百万劳动人民去完成这些任务,不断地发扬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主动精神和干劲,调动社会主义社会所拥有的那些尚未充分发挥的潜力,更积极地支持一切有益的创举。”^①在此后的一系列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改革的目的是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善社会主义,使人民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1987年11月,在刚刚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总结和阐述了自上任以来的关于改革的思考。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既不是即兴之作,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人民的普遍呼声,是变革的潜力在物质生活和社会意识中成熟的结果。“在工人阶级、农民中,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党的机关里,在中央和地方,逐渐开始认真思考国内发生的事情,更明确地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②戈尔巴乔夫再次强调了人民意愿与改命运的关系。“必须善于根据群众对政策的接受情况来校正政策,保证反馈作用,吸取来自人民的思想、意见和建议。劳动人民会提出许多有益的和有意思的东西,而这在‘上面’并非总是能看清的。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无视人民所讲的话。总之,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民对改革的态度。”^③

应该说,从总体上看,无论是苏共党员还是人民群众,大部分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都是寄予厚望。希望在一个年轻而富有活力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使苏联走出发展的停滞困境,并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因此,在改革的初期,人民对改革和戈尔巴乔夫充满信心。1987年11月26日,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公布了关于生活方式问题的广泛民意测验结果。结果显示:在回答“您能不能说您是乐观地看待未来、相信未来”的问题时,有72%被调查者的回答是肯定的,10%的人作了否定的答复,18%的人表示难以回答。对民意测验的分析表明,在不相信未来的人中间,多半是身体状况不好的人、

① 《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年)》,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55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0~21页。

③ 同上,第31~32页。

改革和净化社会生活的进程触及了其利益的人和被调查时正在闹家庭矛盾的人。在对提出的问题表示难以回答的人中间,有不少是还没有确定自己生活道路的年轻人和那些有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心理的人。^① 即使是在改革进入1988年时,经济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人民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继续表示支持。1988年5月27日,《纽约时报》公布的一项对莫斯科人的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莫斯科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经济计划没有带来什么好处。12%的人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他们家庭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了。40%的莫斯科居民说,他们希望他们的家庭生活能在今后5年内有所改善;18%的人说,情况会越来越糟。但是,民意调查发现,莫斯科人对戈尔巴乔夫整个计划表现出了坚定不移的支持。^②

然而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方略却最终葬送了人民对改革的美好愿望。激进化的政治体制方案在延误了经济改革的宝贵时间的同时,也进一步使社会生活不断政治化。身处大变局时代的苏联共产党员,在党自身面临改革和社会重重压力的情况下,也开始了思想上的裂变和组织上的分化。寻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对利益的公开追求,成为苏共党员在改革愿望幻灭后的政治反弹。

三是个人野心的寄予。作为一个拥有全国政权的政党来说,布尔什维克党始终面临一个艰难的问题:如何处理党员规模的急剧扩大给党的纯洁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列宁在革命胜利初期就预想到了这种情况,并提出了清党以保持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无产阶级性质。列宁指出:“在革命后的初期,很多‘诚实的’和抱着庸俗心理的人特别胆小畏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则全体怠工,以此讨好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有过这种现象,而且不可能没有这种现象。全部问题在于,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③斯大林进一步阐释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他指出:“我们党是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87年11月26日电。

② 合众国际社纽约1988年5月27日电。

③ [俄]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4页。

执政的党,那些不可靠的、同无产阶级思想背道而驰的、企图升官发财的分子往往整批整批地钻进我们党来,或者竭力设法钻进来,因而把腐化和守旧思想带进党里来。共产党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设法保护党,不让这些分子钻进党里来。必须永远记住,政党的力量和作用,特别是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与其说是取决于党员的数量,不如说是取决于党员的质量,取决于他们的坚定和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①因此,斯大林强调:“要保持自己党的坚定性和纯洁性,不要追求党员的数量,要不断地改善党员的质量,保护党,不让市侩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涌进党来。”^②

尽管列宁、斯大林希望通过清党的方式来保持布尔什维克党的无产阶级本色,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他们及其后的苏共领导人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原因很多,但是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的组织管理体制无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消极作用。一方面,干部任命制在保证了党在组织路线上的控制权的同时,由于监管的缺位却也不可避免地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产生了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人的发展往往取决于上级领导的主观判断。曾经作为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换句话说,是否退休问题取决于主观因素。”^③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式的组织管理体制带来的另一个严重的政治后果就是,苏共党内的政治生态环境迅速恶化,整体政治道德水平急剧下滑。此时的苏联共产党与其说是一个无产阶级群众性的政党组织,还不如说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僚行政机构。于是,党的组织原则和道德伦理迅速被官僚科层制度的新要求所替代,“履行义务和遵守纪律被奉为官僚的最高准绳,它是向上爬的最可靠的阶梯”^④。对于下级部门来说,上面的指示和命令就是最高权力无所不知的表现,它对官僚机关中每一个行政人员来说,就是他们作为公职人员而存在的保证。“对各个官僚来说,不管是皇

① [苏]斯大林:“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当前任务”(1921年),《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9页。

② 同上,第80页。

③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④ [捷]奥塔·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蔡慧梅、谭美华、王健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8~69页。

帝或党的首脑,他们关于国家必要性的不容怀疑的知识就是一种保护伞,抵制人们对其行使职权的各种批评。”于是,“遵守制度本来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现在却变成了目的。这是一种人们熟知的目的偷换,工具的价值变成了最终价值。一般来说,所谓纪律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忠实于规章的意思,但官僚们不是把纪律看作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措施,而是看作他们生活中的一种直接价值。这种改变本来目的的、进而强调纪律的做法,导致了僵化和不易适应性。形式主义以至仪式主义就是这种顽固坚持和过分遵守形式化的程序规定的后果”^①。

政党组织的官僚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它在信仰和行动两个方面塑造了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向上爬”成为组织成员的实现个人权力野心的唯一行动准则。于是,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社会政治和道德上的先锋模范作用慢慢地被销蚀腐化。党的形象开始被一幢幢恢宏壮阔的大楼、一辆辆等级分明的汽车、一个个特供专卖的小白桦商店所取代,党的政治活动能力开始被一个个部门、一份份文件、一串串检查所肢解。党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远。当戈尔巴乔夫着手改革时,他不得不对改革的发起者——苏联共产党——也提出了通过对党员的政治鉴定以克服党的官僚化弊病的改革要求,以此达到恢复生动活泼、民主团结的党内关系的目标。他说:“如果严肃地来对待这件严肃的事情,那么任何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提出党自我纯洁的思想,是指望鉴定应遵照党章准则,在正常的民主进程范围内,在公开的党的会议上进行,而不是在什么特别的‘三人小组’或‘五人小组’的参加下进行,不是通过少数人的秘密讲评和书写内部鉴定来进行。鉴定过程本身应当是教育共产党员的学校,为的是通过这次考验之后,党的同志式关系能把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改革向我们大家提出的共同目标和任务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②

但是当戈尔巴乔夫发现通过清党仍然无法根除苏联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弊病的时候,他开始谋求建立另外一套权力体系来减少和克服党对国家政

① [捷]奥塔·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蔡慧梅、谭美华、王健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9页。

②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83页。

权的过度介入,以此希望党真正成为一个向西方社会民主党一样的社会主义政党。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一旦彻底剥离了苏联共产党与政权的关系,固然能够减少官僚主义以党的侵蚀——因为党再也没有向国家政权直接输送行政官僚的可能。但是另外一个更有颠覆性的后果就是,拥有政治野心的党员,特别是党内精英开始另起炉灶,谋求他路。不管是出于政治策略需要还是政治立场变化,这些有野心的党内政治精英在反共的政治浪潮中,通过对苏联共产党的大肆抨击摇身一变成为“反共斗士”“民主精英”,在最终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力野心的时候,又给处于风雨飘摇的苏联共产党以致命一击。一大批从苏联共产党内走出来的“精英”,开始肆无忌惮地分食苏联共产党留下的巨额政治财产。

2. 民族独立运动中的苏共党员

改革时期社会民主运动的一大特点就是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组织的加入。这一政治举动在事实上拉开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瓦解的序幕。在苏联,唯一能够统一整合起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力量就是苏联共产党。这是因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因为属于不同的民族、地区而形成的不同集团之间就有不同的利益。但是,也有必要通过解决这些冲突,使它们团结起来,这就需要有进行统一的因素。到目前为止,国家就起着这种作用,它通过一党制进行鼓动和组织”^①。一旦苏联共产党发生内部政治分裂,苏联的瓦解也就失去了组织上的根本保证。

那么在苏联各主要加盟共和国谋求政治上的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员为什么会加入以社会民主运动为表面形式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呢?大体看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蜕变引起的。

一是政治关系上的蜕变。保持苏联共产党政治团结的关键在于政治信仰、政治立场和政治宗旨的根本一致,以及在此基础上严格遵循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这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得以成立的政治思想原因,也是尽管宪法规定国家形式是联盟但实际运行却是中央集权模式的政治组

^① [法]亚历山大·阿德勒等著:《苏联和我们》,王林尽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2页。

织原因。而就政治实践而言,作为一个统一的政党组织,苏共中央能够与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保持顺畅的上下组织关系,其根源则在于拥有中央政权的苏共中央的全方位强大。无论是在斯大林时期,还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往往具有强大的政治控制能力。

但是从苏联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这种政治控制能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斯大林时期,苏共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控制,既是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领袖所拥有的无上权力的集中体现,同时又是苏共中央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对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全面移植。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苏共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之间虽然是一种政治共生关系,但是政治平衡的重心却在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只是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延伸,是其组织派出机构。不过,在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时期,苏共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政治共生关系却发生了缓慢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由苏共中央的集体领导引起的。

必须承认,无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是如何痛斥斯大林的残暴统治,但是仍然无法根除其作为与列宁同时代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革命传承。这种革命性的传承和对列宁时代布尔什维克家的神话,使得斯大林时代的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形成了血肉相融、无法分割的政治关系。面对作为苏联共产党缔造者的斯大林和以其为代表的党中央,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都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政治膜拜心理。即使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政治上的平等也无法取代斯大林作为“领袖”的权利。赫鲁晓夫清楚地记得,斯大林喜欢反复对政治局委员们说:“你们都是些盲人、瞎猫,要是没有我,你们准得被帝国主义者一个个掐死。”^①赫鲁晓夫将这种心理斥责为“奴才心理”:^②“斯大林诞生了,我们就把自己的命运都交给他。那样一来,只要他去世了,整个国家便群龙无首,国家就失去了一切赖以支撑的某种根基。这是很愚蠢的!有过马克思,也有过列宁,斯大林和列宁没法比。那是真正的领袖。”^②不过,无论赫鲁晓夫怎么对斯大林进行污名化,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22页。

^② 同上,第1097页。

但从政治实践来讲,这种顺服的政治心理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党组织是中央的政治派出机构的组织原则。但是,当赫鲁晓夫及其以后的苏共领导上台执政后,这种微妙的政治心理发生了变化。

不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怎么被党的宣传机构塑造成为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或者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人,都无法改变一个基于生理的不可更改的客观因素。这就是,此时的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无论就其自然年龄还是政治经历而言,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都属于同时代的人。这一自然因素导致的政治影响就是:对革命时代政治神话的敬畏和尊崇减少了,对官僚体制所蕴含的权力认知加深了。在各地地方党的领导人看来,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其之所以能够走上政治的顶峰,根本的原因在于党的官僚机制的作用。也就是说,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已经被褪去了神秘的政治面纱,被还原成为千千万万、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社会大众。他们,只不过是政治的幸运儿!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判,在事实上造成了苏联社会的分裂并带来了深远的政治影响:许多人不再相信任何国家领导人。“人们无法相信,赫鲁晓夫只是在近三年里才了解他在报告里所讲述的那些可怕的事情。”^①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领导人想的首先是自私的利益”^②。

普遍性的社会怀疑及其引发的政治心理变化,使得各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越来越把苏共中央领导人看作是和他们一样有着共同经历的党内同志和政治同事。政治神秘感的消失,表明了地方党的领导人力图谋求更大权力的政治野心。而苏共中央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在中央的政治地位,又必须依靠地方党的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一种新的政治共生关系形成了。这种政治共生关系与其说是基于共同的政治信念,不如是说基于共同的权力追求与维护。在权力野心的腐蚀下,苏共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很快就简单化为苏共中央领导人与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政治上的“庇护—被庇护”关系的形成,不仅伤害了维护苏联共产党统

① [俄]Ю. В.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423页。

② 同上,第424页。

一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更是大大刺激了地方党的领导人的政治野心。

作为戈尔巴乔夫同龄的叶利钦就是典型的代表。在叶利钦看来,“俄罗斯早已没有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领袖人物了”^①。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极大地刺激了地方党的领导人的政治野心。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秘书格拉乔夫着重分析了这种政治心理:“他是属于他们那个圈子的人,曾几何时,他也在处理应付他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他眼下尚未变成可望而不可即的莫斯科天人。此外,陷于停滞的克里姆林宫精英尽管很不情愿,却不得不让这位来自‘旁门左道’、来自外省的人进入自己的圈子,这个事实本身就让许多人感到有了希望:患硬化症的党的系统中即将恢复干部流动,新的任命也不会带有王位继承的性质,也就是说那些在党的田野上‘耕耘’的人有了晋升的机会。况且大多数书记认为,若是出现另外一种‘牌局’,那么他们每个人都可能登上他的地位。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青云直上引起诸如叶利钦这样的人的嫉妒(叶利钦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这个更加重要的工业洲的书记呢?’)的话,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说,他的成功就是一个令人抱有希望的明证:他们的努力不会白费。机关的中下层期待着年轻有为的领导人上台会带来变化……有些人(这种人占多数)希望进入必不可免的干部革命的主流并利用腾出来的空缺,另一些人则指望领导年轻化本身即可恢复党在社会中业已丧失的威信。”^②

当戈尔巴乔夫开启改革的闸门并试图通过废止苏联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宪法规定,从而使苏联共产党重新在民主竞选中获取新的社会支持的时候,他其实打开了不可预测的“政治魔盒”:当意识到传统的权力传送带——苏联共产党——已经无法为个人发展或者说是个人的政治野心提供向上的阶梯的时候,在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看来,苏联共产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政治价值。于是在这个时候,“顺应”和满足民族主义运动的需要,成立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就成为一个极好的政治替代品。

二是政治组织上的蜕变。对于加盟共产党来说,当决定了要摆脱苏联

①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②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76~77页。

共产党的中央控制以谋求政治独立的时候,其实早已有了组织实体的准备。甚至可以说,只要换个名称就可以开始工作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既是国家制度建构上的法理要求,也是苏联共产党治理国家的原则体现。

一方面,这是苏联的国家结构决定的。苏联宪法规定国家结构是联盟性质。也就是说,从法理上讲,苏联是各个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组成的联邦组织。既然联盟是由单个个体的国家组成的,那么在单个个体的国家内部,除了外交、贸易、税收和国防等权力由联盟掌管外,作为国家存在而必需的其他机构组织都是一应俱全。这种制度特点从行政权力流转的顺畅角度而言,是必需而且必要的。没有与中央机构相对应的地方部门机构,苏联的计划管理体制就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另一方面,这也是由苏联共产党国家治理原则决定的。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唯一执政党,主要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行使党对国家的领导。于是,按照苏联共产党对全国政权的统一领导关系和表现形式,各加盟共和国等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也表现出了相应的组织结构和领导关系。在政治实践中,与苏共中央总书记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各共和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和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也成为地方的“一把手”。可以说,这种中央与地方相对应的组织形式,保证了苏共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但是这种保证有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就是:中央政权能够保持足够的强大并能够在满足地方的利益需求中获取政治服从与支持。只有这一前提的存在,才能避免已经具备了组织形式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实体化倾向,克服和防范其由此而滋生出谋求和扩大更大权力的政治欲望。

然而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种先决性的政治前提在其推动改革之时,就已经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由于国民经济日益陷入停顿状态,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支持也随之不断减少。地方政府在承受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下,对中央政府的抱怨也开始增多。另一方面,苏共中央高层领导内部中的地方势力也在不断增长中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领导人谢尔比茨基为代表的地方政治势力,在政治局内对苏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走向等方面有着强大的政治影响。作为政治局委员,谢尔比茨基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不仅是中央政治局

委员的职务性规定决定的,更加关键的是他的权力基础来源于乌克兰共和国党组织。乌克兰不仅作为苏联的“粮仓”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而且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国而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影响力。与其他政治局委员相比,正是依靠着乌克兰共和国党组织的支持,谢尔比茨基在政治局内的地位往往显得更加牢固。在戈尔巴乔夫通过退休等方式强迫格里申、库纳耶夫等离开政治舞台,但却对谢尔比茨基束手无策。即便戈尔巴乔夫通过整风肃纪运动打击和改组乌克兰党组织,企图削弱谢尔比茨基的权力基础,但是直到1989年9月20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才实现了解除谢尔比茨基政治委员职务的愿望。解职后,谢尔比茨基因患重病很快于1990年2月16日逝世。

当戈尔巴乔夫以“公开性”“民主化”促进苏联共产党自身改革,并以此将之改造成通过竞争性选举执掌政权的西方式的社会民主党时,实质上是彻底抛弃了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在苏共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之间的组织关系,已经从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的组织严密的上下级关系,一变而为苏共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组织的平等合作关系。苏共二十八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对中央政治局的改革就是这一关系变化的结果。主要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都进入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委员,共同协商制定苏联共产党的发展规划。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组织上的蜕变,获得了政治独立地位。

三是政治归属上的蜕变。苏联共产党内部存在的深刻的民族化倾向,引起了党的领导人的高度警惕。从列宁、斯大林开始,针对党内的这种倾向,提出了用阶级取代民族、用共产主义取代民族主义的政治原则和政治主张,以此希望把苏联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历史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当苏联经过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高速发展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事业取得了全面的阶段性胜利时,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苏联最终地、完全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并宣称这次大会“将作为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代表大会,作为审查和通过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纲领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称:“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

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声称,苏共已经“成为政治组织”。但是赫鲁晓夫的政治宣言并不能掩盖苏联政治生活的现实,尤其是在解决党内的民族化倾向问题上更是毫无益处。相反,在斯大林时期曾经被强力压制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时期开始缓慢地复苏。在仪式化的共产主义信念下,民族主义的潜流开始积蓄力量,并在戈尔巴乔夫释放的政治魔法——“公开性”——的作用下迅速发酵。

在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运动面前,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面临着艰难的政治选择:共产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就当时的苏联政局而言,这一选择并不艰难。在事实上已经本地化、民族化的地方共产党领导人看来,顺应政治潮流,掌握政治权力才是应对纷杂的政治形势的不二法门。于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又有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参与者——民族精英。不过,这个参与者并非是一个政治陌生人。相反,就大多数参与社会民主运动的政治精英而言,苏共党员和民族精英往往是其政治身份的一体两面。简而言之,正是苏联共产党培养、造成了自己的事业继承人,同时又为埋葬自己的事业准备了政治掘墓人。当苏联共产党保持强大的中央控制能力的时候,苏共党员的身份能够为民族精英提供足够的政治保护,从而维护其在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当苏联共产党开始丧失中央控制能力的时候,民族精英的身份又能够为其提供足够的政治机会,从而在改头换面之后继续其在民族地区的新的统治。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改革末期,社会民主运动中出现的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乱象,其实就是苏共党内政治精英不断上演的“帽子戏法”。

三、民族精英

早在20世纪70年代,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加里奇就预言:“苏联领导人看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力量,并且对这股力量的担心很可能甚于对其他力量的担心。民族加盟共和国的起义不可避免也不可逆转,正是起义

能够敲响制度的丧钟。”^①那么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加盟共和国又是如何发动“起义”?民族精英又是如何领导这场“起义”呢?简言之,民族精英是如何成为这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权力的攫取者?

从民族精英的政治轨迹来看,其政治活动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1. 苏联政治内部的民族精英与民族主义

作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库纳耶夫和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谢尔比茨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起就成为苏联地方政治势力在苏共中央高层的主要代表人物。作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以共和国为后盾从而拥有坚实而广泛的政治基础,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形成的“总书记—第一书记”权力体系的坚定维护者。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他们是旧时代的政治遗产继承人,是对他要进行的改革大业有着阻碍作用的人。于是,戈尔巴乔夫通过干部人事政策的调整来达到逼迫其辞职的目的。爆发于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骚乱,在相当意义上讲,就是已经具备民族主义意识的哈萨克斯坦社会和已经民族化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对来自莫斯科强硬指令的政治反击。

1986年12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因年龄和健康原因提出辞职。实际上,“这次辞职基本上是戈尔巴乔夫一手造成的,他不止一次发牢骚说,他收到许多来自哈萨克斯坦告发库纳耶夫的上访信”^②。

1986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党中央全会决定,解除现年74岁的第一书记穆罕默德·库纳耶夫(哈萨克族)的职务,由59岁的俄罗斯人根纳季·科尔宾接任。科尔宾原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共产党第一书记,在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根除酗酒、懒散和贪污现象的运动中表现一直很突出。但是,苏共中央的这一做法却被看作是对哈萨克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哈萨克斯坦的民族精英们普遍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不考虑人民的

^① [苏]伊凡·里特维年科:《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2年第1辑。

^②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75页。

意见,而派来一个不了解哈萨克斯坦不了解那里的人民不了解他们的传统和文化的人来领导共和国呢?”^①随后在17日、18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和共和国的其他一些城市,人们纷纷走上了街头,烧毁汽车和商店,抗议库纳耶夫被免职。“这次骚乱事件是苏联25年来第一次正式报道内部发生了动乱,这次事件显然是由于任命了一位得到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俄罗斯‘局外人’来担任这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共和国党的领导人而引起的。”^②

阿拉木图事件成为“地方精英挑起的、旨在‘显出凶相’和表示中央的影响有限的族际冲突,仅仅是改革唤起的民族主义火山的第一次喷发”^③。但是,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并未给予重视。相反,他们认为骚乱是由库纳耶夫挑动起来的有组织的民族主义行为,必须予以打击。

1986年12月23日,刚刚担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党中央领导人的科尔宾在紧急召开的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指出:“在阿拉木图市出现的不健康现象说明必须特别重视国际主义教育。重新组织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也十分重要。”科尔宾强调,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加强纪律和秩序、严格遵守党内生活准则、反对酗酒和其他反社会现象上的重要性”。同时他还强调,“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使党对经济和文化机构的管理工作有个决定性的转变”^④。

1986年12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阿拉木图事件,并通过相关决议。不过,会议的重点“并不是分析事态发生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而是要给点颜色让哈萨克斯坦,同时也让其它地方瞧瞧。人们遵循着这么一个业已形成的概念:一切都应当本着统一和友谊的轨道办,唯一的危险便是民族主义的本能暴动。这种暴动并非由于存在实际问题,而是历史遗祸,是外部力量的影响所致”^⑤。

①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总统手记》,时事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②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6年12月23日电。

③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21页。

④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6年12月23日电。

⑤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97~598页。

这一习惯性的政治思维遮盖了苏联民族问题中存在的尖锐矛盾。1987年2月21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爱沙尼亚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时仍然继续表述着苏共的传统民族政策。他说:正是由于苏联各大小民族的共同努力才大大增强了各族人民解决政治任务、经济任务、社会任务和文化任务的能力。当然,在这样一件大事上也有过疏漏和失误,也出现过紧张的情况。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党在使苏联各大小民族团结起来方面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的主要结果。也不能改变构成今日苏联的各民族大家庭的结果。^①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解决阿拉木图骚乱的问题中心在库纳耶夫。只要彻底清除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共产党组织的影响力,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才能有效遏制本地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按照苏共中央指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党中央在3月14日召开的全会上对库纳耶夫进行了公开批评。全会认为:在亚洲的苏维埃共和国——哈萨克斯坦明显出现了许多创造性活动领域的积极倾向。哈萨克斯坦党中央从自己开始改革,从以批判的眼光重新估价自己的活动出发,用具体的事例表明,应当消灭过去那种言行脱节的现象。坚决打击不良现象。同时,全会责成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局讨论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原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因粗暴违反党的生活准则,确立个人崇拜,歪曲党的干部政策和为所欲为,从而导致任人唯亲、滥用职权、行贿受贿和营私舞弊等现象在共和国内泛滥及民族主义情绪和其他不良现象应负的党内责任。^②

1987年7月16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苏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党组织对劳动人民进行族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的决定》。^③ 决定指出:

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前领导人和共和国许多党委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犯有严重错误,大大削弱了对劳动人民进行族际主义和爱国主义

① 塔斯社塔林1987年2月21日电。

② 塔斯社阿拉木图1987年3月14日电。

③ [苏]《苏维埃俄罗斯报》1987年7月16日。

义教育的工作。没有考虑到民族自我意识的迅速增长,没有找到及时和正确地解决业已出现的问题的办法。党组织在某些阶段实际上停止了同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精神领域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的种种表现的斗争。这对共和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不良影响。

在70至80年代之交,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都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社会文化建设计划经常完不成。居民的食品供应状况恶化。社会公正原则遭到破坏。

共和国领导机关放弃了有目的地培养工人阶级民族干部——族际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和传播者的工作。在干部政策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给劳动人民族际主义教育工作带来很大的危害。在选拔干部和把干部推荐到领导岗位上时,起决定性因素的往往不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 and 道德品质,而是看属于哪个民族,看亲属和同乡关系和对个人是否忠诚。

苏共中央认为哈萨克斯坦所犯的背离党的生活准则、违反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原则的错误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当改革的革命进程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时候,及时解决民族关系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高自大的表现,都应当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取得的最伟大成果——各族人民的兄弟友谊和苏维埃社会族际团结的践踏。

苏共中央强调指出,族际主义首先不是在语言上,而是应当在行动上表现为增加哈萨克斯坦对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综合体的贡献、不断提高共和国科学生产潜力的效益,积极参加解决全民任务。

建议哈萨克斯坦党委按照苏共中央一月(1987年)全会的决议,根本改革干部工作的整个制度,使其具有真正的民主性质。每个领导人、共产党员都应当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做出履行族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义务榜样。

党中央认为,培养坚定的族际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情感应当成为群众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主要方针之一。

那么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和苏共中央的决定呢？

在高度集权的苏联社会，解决问题的关键往往是通过重点岗位的重点人物的更替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和苏共中央决定本身并没有问题。对戈尔巴乔夫来说，通过适当的方式解除库纳耶夫的职务，这是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传统权力。但是，权力行使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合适的政治环境。如果还是在被戈尔巴乔夫斥责为“停滞时期”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或赫鲁晓夫时代，这种对主要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更换往往只是一件单纯的人事更迭，而不会引起普遍性的社会刺激性反应。

同样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党中央领导人的更换问题，赫鲁晓夫简单直接的做法并未引起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弹。1953年9月，为了解决农业问题，扩大种植面积，赫鲁晓夫在9月全会后专门听取了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沙亚赫梅托夫关于哈萨克斯坦的相关介绍。不过，赫鲁晓夫并不满意他的汇报。他认为，沙亚赫梅托夫不愿意中央在哈萨克斯坦进行垦荒的想法是民族主义的考虑。“后来我分析了他的立场，知道他是了解哈萨克斯坦的各种可能性的。为什么州委书记们跟他的立场不同呢？我有一个印象，这里有政治的因素，确切地说，是民族主义的考虑。沙亚赫梅托夫懂得，如果扩大粮食的生产面积，那么种植粮食作物的工作，哈萨克斯坦人自己是承担不了的。哈萨克斯坦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人，主要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他明白这一点，而且没有人对此加以隐瞒，这样就只得号召愿意垦荒的志愿者前来帮忙。我们倒是有把握找到这样一批人，可是沙亚赫梅托夫压根儿就不希望这样，因为这样一来，哈萨克斯坦本地人的比重就会大幅度地下降。”^①对此，赫鲁晓夫的做法是直接换人。1954年召开的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全会推举波诺马连科接替沙亚赫梅托夫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位，推举勃列日涅夫担任哈共中央第二书记。对于这次的人事更替，赫鲁晓夫十分满意：“我们加强了哈萨克斯坦的领导力量，以应对那里面临的艰巨工作。必须推荐一些有魄力、有修养的人才。因为哈萨克斯坦是一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59页。

个幅员辽阔的共和国。”^①

对于1986年底的戈尔巴乔夫来说,赫鲁晓夫可以如此行事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勃列日涅夫时期起,“总书记—第一书记”的权力体系实质上已经成为苏联政治结构的稳定支柱。“第一书记”们在向“总书记”效忠的同时获取了诸侯般的政治权力。在他们的经营下,“地方上的苏共上层变成了家族势力和地方势力的集合体”^②。任何向这一政治集合体的挑战,都要做好承受政治风险的准备。不得不说,戈尔巴乔夫在民族问题上的认知已经落后于现实政治的发展。

面对着已经充分本地化、民族化的政治权力集团,戈尔巴乔夫左右为难:强力压制,不符合他不流血的政治理念;协商解决,又对问题于事无补。于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七年中,民族问题虽然不是改革的中心主题,但却往往决定着改革的成败。当一大批民族政治精英觉察到中央的衰弱后,争取更大权力的政治野心就开始被刺激放大。当现有的政治结构无法容纳更多的权力欲望的时候,打碎旧的权力结构,建立新的权力体系就成为民族精英们的必然选择。

2. 民族精英与脱离苏联体制的独立运动

如果说阿拉木图事件还只是民族精英在苏联现有体制框架内寻求更多权力的第一次政治爆发,那么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精英则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脱离苏联体制的政治冲动,并在内外合力之下实现了民族独立的政治目标。

在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波罗的海三国的地位相对比较特殊。它们是在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于1940年被苏联吞并的,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始终不予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精英也暗中积蓄着独立的政治力量。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60页。

^② [俄]B. A. 利西奇金、Л. А. 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9页。

以1987年为标志,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运动发生了变化。在1987年以前,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要求把本民族语言变成国语,在共和国实行双语制。如果说,这一阶段的民族运动还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民族文化教育权利的范围之内,那么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的改革浪潮下,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运动则开始进入为谋求国家独立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阶段。

1987年8月23日,正值《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周年纪念日,爱沙尼亚首都举行了由美国之音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以及一小批因反苏活动而受审的人策动的集会,要求公布这个条约的秘密协定书,为大批被驱逐出境的受害者恢复名誉。

1987年11月18日,正值1918年11月18日拉脱维亚独立日。这一天被民族精英们确定为民族节日。数以千计的群众不顾当局的警告上街游行,并向里加的自由纪念碑献花。

进入1988年度,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精英开始了民族运动的组织建设。6月,立陶宛激进民族团体“萨尤季斯”(争取改革运动)成立。10月,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成立。一系列政治组织的成立,使“具有各种信仰和世界观的人现在想方设法地在争取改革运动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在举行大规模行动时,争取改革运动的支持者们不论对个别人还是对当局,不择手段地进行诽谤。有时是印刷口号和宣传画,除了进行挑衅外,这些口号和宣传画不可能有任何益处”^①。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布拉藻斯卡斯在电视台发表讲话,呼吁立陶宛全体居民“不要受某些人煽动,不应当破坏,而要建设”。但令人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听进这些话。包括一些高年级中学生在内的一批人以“争取改革运动”的名义开展行动,在十字街头堵塞交通。波罗的海三国的混乱局面让苏共中央大为不满。《真理报》指责说:“没有责任感的民主会变成坏事。暴力行动显然是违背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的。”^②

1989年8月15日,《真理报》再次抨击波罗的海沿岸诸加盟共和国的行动是“资产阶级的”和“反苏的”。说它们已变得太民族主义了,并容许反苏

①② 塔斯社莫斯科1988年11月22日电。

活动和“资产阶级”的行为。在过去6个月内成立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人民阵线以及立陶宛的争取改革运动从当地共产党那里窃取了許多政治权力,甚至当地许多共产党员公开支持它们。它们的独立倾向已变成了一个爆炸性问题。《真理报》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各反苏集团公开扩大其活动”,上述人民阵线还派出“使者”到各地的共和国介绍其经验。这种情况表明:“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人民阵线式的运动今年已蔓延到了其他共和国,其中包括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共和国。”^①

苏共中央隔靴搔痒式的批评并不能阻止波罗的海三国民族精英的政治狂热。1989年8月23日,在民族精英的组织下,波罗的海三国二百多万人跨越波罗的海共和国边界手拉手形成了人链,以此作为纪念使共和国失去独立地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五十周年之际的一次大规模抗议活动。在群众拉起了长达六百多千米的人链,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主要城市联结起来的时候,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教堂钟声齐鸣,响彻波罗的海共和国上空。在里加,男人、妇女和儿童唱起了立陶宛国歌,然后手挽着手和平站立15分钟。据估计,有一百多万人参加了拉人链活动或其他集会。^②

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运动使苏共中央大为震惊。1989年8月25日,苏共中央发表严厉警告波罗的海3个共和国民族运动的声明:“在波罗的海3个共和国,存在着发生内战和大规模巷战的危险。”但是苏共中央的声明不仅没有得到波罗的海三国的尊重,而且使波罗的海三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1989年8月27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负责人伊瓦尔斯·克兹贝里斯和米克·蒂特马通过电视台及电台抨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克兹贝里斯反击说:“声明是挑衅性的,而且是对我们的事务的干涉。”蒂特马也指出:“声明显然是克里姆林宫保守派为利用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最近的事态发展结束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计划而采取的行动。”^③

① 路透社莫斯科1989年8月15日电。

② 路透社里加1989年8月23日电。

③ 路透社莫斯科1989年8月28日电。

与伊瓦尔斯·克兹贝里斯和米克·蒂特马的明确反对不同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共产党中央高层则表示拥护苏共中央声明。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全会向共和国全体居民发表声明,呼吁共和国居民要“清醒认识到,立陶宛共和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同苏联是一体化的”。声明强调称,对历史真相的反思不能用以煽动政治情绪。声明指出:“一些极端势力的举动是针对立陶宛共产党和政府的,实际上就是阻挠改革,今天的局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也认为,共和国内确实存在分离主义表现以及反苏情绪、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在这种形势下,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局“认为有必要再一次强调指出,我们的立场依然不变:主张我们共和国成为崭新的苏维埃联邦组成内的一个主权的拉脱维亚,争取拉脱维亚共产党作为苏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新的地位”。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瓦伊诺·维亚利亚斯明确指出,关于该共和国退出苏联的要求“是不负责任的,只会损害爱沙尼亚人民的利益”。他强调,分离主义是与要求“同以缓和紧张局势、人道主义世界观和支持苏联改革方针的稳定性为特点的国际局势尖锐矛盾的”^①。

狂热的民族情绪和混乱的政治局面,使得“萨尤季斯”“人民阵线”等民族运动组织日益显露出其政治目的和政治野心。1989年8月29日,《真理报》发表评论指出:“那些把共和国居民引向各民族闹纠纷的人,在改革口号的幌子下,怀有个人野心,渴望在沙文主义和分立主义的浊浪中夺取政权。”^②但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步步退让中,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精英得寸进尺,坚定地朝着独立的目标前进。

1989年12月19—20日,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议会通过《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地位的宣言》,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宪法在共和国国内失效。1990年3月30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向独立过渡的决定。1990年5月8日,改国名为爱沙尼亚共和国。1990年5月4日,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通过独立宣言,改国名为拉脱维亚共和国。

① 塔斯社莫斯科 1989 年 8 月 29 日电。

② 塔斯社莫斯科 1989 年 8 月 28 日电。

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大大刺激和鼓舞了苏联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乌克兰、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塔吉克、吉尔吉斯等地都出现了民族冲突。随着1990年以后苏联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和联盟中央的权力瘫痪,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逐渐演变成了政治分离主义。左右摇摆的戈尔巴乔夫束手无策,只能放任自流,从而丧失了挽救苏联的最后机遇。纳扎尔巴耶夫指出:“最不稳定的1990年在国内各个地区开始爆发民族冲突。但就在当时仍可以改变局势并恢复原来状态。需要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应当在法律范围内有所作为,戈尔巴乔夫当时有足够的宪法确定的全权。然而他像往常一样,持观望态度,并称一切都在自我改进完善之中。但是他测算失误了:悲剧事件的土壤已经培育成熟,已站在1991年的门槛前。”^①

四、政治激进者

如果说,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民族独立运动还只是在苏联政治权力的外围发起的游击战,那么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政治家与激进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则在苏联政治权力核心点燃了分裂的炸弹,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灰飞烟灭,荡然无存。当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沙赫纳扎罗夫问经济学家加夫里尔·波波夫为何会选择叶利钦作为政治代言人时,波波夫的回答是:“人民喜欢”,“他勇敢、顽强地砍伐着现行制度”。^②

1991年2月7日,苏联人民代表、苏联元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题为“苏联作为社会主义联邦国家是将保留呢?还是将瓦解?”的文章。阿赫罗梅耶夫说:“陷入危机的有国家的政治体制、族际关系、经济管理体制、乃至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现象只是部分地产生于客观原因,而主要的是由反社会主义的和分立主义的势力蓄意造成的,并

^① [哈萨克斯坦]努·纳扎尔巴耶夫:《时代 命运 个人》,陆兵、王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60~61页。

^②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

且完全不加掩饰地对社会产生破坏性影响。”阿赫罗梅耶夫指出,从1990年底开始,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阿法纳西耶夫和其他人开始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总统公开斗争。“他们同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运动联合在一起。”面对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政治激进派的疯狂进攻,阿赫罗梅耶夫呼吁:“苏联武装力量同大多数人民一道,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一道,同苏联总统一道拥护联邦制的社会主义的苏联。”^①

1. 改革派:激进的政治领导人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是“戈尔巴乔夫最初伙伴中的第三个人在权力阶梯上的地位低于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他是共产党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不是正式委员。但他显然注定要成为这三个人中最重要的一个”^②。亚纳耶夫就认为,分析苏联灭亡的主要前提条件,不能不考虑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相互关系这个因素,亚纳耶夫把这种关系定位为“动物学上的相互憎恨”。同时,他们实质上完成了同一个任务——动摇和毁灭了苏联。“正如当时有人说的那样,两只狗熊待在一个洞穴里,显得太挤了。”^③从1991年初开始,叶利钦发动了极为积极的反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运动,并且在这场赌博中最终成为最大的政治赢家。

1985年12月24日,苏共莫斯科市委召开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出席了会议。会议选举叶利钦为市委第一书记,市委原第一书记格里申被免职。莫斯科市委书记一职在苏共党内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这是全国各地区党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位,因为它包括统治着广大帝国的中央官僚机构。”^④戈尔巴乔夫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任命叶利钦执掌首都党组织。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2月7日电。

②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0~61页。

③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④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精力充沛的叶利钦对总书记的器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非常认真地投入这项工作中去。叶利钦的警卫科尔扎柯夫回忆:“最初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奉若神明。他和苏共中央总书记之间有一条专用的热线电话。只要这部电话一响,叶利钦就飞快地跑过去。开始戈尔巴乔夫的电话相当频繁。但是接近1987年时,电话铃声就越来越稀少。叶利钦是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热心参加各种党内活动,当时他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丝毫不感厌倦。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他可能是最忠诚的党员,比任何别的党内首领都更愿竭尽全力去改善生活。”^①叶利钦真心实意地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并以自己的方式来体现改革成果。“例如在莫斯科,差不多每一个角落都建起了农贸市场,当时莫斯科人买菜、水果、禽蛋、蜂蜜都十分方便。叶利钦当时自己看报,他个人认为改革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公开性之外,全国上下没有新鲜货色。报刊杂志上大块文章也只是强调公开性。”^②不久,叶利钦“就成为普通莫斯科人心目中的英雄,成为有很强权势欲、并对其领导层同僚构成潜在威胁的对手”^③。但是,叶利钦工作上的粗暴做法也开始让戈尔巴乔夫感到不满。戈尔巴乔夫说:“不久他的一些极端做法和庸俗的工作作风就表露出来。他在工作中对干部采取粗暴的态度。他对各区委会的工作不是检查,而是严厉斥责。有些区委会派人到中央来揭露事情的真相。有些人甚至不知该如何摆脱这种工作方式。这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市委常委会可以在夜里11—12点开会,就是为了告诉所有人,他是如何工作的,而其他的人都是游手好闲的懒汉。他把这种工作方式称之为创新。实际上,这是典型的庸俗外省风习。”^④

戈尔巴乔夫开始疏远叶利钦,而叶利钦也对戈尔巴乔夫越来越不满意。1987年9月12日,叶利钦致函在南方休假的戈尔巴乔夫,抱怨他作为莫斯

① [俄]A. B. 科尔扎柯夫:《我所知道的叶利钦——俄罗斯总统安全局前局长回忆录》,杨藻镜、葛澹云、王文静译,外文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② 同上,第51页。

③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④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2003年,第69页。

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得不到支持,并请求辞职。10月21日,在苏共中央召开关于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报告的全会上,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矛盾彻底公开化。叶利钦在抨击了改革进展缓慢后,公开向全会提出辞职。随即在戈尔巴乔夫的示意下,全会对叶利钦展开了激烈批判。会议通过的专门决议指出,叶利钦的发言“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责成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莫斯科市委“结合中央全会上形成的意见,研究鲍·尼·叶利钦同志要求解除其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问题”^①。11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列·尼·扎伊科夫接替叶利钦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8年1月14日,叶利钦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十月事件”对叶利钦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沉重打击。以至于叶利钦认为,他有可能会从此告别苏联的政治舞台。“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我推到荒无人烟的偏僻角落里,也没有把我发配到遥远的异域他乡,就像他的几位前任所做的那样。相反地,他似乎是很高尚地宽恕我,怜悯我。”^②在这个时候,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了。他说:“我彻底弄清了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我看清了他的力量和软弱,懂得了来源于他的不幸与危险的精神流质。我从来没有把同他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但如此,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亦步亦趋,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③

随后,叶利钦的命运发生了戏剧般的转变。他成为苏联国内所有不满情绪的代言人。“把叶利钦开除出党的最高领导班子所产生的效应完全不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所希望的那样。如果说以前这种惩治确实会使一个人从政界消失,现在的情况则不然。被罢官的叶利钦马上变成了一个游离于70年历史的国家政治生活规则之外的政治人物。他成了国内所有不满者的领袖,成了前不久还是其领导成员的那个党的政治反对者。在一个没有反对党的国家,叶利钦成了未来运动的领头人。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出现了,许多原先只有不满情绪的人作好了成为反对派的准备,为未来年代的激烈政

①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71~572页。

②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③ 同上,第19页。

治斗争和政治对抗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这是‘叶利钦案’制造者们所没有想到的。”^①而这一切,正是戈尔巴乔夫亲手开启的“改革”造就的。苏联人对官僚特权阶层几乎感到一种憎恶,因为它被用来“谋取特权和私利”。“在这一基础上,叶利钦被创造出来,作为临时偶像。”^②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叶利钦迎来了政治春天。1989年3月26日第一轮投票选举之后,统计结果令戈尔巴乔夫大吃一惊,叶利钦获得了89.4%的选票。“反对叶利钦的莫斯科党组织全线崩溃。”^③

叶利钦的成功,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形象相形见绌。到了1990年初时,在老百姓和许多苏联人民代表的心目中,戈尔巴乔夫的形象就是一个软弱无能的领导人,他说话滔滔不绝又非常不清晰,他没有能力采取果断措施。与戈尔巴乔夫相比,“叶利钦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则是果敢有力而又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大家认为他是有能力整顿国家秩序,消除贫困,打击犯罪和滥用职权。叶利钦巧妙地利用民众的情绪,经常参加各种公开活动和演讲,尽管他还没有形成任何明确的政治和经济纲领”^④。

1990年5月29日,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一天,莫斯科近千人举行集会,支持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当选后,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根据即将通过的独立宣言和所需的法律,俄罗斯将完全独立,它的决议将高于联盟的决议。”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叶利钦的这一做法既不负责任、又十分无知。“实际上这意味着俄罗斯将联盟及其权力机构,将不履行全联盟性质的决定。俄罗斯的行为引发了所有加盟共和国以及许多自治共和国群起宣布独立——出现了‘主权大检阅’,妨碍了与立陶宛进行建设性对话,实际上开始了苏联瓦解的进程。因此,那些认为联盟倒台是由

①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74页。

②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0页。

③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44页。

④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2页。

波罗的海沿岸、高加索和中亚的民族冲突引起的议论,都是企图事后为叶利钦及其民主俄罗斯派的战友们的不负责任的瓦解苏联的行径开脱。”^①

叶利钦开始向戈尔巴乔夫发起政治上的猛烈进攻。

1990年7月6日,叶利钦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民主国家不可避免地实行多党制。在各种政党逐步形成的情况下,苏共要进行根本改革。只有议会党才能革新社会并在选举中赢得胜利。

1990年7月12日,叶利钦在代表大会上说:“鉴于我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和俄罗斯人民赋予我的重大责任,考虑到社会向多党制过渡,我不能只履行共产党的决定。我必须服从人民的意愿,因此,鉴于我所承担的义务,我宣布退党。”^②

从这一刻起,叶利钦正式成为苏共的反对者,成为戈尔巴乔夫走上政治末路的主要推手。根据苏联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就苏联民居对政治活动家们的态度问题的民意测验显示:2680名被调查者中有61.3%的人对叶利钦的活动表示完全赞成,21%的人不完全赞成,5.3%的人不赞成。而对戈尔巴乔夫的活动只有28.5%的被调查者完全赞成,40%的人不完全赞成,19.5%的人不赞成。在回答“谁的行为你最喜欢?”这一问题时,有34.2%的被调查者提到叶利钦,10.2%的人提到戈尔巴乔夫。^③到了1991年1月,70%的人认为最理想的政治家是叶利钦,只有14%的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④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叶利钦的威望已远远超过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的政治野心滋长起来了。对他而言,此时的政治目标已经很明确——摧毁苏维埃制度。叶利钦说:“俄罗斯的主要怪诞现象是,国家体制早已蹒跚而行。严格地说,就是没有任何人驾驭操纵之。实际上俄罗斯早已没有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领袖人物了。甚至连改革家戈尔巴乔夫都是世界上最害怕破坏和粉碎这个体制的,他怕这个体制将来会报复他。依照他的思想,‘改革’不应该触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机制……在戈尔巴乔夫当

①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

②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338页。

③ [苏]《国际文传电讯》1990年9月,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9月18日。

④ [日]《每日新闻》1991年1月1日。

政的情况下,把这种体制转变成了另外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不可能公开地压死我们,但它能够慢慢地、一块一块地吃掉,最后完全吃掉我们。它能够暗中破坏我们的一切行动而又能摆脱任何监督。它能够在亲亲热热、温温柔柔的拥抱中让你窒息而死。它对付我们的办法非常之多。然而,我们只有一种选择——战而胜之。”^①

1991年6月12日,举行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选举。叶利钦获得了57.3%的选票、雷日科夫得票率为16.85%、日里诺夫斯基得票率为7.81%。在进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前期的准备过程中,叶利钦、雷日科夫、日里诺夫斯基之间的选举斗争表明:从实质上讲,这是苏共和成分复杂的政治运动——“民主联盟党”之间的斗争,这也是苏联支持者和俄罗斯独立支持者之间的斗争。“设立俄罗斯总统,并且赋予他很大的权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在苏联国家大厦下面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地雷。在俄罗斯即将出现了一个新的、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基本上不依赖于苏联政府和苏联总统的权力中心,出现了一个与苏联竞争的国家。”^②

1991年7月10日,俄罗斯联邦第五次非例行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叶利钦宣誓就任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参加了叶利钦的宣誓仪式。“这个不仅隆重而且意味深长的仪式,大家都看出这两位对抗4年有余的政治家的心情有很大差别。叶利钦处在成功的顶峰,他感到喜气洋洋。他正在接受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的全权。戈尔巴乔夫则抑郁不欢。从表现上看,戈尔巴乔夫当然还是苏联总统,俄罗斯联邦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共和国而已。但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个职务的,不是全体公民,而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而且还不是一致通过。更何况,俄罗斯不仅是苏联最大的共和国,而且还是苏联整个构造的基础,这种构造的坚固性遭到很大的破坏。”^③

1991年7月2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颁布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机

①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②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③ 同上,第52~53页。

关非党化的命令。命令规定：不允许各政党及群众性社会运动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以及基层组织、委员会和其他组织机构中活动。马特洛克指出，这是一项极具潜在破坏力的法令，禁止任何政党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国家机关中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活动。如果法令得以实施，将对俄国共产党形成致命的打击，因为它是建立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之上的。每个机关、学校、工厂、农场以及军事单位都有共产党组织，而共产党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来进行统治的。即使共产党放弃了在法律上的统治权，这些机构仍会完好无损，一如既往。如果取消了工作单位的党组织和他们所提供的特权，许多成员将会默默放弃党员资格。“共产党组织一直全力反对叶利钦，而这个法令就是他的报复。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私人仇怨。如果一个党独享国家级组织的利益，且暗中得到国家统治机构的支持，那么，一个真正民主、多党制的政府就不可能在这个国家里诞生。”^①

1991年8月19—22日，“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保全苏联的努力失败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据格拉乔夫观察，从福罗斯回来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了自己的死对头叶利钦的政治债务人，多亏叶利钦的果断行动，他才重新回到克里姆林宫”。总统的所有这些致命的失误、新的有缺损的地位都对他的执政者威信打击甚大。因为在俄国（乃至苏联）公民心目中，千百年来形成了一种民族领导人就是上帝恩赐的君主、天赐的“生父”的观念，无论他身着沙皇的紫袍还是顶着总书记的称号，都是如此。主要的是，在八月动荡之后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中的政治地位起了很大的变化。那个千百万人将他们的生活迅速而奇妙地得以改观的希望同他所开始的改革、同他本人联系在一起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思想上的解放、令人陶醉的变革空气和上帝赐给的政治自由，不能永久充当生活水平下降和社会紧张局势加剧的补偿。八月事件还表明，改革已经“误入歧途”，改革的继续进行已经并没有预示着美好前景（戈尔巴乔夫本人将自己上台执政的最初几年称之为“美好的时期”），而是预示着阴霾的日子和悲剧性的问题。“曾几何时，改革的首倡者和鼓动家还几乎被当成救世主，如今

^①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56页。

则已失去昔日的神圣光环和永远正确的声誉。”^①

2. 改革派：激进的知识分子

戈尔巴乔夫曾对知识分子抱以厚望。他说：“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他们乐意挑改革的重担。我们的创作知识分子同党一起开始进行变革。他们的公民立场越来越坚定。我们关心这种积极性，并珍视他们在1985年4月以后参加改革、帮助社会改革的热情和愿望。我们希望，知识分子的贡献会更大。知识分子正在进入思维和责任心的新境界。其方向符合苏共的政治路线和人民的利益。”^②然而改革的失败及苏联走向衰亡的历史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无论是被视为保守派的利加乔夫，还是作为戈尔巴乔夫亲密助手的切尔尼亚耶夫，虽然在政治立场上有着巨大的分歧，但在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上却保持着相当的一致。利加乔夫指出：“对苏联人持最严厉批评态度的人是苏联人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③而就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命运而言，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意见，对苏联的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来说，戈尔巴乔夫曾是个英雄。但是，这支合唱队最终把指挥赶下了台。”^④

事实上，当“公开性”的闸门放开的时候，涌现出来的不是滋润干枯土地的潺潺细流，而是横扫一切的滔天大浪。赫鲁晓夫曾经担心的“春汛”大潮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关键时刻发生了。这一次，又是激进的知识分子率先拉响了进攻的舆论号角。

以苏联国家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的精神嬗变之路为例。

1987年年初，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给《莫斯科新闻》撰写的文章中，谈到党史研究工作要冲破过去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所定下的公式。也就是说，党史研究要突破旧的思维框架。文章发表后，阿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29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99页。

③ [法]《费加罗杂志》1990年3月17日。

④ 美联社莫斯科1991年12月14日电。

法纳西耶夫立即遭到苏联档案总局局长瓦加诺夫的指责。3个月后,又有4名历史学博士联名写信指责阿法纳西耶夫的文章是“不科学和耸人听闻的”。联名信的作者认为,阿法纳西耶夫的文章实际上是号召“重新评价苏联人民70年来所走过的路程”。他们强调,“改革不是破坏,而是创造”。联名信的作者不承认在党史研究中存在“斯大林公式”,并批评阿法纳西耶夫关于“最近15至20年内苏党史研究停滞不前”的说法。

面对批评,阿法纳西耶夫针锋相对。他反驳说:“改革的基本含义就是既要破坏,又要创造。”阿法纳西耶夫则引用全苏社会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材料来予以反驳。在那次会议上,许多人都指出党史研究存在严重问题。阿法纳西耶夫强调: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基础的,正是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公式。其特点就是把党史归结为党内斗争和工人及民主运动内部的各党派之间的斗争;把不同意见的斗争、探索革命途径的企图和党的领导内部的分歧说成是某些人的险恶密谋;对由于意见分歧而形成的派别事后贴上“反党集团”的标签,说它们具有“反革命的意图”。阿法纳西耶夫还认为,党史教科书对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的阐述具有片面性,删去了列宁对后来成为反对派的那些人的正面评价。联名信的作者则认为,不能把历届党代表大会对反对派所作的评价称为“标鉴”,说反对派推行的是“反人民的和反革命的路线”,因此不能为他们平反。^①

随着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阿法纳西耶夫已经不再满足于学术思想上的争锋,而是走出书斋开始从事政治活动。

1988年6月7日,选为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代表阿法纳西耶夫在《共青团真理报》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建议:

▲成立常设的立法委员会来监督警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活动,并改组目前在国内公民事务上拥有巨大权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让它集中精力对付来自外国的威胁。

▲取消国内护照(身份证)和居住许可证,让公民能够自由地在国

^① 新华社莫斯科1987年5月6日电。

内外旅行和在自己选择的地方居住。

▲废除共产党员在求职时受照顾的做法。取消那些占据着由党控制的职位的人所享有的一切特权。

▲颁布一项法律,明文规定共产党只对党员拥有权力。

▲取消党的领导人所享受的特权,例如配备小汽车和别墅,在特殊的商店购物,在特设的医院看病以及优先上大学等。^①

1988年6月17日,阿法纳西耶夫要求重新看待托洛茨基。他说,应该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骂成是苏联的叛徒和社会主义头号敌人的托洛茨基平反,并且重新出版他的著作。阿法纳西耶夫说:“我们必须为所有那些根据虚假的证据遭到镇压和被指控的人恢复名誉,托洛茨基就属于这些人之列。”阿法纳西耶夫谨慎地指出,为托洛茨基平反并不意味着赞成他的主张。他说:“至于在政治上恢复名誉,我认为在这方面也将有所突破,但是,这要取决于对我们的历史以及对党内的政治斗争进行深入的研究。”阿法纳西耶夫的呼吁,是同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受到过挑战的苏联正统的核心是直接相违背的。可以说,在戈尔巴乔夫发动“公开性”运动的背景下,“这是迄今提出的最大胆的建议之一,这场运动的内容包括要更加坦率和更加带有批判性地看待苏联70年来的历史”^②。

1988年7月31日,阿法纳西耶夫发表的观点又一次遭到批判。阿法纳西耶夫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回答》的文章中说:“我不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文章说,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而极大地扭曲了社会主义,建立了一种残忍的压制异己思想的机制。但是他们又应当保障工业建设,保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而人民跟着他们走了,相信这些实际事情,不知道精心掩盖起来的斯大林罪行的全部真相。这就说明,为什么尽管出现了严重的变形,社会主义即使在最痛苦的时期也生存了下来。社会主义首先存在于人民的意识和创造性劳动之中,存在于他们的理想和希望之中。文章指出:当然,关于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和我们所做的

① [美]《纽约时报》1988年6月9日电。

② 美联社莫斯科1988年6月17日电

工作的争论之所以重要,首先就在于它们有助于理解我们今后要走的路——改革之路。他们说,这是一条用手摸得着的道路是不对的。党知道想做什么,知道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关于“革命性改革——革新的思想”的谈话和《关于实行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深入改革的任务》的报告包含着革新社会主义的明确构想。这一构想是不断发展的、创造性的、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这一公式表达了改革的实质。^①阿法纳西耶夫的观点遭到《真理报》的批判。《共产党人》杂志政治观察家伊戈尔·杰德科夫和该杂志第一副主编奥托·拉齐斯撰写的《选定的道路》一文,反驳了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的上述观点。

进入1989年以后,苏维埃政权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的举行,进一步鼓舞了阿法纳西耶夫的政治热情。而当选苏联人民代表更使阿法纳西耶夫充满了十足的干劲。

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尤里·阿法纳西耶夫认真地履行着他作为人民代表的职责。他利用向全国播映的电视节目告诉千百万苏联人会议进展情况。大会辩论休息时,他从克里姆林宫跑出去会见急于了解情况的选民和大学生们。数以百计的莫斯科人挤在闷热的旧课堂里,听取阿法纳西耶夫圆满地回答有关代表大会进程的各种问题。阿法纳西耶夫说,选民们急于了解的是代表大会如何改变政治问题而不是代表大会如何解决日常的消费品问题。

不过,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对代表大会并没有给予积极肯定,而是作了“一个否定多于肯定的总结”。他认为:“会议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再说,两次会议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它甚至连解决问题的途径都没有指出来。大会让人们陷入了混乱。”他还说:“人民代表大会为官僚主义作了工作。它在更新各类机构的同时为戈尔巴乔夫本人强化了官僚主义行政机构的单一权力。”阿法纳西耶夫认为,自改革开始以来,“已彻底破产的”经济形势丝毫也没有起色。它仍然在恶化。他说:“应当有一项走在事态发展的前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88年7月31日电。

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跟在它的后面的政策。不然,就会出现现在这样的人闹不清到底是由经济形势引起的还是由别的什么引起的一连串灾难、事故和全国性的问题。”阿法纳西耶夫认为,改革的最初几步曾是改善经济形势的一些“畏畏缩缩的”主张,为了实现这些主张就必须有起码的公开性。后来,这就成了“滚雪球”,事态发展超过了当局的估计。他说:“党采取的这种保障措施演变成了不可控制的事态发展。”阿法纳西耶夫认为只有两种解决办法:“要么有一项预计到事态发展的政策,要么就不顾一切后果而使用武力。”^①

阿法纳西耶夫认为,经过4年半的改革之后,在苏联的“无政府主义前期形势”面前出现了一个“政治真空”。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政治压力集团,以整合民主力量向代表大会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1989年8月25日,阿法纳西耶夫、萨哈罗夫和叶利钦一起在莫斯科电影之家召开了第一次跨地区人民代表小组会议。“跨地区议员团的成立,成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代表大会随后事态的重要时刻。民主派的代表是将其作为抵抗保守派,在代表大会实施自己计划的机构考虑的。”^②

随着跨地区议员团的成立,阿法纳西耶夫清楚地向外界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改革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阿法纳西耶夫的激进见解让戈尔巴乔夫大为恼火。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0月15日与新闻界代表会晤时指责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和什梅廖夫同离经叛道的最高苏维埃共产党代表鲍里斯·叶利钦一起组成了“一个争夺权力的法西斯集团”^③。最终,戈尔巴乔夫给了阿法纳西耶夫“劝其退党”的处分。

不过,阿法纳西耶夫仍然坚持己见。1989年10月20日,正在日本访问的阿法纳西耶夫第一次公开表明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其局限的观点。在与日本共同社主持的关于苏联改革问题的讨论会上发表讲演时,阿法纳西耶夫断言苏联的社会主义已失去前途。他向与会者说:“改革作为历史的现实是所谓苏联这个最后帝国的终结。”阿法纳西耶夫全面否定苏联式

① 法新社巴黎1989年8月25日电。

② [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③ 美联社莫斯科1989年10月17日电。

的社会主义。他说：“应该从苏联的字典中删掉共产主义一词。”^①

政治形势的日益发展,让阿法纳西耶夫政治主张更加激进和大胆。1989年12月14日,第二次跨地区小组会议召开。改革派在围绕是否创立一个共产党的政治反对派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建立政治反对派可能是走向建立另一个政党的一个步骤。阿法纳西耶夫明确表示:“我们赞成多党民主制。”因此,他坚持要求建立“政治反对派”,并提议把它称为“激进民主集团”。阿法纳西耶夫声称:“同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分道扬镳的时候已经到了。”^②

1990年1月20—21日,来自苏联全国175名代表在莫斯科开会,经过两天的讨论,决定成立“民主纲领派”的组织,阿法纳西耶夫入选由56人组成的协调委员会。“民主纲领派”决定,如果苏共中央领导不接受民主改革,他们将脱离苏联共产党,成立一个社会民主党。这个组织的纲领要求苏共作重大改革,以便使它能在一种多党的体制下进行工作。

1990年2月4日,莫斯科20万市民举行了自革命胜利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要求苏联领导人同非正式的民主反对派举行公开的会谈,并废除共产党对政权的垄断。在许诺要清除强硬派的苏共中央全会的前夕,莫斯科市民们高举着要求把利加乔夫开除出政治局的标语牌示威,其中的一个标语牌上写着“要戈尔巴乔夫,不要利加乔夫!”的口号。示威群众挥舞着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的人民阵线的旗帜。阿法纳西耶夫要求政府同代表莫斯科12个非正式政治改革团体的社会民主联合会举行圆桌会议。2月25日,苏联首都大游行组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游行的目的是“帮助选民确定”在即将于3月4日举行的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该投谁的票。集会将在花园环形路的一个区、首都重要的交通要道举行。正如阿法纳西耶夫宣布的那样,游行示威要把所有激进情绪的人民代表联合起来。

1990年3月12日,第三届(非常)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阿法纳西耶夫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指责列宁“把大规模实施恐怖和暴力列入国家政策的原则”。4月10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党内“激进派”——民主纲领派——企图分裂党,并暗示有可能将这些“激进分子”清除

① 共同社东京1989年10月20日电。

② 美联社莫斯科1989年12月14日电。

出党。4月18日,阿法纳西耶夫宣布自愿退出苏共。

1991年1月16日,作为“民主俄罗斯”运动主席的阿法纳西耶夫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宣布,“民主俄罗斯”和跨地区议员团已经决定1月20日在莫斯科组织声援立陶宛和抗议反动派进攻的示威游行和集会。集会的基调将是反总统的,即反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口号之一是要要求总统及其同伙下台。此外,还要组织罢工。^①

1991年2月7日,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指出:从1990年底开始,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阿法纳西耶夫和其他人开始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总统公开斗争。“他们同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运动联合在一起。”^②

1991年4月27日,“民主俄罗斯”提名叶利钦为俄罗斯联邦的当选总统候选人。尽管在此之前“民主俄罗斯”还尖锐地批评叶利钦背叛了该运动,攻击叶利钦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一项要求结束长达8周的煤矿工人罢工的联合声明。阿法纳西耶夫说,由于签署了这项联合声明,叶利钦使得民主派联合工人运动的力量反对戈尔巴乔夫并进行富有意义的改革的努力付诸东流。但是阿法纳西耶夫承认,民主运动现在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他们不同意这项联合声明,但是他们也不想表露出反对叶利钦的意见,因为结束长达73年的共产党统治是他们最大的愿望。阿法纳西耶夫说:“此时此刻,我们发现自己处在复杂的境地。我们必须支持叶利钦。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有关这项声明的真相。”^③

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以57.3%的选票成功当选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总统。7月10日,叶利钦宣誓就任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参加了叶利钦的宣誓仪式。7月2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颁布《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的命令》。命令规定:不允许各政党及群众性社会运动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以及基层组织、委员会和其他组织机构中活动。

“八一九”事变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① 新华社莫斯科1991年1月16日电。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2月7日电。

③ 路透社莫斯科1991年4月27日电。

“戈尔巴乔夫成了自己的死对头叶利钦的政治债务人。”^①当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24日建议解散苏共中央并宣布辞去总书记职务时,阿法纳西耶夫孜孜以求的政治使命完成了。

五、社会失意者

如果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社会民主运动,那么应该承认,社会民主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股左右改革发展的强大政治浪潮,迫使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共产党在政治上不断退让,发挥关键因素的不仅仅在于社会各界精英的政治组织能力,更重要的社会民主运动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被压制的苏联社会在改革环境中所蕴含的对现状不满的普遍性诉求。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触及整个社会。”^②在改革的破与立中,大批社会失意者的产生及其表达诉求的组织化行动,使得社会民主运动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有成就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并乐于看到它照原样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却会乐于看到世界急遽改变。”^③

1. 失业者

失业,对于苏联人民来说,曾经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人民赤裸裸的野蛮剥削。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稳定的工作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象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但是改革改变了一切。戈尔巴乔夫宣称:“在把我们所采取的措施称为革命措施的时候,我们是指这些措施的深刻性、彻底性和不妥协性,是指这些措施包括从上到下、从经济基础、所有制关系到上层建筑的整个社会,包括一切生活领域,并且是全盘地、完整地包括所有这些方面。这不是对我们社会机体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戮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29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8页。

③ [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页。

上这种或那种小毛病和污点进行粉饰和洗刷,而是使整个社会机体得到改善和更新。”^①

在经济改革中,减少政府部门对企业管理的直接干涉,给企业以独立经营的自主权,逐步建立竞争性的市场机制等,这是戈尔巴乔夫破除经济管理中的障碍机制所采取的“革命性措施”。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不采取这些措施,就没有办法激活企业活力。对苏联人民来说,改革不是二选一,而是二者兼顾。在老百姓眼中,能够提高生活水平而又不威胁到他们经济安全感的改革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但是,这样的改革只是一种政治幻想而已。于是,在社会大众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产生了一个艰难的问题:谁来承担改革的阵痛?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没有阵痛的改革是不存在的。“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可能所有的人都不得不牺牲些什么。”^②只有经过改革的阵痛,才能真正改变停滞时代形成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旧事物、旧关系。因此,因减少或降低人民承担改革阵痛的办法,只有一条道路可走:那就是加快发展速度,缩短阵痛期。戈尔巴乔夫说:“对待改革像对待一切革命一样,不能持轻率态度。要把改革进行到底,使之天天都取得成就,让群众能够体验到改革的成果,使改革的飞轮加速旋转,加快前进,即加快发展的速度。”^③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在采取行动时仍然保持了相当的谨慎。直到1987年6月才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企业法》。并决定于1988年1月开始实施。不管怎么说,经济改革终于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就在经济改革开始深入推进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又突然转向政治改革,固执地认为只有先解决好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才能顺利进行。于是,整个改革开始乱套了。政治狂热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各主要城市,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使得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愈来愈艰难。而随着《企业法》的实施,失业更是为老百姓困窘的生活雪上加霜。1988年7月26日,莫斯科电台报道,随着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逐步使苏联工业实现现代化,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已有将近100万工人被解雇。“国家统计局认为,这是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结果。”不过,莫斯科电台解释说,被解雇的工人肯定有别的工作做,“因为政

①③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61页。

② 同上,第59页。

府正在有计划地重新分配劳动力”^①。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停滞和恶化,苏联政府已经无法为失业的人群提供足够的职位了。1990年10月11日,苏联国家劳动和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谢尔巴科夫说,据初步统计,苏联目前有250万人失业。苏联国家统计局调查材料也显示,现在苏联有劳动能力而没有就业或学习的人口数量超过八百万人。^②10月25日,苏联经济部第一副部长亚历山大·特罗申在苏联国民经济应急管理委员会上对明年的经济工作作出预测时表示,全国的失业人数可能从300万人上升到2500万人。特罗申指出:“如果目前所有的不良倾向继续发展,接着而来的将是经济崩溃,生产成倍衰退,恶性通货膨胀和不可预测的社会后果。”^③

事实上,这种“不可预测的社会后果”早已发生了。一方面,持续性的失业造成了家庭的经济贫困和社会犯罪率的上升。据内务部统计,1991年犯罪率比1990年上升18%以上,其中近80%的案件属于经济犯罪,盗窃国家和私人财产的案件显著增加。在所有犯罪案件中,有12%是失业人员所为。^④另一方面,全国性的失业使得苏联老百姓丧失了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信心。窘迫的生活造成的严重的生存压力和不满情绪的迅速累积,于是当叶利钦提出“将实行不降低生活水平的经济改革”^⑤时,许多人开始加入支持叶利钦的狂热政治运动之中。

2. 社会青年

作为社会群体中思想最为活跃、行动最为迅捷的青年,在社会民主运动中往往在行动上起着先锋性作用。正像戈尔巴乔夫所说:“青年中间蕴藏着改革的巨大潜力。”^⑥但是随着苏联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从勃列日涅夫后期开始,苏联青年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已经发生了悄然变化。在戈尔巴

① 美联社莫斯科1988年7月26日电。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90年12月14日电。

③ 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10月25日电。

④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92年1月28日电。

⑤ 路透社莫斯科1990年6月9日电。

⑥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40页。

乔夫倡导“公开性”的改革时期,这种变化的心理在失去社会制约的环境中更是显示出其严重的消极倾向。

1989年7月12日,苏联共青团中央高级团校科研中心主任、哲学博士伊利因斯基教授对苏联青年的心理变化作了描述。^①

他说:

苏联青年今天处于一种窘困状态。年轻职工的平均工资为120—140卢布。一个有奖学金的大学生年平均收入低于500卢布。全国有400万青年家庭等待分配住房,150万儿童等待入托。已经工作的青年只有10%的人有单独的住房,2/3已工作的青年在27岁以前要住在集体宿舍里或租房住。

青年的冷漠、悲观和怀疑情绪不断增长。不到40%的青年相信我国能达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1/5的青年认为我们在今后几年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近50%接受调查的青年工人和近60%接受调查的大学生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过是免费教育和没有失业。

再拿人道主义来说,我国绝大多数青年人认为,人道主义就是有丰厚的工资收入,舒适的住房,丰富多彩的产品,漂亮的衣着,没有这些东西,人们就把头扭向另一面。

青年有一种享受倾向,希望吃得好,住得好,什么都有,但是什么都不想干。危险趋势今天,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是抓紧使我国的经济健康起来,消除社会的紧张情绪,要稳定青年对社会前途的看法。不应忘记,非正式运动或者自发的青年团体都可能被有卑劣政治目的的人所利用。

我担心,我们的社会现在孕育一种爆炸危险。

青年人由于年龄关系,情绪最为偏激。人们往往不大愿意同年轻人认真谈谈,这使年轻人非常激动和恼火。针对青年问题应采取的措施首先应当改变社会对青年的态度,从而改善青年同社会的关系。年

^① [苏]《文学报》1989年7月12日。

轻人需要同社会广泛地和坦率地对话。社会应当给年轻人发表看法创造条件。这应当是国家对待青年的政策。青年问题有两个方面：作为社会问题，社会应当关心自己的青年一代；作为青年自身的问题，青年人追求自我实现和活动天地。应当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建立两代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在教育问题上应当有一套新构想和新哲学。要有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体系。社会向青年投资就是向自己的明天投资。老一辈不要指望青年人会亦步亦趋地照他们的样子做，更不要指望青年人会努力讨他们喜欢。

当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例行全会在1989年10月27日召开时，与会者的共青团领导人强烈感到解决伊利因斯基分析的苏联青年问题的紧迫性。改革形势下出现的青年运动已经越来越迅速地超出共青团的范围。国内先后出现各种青年协会，大学生联合会和自由参加的协会、“绿党”小组和儿童组织。^①

这些青年组织都与共青团没有任何组织关系。事实上，在整个改革时期，以青年作为工作对象的共青团并没有赢得青年的欢迎。已经浸透了官僚主义的共青团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批评。他说：“拍拍青年的肩膀，傲慢地对待青年或是向青年献媚，所有这一切都一文不值。”尤其是在做青年的工作时，教训人的腔调和命令主义是不能容忍的。“不管对这些做法作何种解释——是不相信年轻人的志向和行为的成熟性，还是简单地为青年打保险、想使自己的下代人走轻松愉快的生活道路，这种态度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②然而作为苏共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织，共青团僵硬呆板的组织方式无法吸纳青年对生动活泼的政治活动的向往。直到1991年9月28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十二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共青团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并决定停止共青团选举产生的中央机关的活动时，这种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改观。

在急剧升温的政治氛围中，迎合和促进青年心理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89年10月27日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41页。

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无所顾忌的社会民主运动。早在阿拉木图骚乱发生时,《共青团真理报》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1987年1月10日的《共青团真理报》指出,可以有把握地说:发生事件的根源首先在于青年中间的意识形态工作出现严重疏忽,爱国主义和族际主义教育有所削弱。报纸指出,最近几年里共和国流行一种对业已取得的成就作不客观评价的做法。《共青团真理报》指出:“公开违背时代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于是选择了另一个口号——民族主义,在有损民族尊严的问题上采取蛊惑人心的做法鼓动了一部分青年。这些青年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而变成了挑拨者的盲从工具。”^①

3. 知识分子

对于大多数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来说,加入社会民主运动的目的,与其说是谋求政治上的改变,不如说是更加关注于生活的改善。通过社会民主运动来表达自己的强烈愿望,以此希望政府能够适当关注并做政策性的修改,从而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物质待遇。

1989年2月4日,《社会主义工业报》发表的经济学副博士戈利斯的文章就明确地表达并解释了知识分子对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态度。^②他在题为“知识带来贫穷”的文章中说:

生产部门工作人员的月平均工资比工业部门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少37%。教师的工资经过上调以后,也只有工业部门工作人员工资的71%。文化领域更为严重,平均工资只有工人的56%。科研人员生活得比较好,他们的月平均工资是工业部门的96%。如果把这些指标同建筑业的劳动报酬相比,反差就更为强烈了。建筑业的工资比工业部门还要高12%。

知识分子的物质状况不令人羡慕。高等学校刚毕业的工程师一个月拿115~120卢布。刚开始工作的工人一个月拿160~180卢布。一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87年1月10日电。

^② [苏]《社会主义工业报》1989年2月4日。

位很有才干的工程师工作五六年一个月才挣 160~170 卢布,同样工龄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却可挣 200 卢布以上。一位工程师干了 10 年、当上设计局长,月工资连同奖金可拿到 400 卢布,但同样工龄的工人却可拿到 500 卢布,甚至 600 卢布。

如何解释这种状况呢?能否认为这种状况是正常的呢?

我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形成劳动报酬的整个机制,以及整个经济实践是建立在不正确的概念之上的。这种概念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鼓励靠牺牲“次要”部门来发展重工业。

这种做法的后果特别明显,精神的东西落后了,专家的知识水平降低了。教师没有粉笔用的情况是很糟糕的。如果对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态度仍然不变的话,这种“知识误”的现象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是否希望有优秀的教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是否希望有高水平的医生为我们治病呢?我们是否希望文化界人士教会我们理解美呢?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当懂得,我们要是只把饭桌上的残羹剩饭送给精神生产领域的人吃,我们就休想有高水平的精神产品。我们需要广泛的高水平的精神生产。没有这一点,也就不可能有卓有成效的物质生产。精神上的贫乏必然导致物质上的贫乏,反之亦然。

4. 政府工作人员

社会失意者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群体就是政府工作人员。作为破除障碍机制的主要革新对象,政府工作人员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承担了很大的压力。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改革首先冲击的是那些习惯于按旧方式工作的人。我们没有政治上的反对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接受改革的人的斗争。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可能所有的人都不得不牺牲些什么。但是,都必须永远放弃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不应有的种种

特权,放弃为障碍机制效劳的各种权利。”^①

在戈尔巴乔夫的强硬路线下,苏联政府部门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精简裁员行动。从1985年3—12月,戈尔巴乔夫对约二十个政府部和国家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作了大的人事更动。其中,各部门已有数千名人员被裁减掉。其他政府部门已接到指示,不许录用新人。^②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政府部门也将有数百万政府工作人员约有一半将失去现有的职务。1987年1月21日,苏联政府社会发展局副局长普罗斯佳科夫说,根据这一改革决定裁减下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将得到新的工作,其中一些人将去工业部门工作。他说,此举旨在压缩不合理的部和管理机构。估计各加盟共和国下属的部和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将不得不裁减大约50%,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将不得不裁减30%~35%。他说,目前在苏联政府下属的部及部级机构工作的人员有数百万,“其中许多人不合格,而且主观能动性不强”^③。

戈尔巴乔夫不仅在政府部门开展精简机构运动,也对苏联共产党组织进行了大幅调整。1988年7月29日苏共中央全会公布的决议说,对党中央的固定工作人员和地方党机构进行改组的工作到今年年底时应该完成。届时,“工作人员的总数应当大大地减少”。这项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改变苏联社会面貌的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其重点将首先放在中央委员会的20个中央部门,从中央到全国各地的市一级,都有这样的部门。决议指出,负责处理工农业的一些具体问题的9个党部门(许多部门是从20年代初就存在的,而且全都有与政府机构重叠的好几个分支机构)将予以解散。^④对这项改革方案,戈尔巴乔夫在9月23日对新闻界负责人的讲话时作了解释。他说,根据七月全会通过的旨在限制党对经济事务的干预的决定,党组织应当精简。这一措施首先会影响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下属各部,“然后在较小程度上也会影响地区党委和市党委的各机关”。同时,戈尔巴乔夫也批评了那些“对每个挫折都幸灾乐祸”并认为“改革”会失败的人。^⑤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9页。

② 德新社莫斯科1985年12月13日电。

③ 路透社莫斯科1988年1月21日电。

④ 路透社莫斯科1988年7月31日电。

⑤ 法新社莫斯科1988年9月29日电。

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大规模的精简机构行动,在政治民主化的时期越来越失去了其本身应该达到的作用: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伴随着国家权力中心从苏联共产党向最高苏维埃的转移,苏共的政治权力被迅速剥夺,曾经作为整个国家神经中枢的政治传送带停止了运转。而新获取了最高权力的苏维埃却并没有做好接管国家政权的准备。于是,在大幅度的精简机构运动中,一方面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政令混乱的局面,另一方面则使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在民主化的浪潮中成为“政治沼泽”。“他们早已不把党的指示当作无条件执行的命令。这就意味着,只能假定认为他们是‘自己人’。”^①

^① [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第三章 社会民主运动的组织类型

“公开性”打开了紧锁的政治魔盒，释放出苏联社会过度的政治激情。在社会民主运动的狂热浪潮中，形式多种多样、名称五花八门的政治性组织纷纷成立。截至1990年，苏联共有2000~3000个所谓的“非正式”小组和团体。^① 约有200万~250万人参加了上述组织。^② 根据社会政治活动特征可以将其分为：爱国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生态运动、君主制运动、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宗教运动。按照社会政治组织类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以“人民阵线”为代表的体制外的群众性政治组织、以“跨地区议员团”为代表的体制内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和以“民主俄罗斯”运动为代表的独立的政治反对派联合体。

一、组织类型——社会群众组织

以“人民阵线”为代表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在改革初始阶段被戈尔巴乔夫看作是“人民正从往日的冷漠中摆脱出来，满腔热情地投身于社会生活”^③的一种表现形式。与“人民阵线”同属一种类型的还有被冠以俱乐部、联合会、社团、协会等各种名称的政治组织。之所以会有这种奇怪的名称，主要是为了回避苏联法律的制裁。马特洛克在分析“人民阵线”组织的起源时就

① 关于“非正式”小组和团体的数量，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统计。苏联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就认为大概有三万多个类似的团体存在。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90年2月14日电。

③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88页。

说：“当时，共产党是苏联境内唯一的合法的政党，因此在爱沙尼亚和其他共和国内，人们决定组成‘多民族阵线’，而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政党。给他们的组织一个有别于‘政党’字眼的名称，组织者就可以避免法律上的指控，也可吸引共和国内共产党人的支持。他们还把绝大部分活动冠以‘支持调整运动’或改革运动，以避免与莫斯科关系紧张。由此他们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他们的运动是支持而不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①

1. 群众性社会组织：从俱乐部到争取改革运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非正式群众性政治组织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形成的。只不过在当时，这种非官方社会团体往往不被苏联政府所允许，其活动多处于地下隐蔽状态。但是随着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上号召公众更广泛地参加国事，即实行民主化之后，这些团体便逐步成为半合法的团体了。虽然还没有完全获准苏联现有法律的允许，但却符合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需要：“改革，就是依靠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活动，更全面地发扬民主，发展社会主义自治，鼓励主动精神和自主性，加强纪律性和秩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大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更加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②

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活跃于苏联社会生活的群众性组织，大体可以分为政治性组织和非政治性组织。非政治性组织主要以环境保护等为主要活动。比如，起名“三角洲”的社会团体的目标就是争取在列宁格勒兴建一个水坝；以“森林”为名的社会团体则为反对乱砍滥伐俄国广大森林而努力进行斗争。当然，大部分非正式团体都在开始组建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比较明确的政治指向。比如，成立于1982年的“纪念碑”的非正式团体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座纪念碑来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人。据苏联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估计，截至1987年底，“估计这种团体目前至少有3万个。这是

^①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96～197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主要由青年人组成,其中有些人是知识分子”^①。

作为群众性社会团体,其中坚分子却主要集中在青年人、知识分子(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人权分子等人身上。这些人虽然人数少,但是作为群体性团体的主要组成人员,在团体的社会活动中发挥了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在这些对现行苏联政治秩序怀有强烈不满,甚至仇视的人的领导下,许多非正式社会团体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其在政治上的反抗与破坏。

1987年12月28日,《真理报》发表社论警告人们提防新的政治俱乐部的攻势。社论指出,总的来说,非官方活动的发展是说明民众对政治感兴趣的一个健康迹象,但是那些鼓吹成立反对党或独立工会的组织和那些鼓吹犹太复国主义、反犹太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组织必须受到谴责。“它们的活动有时具有明显的非法性质。它们未经当局允许就组织示威,甚至制造混乱。它们非法印刷和散发敌视社会主义的印刷品。”社论指责“一些流氓和蛊惑人心者打着极端爱国主义的旗帜,鼓吹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试图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来回顾历史”。社论强调:虽然西方一些人希望这些俱乐部是一个表明苏联可能走向“西方模式的多元化”的迹象,但是《真理报》告诫说:“我们的方针不是实现西方那种自由化,而是加深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②

1988年11月11日,《真理报》发表政论家布日凯维奇的述评指出,必须积极地把1985年4月以来苏联广泛发展的非正式社会团体运动引向满足社会利益的方向。布日凯维奇说:

目前苏联到处都有把某一部分居民结合在一起的俱乐部、联合会和基金会在活动。约3/4的团体是组织各种形式的业余活动。其余的团体则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内外政策。许多这样的团体提出要解决的任务,有助于深化苏联社会的民主和扩大公开性,有助于加速我国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进程。但是,这些非正式团体目前的行动还很不坚决,在实现提出的任务方面还有些畏畏缩缩。它们的精力主要

①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7年12月30日电。

② [美]《纽约时报》,1987年12月28日。

用于组织讨论,编写文件,讨论法律草案,出版自己编辑的手抄本杂志。另一方面,非正式团体里也有一些公开破坏法律的人,政治上幼稚的人,有时还有一些公开反对我国现行制度的人。^①

应该说,如何在“公开性”时代处理党和政府与非官方社会组织的关系,已经引起了苏共中央的重视。早在1987年的时候,苏共中央委员会就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如何解决因响应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社会进一步实现民主的号召而不断壮大的非官方组织的问题,并研究如何对付鼓吹同国家对立的观点的人的问题。不过,从其后的历史发展结果来看,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并没有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事实上,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些引起党内保守力量不满的社会现象,虽然有些乱,有些出格,但却是苏联人民关心国家事务、关心改革命运的具体体现。“恢复和加强苏联人对国家命运负责的主人翁感和亲身参与并关心公益事业的感情,这是改革条件下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甚至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②

于是,在戈尔巴乔夫的解禁下,非正式社会团体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在苏联的政治大地上迅速涌现,很快便在响应总书记“公开性”的号召下,掀起了狂热的政治浪潮。整个社会迅速沸腾起来了!

根据改革时期群众性政治组织的发展状况,笔者对部分主要团体的活动作了简要梳理。具体情况见下表。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88年11月11日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25页。

改革时期部分非正式团体的政治活动简表

序号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社会主张与组织活动	社会态度
1	纪念协会	1982年	建立一座纪念碑来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人。	1987年12月28日,《真理报》发表评论:“一些流氓和蛊惑人心者打着极端爱国主义的旗帜,鼓吹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试图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来回顾历史。”
			1988年10月30日,列宁格勒等四个城市发生规模较小的纪念“政治犯日”的抗议活动。警察在几个城市一共逮捕了六十多名参与者。	1988年7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说:“还有一个在代表会议前夕和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为受迫害者建造纪念碑的问题。你们可能都记得,在党二十二大的闭幕词中提到过这一点,当时得到支持。在党的二十七大会上也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没有作出实际决议。正如报告中所说,对无法无天时代的受害者恢复公正,是我们的政治义务和道德义务。让我们通过在莫斯科建造一座纪念碑来履行这项义务吧。我相信,这一措施将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支持。”7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建议,在莫斯科为斯大林统治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
			1989年3月5日,在高尔基公园举行为悼念斯大林的受害者集会。与会者高呼:“叶利钦是人民的儿子。利加乔夫可耻。”政论家科里亚金说利加乔夫应当辞职时,人们为他长时间鼓掌。科里亚金说:“去年就有人要求利加乔夫辞职。现在这已经成为全体人民的要求。”	
2	信任	1986年	1988年6月4日,在莫斯科市中心普希金广场举行集会。与会者手持的一些招牌上写有:“人民自卫,免受官僚之害”“戈尔巴乔夫坚持下去,我们将同你一道走向街垒”“清除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恢复马克思主义”“经济核算不是战略,是策略”等字样。	《红星报》批评政府的软弱助长“绥靖情绪”。
3	公民尊严			
4	唯一抉择			
5	民主和人道主义组织			

续表

序号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社会主张与组织活动	社会态度
6	民主联盟	1988年 5月8日	<p>在成立大会上,民主联盟发言人尤里·米秋诺夫说,民主联盟的成员中有人权活动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和莫斯科市及列宁格勒、里加、托木斯克、卡卢加、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其他城市若干讨论小组的成员。“民主联盟”的创建声明说:“我们将明确规定我们作为反对现秩序的反对派政党的活动内容。”民主联盟组织委员会14名委员之一的瓦列里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强调指出:“西方社会在许多方面是大部分与会者的标准,而对于我们之中的一些人来说,则在一切方面都绝对是标准。”民主联盟的纲领把“改变苏联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求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发展混合经济,实行多党政治制,使反对派的报纸合法化和成立独立工会。</p>	<p>1988年5月8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人在莫斯科聚会时,克格勃在周围的大街上和这座公寓大楼的大厅里布满了秘密警察。同时,在公寓附近停了至少二十辆小汽车和八辆公共汽车,车上坐着克格勃的警察。警察拘留了19名参加人员。</p>
			<p>1988年8月21日在莫斯科市中心普希金广场举行非法集会。内务机关工作人员通过扬声器整整一个小时解释了集会的非法性,劝说集会的组织者离开普希金广场,阐明非法行动的后果。挑拨者没有服从。当时根据法律,莫斯科市苏维埃执委会内务总局特种部队和纠察队员使用武力驱散了违法集会。</p>	<p>1988年5月18日,《莫斯科新闻》发表评论:企图把我们为了建设目的而创造的东西用于破坏的目的。评论指出,在我们某些同胞的日常意识中开始渐渐地形成两种神话:“消极的神话”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的神话”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制造神话的结果以“民主联盟纲领”的面貌浮到社会生活表面上来。</p> <p>1988年8月24日,《真理报》发表评论:这些人企图利用我们的民主和公开性来达到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的目的,这些人蓄意超出社会主义意见多元化的范围,挑唆违反社会秩序和惹起民警的干预。法律就是法律。每一个人都应当遵守法律。因此,莫斯科民警局21日在普希金广场上的行动应当认为是合理的。它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它保卫了改革、民主和法制。民主同肆意妄为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有健全的头脑和有力量在法律的基础上抵制所有企图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破坏改革的人。</p>

续表

序号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社会主张与组织活动	社会态度
			1988年9月5日,“民主联盟”在莫斯科举行示威集会。警察进行了干预并拘捕17人。	1988年10月22日,莫斯科民警局局长波格丹诺夫批评说,“民主联盟”是一个有极端主义情绪的团体,这个组织“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成果,主张修改宪法或要求取消宪法中有关党的领导作用的条款,反对青年人服兵役”。“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忧:一些犯罪分子和挑拨离间分子有可能利用未经批准的集会制造大规模骚乱。”
7	爱沙尼亚人民阵线	1988年10月1日	举行自由选举、以宪法保障私有财产、停止实施义务兵役制和惩处那些对斯大林时期的罪行负有责任的人。	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瓦伊科·维亚利亚斯批准了人民阵线的成立。 1988年10月21日,《真理报》发表评论:这些组织是改革沃土上的莠草,寄生在民族问题上,不能允许用民族主义来取代民族虚无主义。
8	拉脱维亚人民阵线	1988年10月8日	经济完全独立,其中包括建立自己的货币、建立与其他国家的独立关系、控制移民和出国旅行等权利;在苏联建立法制国家,同遏制改革进程的官僚主义体制作斗争。	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诺夫和该共和国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出席了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成立大会。 1988年10月21日,《真理报》发表评论:这些组织是改革沃土上的莠草,寄生在民族问题上,不能允许用民族主义来取代民族虚无主义;《新时代》:在这些共和国部分居民成立的人民阵线的纲领中发现有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和有分立主义的倾向,产生了这些共和国按民族特征分裂的危险。
9	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萨尤季斯)	1988年10月22日	把支持改革和公开性政策的力量团结到自己队伍中来,争取国家独立。	立陶宛党中央第一书记布拉藻斯卡斯在成立大会上发言时说,这一群众组织“是支持改革的积极力量,因为它的目标原则上是正确的,我们予以支持”。

续表

序号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社会主张与组织活动	社会态度
10	乌克兰争取改革人民运动(鲁赫)	1989年9月8—10日	目标:反对苏共,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独立。 运动副主席、苏联人民代表切尔尼亚克:“我们应当取得政权。”苏联人民代表马尔季罗相上校对乌克兰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毫无根据的攻击。他当众问道:“你能给我指出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中有一个诚实的人吗?”还有代表宣称:“只要乌克兰留在苏联,那就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	1989年9月15日《真理报》以“乌克兰争取改革人民运动往何处去?”为题,对成立大会进行了报道和批评。
11	俄罗斯工人联合阵线	1989年9月	俄罗斯工人联合阵线在西伯利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举行成立大会。来自29个工业中心的11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联合阵线决定:反对激进的经济改革,保卫在苏联边远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不受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 1990年2月18日,俄罗斯联合工人阵线组织了至少有二千人参加的苏联电视发射塔附近的示威,谴责戈尔巴乔夫使这个国家陷入贫困和西方式的堕落颓废之中。	1989年9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联合阵线在其成立大会上决定,反对给苏联加盟共和国以更多的经济自治——这是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长期以来所争取的。戈尔巴乔夫主张把实行更多的自治作为使苏联生产恢复元气的手段。他也愿意将亏损的国营公司出售给私人经营的主张在联合阵线大会上受到批评。
12	苏联民主组织跨地区协会	1989年10月29日	1989年10月29日,苏联民主组织跨地区协会在车里雅宾斯克闭幕的成立大会上宣告成立。参加大会的有来自12个加盟共和国的数百名代表和客人,他们代表着有三十多万名成员的92个非正式组织和运动。	1989年10月30日,针对会议组织者借口“苏共中央机关报刊不是像他们的领导人希望的那样报道这种组织的活动”而不允许包括《真理报》记者在内的一些新闻工作者参加会议的做法,《真理报》评论说:“这种举动不太符合新成立的组织的领导人多次宣扬的民主、多元化和言论自由的原则。”

续表

序号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社会主张与组织活动	社会态度
13	俄罗斯联邦“统一”工会	1990年 1月8日	1989年底,坚决主张独立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所属的俄罗斯联邦合作社工作者工会正式成立。	主张

2. “人民阵线”:政治反对派的民主“遮羞布”

在众多的非正式社会团体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以“人民阵线”为代表的苏联各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团体。自1988年10月1日爱沙尼亚人民阵线宣布成立,并获得爱沙尼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瓦伊科·维亚利亚斯的肯定后,“人民阵线”作为共和国主要精英分子发起的对抗共和国中央和联盟中央的运动统称,很快就因其既“可以避免法律上的指控,也可吸引共和国内共产党人的支持”^①而被广泛模仿,成为政治反对派从事政治活动的“遮羞布”。

从“人民阵线”的发展状况来看,无论其在各共和国的发展形势有多么不同,但是其在总体政治目标上却保持着惊人的一致:反对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反对联盟中央的统治,争取民族和国家独立。就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人民阵线”成立之时,《真理报》就发表评论指出:“这些组织是改革沃土上的莠草,寄生在民族问题上,不能允许用民族主义来取代民族虚无主义。”^②《新时代》杂志也指出:“在这些共和国部分居民成立的人民阵线的纲领中发现有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和有分立主义的倾向,产生了这些共和国按民族特征分裂的危险。”^③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博布科夫在谈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人民阵线”组织时就说:“他公开的口号是号召人们支持改革,捍卫人权,拥护乌兹别克斯坦的民主改革。不过在这些口号的掩护下,他们实

①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97页。

② [苏]《真理报》,1988年10月21日。

③ [中]《参考消息》,1988年10月31日。

质上主张纳粹主义。”^①在克格勃看来,立陶宛的“萨尤季斯”主张的民族复兴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用斯米塔纳独裁者和对于同立陶宛的苏联时期相联系的一切都仇恨的精神恢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价值”^②。

总体来说,“人民阵线”具有极其显著的组织特征。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三大特征:

一是组织构成的民族化、本土化。以“人民阵线”为代表的非正式社会团体,在不同的共和国由于不同的民族传统而有着不同的称呼。比如,立陶宛的“争取改革运动”就以立陶宛语表述的“萨尤季斯”最为瞩目;乌克兰的“争取人民改革运动”就用乌克兰语表述为“鲁赫”;乌兹别克斯坦“争取改革运动”就用乌兹别克语表述为“比尔利克”。除了运动名称上的民族化色彩以外,参加运动的人员类属上也具有极强的民族特征。尽管“人民阵线”宣称是所有致力于改革的人的群众性团体,但是在其实际运行中却往往以民族属性作为取舍标准。比如,立陶宛的“争取改革运动”中大部分都是立陶宛人,只有极少部分是讲俄罗斯语的本地居民。而在立陶宛另外一个主要的非正式团体——团结联合会——中全部都是立陶宛人。即便是在“争取改革运动”中有少量讲俄语的成员存在,但在多数情况下仍属于俄罗斯化的立陶宛人。在民族情绪越来越高涨的时候,俄罗斯化的立陶宛人也更加迫切地希望恢复纯正的立陶宛身份。

二是组织领导的精英化、党员化。“人民阵线”作为各共和国表达人民改革意愿的群体性团体,其组织领导实质上从一开始就具有精英化的显著特点。也就是说,共和国的社会精英实际上主导着“人民阵线”的发展走向。在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阵线”中,知识精英在运动组织中占据着相当的比例。比如,在爱沙尼亚“人民阵线”中,知识分子比例高达58%;在拉脱维亚“人民阵线”中,知识分子比例为40%。^③知识精英作为“人民阵线”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由其特殊的社会角色决定的。一方面,知识精英向来被视为

① [俄]菲·博布科夫:《克格勃与政权——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回忆》,王仲宣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294页。

② [俄]维·什罗宁:《克格勃X档案》,赵云平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

③ 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20世纪60—90年代苏联各社会政治阶层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264页。

“社会良心”，是社会公正的代表。尤其是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知识精英扮演着反抗苏联极权政治而遭受迫害的悲情角色，更是在博得社会普遍同情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社会良心”的角色认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由于其自身的专业技能而赢得社会尊重，并进而获取社会的思想服从。无论是在平均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波罗的海三国，还是在其他共和国内，知识分子作为一定社会文化思想的传播者和创作者，总是能够以其“理性”的思维形象和行为规范树立起其社会标杆的示范引导作用。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候，社会思想的混乱更容易使盲从的社会大众顺应知识精英的领导。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知识精英对社会生活的敏锐感触和政治生活的敏锐观察。与社会大众的紧密联系使知识精英能够把握住社会普通大众的所思所想，而对上层政治生活的风向感知又能使知识精英觉察到政策走向的变动与调整，从而在结合上下两个方面的具体情况后，知识精英往往能够提出既不触碰上层政治底线，但又能够反映普通大众社会期望的政治主张，从而不断扩大和强化其在运动中的组织领导作用。与此同时，在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阵线”运动中，还有一个普遍性的显著特点，“即共产党员也参加了进来，这是很有意义的现象”^①。在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阵线”组织成立之时，共和国的党中央领导人都对此表示了赞同和肯定。比如，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成立时就得到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瓦伊科·维亚利亚斯的亲自批准。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成立时，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诺夫和该共和国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出席成立大会。在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成立大会上，立陶宛党中央第一书记布拉藻斯卡斯在大会上发言时说，这一群众组织“是支持改革的积极力量，因为它的目标原则上是正确的，我们予以支持”^②。随着波罗的海三国谋求独立的政治呼声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人民阵线”对共和国共产党组织产生了巨大的分裂作用。大批共产党员倒向“人民阵线”。一小部分共产党组织反对“人民阵线”的独立野心，但是在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的步步退让下，其反对行动很快就淹

①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97页。

② [中]《参考消息》，1988年10月31日。

没在狂热的民族洪流之中。

三是组织原则的政治化、权力化。作为群体性团体，“人民阵线”发展趋势就是越来越政治化和权力化。简言之，“人民阵线”日益脱离群体性团体的组织范畴，一变而成向现政权发起冲击的政治权力集团。促进这一演变过程的发生有着多重社会因素，但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不容忽视。一方面，政治形势的演变对“人民阵线”组织目标调整的影响。波罗的海三国发起成立的“人民阵线”运动，其最初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提高民族语言文化的社会地位方面。但是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日益激进和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波罗的海三国的运动目标开始向谋求政治独立转向，并成为共和国内民族主义的“主旋律”。政治目标确定为夺取政权后，过去松散的群体性团体必然要按照权力运作的方式来重新构建一个新的权力集团。另一方面，在“人民阵线”与联盟中央持续的政治博弈中，为了对抗庞大强势的联盟中央，也必然要求组织严密的权力结构来应对来自中央的压力和打击。正是出于上述两个方面主要因素的考虑，无论是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阵线”，还是其他共和国的“人民阵线”，在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之时，适时地实现组织目标的转换和组织结构的调整，才有可能在权力的盛宴中分享属于自己的政治蛋糕。维陶塔斯·兰茨贝基斯领导下的立陶宛“萨尤季斯”就是典型代表。作为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兰茨贝基斯在立陶宛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1990年3月11日，兰茨贝基斯击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成为立陶宛50年来第一位非共产党的共和国主席。这位57岁的新领导人说：“我们的目标就是重新获得独立。”争取独立运动仍将作为“团结人民”的政治运动存在，而不转为政党。当人们问及他的身体状况时，他说：“我的健康状况足以使我担任领导职务。”^①

^① 美联社维尔纽斯1990年3月11日电。

二、组织类型——政治压力集团

当非正式的群众性社会团体作为苏联政治体制的外部政治性组织不断发展膨胀并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的“民主化”氛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开始考虑在苏联政治体制内部(尤其是苏联共产党内部)能不能也培育和发展出类似的派别团体以相互竞争促进党内民主呢?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想法在根本上违背了苏联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禁忌:党内不能有派别活动存在。自1921年3月8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以来,按“特殊政纲”组成的派别集团就已经丧失了在内党存在的合法性。^①之所以严厉禁止党内派别存在,就在于它对布尔什维克党具有致命性的政治危害。“我们认为在我们党内不容许有派别存在,因为显而易见,在内党存在着各种有组织的派别,就会使统一的党分裂成一些平行的组织,就会在国内形成一个或几个新党的萌芽和细胞,也就是说,会瓦解无产阶级专政。”^②当戈尔巴乔夫希望效仿列宁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的政治派别而来改造已经成为官僚权力集团的苏联共产党时,他没有想到过的就是:戈尔巴乔夫不是列宁!更何况,恰恰就是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面对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受到工农群众极大不满情况下作出的这一决定。因此,当戈尔巴乔夫打着向列宁学习并恢复列宁主义传统的旗号时,允许党内政治派别存在的做法实际上正式开启了苏联共产党内部瓦解的进程。

^① 《关于党的统一》决议规定: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任何派别活动;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5页。

^② [苏]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3页。

1. 政治改革、政治派别与苏共党内的民主运动

不过,戈尔巴乔夫在采取行动时却保持了足够的谨慎态度。为了减少党内敌意,戈尔巴乔夫决定采取迂回战略,在高举列宁旗帜的同时却不断阐释着自己改造党的思想。戈尔巴乔夫认为,列宁在苏维埃政权遭遇到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持开展党内讨论,听取党内不同意见,这是布尔什维克能够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重要原因。“至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七大至十大的速记记录时,曾经大为赞叹。尽管当时面对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陷入绝境,执政党却并不害怕辩论,并不认为可以限制发表意见、言论、批评的自由。我的心中形成一种印象:列宁有意地鼓励‘敞开’党内的意见分歧,至少在初期确是如此。”^①

把列宁当作自己的政治护身符,这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头几年用来对付党内反对力量惯用的政治伎俩。或者说,这也是一种政治传统:表示对苏维埃政权创立者的敬仰以及对他的思想和事业的无限忠诚。不管怎么说,戈尔巴乔夫的策略成功了,至少在他开始打破“党内不容许有政治派别”的组织铁律的时候,党内反抗力量虽然有,但却并不影响大局。于是,戈尔巴乔夫决定进一步采取行动。

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会见新闻界代表时正式阐述了自己对与反对派相互关系的理解:“无论在党内或者在国家机关中,都存在着许多由于没有反对派和不同意见造成的思想和行动停滞、守旧、错误和失误。现在,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我们的新闻界可以成为这种独特的反对派。”这大概是戈尔巴乔夫有别于安德罗波夫的主要方面——戈尔巴乔夫接受了有反对派的思想,认为反对派是不可避免的。“他相信自己的力量,所以不怕反对派。集权主义的传统就这样被中断了。”^②

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②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15~516页。

他说：“我国社会从历史上形成了这样的情况：党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反映在国家生活中。我国没有正式的反党派。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就负有更大的责任。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工作中的集体领导原则，扩大党内的公开性，是自己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中央委员会要求那些被选到领导岗位上来的人要谦虚、正派、诚实，不容忍奉承、拍马。党内不能有不受批评的人，同样也不能有没有批评权利的人。”^①

1988年，戈尔巴乔夫找到了能够使苏共“顺产”出政治派别的方法——选举。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差额选举能够打破党组织的垄断行为，使候选人能够直接对党内“选民”负责，反映基层党员群众的真实愿望，从而破除苏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体现多种多样的社会利益的社会团体迅速增加”是改革的“显著特点”，“总的说来，这是人民的首倡精神的出色表现，它值得大力支持”。戈尔巴乔夫说：“一旦我们给发扬党内民主进程创造了条件，党内立刻出现了许多运动和纲领派。”^②

戈尔巴乔夫把政治派别的存在作为苏共党内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在他看来，“在我国历史形成的一党制的条件下，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一种经常起作用的自由对话、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价的机制是一个极其有意义的问题”^③。不过，当党内政治派别开始形成并正式发挥其作用时，戈尔巴乔夫预想的党内和平、民主、理性的对话氛围并没有形成。相反，在权力的诱惑下，政治派别在组织上存在的潜在分裂可能迅速蔓延腐蚀到苏共内部，统一完整的苏联共产党开始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争斗中陷入政治瘫痪。

苏共的瓦解开始了！

2. “跨地区议员团”：政治反对派——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结合

1989年5月25日—6月9日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苏联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51页。

②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③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47页。

政治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转折意义。“它在有限的几个星期内使全国政治化,此前并不存在名副其实的政治家,有的是机关内部的党的阴谋家,并不触动社会。现在出现的政治,是社会利益碰撞的表现。”^①代表大会对苏联的现有的政治格局提出了挑战,苏联共产党对代表大会的控制能力明显减弱。“对相当多的代表而言,政治自决权仍然是一个公开的问题——他们没有自己坚定的立场。辩论过程本身及其尖锐性,经常推翻老广场对每天制定的计划。有时连主持会议的戈尔巴乔夫几乎都失去了对会场的控制。”^②

代表大会最为突出的影响则在于它为新的政治力量的重组提供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为以知识分子为主要代表的“民主人士”的华丽转身提供了政治舞台,为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曾经的苏共高层领导人的政治独立提供了历史机遇,为以加夫里尔·波波夫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与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政治精英的结合提供了政治化合剂。“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现代史的分界线。会上真正‘打破’了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出现了合法的反对派。民主运动得到了强大的发展动力。”^③

从知识精英的角度来看,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作为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政策的积极拥护者,他们提出了关于改革的各种各样思想、口号和目标。尽管他们之间的主张有分歧和矛盾之处,但这并不足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泛化的“民主派”而存在。他们意识到了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但却对改革的未来发展目标缺乏宏观和微观的设想。“当时,民主尚未作为政治运动形成。它充其量只是政治思维和行动的形象,而民主派本身是一批思维方式相同、对前不久发生的事件观点相似的人士。他们对宣布进行改革感到高兴,但对改革的进程感到失望,对现状极端不满,要求决定性的变革。但对这些未来变革的轮廓却含糊不清。”^④

不过,叶利钦的出现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却使知识精英的政治主张有了可靠的政治依托人。自从1987年10月全会上遭遇政治打击之后,叶利钦的政治生命因其政治形象的改变而很快有了新的转机。从作为

① [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41页。

② 同上,第42页。

③④ 同上,第46页。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党的官僚”形象，在激进媒体的包装下迅速成为社会大众心中的反对特权的“政治斗士”和人民的利益代言人。然而对叶利钦来说，如果要想彻底摆脱党内反对势力对他的政治压制，那么他就必须寻找新的政治力量的支持。于是，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结合就有了共同的利益需求。

对知识精英来说，叶利钦的政治作用体现在他已经开始形成的政治形象。在莫斯科知识界中，第一个欣赏叶利钦的是莫斯科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1987年10月全会发生叶利钦事件后，波波夫在谈及叶利钦被解职的教训时指出：

改革像一切新生的，从未经历过的事物一样，会给我们以教训。鲍·叶利钦被解除莫斯科党组织领导职务就是其中的一个教训。这是一个痛苦的，但却是大有教益的教训。

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已有两年半的历史。它已经历了发展的第一阶段，进入了第二个，也许是最困难的阶段。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团结一切力量，动员解决主要任务。然而很清楚，这一重要性虽已被党的领导核心所理解，但尚未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见解。否则，叶利钦就不会企图将自己的“特殊立场”置于中央全会之上。应该承认，类似的立场是有其拥护者的。可能他们甚至会真诚地自认为是改革的捍卫者呢！但捍卫什么？问题就在于此。他们认为，改革的问题不在于进行顽强而又细致的、经常的劳动来使社会得到革新，而仅仅在于干部更迭。这种路线和观念是过去遗留下来的种种机关万能的信念的产物，认为能够用骑兵式的袭击来解决所有问题。

当生活已经证明，如今问题已不在于更换船员，而在于改造战船本身时；当已弄清楚，现在需要的是多年的艰苦的劳动，需要高深的学问，需要善于在民主的条件下工作时，有人就会产生一种惊慌的情绪，提出一些冒险主义的建议，并开始不惜一切代价来吓唬别人。

可以说，不管这些人的个人意图多么真诚，他们除了在复杂的任务

面前张惶失措外,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①

虽然在文中波波夫对叶利钦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但似乎更多的是对叶利钦的惋惜。1987年12月16日,波波夫又对叶利钦事件阐释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叶利钦的过失在于,他两年前掌管首都最高权位后,采取了“独裁的、保守的先锋派主义”的姿态。说他是独裁的,是因为他宣称改革的主动力量是领导人而不是群众;说他是先锋派主义者,是因为他虽是改革的激烈支持者,却想凭几个飞跃来实现目标,把堆积如山的严重问题需要通过一天又一天的艰苦卓绝的劳动来逐步解决这一客观现实置之脑后;说他是保守的,是因为这种方法不仅不能带来硕果,反而会败坏改革的信誉。波波夫指出:“叶利钦在推进改革时操之过急,脱离了现实基础,结果帮了反对改革的人的忙。现在,那些批评叶利钦的人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戈尔巴乔夫。”^②

在知识精英看来,叶利钦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的人。持这种观点的并不仅仅是波波夫一人而已。事实上,在整个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知识界中,这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回忆说:“在首都和彼得堡的知识界任何时候也没有为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感到振奋。我自己也曾长时间认为,叶利钦是戈尔巴乔夫的挚友之一,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有人指使干的。或者,最起码是由政治游戏决定的:戈尔巴乔夫不过是从策略上考虑暂时牺牲一下叶利钦而已。当时我同这两个人还不相识,还没有看到实际的力量、偏见和激情的对比,我曾自信我懂得这种游戏。”^③

不过很快,叶利钦表现出的改革的“佐罗”^④形象及其在普通民众中间的日渐扩大的影响力让知识精英开始重新审视。知识精英把叶利钦“当作一个有利力的同盟者、意志坚强的人和在一艘被称为‘苏共’的船只上不惧怕造反的人。他们打算在与党的斗争中,利用他的战士品质。为了推翻‘极权主义的墙’,必须有一个冲撞。他们首先看中他是制度的破坏者,但十分怀疑他

① [苏]加夫里尔·波波夫:《吸取教训》,《莫斯科新闻》,1987年11月18日。

② 路透社莫斯科1987年12月16日电。

③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89页。

④ [法]贝尔纳·勒孔特:《叶利钦:一位圣人》,《快报》,1989年4月7日。

有能力解决与建设民主社会有关的创造性任务”^①。叶利钦逐渐被知识精英所接纳。于是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就问加夫里尔·波波夫:“为什么民主派决定让叶利钦做他们的领路人,他们在他那儿找到了什么?”波波夫的回答是:“人民喜欢。他勇敢、顽强地砍伐着现行制度。”沙赫纳扎罗夫反驳说:“可是他的智力潜力并不很大。”波波夫自得地说:“他也不用特别为难自己,那是我们的事。”^②

对叶利钦来说,与民主派接近并获取其对自己的政治支持也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在首次人代会开始,民主派就像是某种‘政治名士’,尽管非常鲜明和轰动,但没有任何重大政治影响。但是,叶利钦从这个尚未定型的民主运动中,看到它的巨大的政治潜力。”^③尽管与知识分子的相处过程并不是令人很满意,但是叶利钦也发现了自己的政治优势。在跨地区议员团的会议上,叶利钦对与会的知识分子说:“你们会互相交谈,会和外国人交谈,但是和工人交谈,你们就力不从心了……”^④

于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在共同目标的驱动下走到了一起。

1989年6月12日,叶利钦向外界宣告,他正在组建进步议员团。

1989年7月19日,叶利钦向最高苏维埃通报说,旨在组织一个“跨地区代表团”的协调机构已经建立,计划月末召开成立大会。地区间小组^⑤的目标是要“加速改革的进程”,并将为实现这个加速采取更加果断一致的步骤。叶利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反对”这个词,但他却明确了这个在最高苏维埃

① [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②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

③ [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④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⑤ 马特洛克分析:尽管改革派没有能够主导新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所属机构最高苏维埃,但他们并非无足轻重的少数……由于这些代表思路清晰、目的明确,再加上电视的转播,他们虽人数不多,却往往能在公开场合制造出轰动效应。然而,他们的数量毕竟有限,除非戈尔巴乔夫支持他们的立场,帮助他们拉选票,不然他们还是很难施加有效的影响。很明显,他们需要一个组织来协调他们的政治行动,但他们大多仍是共产党员,而党章又规定禁止搞宗派主义。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称他们的组织为“小组”,而不是“宗派”或绝对禁止的对象“政党”。——《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58页。

里属于少数派的小组将要发挥的作用:将作为一个反对派为立法机构起草供其选择的建议。

1989年7月29—30日,跨地区议员团在莫斯科电影之家召开成立大会。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经济学家加夫里尔·波波夫、塔尔图大学的维克多·帕尔姆、安德烈·萨哈罗夫和鲍里斯·叶利钦当选该议员团的主席。跨地区议员团的成立,有着深远的政治影响。“在苏维埃政权年代,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首次出现了反对派的机构,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谁也不怀疑它就是反对派。跨地区议员团宣布的目的和任务,不仅不符合传统的正常规矩,而且与此相反,还要推翻它。民主派的代表们要求承认私有制,公开提出拥护政治多元化和反对苏共的垄断地位,主张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和权力分散。”^①于是“我们国家合法的反对派组织就正式形成了”^②,并且“获得了不止一个共和国的支持。它使自己合法化的方法是将自身定性为一个支持改革的组织,这也是此后各共和国民族阵线所使用的方法”^③。

然而,戈尔巴乔夫最初并没有发现跨地区议员团所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在1989年8月4日的最高苏维埃工作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对跨地区议员团提出了批评。他说:

实际上,这意味着试图对在社会发展问题上观点和态度上的自然差别赋予某种组织形式的一种尝试。跨地区小组中的某些同志自称是左派激进分子。能够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其他人就应当认为或者甚至宣布自己是中派分子或者右派分子了?从这种做法中能给事业带来什么好处呢?

在跨地区小组里已经开展的讨论中,如果不去注意该小组某些成员的挑衅性口号,尤其是在举行集会时喊出的口号的话,他们也没有提

① [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②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319页。

③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59~260页。

出最高苏维埃讲台上不能提出的任何意见。如果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如果大家都认为自己的崇高义务是使国家摆脱危机,走上改革道路,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革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发挥这种制度的潜力,那就应当团结起来,而不是彼此划清界限。应当沿着团结各种力量和加强彼此信任的道路前进。这一点也不否认坚持原则性观点的可能性。最高苏维埃已经进行的几天工作明显地表明,意见多元化不会成为一致行动的障碍。^①

即便看到了跨地区议员团成立后带来的政治变化,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参透这种变化后面隐藏的政治玄机。戈尔巴乔夫指出,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参与跨地区集团的,或倾向于这一组织的大多数代表,参加这个组织的会议,却不办理正式加入手续,依然留在苏共内部。除了萨哈罗夫之外,跨地区议员团的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党员:像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所以,执政党内的大多数和议会中的反对派之间的界限就显得很“模糊”了,这也就带来了诸多不便。中央机构和大多数领导成员都未立即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全新的情况下行动,需要重新学习,坚决摒弃以往的游戏规则。某些人还是从“共产党人同非党人士的联盟”的传统观念出发。他们认为,苏共党员在代表中间占压倒多数。既然如此,只需规定严格的党的纪律即可贯彻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议。党中央各部经过短时间酝酿,建议将从各地来到莫斯科的代表召集起来,深入细致地引导并提醒大家:党员的职责就是按中央的指示投票表决。然而,事与愿违。^②

三、组织类型——竞争性政党组织

如果说以跨地区议员团为代表的政治团体还只是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① 塔斯社莫斯科 1989 年 8 月 4 日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04 页。

内部扮演了西方议会党团的性质,那么随着1990年的到来和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取消,越来越多的民主运动派别纷纷从半公开走向公开,从半合法走向合法。多如牛毛般的各种类型的政党成立及其在选举运动中的大肆活动,剧烈地冲击着曾经坚如磐石的苏联政治体制。

1. 一党制的废止与多党竞争的政治局面

当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民主化”的时候,本身就暗含着政治多元化的发展逻辑及其背后可能发生的政治后果——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事实上,在1989年的人民代表选举运动中,正是“取消宪法第六条”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政治主张把民主派团结起来,并最终形成了跨地区议员团的政治反对派组织。

进入1990年以后,“取消宪法第六条”成为经常性的群众大型集会游行的主要口号。据统计,在1990年的头两个月苏联国内就举行了约一千五百次集会,参加者达650万人次。群众性集会中显露出来的敌对的政治情绪对苏共中央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压力。据当时在苏共中央工作的鲍里斯·费奥多罗夫回忆:“1990年春天,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害怕示威群众会捣毁属于党中央的住房,把家人都搬到亲戚家去住。在苏共中央的楼群里总有专门的警卫人员执勤。”^①

为了应对危急的政治局势,戈尔巴乔夫认为实行总统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在1990年3月12日召开的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的主张在大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后获准通过。不过,作为设立总统职务的利益交换,戈尔巴乔夫必须满足他在代表大会中的临时盟友——跨地区议员团——的要求:修改宪法第六条。在苏共党内的反对压力下,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政治妥协。“这就是说,在利益交换的前提下可能达成妥协。确实也这么办了——对宪法进行了某些必要的修改,其中包括取消臭名昭著的第六条。作为回报,跨地区议员团支持了戈尔巴乔夫。”^②

^①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13页。

^② [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52~53页。

对宪法第六条的修改,在政治上使多党制成为合法存在。^① 苏联开始进入多党竞争的政治多元化时代!

2. “民主俄罗斯”:走向联合的政治反对派运动

1990年春季举行的地方权力机构的选举,对叶利钦及其政治盟友——民主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考验,也是一次巨大的政治机遇。

虽然叶利钦成功入选苏联最高苏维埃,并且获得了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职位。但是,这一形同鸡肋的职位使叶利钦在最高苏维埃处于绝对无权的地位。“他只能在群众集会上演讲,但是没有采取什么行动的可能。”^②这种政治局面是叶利钦和他的政治盟友所不愿看到的。于是,竞选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进而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就成为叶利钦的政治目标。

1990年1月,叶利钦与助手列·苏哈诺夫和联盟代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根·布尔布利斯前往自己的故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开展选举活动。叶利钦敢于讲话的精神,对问题的评价采取的不妥协立场,尤其是他关于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一样享有主权的主张立即引起了选民的极大兴趣。当然,在竞选活动中以反对派政治家身份出现的叶利钦,也立即引起了其他选区选民的注意。

政治形势的发展,使得叶利钦自然而然地充当了所有民主力量非正式领袖的角色。“几乎自称是民主分子的所有候选人,都得经过叶利钦的支持才能决定自己的立场。他也成了选民最正确无误的定位器。”^③1990年2月中旬,持有民主观点的代表候选人见面了。他们联合成立了“民主俄罗斯”集团。叶利钦签字表示支持这些候选人,这在当时对选民来说是分量最重和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民主俄罗斯”获得了28%的选票。^④与此同时,在莫斯科、

① 注:1990年10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规定所有政党和组织一律平等,从而为多党制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②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14页。

③ [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④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

列宁格勒和许多大的工业中心,大多数是自称为民主运动的支持者获胜。

按照预先设计的政治方案,在取得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的资格后,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争取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当时的形势分析表明,俄罗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力量分布大体如下:“40%是保守派,主要是党的官员、农庄主席、自治地区的代表、企业的经理和军官;还有40%是民主派及其同情分子,‘苏共民主纲领派’的支持者;最后是20%的‘沼泽地’,其代表和票数应当最终决定当时共和国最高职务的人物——最高苏维埃主席选举的命运。”^①

为了保障叶利钦在人代会上获胜,“民主俄罗斯”成立了由A.索比亚宁、尤·雷日科夫、Л.波诺马廖夫、С.克拉萨夫瑟科、根·布尔布里斯、谢·沙赫赖等组成的分析小组。在列宁格勒成立了支持叶利钦的选举委员会。根据委员会的倡议,1990年5月7日在距列宁格勒160千米的普里奥焦尔斯克举行了叶利钦支持者的会晤。来自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雅罗斯拉夫尔和卡累利阿等州的代表,共同讨论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候选人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提纲和竞选这一职务的策略。

1990年5月16日—6月22日,在长达一个多月的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为了应对来自苏共中央的压力——不许叶利钦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民主俄罗斯”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

第一步策略,选择将动摇不定的代表逐步“拉到”自己方面的策略。在最开始的讨论阶段,当代表们甚至就连最非原则的问题也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民主俄罗斯”决定不让叶利钦发言。目的是“让他不要在小事上分散精力,只在提名领导职务的候选人才发言”^②。事实上,这一策略是相对比较成功的。因为“党的宣传企图强加于他的那个讨厌的恶魔形象,与他本人形成强烈的反差——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是一位全神贯注、处事谨慎、心地善良的人,他态度平静、信心十足”^③。

第二步策略,组织群众游行集会,对代表们施加舆论压力。应该说,此时的叶利钦俨然成为社会普通大众的政治代言人。为了支持他,人们经常举行

① [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②③ 同上,第63页。

群众集会。人代会弄得越长,社会舆论就越使代表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第三策略,也是最为关键的策略,叶利钦的发言必须准确把握代表们的政治心理。面对苏共中央推选出来的竞争对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叶利钦明确阐述了自己使俄罗斯摆脱危机的观点。他主张进行根本的宪法改革,理解与不同的政治力量对话的意义,承诺在原则性的基础上,在不损害俄罗斯主权和利益的前提下与苏联总统和政府保持工作关系和对话。叶利钦反复强调:“俄罗斯应当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平等地成为苏联的成员。”^①不过,在与波洛兹科夫的两轮较量中,叶利钦仍然没有占据明确的优势。结果,不得不进行第三轮的投票。就在这时,叶利钦的竞争对手换成了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 A. 弗拉索夫。苏共中央的临时换将,大大激怒了会场上的代表们,使先前摇摆不定的代表们坚定了对叶利钦的支持。最后,弗拉索夫还是失败了。“民主派仍然把他当作党的机关安插的人。许多‘左派’代表也不支持这一候选人。现在,连激进的共产党员也感到不满了。‘沼泽地’也对阴谋感到讨厌,投票表示反对。”^②而就在第三轮投票的关键时刻,将叶利钦的《我的自白》一书赠送给与会的代表们。于是,“对候选人的辩论在翻他的书页的沙沙声中结束。也许由于这本书帮助了某些代表最终决定了自己的立场”^③。1990年5月30日,叶利钦以535票赢得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胜利。

“民主俄罗斯”运动作为反对党的政治大集合,迅速在苏联政治生活中掀起了政治狂飙,引起了苏共的极大震惊,并开始寻求在组织上的扶持与之相对的政治团体。

1990年11月17日,列宁格勒州市委书记别洛夫在俄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发言指出:

改革进入了死胡同。社会紧张气氛演变成仇恨,内战威胁加剧。

“更多的民主、更多的社会主义”这一口号使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

同一切反对派和睦的思想是幻想,同那些拼命夺权以实现反革命

①② [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③ 同上,第65~66页。

政变的势力无法和睦。

如俄共不认识面临的危险,不为维护苏维埃制度而斗争,必将同立陶宛已发生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正发生的那样,和平复辟以法西斯统治方式出现的资本主义。

俄共应向俄罗斯共产党人和人民发出呼吁:社会主义祖国在危险中!

必须要求苏联总统履行其作为党员和公民的义务:立即采取行动维护苏联宪法。苏联和苏共领导奉行的妥协、讨好自由派的政策,是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建议一切珍惜苏维埃祖国的公民结成“苏维埃俄罗斯”运动,以对付“民主俄罗斯”。^①

1991年1月31日,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更是直接斥责“民主俄罗斯”正在从事着摧毁国家制度的“影子政治”。他说:

在评价当前形势时,应从下列情况出发,近两年来一直在进行的那场有计划的、经过周密思考的、按照认真制订的方案展开的隐蔽战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场战争看上去是针对共产党的,实际上针对的是我们社会的基本生活结构。社会终于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尽管开始得很缓慢并且非常痛苦。

建立平行的国家结构、将与苏共对立的政治组织联合起来的企图已成为现实。这一切都是在所谓改革受挫和遭到失败的烟幕下进行的。在“民主俄罗斯”运动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政党,这个党有着垂直的组织结构,并且在劳动集体建立有基层组织。1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群众集会说明,与苏共对立的反对派势力是有行动能力的。他们在这次集会上明确宣称:公开反对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使中央政

^① [苏]《苏维埃俄罗斯报》,1990年11月17日。

权窒息以及抛弃社会主义选择的时机已经来到了。绝大部分标语和口号都带有明显的反对总统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性质。他们把赌注压在叶利钦这个中心政治人物身上。

问题不仅是“影子经济”对生活产生现实影响,而且还出现了“影子政治”。一批称之为反对派的“智囊”的跨地区议员团的领导人在制定其战略构想。“民主俄罗斯”通过建立莫斯科——列宁格勒——俄罗斯大城市坚强的轴心来加强自己的阵地。俄罗斯联邦议会在此起着凝聚的作用,该议会领导人正在各共和国之间加紧签订双边协议并在积极倡议成立所谓主权国家大家庭。他们企图将中央现领导的权力据为己有,这里所指的是成立共和国的军队和使执法机关脱离中央领导。在党和社会政治制度受到密集炮火袭击的情况下,当我们的敌人在不择手段地行动,而且不愿为公民和睦作出理智的妥协时,苏联共产党除了号召进行政治斗争外,别无其他出路。^①

面对来自苏共中央的政治压力,“民主俄罗斯”却以社会舆论为后盾,积极联合政治上的反对派力量,在即将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为叶利钦谋求更大的政治权利。1991年6月12日,在俄罗斯联邦总统的选举过程中,“民主俄罗斯”故技重施,再一次帮助叶利钦成功当选俄罗斯历史上首位总统。塔斯社在分析叶利钦获胜原因时就指出:

鲍里斯·叶利钦的胜利并不出乎预料,尽管他的许多反对者明显希望至少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就这样,苏联这个拥有1.48亿人口的最大的共和国拥有了自己历史上的第一个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为什么能取胜?这对俄罗斯和整个苏联的局势会产生什么影响?

叶利钦在执行自己的政策时依靠的是作为苏共反对派的“民主俄罗斯”运动的支持。当然,叶利钦对于大部分投票赞成他的人来说,仍然是与中央和共产党对抗的象征。但是,有不少人这次投他的票正是

^① [苏]《真理报》1991年2月4日。

因为社会上相对立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抗有所缓和,以及俄罗斯和中央之间的对抗有所缓和。叶利钦选择共产党员改革家亚历山大·鲁茨基作为自己的副总统人选这一点就是他的新的社会合作路线的很好证明。^①

随着政治形势的急剧转变,当“民主俄罗斯”的斗争目标——苏联共产党——在“八一九”事变以后彻底退出苏联政治舞台以后,“民主俄罗斯”与叶利钦的政治蜜月关系也迅速消逝。关于国家发展的政治理念、政治目标 and 政治走向的差别,使得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走向自我解散的政治结局。1991年11月10日,在“民主俄罗斯”运动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俄罗斯民主党领导发言人伊利娅·罗伊特曼宣布:加入联盟的俄罗斯民主党、人民自由党和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三党退出“民主俄罗斯”并成立“俄罗斯民主力量联盟”^②。

事实上,早在加夫里尔·波波夫促进叶利钦与知识精英的结合时,双方之间都没有把对方视为“自己人”的政治觉悟。当沙赫纳扎罗夫问:“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如果他像俗话说的那样,决定走自己的路呢?”波波夫以寻常的方式轻轻地笑着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他扔下去,我们大家都在这儿嘛。”^③看来,彼此接近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其中的过失不仅在叶利钦,还在他的跨地区议员团的同行。他们许多人在1992—1993年,在不受欢迎的改革的困难阶段悲观失望,匆忙离开了现实的政治任务,重新回到他们接近的擅长袖手旁观的批评者角色。他们愿意停留在80年代末期的幻想的民主世界,也许因为在那里保留着某些重要的民主价值观,但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始终没有扎下根。”^④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6月14日电。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11月10日电。

③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

④ [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第四章 社会民主运动的活动方式

戈尔巴乔夫时期社会民主运动的活动方式是一个复杂演变的过程。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社会民主运动的活动方式大体经历了从“公开性”提倡初期以言论批评为主要特征的舆论准备阶段,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逐渐走向以示威游行集会等为主要特征的街头政治阶段,最后演进至政治反对派谋求国家政治权力的政治夺权阶段。从社会民主运动的组织化程度来看,其活动方式经历了初期以少数民族群体或持不同政见者或社会不满现状者组织的群体性抗议示威活动的自发阶段,进一步演变成为政治反对派为谋求社会民众支持以扩大政治影响的有组织的社会反抗行动。总体而言,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在反对苏联共产党统治的统一政治目标下,采取了形式多样的组织活动方式,裹挟着社会大众的“民意”,在社会各个领域掀起了狂热的政治浪潮,持续性地对苏共发起了政治攻击。一系列有组织的行动,使苏共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最终在人民的冷漠之中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一、活动方式——集会游行

集会游行是社会民主运动最为常见的活动方式,也是最适合改革困难时期苏联社会普通民众因对社会现状不满而导致的情绪失控的群体性行为方式。“社会大气候是否已成熟得让群众运动萌芽,最可靠的指标莫过于是否有一股浓厚的烦闷气氛弥漫……当一个群众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它得自烦闷者的同情和支持,往往要多于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对一个蓄意煽动

群众运动的人来说,得知全民都有烦闷无聊之感,会比得知全民都饱受经济和政治剥削,更加感到鼓舞。”^①

改革不断遭受的严重挫折,使得苏联社会弥漫着痛苦、失望、愤懑的负面消极情绪。这一切都为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游行示威活动提供了天然的社会土壤。据雷日科夫观察: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他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许多团体的形成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环境保护,有的从事古迹保护,等等。杂牌军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同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和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了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②

1. 改革时期的集会游行:法律的约束与失控

为了规范愈演愈烈的集会游行,保证社会正常秩序的运转,联盟中央作了最大的努力。

1988年7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关于在苏联组织和举行集会和街头游行示威的规定》。规定指出,举行集会和游行要向相应的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递交申请书,参加者不得携带武器和损害健康和造成物质损失的工具。文件规定:凡参加未经批准的示威活动或集会者将罚款300卢布以下,一年内重犯,则罚款1千卢布以下,劳动教养2个月以下或拘留15天;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再次被捕后,将被监禁或劳改1年以下,或罚款2千卢布以下。

1988年10月31日,苏联司法部长克拉夫佐夫同塔斯社记者谈话时

^① [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②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9~10页。

说：“旨在进一步使我国的法律人道化的法治改革，是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的组成部分。例如，打算大大缩小同孤立于社会之外的行为有关的惩罚范围，对未成年人减轻处罚，大大限制死刑的使用。”克拉夫佐夫坚定地说：“根据学者和专家的意见，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90条（散布明知是捏造地诋毁苏维埃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谎言），应完全取消。大概将要这样做了。至于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0条（反苏鼓动和宣传）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刑法典的有关条款，我认为，这一条将会有重大修改。在我们这里不会因持不同政见而受到审判，但受到审判的只是由于比如说在号召推翻政权和政府方面表现出来的具体行动。”克拉夫佐夫说：“还有另一个问题。苏联的现行法律只是为了家庭团聚才允许苏联公民离开苏联。现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标准文件，这一文件将开始解决离开苏联和进入我国的问题。我想强调指出，这一文件将完全符合关于公民权和政治权的国际公约第12条。但就是目前现行制度也大大简化了苏联公民出入苏联的手续。获准离开我国的人数最近大大增加了。仅在今年的前9个月里，离开苏联的就有65764人。”^①

1989年4月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对苏联《追究国事罪刑事责任法》以及苏联其他一些立法文件进行修改和补充”的命令。命令规定，公开煽动破坏和推翻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以及出版或散发具有此类内容的材料者，判处3年以内徒刑或2000卢布以内的罚款。有组织地结伙或利用大规模印刷手段重新实施上述行为者，判处7年以内徒刑或5000卢布以内的罚款。接受国外组织任务实施上述行为者，判处3—10年徒刑。蓄意实施挑动民族或种族仇视或因种族和民族不同限制公民权利的行为者，判处3年以内徒刑或2000卢布以内的罚款。以暴力和欺骗手段以及公职人员实施上述行为，判处5年以内徒刑或5000卢布以内的罚款。结伙犯罪或造成严重后果者，判处10年以内徒刑。煽动背叛祖国、制造恐怖或破坏行动者，判处3年以内徒刑或2000卢布以内的罚款。

一系列法律的出台，并没有改变已经陷入政治狂欢的苏联社会。在戈尔巴乔夫有意无意的纵容下，支持变革的人把公开示威游行当成反对现政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88年10月31日电。

权的一种有效武器。据统计,在1988年,苏联170个城市和居民点共发生2600次大规模行动,参加人数达一千六百万人。1989年全苏共发生5300次群众性集会,有1260万人参加。1990年初到2月25日的近两个月内,全苏共举行一千五百余次集会,有700万人参加。作为首都,莫斯科爆发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比其他城市都多。1988年1—6月就有246次,而1990年1—10月更有约八百次。这些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口号也越来越反动。例如,1989年11月7日,有5000人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1990年2月4日,有2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要求苏共中央政治局辞职和实行多党制;2月25日,有20人举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示威游行;5月1日,有3万人举行反政府示威,高呼反动口号;7月15日,有5万人举行反对苏共的示威游行;9月6日,有数万人举行游行集会,支持“民主派”代表人物叶利钦的市场经济纲领;1991年3月10日,有30万人集会,表示支持叶利钦,等等。^①

面对社会上的乱象,苏共党内强硬派开始主张采取管制措施。“1990年,当旧制度遭到无情攻击的时候,苏共、克格勃和军队中的强硬派开始怀念过去只允许官方组织游行的日子。”^②但是,苏联内务部部长瓦季姆·巴卡金一直拒绝采取禁止和平示威游行的强硬措施。巴卡金认为:“从1990年底到1991年8月,采取了一些徒然的和毫无意义的措施,企图镇压、恐吓还十分脆弱的民主政治的萌芽。1月是维尔纽斯。2月是戈尔巴乔夫在明斯克的讲话。3月里干的蠢事,是出动装甲运兵车、手持塑料盾牌、头戴塑料头盔的部队,向俄罗斯代表大会的代表示威。6月里是部长们对联盟议员的恐吓。最后达到了顶点——8月闹剧,从而导致这一政策破产,连苏维埃制度的政治和思想柱石——苏共,也与之一同崩溃了。因为没有苏共,我们的党已经不可能存在,所以它也就垮台了。强制的反动政策遭到了失败。”^③

不过,示威游行之所以能够受到保护而不至于发生军队介入从而造成

① 王正泉:《戈尔巴乔夫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9~50页。

②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579页。

③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前言,第3页。

流血事件,最终还是由戈尔巴乔夫来决定的。戈尔巴乔夫认为:“利用武装力量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政治家,不仅不该受到支持,而且应当受到诅咒。军队应当用于它的直接使命。指望动用坦克的政治是达不到目的的。此路不通……”^①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放任甚至是纵容,使得苏联公民正常的集会游行权利被迅速政治扩大化,示威游行反对现政权的性质更是愈演愈烈。

1990年2月17日,《真理报》发表评论指出:

国家正在经历一个不同寻常的、矛盾的时期。社会深层急躁的岩浆日益沸腾,大有喷发四溅的危险。

每个人都会看到这些结论的证据——消费市场的不平衡和族际冲突,国家基本秩序和责任感的减弱。也许,读者对内务部关于杜尚别事件的最新通报中的这个刺眼的词组尚不熟悉:“屠杀欧洲民族的人……”

国家正处于决定性关头。人们希望过正常人的生活,主张稳定局势。他们希望有一个能保证人身安全的社会秩序。

遗憾的是,这种危险近来表现得愈来愈明显。有人不顾本来就很紧张的经济状况,仍呼吁进行罢工——看来,他们的根本原则是:“越糟越好”。

许多集会和游行往往变成极端主义独特的合法化形式,在其他口号中往往还出现破坏性的呼吁。同时,在同“官僚机构”作斗争中“爬上来”的人现在也公开企图建立自己的机构并借此夺取政权。在2月2日至4日莫斯科游行的前夕,恰好在维尔纽斯举行了“民主组织跨地区协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在会议的纲领性报告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意见。在最近的将来就应提出政权问题——建立联合政府。所谓的“社会主义党”的一个组织者已向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宣称:“我们的立场是:不同苏共一起搞多元化,而是取代苏共搞多元化。”^②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56页。

^② [苏]《真理报》1990年2月17日。

2. “波罗的海之路”：歌声、鲜花、手拉手的游行队伍

通过组织群众性示威游行集会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这是社会民主运动期间的惯常做法。不过，最为典型的还是波罗的海三国。甚至可以说，作为游离于苏联政治核心外围的波罗的海三国政治反对派，之所以能够与联盟中央相对抗而不妥协，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挟持了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意，往往以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来对抗联盟中央的政治压力，最终迫使联盟中央作出政治退让。

1987年8月23日，正值1941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字纪念日，波罗的海三国的反对派组织了抗议游行活动，“以试探一下公开性的容忍度”^①。在爱沙尼亚，由一小批反苏人士组织策划的集会在首都塔林市中心鹿园举行。在集会组织者的带领下，参加集会的社会群众向爱沙尼亚民族史诗《卡列维波艾格》中非凡的英雄人物的遗孀琳达塑像献了花，以此歪曲和诬蔑爱沙尼亚人民的革命历史、苏联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同日，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也发生了类似的集会活动。在里加市中心刻有“献给祖国和自由”字样的纪念碑附近，一个“赫尔辛基-86”人权团体举行集会并提出了民族主义口号。他们认为苏德条约不是苏联在法西斯主义威胁面前对本国人民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安全的关怀，而是“奴役”拉脱维亚人的开始。^② 在立陶宛也举行了抗议游行活动。对于波罗的海三国此次的抗议行动，“莫斯科没有进行过过分干预。一年后，示威游行的队伍就扩大到了几万人的规模”^③。

进入1988年以后，波罗的海三国的群众性示威游行活动变得更加有组织。1月，爱沙尼亚知识分子为民族独立小组起草了今后三年支配其政治辩论舞台的行动方案。其内容包括：恢复爱沙尼亚被苏联吞并的“历史真相”、公布镇压爱沙尼亚人的种种行径、恢复爱沙尼亚民族语言和爱沙尼亚民族在共和国中的“主导地位”、保护环境、以自由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保证国际普遍认同的人权、只在爱沙尼亚境内服兵役、多名候选人竞选、重新在

^{①③}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96页。

^② 塔斯社里加1987年8月23日电。

海外设立爱沙尼亚外交机构、把爱沙尼亚原来的独立日作为国庆日,等等。行动方案表明:尽管计划的起草人愿意“在现行体制下维护爱沙尼亚人的利益,其活动所起的作用相当于爱沙尼亚共产党的一个民族反对党”^①。4月,爱沙尼亚人建立了“支持改革民族(或人民)阵线”,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已拥有4万名成员。7月,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也成立了相关组织。10月,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反对派力量举行了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并以爱沙尼亚1月行动计划为蓝本通过了政治行动方案。

随着上述组织的建立,公开的示威游行已不再是偶尔为之,而且成了一种经常性的有组织活动。1988年2月25日,大约四千名群众在塔林参加游行活动,庆祝爱沙尼亚独立七十周年。3月和6月,为纪念曾在放逐与清洗中受到摧残的人们以及追悼因此而惨死的亡灵,波罗的海三国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8月,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周年纪念日,波罗的海三国首都又举行了几万人参加的盛大游行活动。在日益强大的公众压力下,波罗的海三国相继恢复了独立时的国旗和国徽。“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当地共产党本身的支持,那些共产主义强加的禁忌在这些地区接二连三地被打破。”^②

到了1989年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以空前的抗议活动引起世界震惊。“人民阵线”得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合作,发起并组织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游行即“波罗的海之路”。二百多万人响应了号召,手拉手形成人链,不间断地绵延于首都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之间。生活在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差不多有五百万,因此参加者令人震惊地达到了全部波罗的海民族人口的40%。事态的发展令戈尔巴乔夫和莫斯科震惊。莫斯科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警告,认为运动的组织者是要强迫人们接受仇视苏联制度、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的和苏联军队。声称如果不悬崖勒马,将予以严惩。然而,“这种陈词滥调不符合事实,也有悖于逻辑,因为要求独立的游行者正是在行使宪法保障的正当权力。在法制社会——这也是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行使权

^①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96页。

^② 同上,第197页。

力算不得犯罪。……正是中央委员会的威吓和动摇,即使抛开声音中赤裸裸的威胁,其表现出的惊惶失措也是可笑的。苏联共产党这个庞然大物在伴着歌声、鲜花、手拉手的游行队伍面前发抖了”^①。

二、活动方式——操纵舆论

对社会舆论的操纵,是社会民主运动期间民主派人士扩大政治影响、组织政治力量的主要手段。霍弗指出:“企图改造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的人,不可能单靠培养和利用不满情绪成事。单是展示变革的合理性或诉诸强制手段亦不足以为功。他们必须知道怎样在人们心中燃起一个极不切实际的希望,至于这个希望是一个天上的王国、地上的天堂、闻所未闻的财富还是统治世界,都无关宏旨。倘若共产主义者有朝一日能够征服欧洲和大半个世界,那将不是因为他们懂得怎样去煽动不满情绪或仇恨,而是因为他们懂得经营未来。”^②通过对苏联历史的抹黑和对苏联共产党形象的歪曲,民主派用“民主”“自由”“公正”“人权”的概念为社会大众构建了一个未来的生活远景,并成功地煽动起社会大众对苏联共产党的不满和仇视。事实上,“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③。

1. “公开性”与舆论改革

戈尔巴乔夫认为,“公开性”首先要从言论自由开始。他说:“如果认为一切都要来自中央,或者更糟,都要来自一个人或是一批人,那么说不定我们会滑向思想僵化。这将对改革的致命打击,甚至是对整个社会发展的

^①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77~278页。

^② [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30页。

^③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致命打击。苏共历史上有过这方面的教训,而且是惨痛的和令人难过的教训。不能使社会科学界和创作力量在党内只起对某些决议或地位很高的同志的讲话发表评论的作用。”^①要让社会言论自由,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报纸杂志敢于说真话。而要说真话,就必须任命敢于讲真话的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哪些人才是讲真话的人呢?知识分子。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地认为,知识分子热烈支持改革,他们乐意挑起改革的重担。

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这一逻辑发展的结果就是,大批更换主要报纸杂志的主编,以使这个“公开性的最有代表性的和群众性的论坛”能够发出“公民的自信的声音”^②。从上台伊始,这种人事更迭就在不断进行。1985年撤换中央周报《经济报》主编;1986年任命叶戈尔·雅科夫列夫为《莫斯科新闻报》主编;任命维塔利·科罗季奇担任《火花报》主编;任命加夫里尔·波波夫担任主要经济刊物《经济问题》主编。科学院新西伯利亚研究所主要学术刊物《回声》,在戈尔巴乔夫的助手阿甘别季扬院士担任主编后,也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丢掉了自己的传统风格,成了“改革”的喉舌。其他中央报刊也遭到撤换主编、改弦更张的命运,或迟或早,最终都由“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变为“支持”戈尔巴乔夫,这些报刊是:中央机关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苏维埃国家报》《莫斯科新闻报》《计划经济》,等等。^③

不过,1989年10月19日《真理报》总编辑维克托·阿法纳西耶夫被撤换,成为社会舆论集体转向的主要标志。

作为勃列日涅夫时代以来的苏共中央委员,《真理报》总编辑维克托·阿法纳西耶夫一直被认为是对改革持保守态度的主要代表。对戈尔巴乔夫主张放开言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做法,阿法纳西耶夫是赞同的。他说:“我们应当坚决地抛弃那些未经历史经验证实、陈旧、过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条条和原理。另外一些有争议的原理须经反复检验、反复研讨或暂时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53页。

② 同上,第91页。

③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马细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0~151页。

放在一边而不要就此争论不休。而且对持相反看法的人应表现出宽容态度,应当记着:在他们的理论观点中也可能包含着真理。而如果在某些问题上与他们产生争论,那么则应当心平气和、言之有据。遗憾的是,我们许多学者却不掌握辩论的艺术,惧怕这种辩论,因为在几十年为社会主义思想服务的过程中,他们已习惯于为政治决议做注释,并以这些东西为根据推导出绝对真理,不动脑筋地唯命是从。”^①对于在改革初期压制舆论的做法也是深恶痛绝的。他说:“报纸上已开始更大胆地,更彻底地报道缺点了,但也要付出代价。有些地方缺点长期未能消除,肇事者有时可能会受点惊,这是因为为了将批评结果告诉编辑部,从形式上惩罚了他。本来应当把一个人开除出党,可是却只给了个警告,把他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报纸加强批评的方针对各级官员对待批评的态度产生了十分令人奇怪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不满。有人暗中对新闻记者捣蛋,要求出示证明,以证明他为什么来,报道什么事和怎样报道。有些人竟然说某家报纸不听话了,必须对它加以某种特殊控制,等等。另一位首长则盛气凌人,对要他对某家报纸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感到气愤。党不会容忍对报纸采取这种不像样的官老爷的态度。”^②阿法纳西耶夫认为,《真理报》作为苏共中央机关报,它的目标首先是宣传苏共对内对外政策,但对于报纸来说,今天不存在原先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或“不容许”批评的“被禁的”题目、领域和现象。^③

但是,对由此而带来的谩骂和无原则的攻击,阿法纳西耶夫则是坚决反对。他认为:“人没有绝对的自由(想要什么就去偷盗抢劫!),社会中应当有政权、纪律、组织性、法制。换句话说,社会,尤其是经济应当得到合理的管理。管理是任何社会不可缺少的特征,管理越有效,社会就越富裕。”^④对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所造成的社会秩序的混乱,阿法纳西耶夫始终不赞同那种“越乱越好”的观点。他说:“我确信,在破坏现有管理体制之前,起码应在局

① [俄]维·戈·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贾泽林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

② [苏]《新闻记者》,1986年第5期。

③ 塔斯社莫斯科1987年3月2日电。

④ [俄]维·戈·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贾泽林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52~153页。

部上确立起新的、混合性的管理体制,其中能够把市场的和非市场的(行政的)调节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我们的这些改革设计师们则彻底把现有管理体制破坏了,然而却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可行的体制。由此而产生出我的国家现在所处的这种权力真空、无法管理、混乱一团的局面。”^①

1987年3月14日,作为苏联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主席、《真理报》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在莫斯科开幕的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今天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极其准确地反映改革的进程与结果,帮助苏共和国家推行公开性、民主化和加速发展经济的方针。他在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群众对报刊寄予很大的信任,在今天更是如此。报纸和杂志发行量的增长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阿法纳西耶夫在指出苏联报刊的批评作用时说,很难找到哪家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不充当“反派角色”。他认为报刊有时“过火了”,把上面的措施说成是不良行为,甚至是罪行。“苏联报刊的任务不是抨击缺点,而是防止缺点。新闻工作者应当把力量用在帮助形成健康的道德风气上。现在苏联报刊在社会生活的这一领域中远远没有做到它应做的一切。”^②

1988年6月27日,阿法纳西耶夫在第十九次全国党代表会议新闻中心谈到“民主化和公开性是发扬劳动者社会积极性的重要条件”这个题目时说,对已经成熟的问题,我们极力寻求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但是,不言而喻,我们并不拒绝对消极现象的批评。阿法纳西耶夫说:“我们需要批评就像需要空气一样,但批评还远没有充分开展起来。必须经常刊登介绍改革先进经验的文章。”^③

正是秉持着上述立场,《真理报》在阿法纳西耶夫的主持下一直强调舆论与纪律的关系。1989年8月1日,《真理报》在社论中指出:“在发展民主和公开性时期,任何人都不能不要纪律和秩序。以高度的组织性进行实际工作的问题是目前社会的一切健康力量极为关心的问题。当前出现了一些

① [俄]维·戈·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贾泽林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87年3月14日、16日、17日电。

③ 塔斯社莫斯科1988年6月27日电。

人和集团自觉不自觉地破坏劳动秩序,竭力利用全民的改革运动服务于自己的自私目的,妄想把现有困难的一切罪过推给党。”不过,阿法纳西耶夫的主张并不被戈尔巴乔夫所喜欢。事实上,还在早些时候,阿法纳西耶夫和《真理报》的尴尬处境就被外界所察觉。

1988年3月21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评论文章:在公开性政策海洋中的《真理报》。评论指出:

《真理报》总编辑维克托·阿法纳西耶夫追述说,他在1985年4月对路透社记者说,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可能出席联合国大会。

阿法纳西耶夫在午饭前一回到他的办公室就看到他的桌子上放着路透社的一条电讯,电讯援引他的话说,戈尔巴乔夫将访问联合国。电话铃响了。戈尔巴乔夫说:“结果你比我更清楚,我将干什么,我将去哪里。”

阿法纳西耶夫回答说,他只是表明他个人的看法。戈尔巴乔夫告诫说:“谨慎为好。”

这家受人尊敬的共产党报纸的销售量已明显减少,人们越来越感到在公开性时代,《真理报》的办报方式已经过时。因为,《真理报》比大多数报纸更注意哪些消息适于刊登。

正当苏联的政治和文化辩论的水平提高的时候,《真理报》继续采取一般来说是保守的立场。《真理报》不止一次地攻击比较自由化的苏联刊物走得太远。《真理报》的评论员特卡琴科说,“让它们在西方说它们想说的话吧。”但是确实使人感到痛心的是,你会发现,我们的某些刊物的文章利用公开性实际上损害了无可争辩的政治和道德价值。”

去年《真理报》的订户减少了25万,而《消息报》的读者增加了。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说:“我们的订户名单像一次民意测验。”阿法纳西耶夫说:“戈尔巴乔夫常常打电话给我。他非常仔细地阅读报纸……有时他称赞我们,有时批评我们……他给我们的文章加标题……戈尔巴乔夫和我的思想十分相似。这就是说,我们的观点非常接近。”一位苏联人士说:“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最喜欢《消息报》。”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作为苏共中央机关报,阿法纳西耶夫主持的《真理报》已经无法跟上日新月异的政治形势了。1989年3月19日,根据苏联共产党选举新议会的结果,政治局中保守的利加乔夫成为这个最高领导集团中最不受欢迎的委员。在这次选举中,有12人对戈尔巴乔夫投反对票。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官员中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经济顾问阿巴尔金获32张反对票,《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获38张反对票。前者过去对改革前景持悲观态度,而后者曾被公众指责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主要官员。^①10月19日,阿法纳西耶夫被解除职务。由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伊万·弗罗洛夫接任《真理报》总编辑一职。戈尔巴乔夫的这一举动被视为其试图进一步清除担任高级职务的保守派,并使改革派盟友控制《真理报》。^②

在1989年10月23日召开的《真理报》编辑记者座谈会上,戈尔巴乔夫为《真理报》的发展作了定调。他说:“党的报刊的任务就是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意义告诉人民。如果能使社会上的一切科学力量和创造力量联合起来,国家就能使财政状况和消费市场的情况得到好转,就能深化和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制止消极进程的发展,使情况得到改善。为此需要作出相当顽强的努力,其中包括采取不受欢迎的措施。”戈尔巴乔夫指出,苏共中央、整个社会非常关心的是使舆论工具的作用今后也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创造性的。“现在,在改革的第二阶段,即社会需要准确无误的方针时,报刊不应该在思想上制造混乱,而应该帮助人们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答案和如何保证改革取得成功的途径。报刊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推动改革的价值和思想,树立积极的进步的 trend 和坚决克服一切消极现象。”最后,戈尔巴乔夫警告说:“任何报刊都不能变成什么人的世袭领地。”^③新任总编辑弗罗洛夫表态说:“《真理报》不仅是群众性的报纸,而且是反映人的思维、心灵和所关注事情的全民报纸。该报发表的全部文章的注意中心应当是人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真理和公开性在含义上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使报纸名称同它每一期的内容一致起来——这是一项主要任务。列宁所创立的党的中央机关

① 法新社莫斯科1989年3月19日电。

② 美联社莫斯科1989年10月19日电。

③ 塔斯社莫斯科1989年10月24日电。

报的信条不可能是别的东西。”^①弗罗洛夫认为,《真理报》将致力于反映全体共产党人的各种不同意见。“不能左,也不能右,不能保守,也不能激进。”^②

然而,解除阿法纳西耶夫职务的举动,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固然是掌握了标志性的舆论工具,但是“公开性”带来的社会舆论的混乱也让戈尔巴乔夫进退两难。就在戈尔巴乔夫召开《真理报》编辑记者座谈会时,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新闻分析:戈尔巴乔夫和任性的报界。^③ 分析指出:

由于苏联报纸每天充斥着从飞碟之谜到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亵渎性的批评之类的耸人听闻的新闻,因而西方人,甚至还有许多苏联读者都渐渐地把公开性误认为是新闻自由。在过去一周中,戈尔巴乔夫主席已帮助澄清了真相。他清洗了一位总编辑,对另一位总编辑进行威胁,并斥责苏联新闻记者普遍缺乏团体精神,以此来提醒全世界,他认为公开性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个工具,而且目前它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发挥作用。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近5年时间里,公开性曾为一系列目的效过力。它帮助赢得苏联知识界对戈尔巴乔夫的事业的支持,更不要说赢得西方赞赏并接受了这个词。它还一直是打击戈尔巴乔夫的敌手的一件武器,并在使他的几届前任名声扫地方面起了作用。

它向公众揭露了国家面临的大量问题,从而为实行重大改革提供了依据。它还促使各行各业的人去寻求解决办法。然而,令戈尔巴乔夫失望的是,它并没有使人们产生一种保持国家的团结和安定,并度过危机的共同目标感。在放松新闻检查之后,总编们的眼睛盯着发行量。他们懂得,好消息和振奋人心的呼吁一般地说并不能赢得读者,于是便想方设法搜罗抱有最大胆的、引起争议的看法的评论家。神秘主义,甚至列宁实际是恐怖分子的说法都出现了。

戈尔巴乔夫和他周围的人抱怨报界使公众分裂成一些派别,总是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89年10月23日电。

② 路透社莫斯科1989年10月30日电。

③ [美]比尔·凯勒:《戈尔巴乔夫和任性的报界》,《纽约时报》,1989年10月23日。

发表一些坏消息来瓦解民心……内务部长巴卡金说：“新闻界现在是一团糟。”他抱怨新闻界制造了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精神恐慌症”。他说：“人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还隐约指责“某些势力”在利用这种鼓动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利加乔夫对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感到吃惊——戈尔巴乔夫或者对这些批评视而不见，或者将批评解释为某些人企图摆脱社会舆论和报界的监督。他说：总书记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右派激进主义掌握的大众传媒明显地控制了全国，严格禁止发表任何异己言论。这是残酷的宣传和恐怖的活动。一天之中，像是得到统一命令似的，五六个莫斯科主要出版物和电视、“灯塔广播电台”等，在外电的有力支持下，一起向对手发起攻击，导致不安定的宣传运动一浪接一浪地在全国展开了。而从那些自称为民主派的人身上很远便可以闻到独裁和控制人民思想的气味。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它直接威胁到真正的民主。但戈尔巴乔夫不理睬这些警告，最终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悲剧。“瓶子中的恶魔扑向他的解放者，激进报刊背叛了戈尔巴乔夫，而且是在改革最复杂、最紧迫的关头。”^①

2.《星火》主编——维塔利·科罗季奇：“人们已没有恐惧心理了”

1985年6月，作家维塔利·科罗季奇出任《星火》周刊总编辑。在他到任之前，《星火》办得比较拘谨，题材狭窄，内容枯燥，特别是关于党政领导人的外事活动报道占了很大的篇幅。说教式的长文连篇累牍，而抨击弊端的短文却少得可怜。在时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看来：“这本杂志充当了各种平庸之作的避风港，并对观点和评价与《星火》人相左的作家、作曲家、记者进行迫害。杂志成了党的机关手中的意识形态大棒。”^②为了改变现状，科罗季奇上任后狠抓了三件事：

第一，向苏共中央致函，要求给予更多的自主权，改变周刊现行的工资

^①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②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2页。

制度,提出在原定的工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总编辑有权解雇或聘请工作人员。苏共中央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经过深入调查和严格考核,他辞退了一批不称职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择优选用了一批合格的记者和编辑,表彰了一些工作成绩突出的记者编辑,并提高了他们的工资。这一措施结束了“吃大锅饭”“干好干坏都一样”的局面,调动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给周刊带来了活力。

第二,大幅度调整了版面,决定不刊登内容空洞的稿件,压缩有关国家领导人外事活动的报道,增加读者感兴趣的、反映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文章,评论、小品文、采访记、小说和摄影作品等。于是,不少内容新颖,文字生动的各种体裁的作品与读者见面了。版面的调整使《星火》周刊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变得活泼多样,富有生机。

第三,贯彻了“公开性”原则,主张“历史无空白”,“现实无禁区”。自1985年6月以来,由科罗季奇执掌的《星火》周刊陆续发表了一些过去多年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其中包括著名苏联记者、作家爱伦堡回忆录的某些章节。此外,一些长期被束之高阁或被打入冷宫的作品也纷纷出现在《星火》周刊上。在他的倡议下,《星火》开辟了“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专栏,聘请当代苏联著名诗人叶·叶甫图申科主持这一专栏。《星火》还组织各种形式的讨论会,邀请经济、理论、文艺、新闻界代表就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各抒己见,展开讨论。^①

科罗季奇的改革措施取得了显著效果。过去,《星火》周刊在报亭橱窗里陈列几天都无人问津,但是在1987年已成为苏联最畅销的杂志之一。发行量迅速增加到150万份。不过,《星火》杂志成功的秘密主要在于发表“有争议的作品”从而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日本《周刊时事》对此作出评论。评论说:

如果问苏联现在最受欢迎的是什么杂志,那么可以说,还是《星火》画报。这份周刊每周星期六发行。一到周六,早晨八点刚过,《星火》画

^① [中]《参考消息》,1987年10月8日。

报就脱销了,可见它受人们喜爱的程度。现在,其他苏联杂志没有能同它相比的。但是,这份杂志受人们喜欢是近两年的事,也就是说,是在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后。

俄国1917年革命之后,于1923年创办了《星火》画报。迄今这份杂志已有60多年的历史。它一直按照社会主义和党的路线确定编辑方针,读者对象是中年和老年人。可是,以前,无论从什么角度说,它都属于“保守的、乏味的杂志”。在现任总编辑就任之前,编辑方针没有改变时,每周差不多有20万份卖不出去。

在新任总编辑卡罗切奇(指科罗季奇——笔者注)的领导下,《星火》画报面目一新,变成了以青年为对象的杂志。自1986年春季之后,《星火》画报每期都以新的内容让人们为之震惊,它逐渐得到了人们的好评。此后,这份杂志不仅苏联人喜欢,就连驻苏的外国记者也开始关注这份杂志,认为它是新的、有趣的“消息来源”,因为,《星火》画报反映了苏联的文化、社会改革和公开性政策,而且成为戈尔巴乔夫时代有代表性的先驱杂志。第一家刊载批判斯大林的小说的苏联杂志,就是这份《星火》画报。在那之前,为不允许发表作品的作家、诗人和画家开辟“恢复名誉”的道路,《星火》画报起过重大作用。除以上这些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作用外,《星火》画报还发掘苏联社会重要的问题,将其提示给读者,引起人们的议论。事例之一,是这家画报刊登过一期有关毒害苏联社会的毒品问题的特集。《星火》画报每期印刷150万份。可以预料,一发行就马上脱销的状况今后还会继续下去。此外,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读者喜欢文艺性的月刊杂志。那些文艺杂志也同《星火》画报一样刊登“有争议的作品”。^①

《星火》杂志的这种办刊风格显然来自科罗季奇个人的政治观点。早在1986年6月召开的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科罗季奇就认为,书刊检查应该严格限于只禁止出版宣扬战争、种族主义和泄露军事秘密的作品。他主

^① [日]《周刊时事》1988年1月9日。

张：“书刊检查决不能对纯文学创作进行干预。”^①

随着“公开性”的更加深入和政治氛围的日益激进，在科罗季奇的带领下，《星火》不仅成为社会民主运动中重要的舆论喉舌，更成为社会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力量。

1988年11月15日，《星火》周刊提出举行纪念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斯大林主义无辜受迫害者活动周。科罗季奇将活动周取名为“良心周”，计划于11月19—26日在莫斯科的一个俱乐部举行。届时将展出大量揭露迫害情况的材料，包括照片、报刊材料、档案材料、亲人和朋友的信、同时代人的回忆录等。活动周期间，俱乐部设信息中心继续收集被迫害者的材料。“良心周”期间还将举行纪念会，苏联著名文化工作者、作家、学者、军人和外交官将出席纪念会。他们演讲所得的收入将作为斯大林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的基金。“良心周”期间还将上映以这段悲惨历史为主题的故事片和纪录片。^②11月26日，“良心周”在莫斯科结束。其间，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剧作家沙特罗夫、演员乌里扬诺夫、政论家雅科夫涅夫和其他一些人在讲坛上说，人民精神生活中已开始了被“停滞时期”压抑了很久的改革，树立了新的心理气氛，解放了思想，加强了法制和公正。^③

对科罗季奇来说，《星火》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人们已没有恐惧心理了。国家正在缓慢地恢复生机。”^④

三、活动方式——出版禁书

出版反映苏联历史的禁书，是知识精英在社会民主运动中的一项主要工作。在知识精英看来，禁书的出版，既是对禁书作者的政治解放和作品的社会认可，同时也是评价苏联历史必不可少的社会思想启蒙，更是在改革运

① 路透社莫斯科1986年6月30日电。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88年11月15日电。

③ 塔斯社莫斯科1988年11月26日电。

④ [法]《青年非洲》1989年10月9日。

动中反对苏共统治的精神批判武器。

1. 思想文化领域的“解冻”：戏剧、电影与文学作品

在勃列日涅夫对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余留下来的人实行镇压后,许多有才干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不是去了国外,就是在“国内流亡”,他们只把自己的作品拿给少数朋友和赞赏者欣赏。当时出走的有戏剧导演尤里·柳比莫夫和电影制片人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留在国内的有才干的艺术家尽管受到官方排斥,但有些人仍赢得了社会名望。另外一些艺术家在活动时尽量不触犯官方限制的范围。看起来,许多音乐家、演员和画家的活动近乎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在尝试抽象派绘画和自由派音乐。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决意改变这种对文化创作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并以此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在我国的精神生活中,文学作品的作用历来是巨大的。作家、电影工作者和戏剧工作者在自己的优秀作品中传播对社会主义思想成果的信念和对社会精神复兴的期望,他们不顾官僚主义的呵斥甚至迫害,一步一步地从精神上培养人们作好改革的准备。”^①

从 1986 年开始,戈尔巴乔夫为推进社会思想领域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986 年 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在向苏共二十七次作的政治报告中对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惰性问题的批评。他说:“一些文学作品、电视节目和影片水平低下,不仅缺乏思想性和美学鲜明性,也缺乏起码的情趣,这些都引起理所当然的指责。需要认真完善电影发行、图书出版事业和报刊工作。”^②戈尔巴乔夫对文学创作提出了新要求:“党和人民都不需要冠冕堂皇的夸夸其谈和对生活琐事的津津乐道、投机取巧和庸庸碌碌。社会期待着作家的艺术发现和揭示生活真理,而后者一向是真正艺术的本质。”^③戈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② [苏]《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年)》,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9~370页。

③ 同上,第370页。

尔巴乔夫告诫文学批评应该摆脱那种腐蚀着健康道德的宽容和大官说了算的风气。他积极评价文学在改革的大变革时代的地位：“只有文学——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人民性的文学，才能培养出真正的、精神上坚强的、能够肩负我们时代的重担的人。”^①

1986年6月19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作家代表和首都一批文学工作者时，就文学在实现苏共二十七次决议和在增添社会主义社会精神财富方面的地位和任务发表了讲话。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正经历着自己历史上和社会发展中的转折阶段。苏共二十七次决议具有转折性质，它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部创造性潜力开辟了新的可能。“为了使我们的各个领域——经济、政治及社会领域具有必要的活力，必须进行深刻的全面的改造。应当从改变人本身的思维和心理状态开始这一改造。冲突局面不断显露，不同立场时有暴露。在改革过程中，有人等待，有人用脑不够，有人仓促行事。但是，既定的目标是要实现的。”谈到积极发挥人的因素时，戈尔巴乔夫说：“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人创造的，一切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社会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取决于人的公民成熟性和道德面貌。我们所有计划的命运，我国的命运都取决于人今天是什么样和明天是什么样。文学家在实现心理与道德改造中，在同不良现象作斗争中可以起很大作用。今天，迫切需要用高超的艺术揭示当前各种冲突和实际矛盾以及使人感到为实现既定任务而斗争的激烈程度的作品。”戈尔巴乔夫提醒作家们，生活的民主化也要求改革，要克服一切社会团体，包括各创作协会中存在的僵化现象。“这里也不应该有惰性、自我满足和官僚主义等现象。”^②

1986年12月20日，《真理报》发表评论说，批评家应对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采取更为客观的态度。明确提出：“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不应出现空白或设置‘禁区’的。”^③

在戈尔巴乔夫的不断推动下，要求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以一种更为坦率和客观的态度撰写富有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成为开展使苏联生活

① [苏]《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年)》，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0页。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86年6月20日电。

③ 路透社莫斯科1986年12月20日电。

和文化恢复活力运动的一部分。

事实上,在“公开性”的号召下,就在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会上讲话后不久就已经出现了意识形态“解冻”的迹象。在莫斯科的剧院里,过去禁演的戏剧《良心的专政》和《直言不讳》等就已经上演。这两部戏剧都是讽刺昏庸无能的官员的心理状态的政治类题材。戈尔巴乔夫恰恰就对此类戏剧非常热衷。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开始在不同的场合试探着政府“公开性”的底线。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文艺部门的官僚们骂得最凶的诗人叶夫图申科,在1985年12月召开的俄罗斯作家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对“进行空洞的思想宣传”和不让人们接触俄罗斯经典著作,却大量印刷了“令人讨厌的貌似学问精深的宣传小册子”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1986年6月20日,新任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电影导演叶列姆·克利莫夫^①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查近二十年来因审查未通过的二十五部以上的被禁影片。克利莫夫赞扬电影制片人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是一位“十分值得珍视的人才”。他说:“塔尔科夫斯基以这样一种方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我认为他在祖国会比在国外更有作为。”

1986年7月23日,《莫斯科》月刊主编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宣布,将在苏联首次出版流亡美国的俄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作品。阿列克谢耶夫说:“我认为弗·纳博科夫早该回到我国读者中间了。我们正试图出版他的小说《卢津的辩护词》。”^②

1986年11月18日,由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的坚吉兹·阿布拉泽导演的电影《悔悟》上映。这部电影打破了二十多年来对斯大林时代一些恐怖行为的沉默,描写了上百万人的创伤。公映此片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倡的要从比较广阔的角度看待苏联历史的做法的一部分。戈尔巴乔夫正在敦促给艺术家以更大的自由,以便讨论在斯大林时代人民所经历痛苦。

^① 克利莫夫因他的电影《垂死挣扎》在西方享有盛名。《垂死挣扎》讲的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故事,描绘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悲痛,而不是他的邪恶。还集中描绘了他的助手拉斯普京,此人是一名小丑,在苏联官方的历史书中是禁止提到他的。这部影片1975年摄制完毕,1985年才获准公映。1985年放映的他的电影《你自己去看吧》,为他恢复了名誉。这部影片描绘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白俄罗斯在纳粹统治下的悲惨生活。

^② 美联社莫斯科1986年7月23日电。

苏联人欢迎《悔悟》上映,许多人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后还不停地议论。一名妇女在离开电影院时说:“真是叫人不敢相信,这是一部艺术品。”她的男友接着说:“艺术品?这是一部关于我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过去的纪录片。”一位不喜欢此片的妇女说:“是的,斯大林是残忍的,这不用说。但我们决不应该忘记,他是一个天才,没有他,我们现在不知会在哪里呢。”《悔悟》的导演阿布拉泽说:“世界各国、各个时期的一切邪恶统治者都是我的影片的原型。影片主题是善与恶的斗争,这种斗争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①

进入1987年以后,社会文化领域的“公开性”越来越大,反映曾经的历史禁忌问题越来越多。

1987年1月28日,由作家阿纳托利·斯特列利亚内导演的反映畜牧业家庭承包情况的纪录片《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汉》在苏联中央电视台上映后,引起了各界观众的极大兴趣和热烈反响。因为这部电影遭到苏共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委书记多尔吉赫的坚决反对。斯特列利亚内对此评论说:“我看问题不在于西夫科夫在政治上是否成熟,也不在于地方领导人是否喜欢西夫科夫本人,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反对推广家庭承包制,反对经济生活中的民主化。”他说:“如果以我和西夫科夫为一方,以我们的反对者为另一方,大家同时出现在电视观众面前,以评一个孰是孰非,我想,我们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汉》是会胜利的。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一部影片的命运,关系到承包制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经济改革的命运。”斯特列利亚内强调说:“我深信,如果我们今天能捍卫一个西夫科夫,那就会给改革做出贡献,因为明天就会出现许许多多这样的庄稼汉。”^②

1987年7月17日,被禁长达20年之久的《政委》在莫斯科电影节闭幕日放映。这部影片抓住了“公开性”的所有痛苦方面:对苏联过去的蔑视、恐惧和怨恨。^③《政委》描写的是一个乌克兰小城在俄国革命期间被强占的故事,揭示了苏维埃历史上一个最黑暗的篇章。影片的表现手法十分直率:在一个又一个镜头里,红军与情绪激愤的当地抵抗力量发生了冲突。影片被

①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7年8月3日电。

② 新华社莫斯科1987年1月28日电。

③ [美]《华盛顿邮报》1987年7月18日。

视为“苏联文化正在继续解冻的象征”^①。

1987年12月23日,由剧作家伊戈尔·伊茨科夫执导的电视纪录片《再揭露》开始上映。这部电视纪录片揭露了斯大林时代的种种残暴行为,如炸毁教堂,把数百万人发配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的劳改营。影片中首次出现了赫鲁晓夫步入苏共二十大大会场作“秘密报告”的镜头。纪录片还嘲笑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不实做法,该领导集团授予勃列日涅夫的勋章比朱可夫元帅还多。影片结尾说:“新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将有助于消除过去造成的破坏后果。”^②

在电影、戏剧等被禁作品不断被重新搬上舞台的同时,被禁的文学作品也开始被大众媒体公开刊载。

1986年4月15日,在著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③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曾被苏联当局处决的古米廖夫的诗作虽几经查禁,最近又在《新世界》月刊和《苏联军人》双月刊上出现。

1987年1月6日,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宣布撤销1958年通过的关于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作协会员的决定,并成立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著名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任该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说:“我们的许多作家,甚至是受尊敬的作家,在那些年代仿佛像着了魔一样陷进了反对这位诗人的不公正的运动,编造了谎言。就像是在沉重的催眠状态下控告自己犯有并不存在的罪行一样。”4月1日,帕斯捷尔纳克的9封信已在莫

① [美]《华盛顿邮报》1987年7月18日。

②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7年12月23日电。

③ 古米廖夫16岁时开始发表作品。他本人受印象派大师布留索夫的影响,其代表作有:《征服者的道路》《爱情之花》《珍珠》《别人的天堂》《篝火》《棕榈树下的阴影》,此外还有评论集《俄罗斯诗歌通讯集》和一些译作。在他死后的1923年还出版了诗集《身后集》。古米廖夫诗歌的主题是战争、大地、航海及对异国风情的描绘。古米廖夫于1921年8月24日被处决。他被指控卷入了塔甘采夫事件。据说他帮助彼得格勒的某个组织起草了一项反革命宣言。同此案有牵连被处死的有61人。在他死后的两年内,在列宁格勒仍能看到他的几本诗集。以后就只在批判他时提到他。这种状况延续到斯大林去世。1962年,他的8首诗收集在特里福诺夫编辑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十月革命前)》一书里。1967年,他的《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旧称)之歌》中的一首诗在《文学报》上发表。1968年,再次禁止在中央报刊上提他的名字。这次大概同一个名叫“争取人类解放的全苏社会基督联盟”的地下组织的年轻人对他崇拜有关。此禁令持续了15年。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些非学术性刊物上取消了上述禁令。

斯科声望很高的《星火》杂志上发表。这些信介绍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创作经过。《星火》杂志说：“帕斯捷尔纳克是在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后开始写作这部作品的，而且是用他的全部生活经验和艺术创作经验写作的。”^①

1987年12月31日，根据苏联国家出版委员会、苏联电视台和一家杂志的调查，1987年苏联人最喜爱的书是作家阿纳托利·里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的孩子们》。这部小说曾被禁多年，终于在1987年出版发行。这本书通过各种真实的和虚构的人物，表现了苏联社会中的斯大林主义。此书一与读者见面，便在苏联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除此之外，丹尼尔·格拉宁的小说《野牛》、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的小说《穿白衣服的人》和亚历山大·别克的小说《新任命》也是1987年苏联最畅销的小说。《野牛》和《穿白衣服的人》主要是描写斯大林时代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学者们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以及在斯大林保护下，一些所谓的科学家对他们有组织的压制。已于1972年去世的亚历山大·别克的小说《新任命》被认为是描写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的最好的文学作品。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颇有天分的部长，但是他忠诚的信念逐步被对斯大林的无条件服从所取代。调查结果还表明：在苏联读者中，诗歌的受欢迎程度大大下降；而小说，特别是涉及从前一直被禁止的题材的小说大为畅销。^②

随着“公开性”原则的推行，知识分子通过满足社会大众对“禁忌”的渴求，把人们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到过去的禁区——20世纪30—50年代初斯大林时期破坏法制的大量事实上来，在告诉人们“历史真相”的同时，成功地摧毁了人们已形成的对苏联历史的自豪感。就像苏联最受欢迎的幽默杂志《鳄鱼》在刊登移居美国的瓦西里·阿克肖诺夫的小说《寻找忧郁的婴儿》时说：“今天，在黑暗的共产党世界，许多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认识到，他们所代表的制度并不是什么新制度，而是过去的遗产。另一方面，美国的资本主义，在进行了一场不同的革命，即技术革命之后，却在真正地走向一个新时代。”^③

① 新华社莫斯科1987年4月11日电。

② 埃菲社莫斯科1987年12月31日电。

③ [美]《巴尔的摩太阳报》1988年1月6日。

2. “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与《古拉格群岛》

戈尔巴乔夫促成的更大程度的公开性使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和其他苏联作家一度受禁锢的作品得以出版,但是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至今仍然不准出版。矛盾的焦点就是《古拉格群岛》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相矛盾。苏联官方把苏联大规模的政治镇压归罪于独裁者斯大林,而《古拉格群岛》坚持认为,苏联的这种大规模的镇压始于苏联创建者列宁那个时期。可以说,索尔仁尼琴归国及其作品《古拉格群岛》的反复命运,在相当程度上其实就是苏联历史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被持续性毁灭的悲剧写照。

1987年3月5日,针对外界盛传《新世界》月刊主编谢尔盖·扎卢金关于即将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岛》一事,《新世界》副主编科斯特洛夫发表声明:“此事并没有在编委会上讨论过。”科斯特洛夫认为,扎卢金的意思只是:“他们将考虑发表所有的苏联文学作品,不论作品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写成的,但他们将首先考虑作品的文化意义。”对于这一消息,苏联官方也给予了正式否认。外交部发言人格拉西莫夫在科斯特洛夫发表声明之后说:“我们各杂志编辑部还没有发表《癌病房》的任何计划。”^①

1988年7月20日,索尔仁尼琴的妻子纳塔利娅·索尔仁尼琴断然否认有关克里姆林宫官员邀请她丈夫回国的报道。她说:“我们从未接到过任何来自苏联官员的电话或信件,来商讨在苏联发表他的著作或者邀请我们回苏联。”^②

1988年8月4日,《新世界》杂志向外界透露,有关方面正在谈判在莫斯科发表索尔仁尼琴的两部长期被禁止的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这两部作品都是根据索尔仁尼琴自己当政治犯的亲身经历而创作的,主要描写了战俘集中营的生活。

1988年9月18日,苏联著名文学批评家纳塔利娅·伊万诺娃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撰写评论说,流亡在国外的诺贝尔奖金得主亚历山大·索尔

^①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7年3月5日电。

^② 美联社华盛顿1987年7月21日电。

仁尼琴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要求政府官员取消不准在他的祖国出版他的作品的禁令。伊万诺娃说：“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作家。年轻的一代一直没有机会读他的书，这对我们的文学是个很大的不幸。我希望这种不正常的状况能得到纠正。”^①

1988年10月14日，苏联政府下令对《新世界》月刊将发表索尔仁尼琴的禁书一事进行审查。已出版的110万份《新世界》10月号被迫停止发行。

1988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明确反对在苏联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他认为，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旨在破坏共产主义。

1989年7月30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星火》杂志文学编辑尤里·切尔尼琴科向外界透露，今年8月《新世界》月刊将开始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他说：“索表示，只要他的作品在苏联出版，他就回国。从他的这一态度来看，他对苏联的作家是满怀好意的。”切尔尼琴科称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具有巨大能量的、富有文学才华的人。”他认为，索尔仁尼琴于60年代撰写的《古拉格群岛》“唤起了我们对（斯大林）罪恶的痛苦记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索尔仁尼琴）。 ”^②

1989年8月3日，苏联作家出版社在《新世界》月刊详细摘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之后，决定发行30万册这部描绘斯大林时代苏联集中营生活的长篇小说。

1990年8月1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布命令，索尔仁尼琴同其他22名流亡者一起恢复了公民权。不过，索尔仁尼琴的妻子纳塔利娅对此评论说，该命令还不足以允许索尔仁尼琴回国，因为命令没有提他的特殊情况。她说：“就索尔仁尼琴而言，最初的命令不仅剥夺了他的公民权，而且史无前例地强行将他从苏联驱逐出境，并且是用逮捕和指控他叛国投敌的方法这样做的。”^③

1990年8月18日。俄罗斯联邦总理伊万·西拉耶夫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公开信，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国。西拉耶夫称赞这位诺贝尔奖金获

① 美联社莫斯科1988年9月18日电。

②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9年7月30日电。

③ 德新社莫斯科1990年8月18日电。

得者是“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儿子”，他的回国“对我们祖国就像空气一样必要”。对西拉耶夫的邀请，索尔仁尼琴于8月24日表示拒绝。索尔仁尼琴说，如果他是以旅游者或宾客身份返回祖国，这将是不可思议的事。在回复俄罗斯联邦总理西拉耶夫的一封信中，索尔仁尼琴说：“当我重返祖国，我将会在那里生活，直至终老。即使在最绝望的岁月里，我仍相信会再回来。”^①

1991年5月29日，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承认为老战士。战士证书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实行的，可以使持证者享受租金便宜的住房和价格折扣的日用品。苏联解体后，经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于1994年返回俄罗斯。

四、活动方式——制造事端

通过制造流血的暴力冲突事件，挑起社会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仇视，从而迫使政府在妥协让步中不断攫取更大的社会政治权力，这是民族主义分子在社会民主运动中采用的极端手段之一。事实上，从苏联后期的社会民主运动来看，民族主义分子成功地在已有民族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新的族际认同，形成了本民族新的政治身份。作为“他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治形象被赋予了黑暗消极的内涵，而本民族及其作为政治载体的民族国家的独立诉求则被塑造成为摆脱异族压迫剥削、建立公正社会的进步意识。于是，在越来越多走向极端暴力冲突事件不断发生的情况下，联盟中央政府和共和国政府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

1. 流血的冲突：“不要把人们当成敌人”

那么到底要不要使用武力进行干涉呢？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当利加乔夫认为，民族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正是改革的真正“敌人”^②，并要求采取坚定的强力

^① 路透社莫斯科1990年8月24日电。

^②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8页。

措施时,戈尔巴乔夫不为所动。在他看来,争端和问题只能通过政治协商的办法来解决。“我从整个悲剧性的历史中所吸取的教训是: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领导当局无法避免动用武力。但是这种行动必须是在绝对必要时才是正确的,而且只限于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问题的真正解决只能通过政治手段。”^①

1988年3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纳卡问题时,戈尔巴乔夫呼吁保持平静:“不要把人们当成敌人……要用政治处理问题。当然,当局还是要掌握权力。法律还是高于一切。”他还说:在冲突中没有胜者,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确认用这样一种政治的、深思熟虑的方法解决民族问题,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事实上不仅在老百姓中间,而且在政治局里头也有人主张使用武力。安·安·葛罗米柯就曾如是说:“军队一上街,秩序马上就会恢复。”这一主张未被大家接受。“但这种主张不时总会出现。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老方法还在发生作用。”^②

在改革进程中影响最大的三次民族危机中,戈尔巴乔夫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政治原则来处理问题的。“可以看清楚,第比利斯、巴库和维尔纽斯这三次危机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其中只有一次,即在巴库,是根据中央的决议派遣军队的。其他两次情况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与国家领导当局以政治与和平的办法解决出现形势的路线背道而驰。”^③

仔细分析戈尔巴乔夫之所以采取放任的态度,除了他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认为一切都在掌握中的政治错觉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政治局战友的认识分歧。事实上,在面对社会极端冲突事件中,苏共中央高层已经产生分歧。戈尔巴乔夫一直在恳求让非俄罗斯民族有更大程度的文化自治和结束俄罗斯化。但他的批评者——包括利加乔夫和克格勃首脑切布里科夫则把目前发生的骚乱归咎于“公开性”政策和对民族主义的让步,并要求对肇事者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他们认为这些肇事者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敌人,是西方大国的代理人。因此,围绕是否应该采取

①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② 同上,第113页。

③ 同上,第128页。

武力干涉的问题,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已经变成关于改革的政治路线问题。如果进行武力干涉,那就是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否定,就是对他所倡导的改革的否定。

1988年3月8日,《莫斯科新闻》发表叶戈尔·雅科夫列夫题为“理智和清醒解决的时刻”的文章,对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冲突问题进行分析时就表达了戈尔巴乔夫的心声。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指出:

苏联发生这类事件的原因是在这之前在贯彻民族政策方面有失误和纰漏。过去口头上讲各民族大家庭,实际上在文化交流方面设置障碍,在教孩子们学本民族语言方面制造困难。

斯大林在列宁之后成了民族问题上的唯一立法者,他把问题简单化,有血有肉的事被列为第一、第二、第三……民族问题似乎成了我们社会的隐私问题,不能说出声来。停滞时期在民主化方面没有可夸之处。

最近几十年来在发展各个共和国及其联盟的国家观念方面我们能举出采取了哪一个明显的步骤呢?民族问题具有连锁反应的特点,如果不考虑其他民族的利益,也就不能满足一个民族的利益。缺乏耐心只能使问题复杂化。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认为:“不能把发生的事件归罪于民主化进程。”^①

2. 第比利斯事件:“反苏活动的演兵场”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呢?

在雷日科夫看来,1989年4月9日发生的第比利斯流血示威事件,恰恰就是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民族分裂分子精心策划的结果。“4月9日事件不是一次自发的、随意之间发生的行动,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经过长期准备

^① 新华社莫斯科1988年3月8日电。

的行动。”^①

事实上,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后,在格鲁吉亚,仿佛是随着魔棒的一挥,形形色色的“民主”党派、组织和团体就纷纷出笼了。雷日科夫指出,如果说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谈到地区经济核算和自我管理原则时还是相当注意使用外交辞令的话,在格鲁吉亚一切都是立刻摆到政治层面上来谈了。出现了“打倒克里姆林宫的帝国式狂妄自尊!”“打倒苏共的无上权力!”“独立的格鲁吉亚万岁!”等口号,紧接着又出现了“格鲁吉亚是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用笤帚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清扫出去!”等,不一而足。出现了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领袖人物。“实质是格鲁吉亚成了操练反苏活动的演兵场。”^②西方“民主中心”人数众多的密使走马灯似的来到第比利斯。很快,这些团体的领袖开始积极活动,发起和发展了共和国内反对苏联共产党和现存制度的政治运动。

1989年4月4日起,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非正式团体在政府大厦前连日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打出的口号是:“格鲁吉亚要独立!”“打倒俄罗斯帝国!”格鲁吉亚领导人认为采取政治方法和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当时许多“老一辈”干部都有这毛病),还是采用武力为好。

1989年4月7日,格鲁吉亚领导人建议第比利斯实行紧急状态。在当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会议上(叶·库·利加乔夫、维·米·切布里科夫和其他人员参加)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军队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

1989年4月9日,示威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16人死亡,175人受伤。苏共中央决定派谢瓦尔德纳泽赴第比利斯处理骚乱事件。10日,苏联政府向第比利斯派出一些坦克,在格鲁吉亚党中央会议上,选出贡巴里泽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原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利提出辞职。

1989年4月11日,格鲁吉亚党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宣布4月11日为哀悼日。

1989年4月12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告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

^{①②}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书》。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共同责任是加深和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但是民族间关系的改革,这不是重划边界,不是打破国家的民族国家体制。我们坚决反对这样做。

1989年4月14日,谢瓦尔德纳泽在格鲁吉亚党中央全会上说,很难认为共和国领导人决定动用武力的做法是正确的,如果准备用坦克捍卫民主和改革,也应事先通知,让人们有充分的准备。他强调,决定出动军队是犯了操之过急的错误,没有仔细考虑各种可能的方案。也没有预见到会造成的后果。他说,事件的性质还需要进行细致、全面和不带偏见的调查,要用法律和科学性来确定事件的性质和方向。^①

关于第比利斯事件,戈尔巴乔夫最为关心的问题不是怎么解决矛盾冲突,而是不停地追问:是谁下命令使用武力?在苏联解体以后,戈尔巴乔夫认为:“格鲁吉亚的地方指挥人员成了某种政治游戏的牺牲品,对此他们自己也不怀疑。看来当时影响军队行为的是那些在1991年挑起称之为叛乱事件的人。罗季奥诺夫大将^②不久前在回答记者有关问题时说,他曾经得到当时国防部长亚佐夫的批准,这就可以证实以上的判断。而罗季奥诺夫以为亚佐夫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赞同。”^③

谢瓦尔德纳泽从格鲁吉亚回来后,苏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讨论第比利斯事件。雷日科夫说:“这些日子我们在莫斯科,我们能知道什么?我——政府主席,而我知道什么?关于第比利斯人员伤亡的消息,我是从《真理报》上读到的。中央书记们知道情况。而我们,政治局委员,在政府中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理应得到及时准确的信息。这怎能行呢?军区司令在那里行事,而我们在莫斯科对此一无所知。他把格鲁吉亚政治局的全部成员都抓起来了。我们对此还是从报纸上获悉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看来也不知道。我们怎么会是这样?动用了军队,而总书记第二天才知道。苏联社会将怎样看我们?全世界将怎样看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这

①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48~149页。

② 罗季奥诺夫,俄罗斯族,1936年生。先后毕业于奥尔洛夫坦克学校(1957)、装甲兵军事学院(1970)、总参军事学院(1980)。1985—1986年在阿富汗指挥第40军,先后任苏联政府阿富汗临时驻军事务全权代表。从阿富汗回国后任外高加索军区司令。1996—1997年任俄罗斯国防部长。

③ [俄]米·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

里许多事情政治局根本不知道。这比政治局作出某些不正确决策还要坏。”戈尔巴乔夫对雷日科夫的发言极为赞赏,并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提出了在类似事件处理上的要求。戈尔巴乔夫说:“在这次会议上我不得不以尖锐的方式提出问题,要求信息准确无误,要求提供信息的单位以极其负责的态度对待工作。当然也提到了军队的作用。国防部长亚佐夫被告知:从今以后没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决定,军队不得干预类似事项。”^①

在整个第比利斯事件中,显示出戈尔巴乔夫的处事风格——推卸责任和不愿担当“政治恶名”。雷日科夫指出,为了稳定局势,依据格鲁吉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在第比利斯实行宵禁。但是中央采取了奇怪的、不一贯的立场。政治局,尤其是戈尔巴乔夫,要求共和国局势正常化——同时又指责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把事情搞得过分紧张。在那些日子里,政治局始终没有开过全体会议。只是几位政治局成员碰头研究一下局势。戈尔巴乔夫有一句最爱说的话:“不要把事情搞得太紧张。”这句话捆住了领导者的手脚,无法自行采取决定。“在第比利斯事件中显示出的这种作风,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特色。他不参与不得人心的决策,尤其是涉及恢复秩序问题的时候。”^②

结果,地方政权瘫痪了,对驾驭事件无能为力。^③

五、活动方式——组织罢工

由于石油等自然资源一直是苏联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也对苏联

① [俄]米·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17~118页。

②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③ 1989年6月,格鲁吉亚人民阵线建立。11月17—19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修改宪法,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宣布如果苏联的法律、法令不符合格鲁吉亚的利益,则停止这些法律、法令在境内的效力。1990年3月16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保证共和国主权的法令,第一个宣布1921年协议和1922年联盟条约作废。1990年12月8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二十八次通过决议,宣布脱离苏共。1991年4月9日,格鲁吉亚非常会议通过国家独立宣言。

其他工业的运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石油煤矿工人举行罢工,往往会给联盟中央带来极大的经济压力。因此,政治反对派往往利用工人谋求改善自身环境的经济性要求,煽动和组织工人举行罢工,以此通过向中央和共和国政府施加压力来满足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

1. 工人:“觉醒的主人翁”

不过,罢工运动最为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它不断滋养着工人作为国家主人翁的政治觉醒,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在联盟中央控制力衰弱的情况下对攫取经济政治权力的渴求。

随着苏联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工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提高。据统计,1959年为49.5%,1970年为56.8%,1979年为60%,1982年为60.9%,1986年61.7%。^①庞大的工人队伍构成了苏联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也是苏联共产党构筑国家阶级基础最为自豪的成就。苏共中央宣称:“工人阶级是新社会的主导的创造力量。我们国家半个世纪的存在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伟大历史使命这一极其重要的原理。工人阶级是推翻剥削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提出的目的是消灭阶级差别,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体现者,同时又摆脱了民族利己主义,它矢忠于各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的思想。”^②

但是苏共中央宣扬作为国家政治主人翁的工人阶级,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由于缺乏表达权利的有效渠道而往往处于官僚制度的依附地位。苏联社会发生的许多案件“生动地揭示了旧的传统依附关系之外的另外一种新的依附关系的表现形式,即下级对上级、群众对领导、公理对权力等的依附关系”^③。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官僚命令体制使生产者对生产资料

① 转引自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20世纪60—90年代苏联各社会政治阶层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267页。

② [苏]《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79页。

③ [苏]《来自苏联法庭的报告》,刘力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0页。

和他们生产的产品的所有完全分离开来”^①。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所有权实际上徒有虚名。“在旧的行政手段管理生产的体制下,工人生产总是在完成上面下达的生产调度命令。天长日久,职工便会异化出来,脱离开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财富表面上属于全体国民,但在实际上属于国家。做出决议决定的是国家的各个部委司局。”^②而作为个体表现的工人由于“经济方面的——微薄的工资、消费品和服务设施的缺乏等等”^③原因,也没有感觉到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理论上讲,苏联是工农大众的国家,国家代表着工农群众;然而作为个人的工人农民及其集体,其真正利益却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不尽一致,至少一直没有找到协调两种利益的公式。”^④这种政治与生活的严重脱离,实质上塑造了工人阶级“被剥削”的感觉。“在苏联,确实存在着某种类似‘阶级意识’的心理状态。少数人有明显的优越感,平民百姓则有被统治的感觉。”^⑤于是,苏共的宣传往往引起工人的反感。“以我们的名义干这些事!……他们争权夺利……以我们这个阶级的名义搞乱了你们的思想……说什么权力在我们这个阶级手里,可是只要你一过问,他们就会让你知道权力的厉害。”^⑥当工人正常的利益表达无法满足时,罢工作为极端的做法就出现了。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工人的罢工就时有发生。仅1967年和1968年初,乌克兰就发生29起“小组不出工事件”,乌兹别克斯坦11起,爱沙尼亚8起,立陶宛5起,塔吉克斯坦4起,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9起,科斯特罗马州8起,彼尔姆州7起,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5起,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4起。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关于

① [俄]科瓦利琴科主编:《20世纪的俄罗斯——苏联历史学家的争论》,转引自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20世纪60—90年代苏联各社会政治阶层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282页。

② [苏]阿甘别吉扬:《苏联改革内幕》,常玉田译,中国对外经贸出版社,1990年,第72页。

③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刘明等译,群众出版社,1984年,第8页。

④ [苏]阿甘别吉扬:《苏联改革内幕》,常玉田译,中国对外经贸出版社,1990年,第72~73页。

⑤ 陆南泉等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74页。

⑥ [苏]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自由、权力和所有权》,林英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页。

1967—1968年间的集体不出工事件”的专门报告中指出：“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劳动定额中严重缺点、企业和工会组织的个别领导人对劳动者的需求漠不关心，以及他们不做必要的解释工作。这些冲突一般都是以满足工人的要求而结束的。”不过，安德罗波夫提醒苏共中央：“事实表明，在地方上还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以消除引发这些现象的原因，这些原因对劳动纪律的状况有消极影响，导致出现我们不愿看到的形势，还可能被煽动分子和敌对分子利用以实现他们的罪恶目的。”^①

安德罗波夫的警告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开始应验了。戈尔巴乔夫宣称：“30至40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逐渐开始同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要求发生矛盾。它的优点越来越不起作用了，相反，障碍作用却不断增长，从而形成了障碍机制，这种机制后来则起了十分消极的作用。由于采取在非常条件下产生的工作方法，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便受到了阻碍。”^②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障碍机制，就是要恢复人的尊严。“人应当知道和体会到，需要由他来发表意见，他的尊严没有被贬低，对他抱有信任和尊重的态度。当一个人看到这一切时，他就能做出许多事。”^③

从1989年开始，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开始频繁发生。戈尔巴乔夫很快就切身体会到作为主人翁的工人阶级所发动的罢工怒潮带来的巨大政治威力。1988年7月19日，戈尔巴乔夫在最高苏维埃讲话中指出：苏联的两个主要煤田的矿工进行的罢工给全国造成了“具有严重后果的严峻局势”^④。然而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真正的危险是，这根引火线是否会引到政治之中去。矿工们已经要求制定新宪法，他们中的一些人要求取消宪法第六条，这一条规定共产党在社会中的先锋作用。如果他们继续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了。”^⑤

①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00～201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1页。

③ 同上，第28页。

④ 路透社莫斯科1989年7月19日电。

⑤ [英]《卫报》，1989年7月21日。

2. 罢工:从经济走向政治

从总体上看,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发生的工人罢工运动,大体有三个比较突出的运动特征。

第一个特征:从自发走向组织。应该说,初期的工人罢工运动具有很大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利益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的延续。1989年7月31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斯捷潘·沙拉耶夫指出,食品短缺、供应不足是促使矿工罢工的主要动因。而随着苏联经济的持续恶化,联盟中央根本无法满足工人的要求。1991年3月5日,苏联政府总理帕夫洛夫在电视讲话中明确表态:经济下降使政府无法给工人增加工资。政府的解释并不足以让罢工的工人理解。相反,他们认为,这是政府的敷衍。于是,罢工运动在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下,迅速从各个矿点的自发性的行动变成了有组织的行动。据统计,到1990年初,全苏170个城市成立了罢工委员会。^①令人担忧的是,罢工委员会的成立加剧了工人罢工过程中摆脱对党的依赖的“确实存在的运动”^②。在罢工委员会的主导下,被组织起来的罢工运动很快对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中央构成了巨大压力。戈尔巴乔夫承认:“这种事态的发展可能危及改革计划的实现。国家可能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即必须考虑应采取什么方式避免局势失控。”在1989年7月18日同地方党的负责人的谈话中,戈尔巴乔夫再次把工人的动乱同目前的经济困难联系起来。他说,在实现改革方面,党远远地落在社会其他人的后面。“结果是,共产党在改革中和在社会上的领导作用可能在削弱,这是一个现实威胁。”^③7月23日,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中,再次呼吁罢工矿工复工。戈尔巴乔夫说,国家正处在“紧要关头”,工人阶级对改革的步伐感到不快,他们要求真正的迅速的变革。苏联矿工采取这种极端措施就是证明。但是如果让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其他工业部门也将卷进来,那将对改革

①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13页。

② 法新社莫斯科1989年7月31日电。

③ 路透社莫斯科1989年7月19日电。

构成威胁。他宣布,苏联议会将对罢工问题进行辩论。戈尔巴乔夫指责矿工们用罢工的形式逼迫当局接受其要求,他认为矿工们“没有通过正确的方式来陈述问题”^①。10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一项今后15个月内全面禁止一切罢工的原则。这项动议以374票赞成、8票反对和4票弃权获得通过。这项专门的决议案是在苏联尚无罢工法的情况下提出来的,罢工法还有待于提交议会通过。这项决议案将会立即生效并实行到1990年底。戈尔巴乔夫提醒议会说,经济形势正在迅速“失去控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纠正这种情况,因为“每过一天,局势就恶化一步”^②。

第二个特征:从分散走向统一。在罢工委员会成立以后,全国各主要矿区的罢工运动迅速走向统一协调。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协调组织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90年1月8日,俄罗斯联邦成立独立的“统一”工会。新工会宣称它坚决独立于去年年底成立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所属的俄罗斯联邦合作社工作者工会。1990年6月11日,苏联煤矿工人罢工委员会在苏联最大的煤矿中心顿涅茨克开会,讨论举行全国性罢工事宜。7月11日,苏联各大采煤区举行了集会和罢工。库兹巴斯(西西伯利亚)矿工的政治罢工持续了一昼夜。据统计,有53个企业没有开工,罢工总人数约为4.2万人。参加集会的矿工对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改善国家煤矿区社会经济状况的第608号决议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执行表示不满。顿巴斯罢工委员会理事会举行为期一天的警告性政治总罢工的呼吁根本没有得到该州所有矿工的支持。在123个矿井中只有二十多个矿井停止了采煤。多数单位决定不停工,而是在群众集会上表示自己的意见。在沃尔库塔(科米自治共和国),30个采煤企业中有11个企业参加了一昼夜的政治罢工。^③到了1991年,罢工行动愈演愈烈。从1991年3月1日起,苏联煤矿工人开始长达三个多星期的罢工。3月8日,顿巴斯和库兹巴斯的矿工继续罢工,60%的矿井停产。3月15日,全苏共有140个矿区参加了这次罢工。到3月21日,罢工不断扩大。在一些矿区的约六百个矿井中有1/4的矿井已停工。到了4月11日,苏联煤田

① 路透社莫斯科1989年7月24日电。

② 法新社莫斯科1989年10月2日电。

③ 塔斯社莫斯科1990年7月11日电。

罢工仍在持续。在沃尔库塔,13个矿井中有12个矿井的矿工在继续参加罢工,其中有6个矿井基本上既不采掘,也不向用户运煤。在乌克兰顿涅茨克煤田,有36个矿井的矿工仍在罢工。在卢甘斯克州,“五一煤业”联合公司的7个矿井中只有托什科夫卡矿井在工作,其余的已经停工7个星期。在库兹涅茨克煤田,76个矿井中有46个停工。持续性的罢工对已经陷入困顿的苏联经济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据统计,3月份由于罢工,苏联经济损失了116.9万卢布。有542个企业停产,其中包括一百多个煤矿。矿工罢工严重影响钢铁厂、机器制造厂、化工工厂的生产,现在还影响到了农业生产。例如,俄罗斯中部的新利佩茨克钢铁厂由于缺乏原料即将停止生产焦炭。炼焦炉将损坏,而恢复受损的炼焦炉需要几年的时间。在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厂的5座高炉只有1座在炼铁,转炉车间和7台轧钢机几乎全部停工,炼焦炉组将熄火。照此下去,钢铁厂将完全停工,无法向五千多个用户提供钢材。据政府估计,由于矿工罢工国家仅轧材就至少损失500万吨。^①面对协调一致的罢工行动,苏联最高苏维埃被迫通过决议,呼吁各共和国议会立即派出全权代表组成跨议会委员会,以便解决罢工问题和寻找摆脱这一危机的办法。

第三个特征:从经济走向政治。事实上,在政治民主化的刺激下,苏联工人的罢工运动在经历了最初的经济性要求后很快就转向了政治性要求。也就是说,苏联的罢工运动开始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并对改革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89年9月,俄罗斯工人成立俄罗斯工人联合阵线组织以反对激进的经济改革,保卫在苏联边远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不受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在西伯利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举行的成立大会上,来自29个工业中心的11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们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前途押在全面发展经济中不合理的市场关系这一赌注上,那么国家的形势将进一步恶化。”联合阵线在其成立大会上决定,它反对给苏联加盟共和国以更多的经济自治——这是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长期以来所争取的。戈尔巴乔夫主张把实行更多的自治作为使苏联生产恢复元气的手段。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4月16日电。

他也愿意将亏损的国营公司出售给私人经营。所有这些在联合阵线大会上都受到了批评。^① 1989年11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在会见煤矿工人代表时称罢工是“走绝路的办法”。雷日科夫强调指出,现在(俄罗斯北部)沃尔库塔矿工的罢工正在被怀有自己政治目的的某些势力所利用。他呼吁煤矿工人不要把自己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很快,雷日科夫的强硬主张使得他成为罢工运动提出的第一个政治要求:辞职。1990年6月15日,苏联煤矿工人代表大会发出警告,除非雷日科夫总理的政府辞职,否则将号召7月11日举行全国性罢工。与此同时,代表大会宣布准备成立一个不受共产党和政府控制的新工会。它要求党放弃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控制,放弃它掌握的大量财产。这一诉求在以308票对116票通过的决议得到了表达。决议说:“苏联共产党声称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及其先锋队。我们是工人,可是我们并不认为目前形式的党是我们的党。我们要求立即取消共产党在我们企业里的特权地位。”决议指出:“的确,5年前,党的某些领导人开始搞改革。但是最近几个月来,最保守的力量已经得势,地位得到了巩固。”^②1991年3月开始的持续性罢工更是明确提出了政治要求:苏联总统和联盟政府辞职,解散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一点上他们得到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和“民主俄罗斯”运动代表的支持。^③ 1991年4月8日,路透社发表评论指出:苏联罢工矿工将他们更紧密地与反共政治运动联系起来,并坚持要求戈尔巴乔夫的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辞职。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罢工工人的发言人说:“所有非共产党党都在支持我们的运动。”他说:“我们坚持我们的政治立场,即戈尔巴乔夫总统和联盟政府辞职。”^④4月9日,塔斯社发表评论指出:在几个地区轮番爆发的矿工罢工结成了一体。经济要求退居次要地位,向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提出政治性最后通牒性的要求成为首要的事情。显然,罢工的性质发生急剧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预料不到的变化,是由三种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在同一时间内不谋而合的结

① 路透社莫斯科1989年9月13日电。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90年6月15日电。

③ 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3月21日电。

④ 路透社莫斯科1991年4月8日电。

果。这三种势力是：罢工的矿工，以“民主俄罗斯”纲领为基础的各个反对派政党，俄罗斯联邦的领导。在打“矿工牌”的游戏中，唯一的大赢家是反对派各政党。这些政党积极支持发出政治最后通牒的举动，按照它们的如意算盘，同矿工们的“蜜月”会赋予它们所缺少的代表“工人阶级”的资格。^①

六、活动方式——内部分化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创设，标志着公开政治的出现。政治反对派有了表达诉求的合法舞台。当加夫里尔·波波夫宣布成立“跨地区议员团”，这实质上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内部的一个政治反对派，一个“反对派力量领导中心”^②。无疑，“苏联出现正式的政治反对派是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另一成果”^③。

1.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与政治多元化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既是戈尔巴乔夫对列宁政治思想的继承，同时又是戈尔巴乔夫打破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垄断，推进人民自治、人民政权建设的逻辑必然，更是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体现。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并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一个排除激变及由此引起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人民的灾祸和苦难的和平改良过程。它要求高超的技巧，以便最好地选择权力交接的时机。这种交接只有在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利用它深化民主制、继续推进旨在建立法治国家和社会目标明确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时，方能完成。”^④于是，戈尔巴乔夫决定在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建立苏联政治生活的全新的权力中心——苏联人民代表

① 塔斯社莫斯科 1991 年 4 月 9 日电。

②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第 326 页。

③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625 页。

④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12 页。

大会。

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戈尔巴乔夫在题为“关于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占中心地位。”他指出:“我们的国家是作为工人阶级专政的工具诞生的,而在60年代则得出了我国在逐步转变成全民国家的结论。但是,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政治过程的内容,就越显而易见地有必要使我们的国家制度达到完全的全民性这个概念……在政治体制的各个基本环节之间,首先是在党和国家之间正确地分配权限在这里具有原则性意义。”^①

1988年10月22日,《真理报》公布苏联宪法修正草案,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法律基础。草案规定,苏联将建立新的国家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其特殊权利是:通过宪法和修改宪法,就苏联的组成和苏联的民族行政区划问题作出决定,确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基本方针,选举和任命国家某些最高职务等。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举产生最高苏维埃——国家权力的常设立法、管理和监督机构,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须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此外,它不行使“国家集体元首”的职能。还规定,设立新的国家职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主席由人民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并首次规定,建立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苏联宪法和法律与各加盟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否一致,全苏政府的决议和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决议是否一致;它有权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部长会议提出取消下属机关或负责人发布的同苏联宪法或法律相矛盾的法令。

1988年10月23日,《真理报》公布《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草案)》。其主要原则是:保证选举的民主性和挑选候选人的竞争原则。这包括不受限制地提出候选人,广泛和自由地讨论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严格遵守程序等。

^①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47~48页。

1989年初,苏联人民代表选举运动正式开始。3月26日,全苏各地进行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苏联国家预算共拨出1.56亿卢布作为全国的竞选费用,每选一名苏联人民代表平均约需六万卢布,全国共设有18个投票站。

1989年4月4日,苏共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结果。各选区的选举是在3月26日进行的,各社会团体的选举是在前两个星期进行的。在2250个代表名额中,已选出1958名人民代表。其余的人民代表将重新选举。在当选者中,妇女占17.1%,工人占18.6%,集体农民占11.2%。当选者中的苏共党员比例为87.6%。居住在苏联的60个民族的公民被选入国家最高政权机关。^①

1989年4月27日,戈尔巴乔夫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碰头会,再次商讨关于政治改革的方案。戈尔巴乔夫回忆,这次讨论可不是起草发言稿的事,而是应当提出建立新政权的构想。也不是简单地着手准备一份像过去那种干巴巴的由“守纪律的代表们”一致通过的法律草案。“我们从一开始就会遇到强硬的反对派,他们因这次选举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而精神大振,并急切地要投入战斗。而大多数代表会怎样行动,还不完全清楚。我已经不记得,是谁首先说过这样的话,但大家都很支持这个说法。他说:从今往后,决定国家生活的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人民代表的代表大会,而不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是一次急转弯,一次真正的大转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逐步取代旧的政权体制以及这一政权的各种象征性的标志。”^②

2. “魔鬼的智慧”: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从1989年5月—1991年9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总共召开了五届会议就结束了它的政治使命——重建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但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却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分裂和混乱。最终这一苏联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一纸决议不仅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且亲身参加了把自己赖以为基础的政治载体——苏联——送入坟墓的政治大狂欢中。

^①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47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

格拉乔夫指出,1988年秋天在更换当时领导成员的位置时,戈尔巴乔夫还以为这是根据国内新的形势对最高权力机构进行的改造。看来他并未意识到实际上这是在洗同一副牌。这样就使自己的选择受到局限,不仅是选择干部,而且是选择继续改革的政治方案,从而也缩小了纵横捭阖的余地。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囿于习惯的人的圈子和老办法的框框,在与党内保守派进行战斗的同时,并未马上完全意识到,在他的倡议下进行的苏联历史上第一次议会选举大大扩展了国内政治斗争的战场,而且从此他势必同新的伙伴、对手和反对者打交道。随着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民主反对派的出现,改革的后方也开辟了新的战场。从此不能再说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了——“群众创造”的篝火熊熊燃烧,升腾的火焰大有将点燃篝火者燎伤之势。^①

雷日科夫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后召开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说:“代表们纷纷涌到讲台上,提出他们的纲领、计划、建议和指责,但政治局却被孤立地撇在一边,好像它患了某种瘫痪症似的。”他警告说:“一股真正的和强大的力量已经崛起,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我们不能认真应付这种局面。如果党无法摆脱这种局面,它就有可能失去管理政府的能力。”^②

苏联人民代表瓦连京·拉斯普京深刻描述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实际情况。他说:

作为一名“人民当政机构”的代表,历次代表大会,甚至每一次会议,我都从来没有缺席过,因此有权多说几句:那真是一种魔鬼的智慧啊!它所“创造”出来这个东西,把已经白热化的氛围炒作得更加炽热了。不过,这种白热化气氛当时仅存在于大城市和民族边疆地区,而1989年5—6月间对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两个星期转播,却把仇恨的种子撒遍了每一个角落。“革命者”对此作了精心策划,并有精确分工。

^① 参见[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04页。

^② 美联社莫斯科1989年8月5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9年8月10日。

不排除大会开幕前一个半月发生的第比利斯事件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它正好安排在这个时间。否则怎么会这么巧,恰好给肆无忌惮地向联盟政权展开进攻提供炮弹呢?这一来全国都可以看到当局有多么软弱,它正在退让。代表大会开幕前是第比利斯事件,而闭幕之后,就在6月份,又发生了血洗费尔干纳事件。1990年1月,巴库再次出现更恐怖的血腥屠杀。而且,紧随从“人民监狱”里跑出来的自发暴徒之后,维尔纽斯又发生了电视塔挑衅事件,还动用了武器,出了人命。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血腥事件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谁都知道,血总是越搅越腥的。

代表大会各次会议上出现的野蛮行径简直难以名状。为了让非正义事业取得胜利,不仅要求不讲道德,不知羞耻,还要不顾一切。什么民主!什么文明讨论!那些家伙像划分战斗队似的按地区划分小组,在没有遭遇到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受到初战告捷的鼓舞,在国内外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的支持下,经常用打冲锋的办法来抢话筒,对与会代表横加谩骂,而且讲的话常常根本不是冲着人去的,而冲着电视镜头,更不许别人开口。只要见到谁对他们构成威胁,谁能阻拦他们的那种破坏的杀气,比如像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罗季奥诺夫上将等,他们就会像一群疯狗似的扑上去,刻意罗织罪名,提供伪证,以最无耻的手段制造事端,布置心理攻势。

而且,所有的一切立刻就会被各地所效仿,并以同样的方式传入政权机关。

最后,政权终于被夺走了,那些人成了俄罗斯的主子。^①

七、活动方式——建立武装

民族武装的建立标志着社会民主运动彻底走向政治分离主义的道路。

^①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3页。

事实上,作为由多民族成分组成的军队,苏联军队内部已经潜伏着分裂的种子。1987年3月12日,《红星报》指出,武装部队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由非俄罗斯民族的成员组成的,他们中许多人几乎或者根本不会讲俄语。比如,在1个只有10人的班里,有2人是俄罗斯人,其余的是乌兹别克人、巴什基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少数民族。10个人中只有6人能讲流利的俄语,这种情况似乎使演习都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更不用说作战了。语言问题还引起了一些其他问题。语言背景相同的士兵或者来自同一地区的士兵往往在一起形成小团体,这是苏联军队高层所不愿看到的。事实表明:“多年来人所共知的一个问题,但是任何人都不想承认这个问题,即对少数民族的(俄语)语言培训失败了。”^①

1. 党的领导、共产主义与苏联军队

统一的军队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主要支柱。“作为苏共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军队也是苏维埃帝国创建、主权与地位稳固的化身。”^②

一方面,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共产主义教育,使苏联军队成为“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这是苏联军队自我认知及对外宣传的一条至关重要的宗旨”^③。苏联军队从其建立之日起,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武装起来的统一的多民族军队。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凝聚苏联军队内部各民族的政治黏合剂,也是苏联军队政治觉悟的根本所在。列宁指出: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如果不使旧军队完全解体(即反动的或胆小的市侩叫喊的所谓‘瓦解’),不经历一个没有任何军队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时期),不逐渐建立起在艰苦的内战中建立起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取得也不能巩固这种统治地位”^④。早在1918年12月25日,俄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军事部门的政策》的决议就明确提出:“军事部门与所有其他部门和机

^① 《红星报》,1987年3月13日。

^{②③} [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465页。

^④ [俄]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86页。

关一样,它的政策完全是以党通过中央并在中央的直接监督下所发出的一般指示为基础的。”苏联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军队力量和威力的主要源泉。列宁在评价共产党在组织和建设苏联武装力量,取得国内战争胜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时指出:“只是因为党随时戒备,因为党纪律严明,还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的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只是因为我们的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牺牲才出现了今天这样的奇迹。只因为这样,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两次、三次以至四次发动进攻,我们仍然能够获得胜利。”^①苏联共产党必须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领导军事建设,既是由党在苏维埃国家中的领导作用所决定的,也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历史使命和性质及其特点所决定的。“红军存在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进行社会主义自卫的工具。”^②

另一方面,对于军队来说,则通过自身的组织同化功能进一步强化了对苏联共产党及共产主义信念的坚持。红军——这支新型的无产阶级军事组织——之所以强大和有力量,就在于这支军队“进行工作不是遭到强迫”^③,而是建立在“它同苏维埃的亲密关系上,建立在它们亲密无间的关系上,也可以说是建立在它们水乳交融的关系上。苏维埃团结着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而军队建立在捍卫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④。因此,“这支军队知道为什么而战,甘愿忍受比沙皇时代更大的牺牲和困苦,因为它知道,它在保卫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土地、自己在工厂中的权力,它在保卫劳动者的政权”^⑤。斯大林指出:“人们习惯把军队看作防御或进攻的机关。而我把军队看作工人和农民的集合点。全部革命的历史表明,军队是来自不同省份的不相往来的工人和农民的唯一集合点,他们在这

① [俄]列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9页。

② [苏]《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8页。

③ [俄]列宁:“在普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76页。

④ [俄]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4页。

⑤ 同上,第43页。

里聚集在一起并形成他们的政治观点。大规模的动员和严重的战争总要引起某种社会冲突,某种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并不是偶然的。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各个遥远的角落里的农民和工人第一次在军队里见面。要知道,通常沃罗涅什的庄稼汉是看不到彼得堡人的,普斯科夫人也是看不到西伯利亚人的,在军队里他们却碰到一起了。军队是工人和农民的学校,是工人和农民的集合点,从这个观点来看,党在军队中的力量和影响具有极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队是把党同工人、贫苦农民连接起来的最庞大的机关。军队是全俄全联邦的唯一集合点,在这里,来自不同省、区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学习并养成过政治生活的习惯。在这个极其重要的群众性的传达机关中发生了如下的变化:在上次代表大会以前共产党占百分之七点五,今年已达到百分之十点五。在这段期间,军队减少了,但是,质量改善了,党的影响扩大了;在这个主要的集合点里我们在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方面取得了胜利。”^①

可以说,正是苏联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及共产主义的政治信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苏联军队提供了坚强的组织机制和统一的思想共识,从而有力地克服了苏联这支多民族军队中存在的民族主义倾向,使苏联军队成为保障苏维埃政权的“最后一道防线”^②。

2. 政治运动、民族主义与军事力量

然而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共产党的毁灭性打击及其政治多元化后释放出来的民族主义,却抽掉了苏联军队最为关键的两个构件:组织和意识形态。于是在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政治大混乱之际,多民族的苏联军队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军队与民族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息息相关的,这不仅因为军队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民族问题影响苏联帝国的稳定。军队若失去镇压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意愿和能力,那么苏联帝国是否能长久存在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③

① [苏]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7页。

② [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474页。

③ 同上,第318页。

民族主义者开始有目的地鼓动苏联军队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中，反征兵运动就是最为典型的挑动方式。苏联国防部的征兵危机始于1989年，一直持续到1991年，直到苏联解体以后。它开始于外高加索地区和波罗的海三国，后来发展到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中亚共和国。在反征兵运动中，民族分裂运动所起的作用在1990年发生了变化。1989年初，民族主义反对派团体——非正式组织——是这场运动的领袖，共和国政府总体上采取消极态度。然而从1989年底到1990年，共和国政府也开始支持抵制征兵运动。大部分共和国的行政机构或最高苏维埃通过行政或立法措施阻碍征兵工作，特别是士兵分配上的异地服役政策。

1989年夏，格鲁吉亚政府要求从格鲁吉亚入伍的士兵只能在苏联的欧洲部分服役。同年秋天，阿塞拜疆通过主权法规，否认在苏军服役的合法性。10月，拉脱维亚独立组织及其他非正式组织发起反征兵运动。打出了“青年人，宁愿去监狱也别到占领军中服役”和“如果你到苏联帝国军中服役，当心被别人家的妇女、孩子们杀死”的恐吓性标语。父母们拥到招兵办，要求他们的孩子只在拉脱维亚或至少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服役。^①12月，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爱沙尼亚士兵只能在爱沙尼亚境内服役。1990年2月，5000名立陶宛青年交出了征兵通知书，以此庆祝立陶宛1918年独立。3月，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免除立陶宛公民服兵役的义务，并宣布苏联1967年通过的兵役法不再适用于立陶宛公民。3月，乌兹别克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伊斯兰·卡里莫夫宣布，被分配到建设工程兵营的乌兹别克籍士兵只在乌兹别克境内服役。5月，亚美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允许所有亚美尼亚籍士兵参与该共和国境内地震受灾区的重建工作。7月，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通过了《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宣称：“共和国在其领域内的权力是居统治地位的、自主的、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在对外交往中也是独立和平等的。”宣言中说，乌克兰有权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内卫部队和国家安全机关。宣言着重指出：“乌克兰共和国公民一般在共和国境内服军役，未经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同意不得在乌克

^①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9年10月28日电。

兰境外为军事目的服务。”^①9月,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其公民在苏军服役的义务。10月,塔吉克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要求大部分应征青年在该共和国服役。1991年1月4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说必须建立俄罗斯军队。叶利钦的言论引起戈尔巴乔夫的愤怒。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这样的言论是粗暴违反苏联宪法的,是向苏联最高权力机关的挑衅,我们请求1月15日就叶利钦的声明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阐述看法。戈尔巴乔夫说:“我的看法与签名的各位代表的看法一样。这是最粗暴地违反苏联宪法。这项声明不仅仅是对苏联最高权力机关的挑衅,而且给国家的紧张形势增加了对抗的内容。我谴责这种政治上经过深思熟虑的、挑衅性的、无助于社会团结,相反却挑起对抗的行动。必须反对并谴责这种做法。叶利钦同志应当以自我批评的态度确认这一点,并撤销此类呼吁。”^②然而,当历史的时针走进1991年时,戈尔巴乔夫的愤怒也仅仅只是不满的情绪表达而已。事实上,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只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土库曼和白俄罗斯4个共和国没有采取类似的行动。

如果说民族主义的政治反对派反对征兵只是他们谋求国家独立道路上采取的第一步,那么着手组建属于本民族的军事力量则标志着民族分离运动进入夺取政权的最后冲刺阶段。

1991年3月12日,《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我国有多少军队?》的文章。^③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军事力量发展进行了概要性的描述。

亚美尼亚

3年前这里开始出现第一批武装部队。到1990年夏天,亚美尼亚的军事行动舞台上出现了两大军事组织——亚美尼亚民族军和亚美尼亚全民运动战斗纠察队。8月中旬以前,两大集团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看谁能更快地解除内务部队和民警的武装(1989至1990年,亚美尼亚

① 塔斯社基辅1990年7月16日电。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1月15日电。

③ [苏]巴亚利诺夫等:《我国有多少军队?》,《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3月12日。

的大多数民警都被夺走了武器)和抢夺军队的弹药库(轰动一时的事件是,1990年8月2日抢走了165个火焰喷射器)。1990年9月以前,亚美尼亚民族军是亚美尼亚最大的武装组织。总指挥是莫斯科财经学院前函授大学生,叫瓦西良。他曾多次表示,亚美尼亚民族军只服从共和国的新议会。去年夏天,在竞选运动中,亚美尼亚民族军同亚美尼亚全民运动的关系尖锐起来了。据估计,亚美尼亚民族武装人员的人数在14万到几十万之间。装备是各种各样的:轻武器,其中包括自动武器,还有火炮、直升机,导弹装置和火焰喷射器。

阿塞拜疆

1990年1月,这里出现并且开始形成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武装队伍,1月12日,在巴库成立了民族防御委员会。在联盟军队1990年1月20日进驻以后,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军事结构被破坏,民族防御委员会领导人被逮捕,该委员会随之解体。在纳卡州还存在着个别准游击队性质的组织,在纳希切万,军事组织看来已经停止了活动。

格鲁吉亚

去年12月20日,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成立内务部队——格鲁吉亚共和国民族军法》。最高苏维埃主席加姆萨胡尔季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近卫军的人数计划大约有1.3万人。其实,格鲁吉亚已经存在着好几个武装组织,它们是在1989年4月9日第比利斯事件后出现的。其中最出名的是“白色格奥尔吉”和“骑士”。“白色格奥尔吉”支持最高苏维埃主席加姆萨胡尔季阿,在目前出现的南奥塞梯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去年夏天,“白色格奥尔吉”和“骑士”之间发生了冲突,在第比利斯中心一度爆发了枪战。“骑士”是反对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军事化组织,得到与共和国现政府唱对台戏的国民大会的支持。据称,该组织共有2000名正式成员,还有4000名候补人员。“鹰”是1989年夏天成立的军事化组织,在最高苏维埃和国民大会的冲突中目前保持着中立。阿布哈兹武装组织是1989年夏天的冲突中出现的。那个时候,阿布哈兹大多数成年男子都被组织在一起,并分配到各军事小队。一旦发生新的冲突,可以在短时间内拉出一支不大(阿布哈兹总共大约

有8万人)但作战能力强的军队。在南奥塞梯,自卫队和战斗队装备着轻武器,其中包括自动武器,还拥有导弹装置。

摩尔多瓦

去年11月上旬开始建立官方的军事组织。一批志愿人员加入了第一大队,他们在10月份进攻打算脱离摩尔多瓦的加告兹中表现出色。现在已着手建立第二大队。在摩尔多瓦境内,现在存在着两个未被正式承认、但已宣布拥有主权的实体——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和加告兹地区。因而也存在着两大军事组织。在德涅斯特河沿岸,这里在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后立即开始组建工人纠察队。劳动集体联合委员会领导着这些组织的行动,一旦有必要,几千人可以拿起武器。在众人皆知的共和国南部事件中,大约有800人的一支队伍前去帮助加告兹人。加告兹自卫队是在去年10月底这里实行紧急状态前夕自发成立的。

立陶宛

立陶宛边疆保卫局成立于1990年春天,其目的是培养海关和边防部门工作人员。其中央和分支机构一般都设在前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的大楼里。今年1月,空降兵首先把该机构人员从那里赶了出来。保卫局没有得到普伦斯克涅政府和纳税人的应有支持。立陶宛的另一个军事组织叫“沙乌柳·萨云加”,成立于资产阶级的立陶宛时期,1988年重新登场。它有自己的军服和条令。在1月事件期间,公开表示忠于独立的立陶宛。与立陶宛这两个军事组织相对立的是“工人队伍”。“工人队伍”是从1988年开始出现的。从去年3月起,联盟所属的工厂开始大规模地组建这种队伍。在1月事件以前,其人数已相当可观。

拉脱维亚

旧制度时期的军事组织“艾兹萨尔格”宣布恢复。对立的一方——拉脱维亚族际阵线也不甘示弱,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组织工人武装纠察队。最负有盛名的是里加特种民警部队的“黑贝雷帽”。有6名队员曾经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内务部大楼。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人数不详,也不知道受谁领导。

爱沙尼亚

一下子建立了两个军事组织——“保卫祖国”和“保卫联盟”。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在维尔纽斯1月事件以后开始坚决捍卫共和国议会。“保卫联盟”还因在国内第一个征集参加反对萨达姆战争的志愿者而闻名。

乌克兰

早就在呼吁建立民族军。不久前，宣布恢复谢奇射击手队伍。乌克兰政党间大会联合了几个组织，它们认为自己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和乌克兰起义军的继承者。政党间大会领导人舒赫维奇说，他准备最近就着手组建乌克兰民族军。

在白俄罗斯、哈萨克、土库曼、塔吉克、乌兹别克和俄罗斯联邦，目前还没有发现组建军队的迹象。

八、活动方式——西方支持

谁也不会怀疑，在高举着“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旗号的苏联社会民主运动背后，总是或明或暗地闪现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影子。事实上，争取西方在舆论和政治上的支持，这是社会民主运动后期民族主义者孜孜以求的目标。无论是在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还是在以煤矿工人罢工为代表的工人运动中，西方国家从来不会缺席。根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看法：“西方为波罗的海三国安排了使苏联解体的某种雷管的角色。”^①

1. 方式一：制造舆论

西方国家通常利用全球性垄断媒体的传播优势，为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摇旗呐喊、擂鼓助威。

1987年8月24日，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文章：爱沙尼亚人大胆

^① [俄]维·什罗宁：《克格勃X档案》，赵云平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29页。

为他们的民族文化辩护,反对俄国统治。^①

一些爱沙尼亚公众和文人凭借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提出坦率的反苏要求。如果他们在几年以前提出这些要求,他们将会被送到盐矿去劳动。

作曲家列波·苏梅拉上个月在塔林市政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宣布,他和其他一些文人发现商业区有三条街道的名称特别令人作呕。他要求立即恢复这些街道过去的爱沙尼亚名称。

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使苏联有机会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决定命运的条约48年后的今天,反对苏联统治的情绪仍在代代相传。

虽然这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土生土长的人口太少,若他们举行反对克里姆林宫的暴动,也无法取得成功,但是塔林市政委员会关于街道名称的辩论表明,当局认识到他们是坐在一个潜在的火药桶上。

苏梅拉的要求在市政委员会没有遭到拒绝。最后,领导集团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对于去爱沙尼亚的游客来说,爱沙尼亚族人和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人的紧张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爱沙尼亚人在共和国150万人口中占微弱多数,但是在塔林和其他城市,俄罗斯人超过了他们。

爱沙尼亚作家埃恩·韦特马最近在大胆会见共和国的俄文报纸《苏维埃爱沙尼亚报》的记者时直截了当地宣布:“现在被普遍认为是政治错误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目前我们共和国内民族关系现状的决定因素。”

这位作家只提到长期关系不和的一方面原因——1940年没收私人农场以及战后继续使用的斯大林集体化方法。

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签订将达一年之后,独立的爱沙尼亚同苏联的关系看起来是正常的。但是1940年6月,克里姆林宫提出了最后

^① [美]《巴尔的摩太阳报》,1987年8月24日。

通牒(以8小时为期限),要求组织亲苏联的内阁,并且立即接受不限数量的苏联军队。

爱沙尼亚照办了。在后来的选举中,苏联使所有非共产党人员的候选人都失去了资格。

对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吞并战略是类似的。在吞并之后,斯大林的助手迅速采取行动,摧毁爱沙尼亚过去的统治阶级,成千成万的爱沙尼亚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

今天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加盟共和国的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任何想摆脱苏联而独立的希望都是不现实的。但是许多爱沙尼亚人都通过自己的服装的颜色来表达他们的感情。他们的衣服的颜色与目前禁止悬挂的以前是独立的爱沙尼亚的旗帜的颜色完全一样。

俄罗斯人源源不断涌进爱沙尼亚以及爱沙尼亚的语言和文化的稳定状态是目前对爱沙尼亚民族之间的关系影响最大的问题。

1988年2月29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继续压制持不同政见活动。^①

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只不过是苏联领土波罗的海沿岸的几小块力量薄弱的地区。戈尔巴乔夫无意削弱莫斯科对这个地区的控制。然而他的改革却促使一些人决心保持主要靠西方而不是靠俄罗斯形成的生活方式。他们采取的是和平方式。罗马天主教的一位活动分子上周在立陶宛告诉西方记者说:“我们不用坦克,我们不用机关枪。我们甚至不用渎神手段。如果他们打击我们,我们并不反击。”

在波罗的海地区,人们对于逐渐进行的俄罗斯化总是忧心忡忡的。事实上,爱沙尼亚最近采取的一个减少俄罗斯移民的措施是规定从其他地方输入工人的企业要按每人2.7万美元的税率交税。此外,戈尔巴乔夫时代填补苏联历史中悲惨“空白”的政策有助于煽起反俄罗斯情

① [美]《新闻周刊》,1988年2月29日。

绪。波罗的海地区的一些报纸如今经常评论莫斯科统治的许多过去的过火行动。这些包括强迫实行农业合作化、战争期间把成千上万的“潜在的纳粹合作者”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驱逐到西伯利亚集中营。

戈尔巴乔夫为振兴苏联经济所作的努力又揭开了波罗的海地区的旧伤疤。爱沙尼亚人抱怨说,本地生产的肉和奶大部分运往其他地区,结果他们自己的货架空空如也。他们还说,对于苏联要波罗的海地区提供优质服装和其他产品的要求,他们必须满足,但是苏联运给他们的则是劣等产品。爱沙尼亚的派尔努市最近甚至组织了一次“充分利用坏事”展览会——关于如何使用从苏联其它共和国运来的建筑材料次品的示范表演。一些当地的经济学家开始主张应让爱沙尼亚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不再听从莫斯科的命令和控制。

1990年1月2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戈尔巴乔夫继续执政与美国利害攸关,波罗的海局势引起严重担忧。^①

当民族冲突和分裂主义的压力冲击着苏联之际,美国官员不得不承认戈尔巴乔夫主席的继续执政与美国利害攸关,这种利害关系现在已压倒了冷战时的老的希望——希望俄国分崩离析。

美国官员对高加索南部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和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流血冲突表示担心,但他们说,他们更担忧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被迫并入苏联的立陶宛和其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不断发展的争取独立的运动。

美国50年的政策一直把这几个波罗的海国家看作“被俘国”,苏联没有正当理由统治它们。如果戈尔巴乔夫为防止立陶宛、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脱离苏联而使用武力的话,那么,美国几乎肯定要在下面这两者中作一抉择——或是奉行老的“被俘国”政策,或是希望看到戈尔巴乔夫从压在他身上的许多包袱中解脱出来。

^① [美]《华盛顿邮报》,1990年1月21日。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戈尔巴乔夫成功地使苏联制度在政治上开放，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牺牲品。老百姓现在有了更多的表示不满的自由，他们越来越大胆地明确表示他们没有看到经济改革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任何改善，他们已经等厌了。

另一位官员指出，东欧夏季以来的局势发展已引起了一种新的忧虑，自从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他不会利用苏联坦克把这些东欧国家保持在莫斯科的轨道之内以后，这些国家就在以它们最快的速度脱离共产主义，转向自由市场经济。这显然多少也是某些苏联的共和国中正在露头的分裂主义态度的推动力。

官员们说，立陶宛扬言要分离出去一举是一个严重的短期威胁，这种威胁使可能的敌对分子有了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正在导致这个国家解体的借口。

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说：“如果立陶宛分离出去的话苏联完整的存在将处于危险中。几乎可以肯定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将会仿效。此外，这个先例只限于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还是会蔓延到格鲁吉亚、摩尔多维亚和乌克兰，其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

这些官员认为，至于一旦有一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分离出去，美国怎么办的问题，这完全是一种假设，现在还无法回答。但是有些人承认，美国最终可能处于这样难堪的处境，即发现“被俘国”的政策在可能有损于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将会实现。

然而，别的官员认为，美国不会以权宜之计的名义放弃原则。一位官员说：“如果我们站出来支持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卫星国的独立，我们不能因为苏联人说，立陶宛是苏联的一部分而有理由背弃它。”

1990年3月28日，英国《卫报》发表评论：波罗的海地区寻找平衡的行动。^①

^① [英]《卫报》1990年3月28日。

立陶宛领导人单方面宣布独立两周以来的立陶宛危机给西方各国首都敲响了警钟。立陶宛领导人兰茨贝吉斯呼吁西方给予支持,这使北约盟国面临着自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最严重的进退两难处境。这一次,如果不冒同苏联发生相对抗的风险,西方国家又一次几乎不可能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即使它们想做什么事的话。兰茨贝吉斯想必懂得这一点,他敦促西方至少先毫不含糊地声明苏联法律不再适用于立陶宛,并从外交上承认他的政府。这样的挑战引起了政治上的严重不安。

西方领导人已经无法确定戈尔巴乔夫在有关立陶宛的决策上是否仍保持住完全的控制权,他们不愿意采取可能进一步削弱他的权威的任何行动。但是,他们还有更深一层的忧虑,苏联的权威与立陶宛要独立的决心之间的对立具有火药桶的特点,火药桶随时都有可能爆炸而给戈尔巴乔夫、改革、公开性、军备控制谈判和东西方关系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给欧洲正在出现的新的政治结构以及冷战之后欧洲走向更加和平、更加民主的秩序的潮流中其他一切有希望的现象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英国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政府告诫过兰茨贝吉斯,不要指望独立的立陶宛会早日得到外交承认。外交事务国务大臣解释说,英国只正式承认那些“对自己的对外政策和自己的领土控制得住、能生存下去的现有国家”。立陶宛现在还不具备这些条件。甚至美国至今也没有表示愿意同兰茨贝吉斯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1990年3月2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欧洲人担心立陶宛的独立可能使民主化降到次要地位。^①

在欧洲国家领导人对苏联在立陶宛的压制策略小心谨慎的反应后面潜藏着这样一种担心:苏联军队可能在那里用暴力形式同民族主义

^① [美]《华盛顿邮报》,1990年3月29日。

者摊牌,这有可能打乱正在迅速给东欧带来民主并结束冷战的进程。欧洲人担心,立陶宛的流血行动可能削弱对欧洲的剧变起了促进作用的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和政策。此外他们还担心,暴力行动将严重影响或破坏一系列微妙的东西方外交谈判和预定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的一些协议。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西方国家政府还有一件事感到不安:立陶宛的独立尝试已经在苏联引起了一个内部解体的很长的进程,它对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具有潜在的巨大危险和严重后果。没有人确知戈尔巴乔夫是否完全控制着他的保安部队,也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进程将朝哪个方向发展,他们害怕说出或做出任何可能引起不稳的事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该组织官方对这个问题一直保持沉默——内部的一位人士说:“立陶宛不是阿富汗。现在有一种感觉:立陶宛的人民走得有点太远、太快了,只要每个人稍微停一下,就可以使问题得到一个解决的机会。”

在舆论的操纵下,西方国家“扮演了一个对他们来说显然不合适的苏联波罗的海各族人民的教师爷角色”^①。

2. 方式二:政治施压

当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日趋激烈的时候,西方国家开始不断给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府施压,希望不要采用武力镇压办法来解决问题。否则,西方将会慎重考虑对苏联的经济援助问题。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恢复独立的立陶宛国家的法令。法令指出,立陶宛1940年加入苏联是“外来力量限制”立陶宛国家的主权。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批准了国家的新名称——立陶宛共和国和国徽。通过了废除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宪法和苏联宪法在立陶宛领土上的效力的法律。批准了以1938年立陶宛共和国宪法为基础的《立陶宛共和国临时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87年8月23日电。

基本法》。^① 立陶宛宣布独立的目的是要迫使莫斯科就准许它享有充分自由一事举行谈判。

为了防止苏联政府对此作出过激反应,在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刚刚通过独立法令后,美国政府敦促苏联尊重立陶宛议会所作出的独立决定,并呼吁苏联与立陶宛政府进行谈判和有关各方避免出现暴力。

1990年3月11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说:“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苏联对立陶宛的合并……我们希望,(对立陶宛的)承认应考虑到一个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最终政府。”“立陶宛新议会已宣布其恢复立陶宛独立的打算。美国将要敦促苏联政府尊重立陶宛公民通过他们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所表达的意愿。”^②此外,英国外交大臣威廉·沃尔德格雷夫在接受电台记者采访时说,英国对立陶宛发生的事情表示欢迎,但是恐怕不得不拒绝任何要现在就承认立陶宛的请求。法国外交部说:“法国希望苏联和立陶宛现在能够通过谈判建立新的关系。”^③

1990年3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将于本周末在维尔纽斯和考纳斯举行军事演习。面对骤然紧张的局势,美国参议院迅速在22日以93:0的表决通过决议,要求苏联停止恫吓立陶宛,并敦促布什考虑立陶宛的建立外交关系的要求。布什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他说,美国支持立陶宛人的自决权。他警告苏联政府,对脱离苏联的立陶宛共和国采取的任何恫吓或动用武力的行动“注定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布什宣称美国与立陶宛人民站在一起,同时又说:“这是一个复杂的、敏感的时期,要求各方领导人保持现实、冷静的头脑。”^④

1990年4月5日,美国众议院以压倒多数要求美国政府承认立陶宛,重申支持立陶宛脱离苏联。

1990年4月11日,布什再次告诫戈尔巴乔夫不要对立陶宛使用武力。布什说,现在立陶宛需要的是对话,而不是坦克。

① 塔斯社维尔纽斯1990年3月11日电。

② 美联社华盛顿1990年3月11日电。

③ 路透社伦敦1990年3月12日电。

④ 美联社华盛顿1990年3月23日电。

1990年4月18日,法国外交部长罗朗·迪马在国民议会宣布,他要求欧共体12国设立一个“专家委员会”,以便研究立陶宛问题和考虑西方将可能为立陶宛人民而采取的行动。

1990年4月25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国会发言时说,苏联必须让立陶宛人来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但是他又说,政府仍不准备对莫斯科实行经济制裁,迫使它同立陶宛领导人举行谈判。贝克说:“我们专注于悄悄外交,以努力促进这种对话。我们在决定我们的政策时应该考虑到实现自由和自决的脆弱的环境。”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美国政府已经拒绝了派遣一名大使驻立陶宛的建议。^①

1990年5月3日,布什在白宫会见立陶宛总理普伦斯克涅。布什重申他强烈支持立陶宛人民的自决权。

1990年6月13日,布什对戈尔巴乔夫开始同波罗的海三共和国领导人会谈表示赞赏,说这是一则“好消息”。

1991年1月维尔纽斯事件后,立陶宛局势不断恶化。美国国务卿贝克严厉谴责苏联在立陶宛的镇压行动,并说这种行动将损害美苏关系。他说:“持久的美苏合作关系即实际上的伙伴关系最终取决于改革是否推行下去,因为如果价值观念不同,那么伙伴关系就不可能存在了。”^②

1991年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特怀勒发表谈话,对苏联军队在立陶宛首都加强警戒措施提出批评。她说:“我们不理解这种公开显示武力的做法怎么能与莫斯科表示要避免暴力的意愿相吻合。我们继续要求立陶宛和莫斯科之间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诚意谈判加以解决。”^③

1991年8月24日,丹麦正式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丹麦成为第一个全面承认这三个共和国独立的国家。

3. 方式三:组织支持

在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进行政治声援的同时,西方国家也通过

① 美联社华盛顿1990年4月25日电。

② 法新社安卡拉1991年1月13日电。

③ 美联社华盛顿1991年6月4日电。

各种渠道加强对独立运动的组织支持。

一是广泛利用波罗的海三国在国外流亡的民族主义组织。如旅美立陶宛人民委员会、旅加立陶宛人民委员会、立陶宛解放最高委员会、立陶宛国际联合会、加拿大“立陶宛复兴运动”等。这些流亡组织的政治目标明确,就是使通过利用一切方式使立陶宛脱离苏联而独立。1989年8月30日,立陶宛解放最高委员会(简称“立解”)主席K. 鲍比亚利斯在“自由欧洲”电台声称:“立解注视着立陶宛的事件并做出一切努力,向世界,特别是不承认对立陶宛占领状态的西方政府表明立陶宛人满怀信心的步骤、他们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①

二是派遣人员全面接触、拉拢波罗的海独立运动的领导人。1991年3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根纳季·季托夫对《工人论坛报》记者说,美国人近几个月已进入这个波罗的海共和国,这是美国制订的“推翻苏维埃制度、摧毁苏维埃帝国”的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大约有十五名美国人,其中至少有一人是美国国务院顾问,已进入立陶宛对那里要求独立的好斗分子进行军事训练。一位曾在阿富汗反政府军任教官、名叫安德鲁斯·艾维的人已用旅游签证进入立陶宛,目前在立陶宛议会防务组织任顾问,“教他们掌握游击战和恐怖活动手段”。在这15个美国“顾问”中,还包括“前白宫官员科亚利斯·利纳斯、目前在国务院任职的萨卡多尔斯基斯·罗马斯、与极右势力关系密切的百万富翁卡茨卡斯·朱奥扎斯及其女儿朱莉特”。季托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装扮成外交官、新闻记者、旅游者的身份与苏联公民接触,“特别是同政界、新闻界人士、非官方组织、各种民族团体和宗教团体的成员接触”。季托夫还说,西方情报机构对议会代表、罢工委员会的负责人感兴趣,“准备把他们送到波兰学习团结工会的经验”。美国、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右翼团体“直接介入了试图摧毁苏联的活动”。^②

^① [俄]维·什罗宁:《克格勃X档案》,赵云平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45页。

^② 法新社莫斯科1991年3月30日电。

第五章 社会民主运动的政治效应

社会民主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破除停滞时代以来形成的“腐蚀心灵的消极和冷漠”^①态度，克服实际情况与所宣布的政策之间根深蒂固的脱节现象，实现社会精神领域的重大变化，这是“我国社会中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情和实质”^②。然而当“民主”的号召演变成为充满了各种异己因素的群众性运动时，一切都开始脱离预设的政治轨道而走向了毁灭现有秩序的悲剧。“所有群众运动都会激起其追随者赴死的决心和团结行动的意愿；不管它们宣扬的主张或制定的纲领为何，所有群众运动都会助长狂热、激情、热望、仇恨和不宽容；所有群众运动都能够从生活的某些部门释放出强大的动能。”^③于是在政治的纷乱之中，社会民主运动被怀有各种目的的人变成了冲击苏联政治秩序的强大力量。

一、社会情绪：挑动人民不满

如果从社会民主运动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其对“公开性”“民主化”的理解集中起来就是：挑动和培养人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并通过群众性的极端活动释放其对现有秩序的强大破坏力。事实上，苏联社会广泛存在的不满情绪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不过在改革的年代里，这种社会不满情绪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89页。

② 同上，第90页。

③ [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页。

本来可以通过改革发展来加以释放排除,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急躁冒进却使改革在遭遇挫折的过程中,又在原有的不满情绪的基础之上制造和累积了更多的社会不满。原来可以容忍社会不满情绪的旧的社会结构被彻底打乱,社会大众的情绪在从不满变成怨气、从期望变成失望甚至绝望后,社会民主运动在社会失意者的加入下迅速从“精英型”一变而为“群众性”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苏联社会的根基开始动摇了!

1. 改革期望与苏联的社会心理变化

人民需要改革吗?

戈尔巴乔夫回答:需要!因为改革是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深刻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业已成熟的必要性。这个社会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变革的地步。“在工人阶级、农民中,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党的机关里,在中央和地方,逐渐开始认真思考国内发生的事情,更明确地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①可以说,变革是这个社会历史历尽磨难才达到的。而推迟改革在最近的将来就可能导致国内形势的尖锐化,直率地说,国内形势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我们产生改革的思想,不仅是受实用的利益和想法的影响,而且是出于良心不安的召唤,是由于从革命那里继承下来的永不衰竭的思想的影响,是由于理论探索的结果,这种理论探索加深了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坚定了采取行动的愿望。”^②

人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

戈尔巴乔夫回答:权利!民主的权利!在1986年10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必须“力求正确解决每一个与为苏联人民服务有关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远非阔绰,还不富裕。是的,我们解决了涉及人的社会地位的主要问题。我们给了人民劳动权、受教育权、居住权、保健权(尽管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以及基本生存权——能在和平中生活的权利。这是我们给予人民的最主要的东西。但是,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还很落后。新的任务,加速和改革的任务,使所有这些问题更加尖锐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0~21页。

^② 同上,第21页。

地摆在我们面前,产生了不少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问题”^①。

改革在持续进行,戈尔巴乔夫许诺的民主权利在“公开性”“民主化”运动中,人民也已经慢慢地得到以前从未想过的属于自己的权利。人们对改革的前景表示乐观。1987年11月26日,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苏联28个地区进行的关于生活方式问题的广泛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在约一万人的被调查中间,有72%的被调查者表示会乐观地看待未来、相信未来。只有10%的人作了否定的答复。而据分析,在不相信未来的人中间,多半是身体状况不好的人、改革和净化社会生活的进程触及了其利益的人以及被调查时正在闹家庭矛盾的人。^②在苏联人看来,生活虽然很艰难,但一切都要向前看。

但是社会经济的停滞和恶化,开始侵蚀着人们的乐观情绪。1989年美国《时代》周刊在苏联就改革等问题对一千多名莫斯科居民的民意测验表明:“关于苏联改革开始后的三年中物质生活的变化”,认为有改善者占23%,认为恶化者占25%,认为无变化者占47%,认为难以回答者占5%。^③在俄罗斯社会,在整个苏联,在各个共和国之间,分裂路线相互繁殖,斗争和争论愈演愈烈。甚至连党的出版物都宣称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改革不只是失败的问题,而是彻底的失败。“国家在滑坡之中,政权无能为力”;“商店里空荡荡的货架”;“犯罪猖獗,失业严重”;“民族冲突导致流血”;“街上行人愁眉不展的表情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我们社会的昏暗处境和危机”;“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出现危机,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遭到侵蚀”——《年轻共产党员》杂志在1990年底就是这样描绘国家形势的。国内几乎所有地方都对肉、糖、油、米,甚至牛奶都实行凭票额供应体制。肉类罐头、香肠,便宜的糖果和葵花油,在商店里早已脱销。从1990年秋天开始,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也实行每周食品定额。“对于很多观察家来说,这样急剧下降实在令人费解。”^④

①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46~547页。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87年11月26日电。

③ [美]《时代》周刊1989年第15期。

④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费解”的是人民,但却不是戈尔巴乔夫。他明白地告诉人民,生活之所以变得这样糟糕,是因为党内有阻力,是他们的守旧思想阻碍了改革的前进步伐。在1986年10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给出了结论:“在这一方面我们有一些顽固不化的人,他们把经济和投资搞糟糕了——可以说把人民的必需品供应搞瘫了……而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些人甚至不让讲新话,不让讲成绩。我想,我们还会碰到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可怜理论家,而且不止一次碰到。他们把主要心思放在加强党对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①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今天的生活之所以变坏,就是因为原先的党的领导们——政治局成员“把经济搞糟了”,“把供应搞瘫了”而且还想做“可怜的理论家”。于是,戈尔巴乔夫告诉人民,生活是美好的,要有耐心,要给他时间。

人民相信了戈尔巴乔夫。但他在干什么呢?否定过去、否定人民的历史!通过连续不断的报刊揭露和学者的精心论证,戈尔巴乔夫试图让人民知道“真相”:现在的糟糕生活是过去的错误导致的。“到1988年,关于效益、增长率、技术进步、质量、生活水平的经济问题和第27次代表大会的其他问题,都转嫁成为勃列日涅夫的问题。社会上充斥着骇人听闻的著作。更糟的是,后来勃列日涅夫的‘错误’又被笼统地等同于苏联的产物。”^②戈尔巴乔夫劝说人民:要摆脱这种旧体制,必须要从精神上彻底颠覆它。于是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的大旗挥舞下,改革的“工程师”们一拥而上,“他们不去抓经济增长,而开始搞‘精神’增长”^③。

人民的生活?自由的空气都有了,还怕没有面包吗?!

然而人民的不满情绪继续在酝酿着。“1989年是苏联犯了致命错误的一年。”^④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在国内展开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民主运动。各

①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47页。

②③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马细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④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40页。

社会组织和各种富有首创精神的团体都全力投入运动,代表候选人之间常常发生激烈的舌战。每个席位都有几个人竞选。竞选情绪越来越激动。“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成功的保障就愈大。如果你谩骂党,你就大可放心,因为你肯定会当选。”^①结果是这种方法到处被滥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许诺提高生活水平。人们相信这一点,成功也就随之而来。所有的批评言论都说到了人们的心里。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期望很大,但是四年之后他们的希望破灭了,生活困难和混乱的现象越来越厉害。人民感到,困难重重,民族关系加剧,犯罪严重,供应恶化,前途一团糟。人们寻求救星,抛弃那些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困难的人。他们可以崇拜那些给他们带来幸福、给祖国带来荣誉的人,把他们当作偶像,但是不能容忍使自己的生活状况恶化。

公众的信心随着获得言论自由而一落千丈。集中控制的经济使民族主义获得了滋生的温床。经济改革已经止步不前——或者根本没有认真地做过尝试,摇摇欲坠的经济加剧了不满情绪。而公开的差额选举使这种情绪上的激动和心理上的焦虑通过人民的“代表”得到了肆意的发泄。在1988—1989年间,“感恩知恩的全国上下与改革领头人之间热恋中显露出来的初次异常,并未导致公民经济状况的实际恶化,更未引起国家解体的悲剧性后果,那都是后来的事情。眼下人们开始表现出来的,仅仅限于因为生活迅速得到改善的希望迟迟无法实现而产生的不满情绪。生活当然是‘变得快活了’,却显然并未变得更好,不过可以希望的东西同原来相比是多得多了。这就足以使许多人感到自己受骗了,感到自己很不幸。新政权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的这种潜在的进展之所以会以愈来愈猛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还因为由于改革者本身的努力,原来‘哑然无声’的社会得到了自我表达的讲台——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舞台、电视屏幕和媒体”^②。

在这些“自我表达的讲台”上,人们看到:“许多不称职的人,甚至连曾因恶性犯罪、杀人坐牢的罪犯也出现在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中。而那些竞选纲

①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322页。

②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06~207页。

领旨在反苏、反共的空谈家和蛊惑人心者更是数不胜数。在这种条件下本应该广泛进行党的宣传,宣传自己的候选人,揭穿某些人不现实、无根据的许诺。”^①得到释放的候选人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筹码,“不仅因为他们急于尽快地切断那仍将国家与不久前的极权主义过去联系起来的线索,或者是急于让戈尔巴乔夫本人与之一刀两断。他们那愈来愈高的声音和日益强烈的自尊心迫使他正视他们,主要是因为这种激进主义反映了全国上下的焦急情绪,全国上下开始公开地一再要求改革及其首倡者拿出具体的成果来”^②。甚至于连共产党自己的候选人也开始竞相攻击以争取选票。“形势发展到共产党候选人互相攻击,这使政治上的对手更容易获得选举权。在集会浪潮中掀起的反共主义,全盘否定历史的狂潮成了所谓‘民主’力量的竞选手段。”^③

戈尔巴乔夫突然发现,他释放出来的竟然是这样的东西!“大概他只是没有料到,公开性,在一定阶段上,(也喜欢这样说)会使他所宣布的改革目标(完善社会主义)变成与他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④原因在哪里呢?“归根结蒂,悲剧并不在于某项计划遭否决或被出卖。而在于,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旧体制越来越威信扫地,越来越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除了空谈,除了一些精明的人在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里迅猛地填补真空外,并没有任何东西来取代这一旧的体制。”^⑤这时,戈尔巴乔夫开始亲身体会到实际上所有的改革者都无法摆脱的那种厄运的作用:“始于良好的愿望而且顺应公众期望的改革,因为仅仅预言奇迹的出现,却通常都不会带来奇迹,徒然增加了不满者的数量,而且往往使这些人调转头来反对改革者本人。”^⑥

甚至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发生了决定性变化。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分数”就不是通过报纸调查的相对支持率,而是通过议会中的投票

①③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②⑥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

④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

⑤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前言,第2页。

来展示了。

从1989年春天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到1990年3月当选苏联总统,仅仅一年的时间,投赞成票的代表比例由96%下降到59%,而他当选总统本身,最终是靠诸如雅科夫列夫、索布恰克、维·戈利丹斯基院士和德·利哈乔夫院士之类社会名流向代表大会发出激昂慷慨的呼吁来保障的。^①

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整个社会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持续不断地下降。1989年12月,有52%的被调查者完全赞同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到1990年1月,这个数字降到了44%,5月份是29%,7月份是28%,而10月份只有21%了。到当年年底就降到20%。1990年年底挑选“年度风云人物”的民意调查显示,32%的被调查者支持叶利钦,只有19%的人选择了戈尔巴乔夫。一年前,支持戈尔巴乔夫为年度风云人物的公众有46%,支持叶利钦的只有6%。1991年头几个月,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持续下降——15%,13%,10%。^② 莫斯科的一家报纸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的知名度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几乎没人听他讲话,他可以机敏,也可以愚蠢,可以好,也可以坏,反正人民对他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他也不寄予任何希望了。”^③

2. 社会情绪与社会民主运动极端化

伴随着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和对改革的持续性失望,苏联社会出现了普遍性的“失意者”。从党的机关到政府工作人员、从社会精英到普通大众,改革所带来的后果不断强化着无法忍受现状的社会负面情绪。

1989年《星火》杂志第44期公布了苏联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开展的全国民意测验结果。在关于“今后几年我国的经济状况能否发生变化”的选项中,认为“将会好转”的占23.7%;认为“将会恶化”的占10.0%;认为“不会发生变化”的占28.1%;认为“先好转,后恶化”的占3.2%;认为“先恶化,后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07页。

②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521页。

③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好转”的占35.0%。

自从1990年5月24日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作了有关向市场经济过渡和调整零售价方案的报告后,莫斯科掀起了新一轮的抢购风潮。从5月28日起,莫斯科市和州的各商店开始凭当地身份证向顾客出售消费品,并严格限量。具体情况是:面包、肉、鲜鱼、面粉和其他粮食、盐和水果,每人每次限2公斤,香肠、糖果、饼干、面条、植物油、面包干和面包圈限1公斤、奶渣和咖啡豆限0.5公斤。奶酪和动物油限300克,人造黄油限两包。其他食品的限量为:鸡蛋10只,果汁和矿泉水5瓶,速溶咖啡1罐,酒2瓶、卷烟10包。服装靴鞋的限量为:成人服装3件,儿童衬衣2件,纺织品根据不同种类限3米至10米,针织内衣5件,鞋3双,袜子3双。其他商品的限量为:肥皂或牙膏2块(支),灯泡5只,杯碗盘6件,地板革5米,墙纸8卷。^①即便如此,面对汹涌而来的顾客,商店已是无粮可售。

苏联社会广为流传的“买汽车”的笑话表达了民众普遍的愤懑心理。

伊凡诺夫终于攒足了购买汽车的钱,于是来到汽车公司交款处付款。

售货员说:“您的汽车将于10年后的今天交货。”

伊凡诺夫问:“是上午还是下午?”

售货员反问:“您现在要知道这么确切有那么重要吗?”

伊凡诺夫答:“因为管子工那天上午要来。”

改革,已经使大多数苏联人丧失了信心。于是在政治多元化的刺激下,在各色政治反对派对未来的美好许诺下,大量“失意者”开始纷纷加入社会民主运动中去。从“民主”的旁观者一变而为“民主”的参与者。“对失意者来说,群众运动是一种替代品:要不是可以替代他的整个‘自我’,就是可以替代一些能让他的生活可以勉强忍受的元素。”^②

^① 新华社莫斯科1990年5月24日电。

^② [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于是,社会生活迅速走向极端政治化——取消苏联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那是一个涌现出众多的无私的积极分子的时代,自发的墙报宣传的时代。在候选人铅印的宣传画旁,可以看到手写的传单,有时是通篇介绍生活中不公正现象的文章。那还是一个在大街上即兴讨论俱乐部和政治化的排长队的时代。复印机感受到真正的高潮,经过专门登记并受到严格保管的、当时为数不多的复印机被用得发烫,复印了无数的报刊文章、著名的反对派的讲话和各种‘保密’的速记稿和文件。”^①在民主派的舆论造势下,叶利钦作为反对苏共中央代表的旧秩序的“政治救星”开始赢得了对戈尔巴乔夫的优势。

1990年7月,正值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苏联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公布了两个月前就苏联居民对政治活动家们的态度问题进行的民意测验结果。在2680名被调查者中有61.3%的人对叶利钦的活动表示完全赞成;21%的人不完全赞成;5.3%的人不赞成。而对戈尔巴乔夫的活动只有28.5%的被调查者完全赞成;40%的人不完全赞成;19.5%的人不赞成。在回答“谁的行为你最喜欢”这一问题时(要求提出1~2个人名),有34.2%的被调查者提到叶利钦,10.2%的人提到戈尔巴乔夫,只有2.7%的人提到雷日科夫的名字。^② 调查结果表明,叶利钦的威望已远远超过戈尔巴乔夫。

充满信心的叶利钦开始在摆脱苏联共产党政治羁绊时发出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在苏共二十八大会上,叶利钦说:

我们为党贡献了几十年的生命,认为有义务来这里说,苏共的出路还是有的。虽然困难、艰巨,但是是有出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转向多党制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在组织上把苏共党内现在提出来的一些纲领都记录下来,让每个党员都有时间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应该改变党的名称。这个党应称为民主社会党。党不应该具有任何国家的功能……^③

① [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② [中]《参考消息》1990年9月18日。

③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45页。

当大会开始宣读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名单时,叶利钦再次要求发言。他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

叶利钦的退党举动标志着苏联政治生活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戈尔巴乔夫的助手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在评价叶利钦的退党行为时说:

只有叶利钦以他野兽般的嗅觉感到了“历史的钟声”。当他发表了他的“波拿巴主义”的讲话(有的代表这样称这次讲话)之后有人攻击他时,他在台上声明退党,而后伴着几声“可耻”的喊声离开了惊慌失措的大厅。他有判断力,这使他比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折中”策略高出一筹……^①

叶利钦退党的消息成为苏联政治生活的某种信号。退党的潮流此起彼伏。许多党员将党证退给党组织,有的还当众将其销毁。大部分普通党员几乎停止参加党的社会工作,不再继续交纳党费。苏共遭遇的政治危机进一步促使社会情绪走向极端化。“权力不是给的,而是争来的”成为政治反对派的“行动指南”。苏共成为所有政治反对派的众矢之的。

1990年10月12日,《红星报》发表文章:“驱狗追猎”。^② 文章写道:

一个腰圆膀粗的年青人在无轨电车里揪住一个老头的西服衣领:“喂,你这个共产分子!”他的伙伴接着骂:“看你的党票救得了你不,走着瞧吧!”下车时,年轻人说:“别让我再碰上,共产分子!”

这些人是什么人?在阿尔巴特街以每只500卢布的价格向外国人兜售俄式套娃娃(国营价7—10卢布,无货)的是他们;在莫斯科市场上用成捆的假钞票买汽车的是他们;在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搞恐怖的也是他们。新的生活骄子——政治化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江洋大盗在成熟。

列宁格勒电视台晚间节目常播放反共集会的镜头,集会者的口号

^①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46页。

^② [苏]《红星报》1990年10月12日。

粗暴,表情歇斯底里,这是同一现象——苏联土生土长的反共主义。其特点是野兽般凶残,连西方反共分子都甘拜下风。

游行的狂呼“消灭苏共”这已经是呼吁搞流氓无产阶级活动了。这种现象虽说各国都有,不同之处是我们这儿卖力地为他们的活动创造条件。有个代表指责苏共中央政治局支配了苏联黄金储备,另一代表说苏共正在夺取经济权柄。还有一位代表要求对列宁提出起诉,说列宁是德国间谍。有的文章要求判社会主义死刑。电视节目《观点》恣意渲染诺沃德沃尔斯卡娅得意洋洋地撕列宁像的镜头。列宁格勒电视台播放谈话,要求设立国际法庭审判马列主义。在乌克兰呼吁绞死共产党人。到处破坏列宁纪念碑,到处在搞地名更改。

我不敢说这一切都是在准备反革命政变。但很像在驱狗追猎,号角在吹,鼓在擂,狗在叫……

二、社会共识:抹黑苏共历史

作为苏联政治制度体系的核心,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实质上就是维护苏联社会思想稳定和团结的黏合剂。但是在政治公开性的号召下,戈尔巴乔夫认为人民有权了解真相、有权对苏联过去发生的历史重新作出评价。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历史的包袱,重建人民的精神家园,才能真正激发人民对于改革的热情和动力。然而戈尔巴乔夫掀开的不仅仅是苏联的历史帷幕,而是沉重背后的社会愤怒。在知识精英和社会舆论的引导下,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被不断爆料抹黑,苏共执政的历史合法性被彻底颠覆。

1. 戈尔巴乔夫:“不让历史留空白页”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坚持“不让历史留空白页”呢?看来,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值得注意。

一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态度和政治风格。列宁指出,用美好的词句掩饰令人不快的真相,对无产阶级事业来说,对劳动群众的事业来说,是最有

害最危险的事情。不管现实如何令人痛心,必须正视现实。“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也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①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政策是自取灭亡的政策。因此,“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②。一直坚信是列宁思想继承人的戈尔巴乔夫始终赞同并决定身体力行。1984年12月10日,戈尔巴乔夫在全苏意识形态工作学术实践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同他们讲真话,因为真话容不得拐弯抹角、吞吞吐吐、空泛和装腔作势的讲话。讲真话,同样既要避免夸大成就、掩盖过失,又要避免对缺点津津乐道。我们的意识形态面向理智、高尚情感和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生活令人信服地证明:党对苏联人发表的公开而诚实的讲话,将永远是容易理解和得到支持的,得到用劳动和社会积极性、坚毅勇敢精神和英雄气概所给予的支持。在我们建设、巩固和保卫社会主义时是这样,今天也还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③1985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为使意识形态工作同生活最紧密地联系起来,还远没有把全部工作做完。形式主义和说教仍在干扰,损失往往是由于空谈和不善于向人们讲真话。而且有时出现这种情况:人听到的是一回事,而在生活中看到的却是另一回事。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④8月28日,在同美国《时代》周刊谈话时,当时代出版公司总经理格伦沃尔德问戈尔巴乔夫:“您是苏联新的领导作风的发起者。您常常到人民中间去,会见群众,总之,您让别人看得见。您喜欢这种工作作风,它会带来什么好处呢?”戈尔巴乔夫回答:“首先,这种作风是列宁教导给我们的。他经常说必须到群众中去,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情绪,并且在实际政策中反映他们的愿望。因此,这里的首创权属于列宁,像他这样的人一百年才出现一次。”^⑤9月6日,在秋明州和托木斯克州党的积极分子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又指出:“这里我认为不妨提醒一下,弗·伊·列宁是怎样教导我们的。

① [俄]列宁:“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1905年),《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31页。

② 同上,第333页。

③ [苏]《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年)》,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页。

④ 同上,第59~60页。

⑤ 同上,第155页。

他不止一次地重复说,不管情况如何,我们时时处处都应实事求是。任何粉饰,更不用说明显的谎话,只能危害我们的伟大事业。列宁的这一遗训应该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准则。”^①1986年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有时谈到公开性的时候,还会听到这样的呼吁:在谈论我们的缺点和疏漏以及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的困难时要谨慎一些。这里只能有一个答复,列宁的答复:共产党人时时处处都要讲真话。”^②可以说,提出“不让历史留空白页”正是戈尔巴乔夫这种政治作风的具体体现。

二是戈尔巴乔夫对改革启动的政治考量。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首先就是要破除停滞时代以来形成的负面消极的社会心理和思维习惯。在苏共二十七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谈到意识形态工作时指出:“目标明确的教育工作往往被人为的运动所取代,这种运动使宣传脱离现实生活,这就对社会气氛产生了不良影响。现实生活中矛盾的尖锐性往往被忽视了,在评价经济、社会领域以及其他方面的实际情况时缺乏现实主义态度。历史上的积垢仍然留有它的痕迹。这些积垢是存在的,它表现在人们的意识中,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举止中。”^③于是,“政治上的奉承,大量授予奖赏、称号和滥发奖金的做法,往往取代了对人及其生活和劳动条件、社会自我感觉的真正关心。形成了对一切都原谅的局面”^④。戈尔巴乔夫指出,当改革日益深入地触及千百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时,一些问题从前似乎已作出答案,今天重新变得紧迫。“人们想理解在社会上开始发生的变化,想理解改革的实质和宗旨,想知道我们走向何处,想攀登哪些高峰以及怎样认识我们所追求的社会的新质态。”^⑤因此,戈尔巴乔夫认为,我们今天有时持批评观点回顾自己的历史,那只是为了更好、更全面地考虑走向未来的道路。他说:“必须本着历史责任感和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过去作出评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是因为那一时期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对社会主义的未来有重大

① [苏]《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年)》,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9页。

② 同上,第336页。

③ 同上,第366页。

④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⑤ [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改革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8年,第5页。

意义。第二,是因为那些年代是我国和国外多年辩论的中心内容,而在探求真理的同时,在国外往往也有人企图诋毁作为新社会制度的、作为相反于资本主义现实抉择的社会主义。最后,我们应当对这一时期和我们历史上的其它时期作出正确的评价,尤其是现在展开改革的时候,——这不是为了政治上去作清算或是发泄悲愤,而是为了对过去的英勇业绩作出应有的评价,从错误和失算中吸取教训。”^①

事实上,从戈尔巴乔夫执政开始,苏联社会就已经开始小心翼翼地对敏感的历史问题展开讨论了。

1985年7月23日,苏联电视台播放了过去长期“被认为不存在的人”——赫鲁晓夫的镜头。这是戈尔巴乔夫三月执政以来的第二次。赫鲁晓夫的镜头在屏幕上一闪而过,这是他一九五七年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一个特写镜头。

1985年11月11日,在勃列日涅夫逝世三周年之际,《真理报》发表纪念文章。文章中没有提到勃列日涅夫的名字,但对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盛行的“不能容忍的阿谀奉承行为”提出批评。

1986年3月5日,在斯大林逝世三十三周年之际,苏联报刊对此未作任何表示,这表明官方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继续对斯大林采取矛盾的态度。在苏共第二十七次党代会上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明显地只字未提。

1986年12月19日,《真理报》就勃列日涅夫诞辰八十周年发表编辑部文章。文章说:“在勃列日涅夫生活与活动的最后几年,对其取得的成就作不切实际的评价曾广为流传。尽管经济形势变化了,但是,并没有认识到改革国民经济管理,把经济转向集约化发展方法。已经不反映新的现实的习惯模式和公式在很多方面限制了对前进道路的探索。”这就导致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经济发展速度的明显下降。“分配关系方面的消极过程在党和人民中间引起很大的担忧。在这种业已形成的经济形势下,产生了许多消极的社会和精神道德现象。”与此同时,“由于缺乏一贯的民主作风,缺乏广泛的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真正的检查监督,就不能及时

^① [苏]米·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揭露这些消极现象”^①。

1987年1月27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猛烈抨击勃列日涅夫在世时的领导工作,说那时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衰落了。他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酗酒和吸毒成风”,犯罪率上升,领导无视普通人民的需要。国家度过了制造“假象”的年代,当时一些严重问题被宣传和赞美声掩盖了,官僚主义使经济陷于瘫痪,使文化生活窒息。尽管戈尔巴乔夫连一次也没有提到勃列日涅夫的名字,但是他指责这位过去的领导人特别喜欢勋章和奖章,包庇他在高级官员中的好朋友,这些人现在被指责为几乎完全腐化堕落了。外国分析家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这篇讲话看起来像是第一份非勃列日涅夫化的重要文件。”^②

1987年3月19日,苏联政治科学协会副主席、《文学报》著名评论员布尔拉茨基教授说:“最近一个时期,我们的文件中没有对赫鲁晓夫个人和他所领导的那一段时期进行正式的评价。我想,我们党将不得不重新评价我党历史上所有的人,但这需要研究,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问题,免得将来又回头来重新评价。”^③

1987年3月29日,现年62岁的赫鲁晓夫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在《星火》周刊发表的文章中说,由于经常改写历史书,而历史书又对过去的重要人物与历史时期避而不谈,这就使苏联年轻人变得玩世不恭起来。他说,1917年俄国革命的许多伟大人物因其思想而很少在历史书中被提及。“把这段历史从我们的历史书中删去,不让年轻人知道,我们完全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当纪念老一代革命家逝世周年时,他们去世的日期和死因都被羞羞答答地省略了——这种半遮半掩介绍历史的方法无助于提高道德水准……”^④

1987年11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的联席会议上,对

① 塔斯社莫斯科 1986 年 12 月 19 日电。

② 路透社莫斯科 1987 年 1 月 27 日电。

③ 新华社莫斯科 1987 年 3 月 19 日电。

④ 路透社莫斯科 1987 年 3 月 29 日电。

以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苏共主要领导人及其历史活动进行了总体评价。

关于斯大林。

在30年代,同剥削阶级敌对反抗作斗争时期用的那套方法被机械地挪用到和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条件已起了根本的变化,国内形成了偏执、敌意、怀疑的气氛。后来,这种政治实践扩大了,并产生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错误理论。

所有这一切都对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起了致命的影响,带来了沉重的后果。十分明显,正是由于缺乏苏维埃社会民主化的应有水平,才使个人崇拜,使30年代的破坏法制、专横和镇压成为可能。坦率地说,这是在滥用权力的基础上的真正罪行。成千上万的党员和非党人士遭到了大肆镇压。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威信遭到了严重损害。我们也应该坦率地说出这一点,为了最终地和坚定不移地确立列宁的社会主义理想,必须这样做。

在战争年代,斯大林所表现的巨大政治意志、目的性和坚定性、善于组织人们和使人们遵守纪律,在取得胜利方面起了自己的作用。但是,肩负着战争重要的重担的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普通苏联士兵和英勇的热爱祖国的伟大劳动者。

现在,对斯大林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讨论得很多。他的个性是极其矛盾的。我们要是站在历史真实的立场上,就应该既看到斯大林在争取社会主义、捍卫其成果方面的无可怀疑的贡献,也看到他和他周围的人所犯的粗暴的政治错误和专横行为,我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对我国社会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后果。有时有人说,斯大林对许多违法事实并不了解。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并非如此。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为大规模镇压和违法现象对党对人民所犯的过错是巨大的和不可原谅的。这是历代人的教训。

当然,不管我们的思想敌人怎么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是必然的。它违反社会主义的本性,它背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它也

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严厉谴责了崇拜本身,也谴责了它的后果。我们现在知道,对一些党和国家活动家,对党员和非党人士、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化活动家提出的政治罪名和镇压都是预谋伪造的结果。^①

关于赫鲁晓夫。

在五十年代中期,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变革之风吹到国家上空,人民振奋起来,活跃起来,变得更大胆,更有信心。批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恢复社会主义法制都要求党及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拿出很大的勇气。开始摧毁以前对内对外政策中的刻板公式,摧毁三十至四十年代所确立的发号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赋予社会主义以更大的活力,强调人道主义理想和价值观,在理论和实践中恢复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

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一九五三年)和七月全会(一九五五年)决议的核心是力求改变经济发展的先后次序,使联系与劳动成果挂钩的个人利害关系的刺激因素起作用。于是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发展农业、住房建设、轻工业、消费领域和与满足人的需要有关的一切方面。

总之,无论在苏联社会中,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发生了良好的变化。然而也犯了不少主观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使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复杂化了,在很大程度上也损害了一些先进创举的名声。问题在于,对内对外政策和党的建设的崭新任务常常用唯意志论的方法,利用老一套的政治和经济办法来加以解决。但是在那个时期进行的改革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依靠广泛发展民主化进程。^②

关于勃列日涅夫。

①② 塔斯社莫斯科 1987 年 11 月 2 日电。

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一九六四年)上,更换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了旨在克服对内对外政策中的唯意志论倾向和偏差的决议。党力求使政策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使政策具有讲求实际的特点和充分根据。

苏共中央三月和九月全会(一九六五年)提出了领导经济的新方法。这在头几年使国内局面有了好转。经济和科学潜力发展了,防御能力加强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采取了树立起我国国际威望的许多对外政策行动。保障了同美国的军事战略均势。国家具备了进一步加快自身发展的巨大潜力。但是,为了利用这些潜力,使这些潜力发挥作用,就需要搞新的彻底变革,当然也需要相应的政治愿望。然而都不足。甚至已经决定了的许多东西也都停留在纸上,挂在空中了。我们的发展速度大大地延缓了。

在中央四月全会(一九八五年)和二十七大会上,党强调指出,在勃列日涅夫生活和工作的最后几年,热衷于不反映新现实的、习惯了的刻板公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对继续前进道路的探索。言行脱节现象增加了。实质上造成危机前局面的经济中消极过程的发展。在社会和精神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这些现象歪曲和损害了社会主义公正原则,破坏了人民对社会主义公正性的信心,引起了社会中的离心离德现象和各种形式的不道德行为。社会主义的崇高原则与日常生活现实之间日益增长的差别已变得不能容忍。^①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历史的重新评价,正式打开了社会思想禁忌的闸门。

2. 改革与历史:共识破灭与苏共形象

很快,社会民主运动以其自身特有的自我毁灭性背离了戈尔巴乔夫曾经希望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引导了共产党人的主要灯塔来检验我们的实际行动的趋向”的主张。^② 在戈尔巴乔夫“写出真实的完善的历史”的号召

^① 塔斯社莫斯科 1987 年 11 月 2 日电。

^② [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革命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8 年,第 7 页。

下,社会思想界开始对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提出质疑并提出了重新评价的要求。

1986年3月26日,《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小册子《苏共历史和政策》在纪念第一本苏共党史教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八十周年的文章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一书既“具有一系列极重要的优点”,同时又“有众所周知的缺点”。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文献现象,对《简明教程》作片面的评价是不对的。它带有那个时期的痕迹,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矛盾。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下,书中渗入了歪曲党史的某些论点。特别是主观主义的论述涉及了某些历史人物在党的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其中有些人的功绩,首先是斯大林的功绩被不适当地夸大了,而另一些人,包括列宁的功绩则被不公正地贬低了。这一阐述的依据是,三十年代中期流行的、苏共二十大后被党史科学摒弃了的建党两个中心和十月革命两个领袖这一违反历史的概念。《简明教程》图解式地,有时不深入地阐述党内生活。党内生活几乎完全被归结为反对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和集团的斗争,对联共(布)在国际共运、在建立共产国际及在其中活动的地位和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党史的分期也有重要的歪曲,带进了主观主义的成分。所指出的以及《简明教程》的其他缺点在以后出版时未能加以批判和克服,这是因为这本书是大众通俗教材,被宣布为马列主义领域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和唯一能解释党史问题的教科书。《简明教程》作为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主要教科书,阻碍了苏共党史科学的进展。但是,无疑,它未能阻止它的发展。^①

1987年2月,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为《莫斯科新闻》撰写的文章中指出,党史研究工作要冲破过去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所定下的公式。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苏联档案总局局长瓦加诺夫的指责。3个月后,又有4名历史学博士联名写信指责阿法纳西耶夫的文章是“不科学和耸人听闻的”。联名信的作者认为,阿法纳西耶夫的文章实际上是号召“重新评价苏联人民70年来所走过的路程”。他

^① 新华社莫斯科1986年3月26日电。

们强调,“改革不是破坏,而是创造”。阿法纳西耶夫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改革的基本含义就是既要破坏,又要创造。”联名信的作者不承认在党史研究中存在“斯大林公式”,并批评阿法纳西耶夫关于“最近15—20年内苏党史研究停滞不前”的说法。阿法纳西耶夫则引用全苏社会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材料来予以反驳。在这次会议上,许多学者都指出党史研究存在严重问题。他强调: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基础的,正是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公式。其特点就是把党史归结为党内斗争和工人及民主运动内部的各党派之间的斗争;把不同意见的斗争、探索革命途径的企图以及党的领导内部的分歧说成是某些人的险恶密谋;对由于意见分歧而形成的派别事后贴上“反党集团”的标签,说它们具有“反革命的意图”。阿法纳西耶夫还认为,党史教科书对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的阐述具有片面性,删去了列宁对后来成为反对派的那些人的正面评价。联名信的作者则认为,不能把历届党代表大会对反对派所作的评价称为“标鉴”,说反对派推行的是“反人民的和反革命的路线”,因此不能为他们平反。^①

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使得苏共中央于1987年7月召开了苏共历史教科书问题学术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上,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批评意见占据上风。苏联社会科学院苏共历史教研室主任、历史学博士尼·尼·马斯洛夫的发言极具代表性。他说: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认为是经典的,其内容被宣布为党的历史问题的唯一正确说明。这本书是从个人崇拜思想的立场来叙述我党历史的,尽管它在国内外传播党的历史知识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它也是教条主义、死啃书本和概念化的根源。社会科学在当前情况下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点。那就是教条主义、烦琐哲学、脱离生活、偏见、评价许多历史篇章时的片面性和缺乏独立性,为了编写新的党史教科书,首先就应当决定取舍问题。今天仍很难克服那些禁锢党史工作者科学思维的教条。

^① 新华社莫斯科1987年5月6日电。

第一个教条是关于党的发展无冲突论的教条。多年来,党的历史被说成是一系列的胜利、成功和成就。……而在我们的道路上曾有过许多困难——既有客观的困难,也有主观的困难。无冲突论不仅是美化现实,而且是歪曲真相。

第二个教条是认为,任何历史人物,只要犯了某种政治错误,那么他从一开始就是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这种观点至今还远未根除。它造成对党的干部和领导人、对列宁周围的人和革命史的歪曲看法。对党的活动家的错误和失算应该说,但也不要忘记他们的功绩。许多党的活动家都完全应该予以平反,因为他们不是间谍、杀人犯、特务、外国侦探,而过去恰恰由于这些而判罪。

第三个教条认为,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一直不断地自动地在增长。这种增长被说成是一种向上的运动,没有遇到障碍,也没有下降过。但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处于停滞状态和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同《人道报》谈话中所指出的“危机前现象”的时期来说,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第四个阻碍客观研究党史的教条是关于似乎是包含在所有党的文件中的绝对真理——终极真理的概念。而实际上有一些文件并不总是符合真理的,这一点现在已得到承认。引起异议的还在于,如果相信迄今出版的教科书的话,那么列宁之后到今天为止,就再也没有什么人了。斯大林、赫鲁晓夫至多也是作为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人而提到。可是这些都是领导党和国家的复杂而矛盾的人物。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对他们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我们出了有关罗斯福、丘吉尔和艾登的书,而斯大林的政治传记我们则尚未编写出来。^①

迫于社会压力,苏共中央决定组织专家重新编写《苏共党史纲要》。

1988年1月8日,戈尔巴乔夫在对媒体负责人的讲话中指出:“这一工作是繁重和负责任的。要知道我们的历史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在世界上既在物质方面,也在精神方面第一次掌握了新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推动

^① [苏]《莫斯科新闻》1987年7月16日。

社会朝进步的方向发展”，“对我们来说，任何把历史看成是坦途的做法都是不能接受的。历史就是它本来的样子。问题在于要真实地反映历史。我们要以诚实的、负责任的和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对我们历史中那些业绩我们要赞颂，但不能原谅违法的，特别是犯罪的人”，“我们的历史是充满经验的历史，越是对之进行研究，越能更好地明白，我们现在和将来要做什么”。^①

1988年2月1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当我们说需要谱写党和苏联社会的真正客观的历史时，这指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在于仅是指姓点名，回忆无故被遗忘的人，尽管这也是一项巨大的、富有人性工作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问题在于要写出真实的完美的历史，不愧为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历史。”^②

1988年6月14日，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顾问罗季奥诺夫认为，苏联历史科学，尤其是党史极其严重地受到教条主义、偏见和粉饰现实等沉痛的侵蚀，脱离了历史真实。这些弊病起源于斯大林把《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奉为教义问答，把列宁变成无害的偶像，把列宁的思想和论点经典化，引导人们死读经书，引用语录。^③

1988年6月20日，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格奥尔基·斯米尔诺夫院士说，最近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回忆录、文章、讨论材料和其他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反映出对苏联历史问题的“错综纷纭的立场和意见”。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涉及党史的“思想库”的收集和检验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半。这一项需要细心和耐心的研究工作的目的是弄清楚一些复杂的、未经充分研究的历史事实和现象，即所谓“空白点”。研究院的科学家已经搞清楚了100多个历史事实和现象。斯米尔诺夫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正在从综合概括‘空白点’和对其进行详细分析转入从观念上理解党的历史问题。”斯米尔诺夫说，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苏联科学家正在编撰的一卷本苏共历史“将成为对他们在开放性和公开性、自由讨论过去和现在的

① 转引自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时期对苏联历史的研究与评价》，《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6期。

② [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革命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8年，第9页。

③ [苏]《苏维埃文化报》1988年6月14日电。

问题的新条件下进行工作的能力的一个检验”。出版这本书(已写出草稿)将成为“出版多卷本的党史的一次总预演”^①。

1988年7月,苏共中央成立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党史纲要》筹划委员会,但是,及至苏联解体此项编写任务也未完成。

对《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的怀疑以及重新编写苏共党史的要求,社会民主氛围日益激进的情况下,不仅未能成为“想对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加以领会、从中吸取教训,作为改革和更新苏联社会的借鉴”^②,反而成为政治反对派力量借以摧毁社会共识的思想基础,攻讦苏共执政合法性的有力武器。事实上,还在戈尔巴乔夫发起重新评价历史运动的时候,这种可能发生的后果就已经被预料到了。

1987年7月3日,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文章:戈尔巴乔夫掀起的揭露斯大林的运动影响到新一代。文章指出:

戈尔巴乔夫重新肩负起30多年前赫鲁晓夫的未竟事业,发动了一场激烈的、主要是对个人攻击的运动,以便从苏联生活中抹掉斯大林留下的消极影响。目前正在小心翼翼地感到震惊的国家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由于斯大林的罪行,使1700万人被送往劳改营并死在那里,500万个家庭被放逐。一位40多岁的莫斯科妇女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她的眼睛在读揭露文章时哭红了。一个50多岁的莫斯科男子说:“斯大林显然是得了精神病,否则他是不可能做出那种事的。”

戈尔巴乔夫本周把他从国外版权所挣得的5万卢布捐赠出来,建设瓦西里·焦尔金纪念馆,以此亲自批准重新对斯大林进行全面的评价。焦尔金是作家兼主编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写的一首诗中所虚构的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特瓦尔多夫斯基一生从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实情况的工作。大约有2000万苏联公民死于第二次世界大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88年6月20日电。

^② [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改革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8年,第9页。

战。据一些苏联历史学家说,如果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不遭斯大林破坏,那场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大部分苏联人对斯大林总的情况、他强迫实行集体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饥荒和他主要在20年代和30年代进行的清洗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尽管在1956年举行的起了里程碑作用的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但当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之后,在他的倡导下开始了一个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进程。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关于斯大林清洗运动的受害者的文章,在那些由于年轻而对这位独裁者没有任何印象的青年人中间引起了轰动。据长期驻在莫斯科的印度记者德夫·穆拉卡说,戈尔巴乔夫正在利用他的反斯大林运动来摧毁斯大林强加于苏联的意识形态、经济、历史、哲学和社会学。

越来越多的有关斯大林的受害者的文章似乎有双重作用。这样做不仅是试图动摇人民的信念,使他们对于当前仍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创建以来该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展开辩论,而且还要在11月份苏联七十周年庆祝活动快要到来的时候,创造出一批英雄来。^①

然而,这些在社会民主运动中创造出来的“英雄”,却通过填补苏联历史“空白点”肆意地向普通民众撒播着敌视、仇恨的消极情绪,用各种匪夷所思的“黑幕”爆料冲击和逼迫着“读者产生了离经叛道的念头:难道需要社会主义吗”^②?正如利加乔夫指出的那样:“他们关心的不是深思熟虑、严肃认真地分析我们矛盾的历史,而首先是自己的‘斯大林主义斗士’的政治形象。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恰好证明了他们这一企图,即‘工程主任们’很少引证苏共二十大揭露个人崇拜的事实,而宁愿‘忘记’它。他们企图把同斯大林主义斗争的功劳据为己有,而且仅仅是归自己所有。他们沽名钓誉,企图在

① [美]《巴尔的摩太阳报》1987年7月3日。

②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53页。

‘白纸上’书写这段历史，这绝不是没有政治目的的。”^①

三、政治氛围：极端的民主化

社会民主运动以其大规模的群众性集会游行和极具颠覆性的社会舆论，尽其所能地挑动着刚刚在政治公开性条件下呼吸着“自由空气”的大众神经。于是，整个社会开始陷入癫狂之中。戈尔巴乔夫曾经痛恨的消极冷漠的社会情绪消失了，但是他所期望的积极、健康、理性的社会热情却在“民主化”的刺激下化身为摧毁旧秩序、焚毁一切的社会激情。于是，“世界历史伟大辩证法创造的离奇现象”^②在改革年代诞生了！

1. 误读的西方民主：游行、罢工与政府的批评

什么是民主呢？在纷乱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所有的政治反对派一致认为毫无顾忌地组织煽动群众性集会示威游行和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肆无忌惮的批评就是社会民主化的具体体现。在反对派对“民主”的理解中，这就是西方式的民主。他们信誓旦旦地向社会大众宣称，这就是改革将要学习的“民主”！然而谁都清楚，反对派对“民主”的选择性理解，其实只服务于一个目的——集合社会力量以搞垮苏联政治秩序。

其实，美国、西德、日本、意大利、加拿大、葡萄牙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只规定了集会的权利，未规定游行、示威的权利；但都制定了全国性或地方性集会、游行、示威的限制性法规。如美国制订了《统一公众集会法》、法国颁布了《关于集会自由的法令》、联邦德国颁行了《关于集会与游行的法律》，葡萄牙颁行了《关于保证和制定集会权利的规章的第406号法令》。日本东京、大阪、京都三个大城市都有地方性的《关于集会、集体游行和集体示威运动条例》。英国在群众集会方面的限制更多，如《煽动性集会法》《不法操练

^①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35页。

^② [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革命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8年，第34页。

的法律》《特拉法加广场法》《公共秩序法》等分别作出了严格规定。归纳起来,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群众集会游行法规提出的主要限制措施有:

一是规定申报、审批制度。联邦德国《关于集会与游行的法律(集会法)》第十四条规定:“要举办露天公共集会或游行的人,应至迟在宣布之前四十八小时向主管厅申报,并应说明集会或游行的宗旨”;“申报时,同时应说明对集会或游行负主持责任的人”。日本《东京都关于集会、集体游行和集体示威运动条例》规定:“在道路及其它公共场所举行集会或集体游行,或无论在任何场所举行集体示威运动,必须得到东京都公安委员会的许可;主办者个人或团体代表,必须在举行日的七十二小时前提出申请,说明主办人、联络负责人的姓名、住址,参加团体的名称及其代表的姓名、住址;举行活动的目的、名称、日期、路线和场所。”美国关于集会的申请规定有十四条之多,其中仅申请的内容就有日期、地点、人数、安全措施和主持人姓名等八项。申请至少要提前九天提出。法国规定,在公路上的一切游行,都要事先申报。但宗教的和民间传统的例外。申报应在游行前3~15天内递交给省、市或镇的政府。申报中要写明游行的主要组织者的姓名、家庭住址以及游行的目的、日期、小时、参加的组织和经过的路线。省长和市长认为游行的性质会扰乱社会秩序,可予以禁止。但申请者可向行政法庭提出关于越权的起诉。举行一次没有申报的或已被禁止的非武装的游行,在法律上被视为非法聚集,可用武力驱散。参加这种游行,不是犯罪,仅属违章,要罚款3~20法郎。

二是关于组织领导的规定。联邦德国法律规定,举行公共集会应有主持人,主持人得指派纠察员,纠察员的人数报警察局批准。主持人在纠察员的协助下,负责维持秩序,规定集会的持续时间,并得随时中止或结束集会。警察局得派警务人员参加公共集会,主持人对派来的警务人员应予安排适当的地点。游行时,警务人员可以命令严重破坏秩序的参加人退出队伍。

三是规定集会纪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法规都有关于参加人不准携带武器及其他危险品的规定。葡萄牙的《关于保证和制定集会权利的规章的第406号法令》规定,不得举行涉及非法占据公共或私人建筑物的集会、群众大会或示威活动。

四是设置集会禁区。联邦德国专门制定了《禁区法》，规定在联邦或州的立法机关或联邦宪法法院周围的禁区，不得举行露天集会或游行。葡萄牙的法令规定，禁止在距离政府当局的总部、军事和准军事机关及兵营、监狱和教养机关、外交代表和领事馆及离政党总部不到一百米的公共场所举行集会和游行。

五是严加控制活动的日期、时间和游行示威的路线。葡萄牙法令规定，游行和列队出行只准在星期日和公共假日；在星期六举行时须在中午之后；其他日子须在晚上七时以后。主管部门为维持游行秩序、公共秩序和公共交通，得改变预定的路线，或令游行队伍只占用车行道的一半。英国规定，和平游行不能阻塞街道和无视别人的权利。1936年《公共秩序法》规定，游行示威都不能携带武器，警察首脑根据游行的时间、地点、路线，认为有可能引起严重的社会扰乱时，可以向游行队伍发出指令，规定要走的路线和禁止进入的公共场所；警察首脑可以向地方议会申请禁止游行，市议会经国务大臣同意可发布限期不超过三个月的禁令，违反禁令或煽动参加这种游行的，可以判罪。大伦敦警察总监在内务大臣批准下自己可以发布禁令。有些地方规定，游行组织者必须事先通知政府。

六是规定主管部门有权制止。联邦德国法律规定：举办人被剥夺了集会和游行的权利而举行该项活动的；集会中发生武力、暴动活动，或发生直接危及参加人的生命和安全事项的；主持人不立即使携带武器及其他危险品的参加人退出会场或不负责任使之离开的；在集会过程中有以犯罪或职务上的违法行为为目的的违犯刑法的行为，而主持人不立即制止的；警察局有权解散该集会和游行。美国《统一公众集会法》规定，主管当局可以以妨碍交通、公众健康和安全等十四条理由发出不许集会的禁令。葡萄牙法令规定：当集会、群众大会、示威游行背离其宗旨，发生违法或不道德行为，或扰乱公共秩序和治安，干扰个人权利的自由行使，或其宗旨与政府当局和军人应有的荣誉不符合的，主管部门得予以制止。

七是规定罚则。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触犯集会、游行、示威法规的行为，规定了罚则。如未经申报、审批而举行示威、游行或集会，或申报不实的；主持人拒绝警察局派往公共集会的人员到场，或不予安排适当地点的；

在活动中携带武器及其他危险品的；在公共集会或游行中经主管当局宣布解散而不立即离开的，等等，要判刑或罚款。美国还规定在定罪后可以罚款和监禁两者并罚。^①

2. 多元的社会力量：经济、政治与运动的野心

改革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其实是形形色色的社会力量在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一致目标下实现各自利益的一场政治共谋。在这场权力的盛宴中，政治精英、民族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粉墨登场，或喧嚣高呼，或浅声低唱，汇聚而成瓜分国家财富的政治交响曲。

政治精英，不仅包括政治反对派，而且也包括苏共党内和政府内部的高层人士。事实上，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政治反对派，之所以能够最后掀翻苏联而在各自国家独立后走上权力的顶峰，既有其自身所拥有和蓄积起来的强大社会资源，但是如果没有苏共党内精英政治立场的彻底改变，政治反对派根本就无法在短期内形成气候。1990年4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利加乔夫在回答《农村生活报》记者提出的有关党和社会状况、解决食品问题的各种问题时指出，目前在苏联社会上有一股“抵制社会主义的势力在活动。在苏共内部也有这样的势力。最危险的事情是我们削弱和放松了党。这是我们犯的错误、政治领导犯的一个基本性错误”。利加乔夫说，共产党人提出了革新党的任务。这不单单是党的民主化和加强同群众的联系，而且也要实际地同苏共队伍里那些采取修正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人划清界限。就是说，这是一项纯洁党的任务。问题在于现在党内有派别、集团、反对派活动。有些共产党派别想在“民主纲领”基础上从苏共内部同其他派别组成议会党。他们自称是激进派。实际上，他们的立场既不新鲜，也不激进，而是真正的修正主义。^②事实上，在苏联的政治舞台上“已谈不上什么区分右派和左派……已经十分明显地看见：有一股力量支持社会主义……也有一股势力在把我国推到资

^① [中]《参考消息》1985年11月20—21日。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90年4月8日电。

本主义化、瓦解苏联的道路上去”^①。

民族精英,既包括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也包括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民族社会精英。民族精英所掀起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固然有联盟中央权力瘫痪的主要原因,但是另外两个因素也不容忽视。一方面是脱离联盟的民族心理的形成。“为什么各加盟共和国急于要得到主权呢?为什么自治共和国不满足于自己的从属地位呢?为什么斯大林时期受压迫、受欺侮的人民要求恢复失去的国家地位呢?因为几十年来超级大国没有保障他们的权利,没有向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主权思想的拥护者在寻找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每个民族都想建立符合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遗产、精神气质、政治思维的民族国家。提高自治的地位,摆脱莫斯科的官吏——这一切指望的是‘自己’的统治者、‘自己’的官员会更民主些,更公正些。人们急急忙忙地想用共和国的围栏将自己可靠地围起来,在自己家园建立自己想要的那种秩序。”^②另一方面则是被煽动起来的民族心理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政治力量。1989年2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维·切布里科夫在同摩尔达维亚首都党的积极分子会见时指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对待盗贼和流氓、杀人犯和强奸犯、贪污犯和投机倒把者的自由主义毫无任何共同之处。”切布里科夫说:“某些所谓的非正式团体大大有损于引起我国社会进一步民主化进程的强有力的积极的社会运动。这些非正式团体受具有极端情绪的领导人的影响,正开始走上从事反社会、违犯法律活动的道路。它们蛊惑人心地声称支持改革,却以其行动妨碍改革。还有一些直接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他们企图建立一些抵制苏共的政治结构。当然,对这种做法和行动不能不作出反应。必须对这些独立团体的纲领和行动是否符合我国社会更新的目标的观点作出原则性的政治评价。”切布里科夫呼吁,依法给予那些“力图促使群众走上无政府和无法无天道路、走上破坏安定形势道路、走上成立站在反对派立场上的合法政党和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2月6日电。

^②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73~274页。

非法政党道路上的团体的领导人以反击”^①。但是民族主义的迅猛发展已经使得民族精英具有了对抗联盟中央的政治实力,并且表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独立野心。

知识精英,既包括以持不同政见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如安德烈·萨哈罗夫等,也包括在改革年代里应时而动、风起云涌的知识分子,如加夫里尔·波波夫等。随着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知识精英也表现出社会角色的多样性。既有继续从事改革理论工作的研究者,也有从书斋走向街头的社会活动家(如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还有委身于政治领导人从而获取相应权力的“御用文人”(如叶利钦的国务秘书根纳季·布尔布利斯、经济顾问叶戈尔·盖达尔等),更有摇身一变借助民主运动而成为地方领导人的“知识政客”(如当选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等)。在整个民主运动期间,知识精英以其精深的专业素养把持着社会舆论工具,以其充满悲情的“社会良心”的道德心理歪曲着普通群众对苏维埃历史的真挚情感,并不断营造着“历史恐惧”的政治氛围。正像戈尔巴乔夫指出的那样:“社会公众急不可待地相看到从前被查禁的历史篇章,是不难理解的。尽管如此,毫无理由匆忙发表评论,仓促作出评价,这样只能使人得出浮浅的结论,不能反映所发生过程的全部复杂性。如果抛给广大公众的不是真正科学的调查结果,而是赶行情的伪造品,那么真理不但不能重放光芒,反而会更加暗淡。”^②民主运动时期苏联知识精英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学者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科学研究的立场和态度。事实上,这种蜕变的知识精英根本容不得理性的声音和冷静的态度,实质上已经沦为追逐权力的知识政客。1989年7月27日,尼娜·安德烈耶娃对知识精英们的背叛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她说:“这个改革的过程类似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改革中心活跃的是得到修正主义分子帮助的我国现存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安德烈耶娃谴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人民代表——麦德维杰夫从未“把档案盒上的灰尘掸

^① 塔斯社基什尼奥夫1989年2月10日电。

^② [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改革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8年,第10页。

掉”；批评历史学家尤其里·阿法纳西耶夫发表的“耸人听闻的声明”“伤害了人民”。安德烈耶娃警告，批评斯大林的人和“一批其他领导”是一道“屏幕，正如过去已经发生的那样，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准备在这道屏幕后攻击列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事实上，“改革已经完全成为空谈而没有行动”。苏联知识界盛行的是“谣言、主观性、缺少证据和随意性”^①。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在1991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指出：问题不仅是“影子经济”对生活产生现实影响，而且还出现了“影子政治”。一批称之为反对派的“智囊”的跨地区议员团的领导人在制定其战略构想。“民主俄罗斯”通过建立莫斯科——列宁格勒——俄罗斯大城市坚强的轴心来加强自己的阵地。“俄罗斯联邦议会在此起着凝聚的作用，该议会领导人正在在各共和国之间加紧签订双边协议并在积极倡议成立所谓主权国家大家庭。他们企图将中央现领导的权力据为己有。”^②

经济精英，既包括在改革后通过白手起家而获取大量经济利益的“草根精英”，又包括通过改革政策和内部体制调整而发展起来的“体制精英”，还包括利用苏联官僚体制中普遍存在的裙带关系攫取利益的“寄生精英”。“紧跟在政治新星们之后，苏联百万富翁的队伍也正在发展壮大。苏联的百万富翁正没头没脑地扑过来。”^③“草根精英”又被称为“合作社员”。他们是《合作社法》诞生后的新一代生意人。有的原先是工程师、自然科学家、记者，有的是头脑灵、手脚快的业余包工头，有的是无业流民。有人是靠新近吃香的宗教书籍或《性感女郎秘诀》之类的黄色书刊挣到资本的。还有的靠倒卖进口货或从事投机生意发了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西方银行有个人账户，万一风头不对，就可飞向西方。在“草根精英”中，以首都银行总裁斯莫棱斯基为典型代表。斯莫棱斯基在20世纪80年代曾因“盗窃国家财产”（7公斤油墨）而被判处2年监禁。获释后，斯莫棱斯基由于无法找到“公职”岗位而被迫从事商业经营。经过艰辛努力，斯莫棱斯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银行。为了进一步壮大银行，斯莫棱斯基为当时利用价格双轨制从事投机生

① 法新社莫斯科1989年7月27日电。

② [苏]《真理报》1991年2月4日。

③ [苏]《林业报》1991年7月27日。

意的人提供了特殊的金融服务——洗钱,并由此获取大量利润。“体制精英”也被称为“鲨鱼”。他们是苏联政府官僚和企业领导。履历彼此相似:大学毕业后在共青团和党的机关或在外贸部门工作,接着跳上公司、银行领导宝座。“鲨鱼”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市中心,甚至在党团市委和区委办公楼里。他们一般搞中间活动、国际旅游或做电脑生意。在公司草创时期,他们不用掏一个子儿,他们同党团机关的关系比法定资本中的控股股份还要值钱。许多公司都是从青年科技中心起家的,后者的收入不纳税,而且容易转成现金。霍多尔科夫斯基作为“体制精英”代表,就是曾经的“共青团经济”的产物。戈尔巴乔夫改革后,共青团组织成了改革的先锋力量,纷纷办起了打印社、旅行社、咖啡馆、舞厅等大批小企业。作为门捷列夫化工学院的共青团副书记,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共青团组织的派遣下进入商界,成为典型的“官商”。弗拉基米尔·波塔宁作为“寄生精英”的典型代表,其实是苏联官僚阶层普遍存在的裙带经济的产物。出身于从事对外贸易的苏联高层官员家庭的波塔宁拥有着“优越”雄厚的关系网络,这使他能够利用内部关系获取大量的政府批文而迅速成为俄罗斯商界的顶尖人物。^①以投机为例,据苏联内务部统计,投机倒把者仅在非食品商品方面的年平均总收入就达10亿卢布以上。从国外进口的投机商品的比例增加了。还出现了以物易物交易和其他交易的出口贸易和边境贸易为掩护的新形式。仅俄罗斯联邦1989年7个月中就追究了8.65万名违法者的责任,没收了总额近150万卢布的商品和实物。经过对8万家商业企业和公共饮食业的检查,在半年中就查明私自倒卖总额为3500万卢布的商品。尽管内务部加强了反对投机倒把的措施,然而这方面的情况仍然极其复杂。事实上,苏联同对社会明显有害的投机倒把活动的斗争,“实质上是政治性质的斗争”^②。

总之,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成功摧垮了苏维埃政权的权力支柱——苏联共产党后,走向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社会精英的普遍性利益选择。在改革中获得利益的经济精英们对未来充满着信心。他们说,“时间对我们有利”,“私人资本是进步的动力”。对他们来说,最紧迫任务是跻进政界和立法机

① 郝赫:《俄罗斯寡头现象分析》,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89年9月12日电。

关,尽快使“上层”出现“自己人”。^①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苏维埃制度垮台得兵不血刃而又出乎意料?因为大家从内心深处打算同它告别”^②。

3. 遗忘的社会大众:生活、稳定与改革的苦果

1990年10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信函中写道:

得到苏联人民支持的改革路线,解放了社会复兴的强大力量;实施改革方针,使国家从休眠和停滞中挣脱出来;国际合作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与此同时,行政管理系统遗留下的沉重负担,贯彻经济改革措施的间断和半途而废,经济指导中犯下的错误,以及不尊重客观规律等,共同引发了国家的一场严重经济危机。国民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生产规模降低,经济联系中断,分立主义加强,消费品市场出现空洞,预算赤字和国家支付能力接近临界点,反社会现象和犯罪行为与日俱增,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下降,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国民经济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旧的行政管理体系已经崩溃,而新的市场条件下刺激经济的手段还没有建立起来。现在需要一种建立在社会和谐基础上的、有利于稳定经济形势和加快改革进程的、沿着市场经济道路的、充满活力的新举措。^③

然而与戈尔巴乔夫充满乐观的讲话不同的是,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正在不断加重。

1990年是苏联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没有见到有这个五年计划的任何信息,甚至连国家发展计划和1991年的预算都没有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工作也被推迟。“所有这一切所证明

① [苏]《林业报》1991年7月27日。

②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37页。

③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页。

的不仅是改革的失败,而且是改革的崩溃,以及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茫然和不知所措。”^①苏联检察院和内务部的统计数字显示:1990年“地下经济”总额达到3500亿卢布,仅比当年全国商品零售额低30%。^②苏联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表明:1991年头几个月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期下降12%,劳动生产率下降11%,工业产品的生产下降8.5%,1991年1—5月,只有酒精制品的生产出现增长,其增长幅度为2%,其余领域均是负增长,对外贸易下降约40%。^③甚至用不着看统计数字,只要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发现这种经济危机具有越来越严重的性质。商店里空空荡荡,衣服鞋子无影无踪,任何家具都无法买到。巨大而空荡的贸易大厅里,售货员们悠闲踱步;橱窗都用塑料布遮挡,堆满了装着陈旧醋渍黄瓜的罐子。不但出现了购肉、油、糖和其他物品的证券,而且还出现了“顾客卡”——能够证明顾客为该城市居民的贴有照片的证件,以免把商品卖给“外人”——过路人。怨恨的人们排着长长的队,候购突然就会从商店里消失不见的香烟,购买在反酗酒运动秘密停止之后一直不曾见到的伏特加酒。商店里连香烟、食盐、火柴都脱销了!城市里时而爆发“香烟”“伏特加酒”骚乱。

犯罪率的急剧上升也使社会安全受到严重威胁。1991年2月19日,苏联内务部长普戈指出:苏联目前的犯罪现象——暴力及有组织的犯罪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1990年有案可查的犯罪案件比前年上升了13%。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一犯罪率已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有武装的犯罪分子更是险恶。普戈说:“我们总是说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但是迄今没有明显的实质性的转变。”官方统计表明,那些向莫斯科闹独立的加盟共和国犯罪现象最为严重,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犯罪率最高,去年比前年增长了43.9%,爱沙尼亚上升了24.4%,立陶宛上升了18.6%,拉脱维亚上升了16.9%。1990年的毒品犯罪率比1989年上升了24%,滥用国家财产犯罪率上升19.9%。^④

①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② 同上,第4页。

③ 同上,第44页。

④ 路透社莫斯科1991年2月19日电。

戈尔巴乔夫一定没有想到,“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受到基层群众的压力、大规模不满情绪的表露或者最不愿看到的自发抗议的混乱状态等的推动,特别是对宣布改革的领导人来说,这样自有其优越之处。“它使执政者有时间制定合理的方案和‘规定剂量’的变革的计划进度表,也可以使人相信社会可以平衡地从一种聚集态过渡到另一种聚集态(从水变成冰或者推动机械的蒸汽),而不会出现质的飞跃和同过去的决裂。”^①然而“滴管式改革”的一切优点,都可能在面临人们的不满和焦急的压力时顷刻之间走向自己的反面。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感受到了。他本人在美国讲了一个关于自己的笑话。人们排成巨龙一般的长队,等候进入商店买伏特加酒。一个男子由于长时间等待而感到精疲力竭,声称马上要去宰掉搞成这个样子的戈尔巴乔夫。但是,他很快就回来了。前后左右排队的人问他是否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意愿时,这位男子叹息道:“那里排队想杀掉戈尔巴乔夫的人比排队买伏特加酒的人还多呢!”笑话归笑话,但是居民对“改革时代的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的绝对无效的愤恨,如同他们对“苏共内部的改革派”的愤恨一样,已成为一种政治因素。^②

为什么改革会变成这样?

它没有带给人民实实在在的美好生活,却实实在在地摧毁了人民已有的幸福根基。“人们当初那种相信新领袖上台会产生奇迹的乐观看法开始消失,开始出现抱怨和不满情绪。”^③1991年1月1日,日本《每日新闻》公布了对4000名苏联人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其中,苏联国民对经济改革的看法悲观,认为“会取得成功”者只有29%,比一年前调查结果(46%)大幅度减少。政府的支持率只有13%,不支持率为73%。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的人仅占13%,不满意的人高达81%。^④

人民开始疑惑了,他们不禁问道:改革到底是什么?

科伊乔·佩特罗夫根据自己的观察分析给出了答案:怪事中之最怪者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②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36页。

③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55页。

④ [日]《每日新闻》1991年1月1日。

仍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就是用它得以颠覆了共产主义。什么是“改革？”直到今天，戈尔巴乔夫先生也未能给以理论上的解释。……最初，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前后，“改革”一词是以改革的一般含义被理解和接受的，而且是20世纪60—70年代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型的改革含义。甚至更晚一些时候，在代表大会后的几年里，苏联领导人和普通老百姓仍然把“改革”理解为一般的改革。它们根本不注意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演讲和手势中寻找突然效果的天生爱好。这个词随便就落在总书记的由助手、工作班子或领导机构写成的报告和演讲里了。这位头号人物的任务就是把写好的东西照读一遍或者转述一遍，戈尔巴乔夫最喜欢转述。在国内，在全世界，那个老掉牙的智谋仍然占上风：在政治里没有堂·吉珂德精神的地位。政治领袖的怪异表现，多半是做给媒体和好奇的记者看的。苏联的一个领袖应该是苏维埃的领袖，不论他继承了谁，谁是他的靠山，勃列日涅夫也好，安德罗波夫也好，契尔年科也好。这正是全部秘密：“改革”为什么畅通无阻。“苏联人民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人走进自己的家园并让他毁灭这个家园，使他们失去了现在和未来。当我们看到普通的劳动人民和领导人像过去一样努力工作，而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为反对自己、反对自己的儿女、反对自己的家庭而工作，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毁坏有70年历史的大厦的时候，一点也不奇怪或者可笑。他们只知道一点：他们正在为完成党和国家的纲领而工作。对于他们来说，谁是头号人物和他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①

于是在习惯性依赖心理下，人们“善意对待党的新领导人的全国民众期待着某种业绩，就像前来观看魔术表演的观众一样地期待出现奇迹，而且是马上出现”^②！戈尔巴乔夫以“人民”的崇高名义，却在不断地毁坏着人民的生活。利加乔夫愤怒地指出：“从大政治中隐退的那些民主派留下的是一大堆谎言。如果不把奢侈的豪宅作为上层富人的战利品，他们等于没建设任何新的东西。‘改革’是为极少数人进行的，而大多数人民变得贫困，生活得

^①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马细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2~43页。

^②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越来越差。”^①局势也变得越来越糟糕,人们开始憎恨地谈论改革。大家都明白,这是一条通往绝境的路。犯罪、贫穷、艰难、痛苦,纷纷落在了普通老百姓的头上。那些变得一贫如洗的人,起初是几个人,然后是一部分,最后就是整个阶层都开始醒悟了。在集会上,他们激愤地提出各种要求:“还我们低价的幼儿园!供孩子们休息的夏令营哪儿去了?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哪儿去了?低价的住房、公交、铁路和空运哪儿去了?”^②俄罗斯报纸刊载了这样一幅西方讽刺画:苏联的大型百货商店里什么商品都没有,只在靠近墙角的货架上摆着一个个头矮小的戈尔巴乔夫,他手中抱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一个单词——“改革”。^③

当苏联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的时候,已经对政治厌倦的苏联人表现出了极端的冷漠。

当理发师列齐科娃今天听到苏联将于1月1日前终止存在的消息时,她的反应是满不在乎。她说:“对我什么都一样。我关心的唯一事情是我的孩子能得到药品。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健康成长。”

学者谢尔盖·卢丁说:“人们对政治的兴趣早已消退。我们大多数人关心的不是有没有政治,而是有没有牛奶。”

对许多莫斯科人来说,每天都为吃饱肚子而奔波,因此没时间去考虑政治问题。大多数人认为,他们个人争购食品比国家领导人争权夺利或戈尔巴乔夫的前途要重要得多。现在莫斯科虽然无人饿死,但许多人则整天都在排队买食品及衣服、鞋袜等生活必需品。

司机列奇连科说,一个普通工人下班回家后发现没吃的,他脑子里是不会去想政治的。他说:“3年前,人们对戈尔巴乔夫有兴趣是因为一切都是新鲜的。但现在,这种新的东西变成糟糕的东西。现在每个人

①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361页。

②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24页。

③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关心的是饭桌上有没有面包。”^①

四、政治团结：苏共政治分裂

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社会思想的大混乱,更是造成了社会民众的大分裂。随着苏联共产党成为改革的对象并在各方面政治压力下而被迫同意修改宪法第六条后,在戈尔巴乔夫努力把苏联共产党改造成西方式的社会民主党的时候,作为完整统一、组织严明的苏联共产党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分裂的危险境地。

1. 政治纪律、政治团结与苏联共产党

列宁指出:“没有组织就不可能有统一。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可能有组织。”^②这是因为,从党的内部情况来看,党是联系在一起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这个组织下面又分成密如蛛网的各种地方的和专门的、中央的和普通的组织。没有有效的组织形式,是不可能实现党的统一的。与此同时,在一切国家里,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除了无产阶级政党以外,还有靠近党的“广大阶层”和组成党、为党提供成员和养料的这一阶级的广大群众。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其自觉性就集中表现为它有组织起来的本领。当它一旦组织起来,就会获得统一意志,而先进的1000人、1万人、100万人的这个统一意志就会变成阶级的意志。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想领导革命,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以维护党的统一,从而巩固和发挥党的领导能力。

党要实现组织统一,必须首先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列宁指出:“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组织上的统一我们从来没有

^① 美联社莫斯科1991年12月17日电。

^② [俄]列宁:“论统一”(1914年),《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5页。

寻求过,而且也不可能去寻求。”^①思想上的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②列宁进一步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包括最革命的时刻,都不会放弃社会民主党的完全独立性,不会放弃我们的思想体系的彻底的不妥协性。”^③可以说,纲领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的一致是布尔什维克党赖以建立的基础。只有这些观点的一致才能把党员结成一个集中的党。如果观点的一致被破坏了,党也就要瓦解的。“所以只有完全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的人才能称为党员,只有足够理解和完全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的人才能参加党的队伍,同时也就是参加无产者大军的领导者队伍。”^④列宁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像一个好客的宗法家庭,愿意把一切同情者都接纳进来。“可是我们党在成了一个集中的组织以后,也就抛掉了那副宗法的面貌,完全变为一座只对够资格的人开放大门的堡垒了。”这对于我们是有重大意义的。正当专制政府竭力用“工联主义”、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等来腐蚀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时候,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竭力摧残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竭力想控制无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应当非常警惕,决不应忘记我们党是一座只对经过考验的人开放大门的堡垒”^⑤。因此,列宁反复强调:“我们非常珍视党的团结。但是我们更珍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纯洁性。”^⑥

党要实现组织统一,必须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列宁指出:“党必须团

① [俄]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文献”(1901年),《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47页。

② [俄]列宁:“论统一”(1914年),《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1页。

③ [俄]列宁:“关于起义的战斗协议”(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57页。

④ [苏]斯大林:“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1905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57页。

⑤ 同上,第59页。

⑥ [俄]列宁:“分裂制造者谈未来的分裂”(1907年),《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页。

结,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这就是从目前形势中得出的政治结论。”^①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因此,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无产阶级的敌人极力利用一切背离共产主义的坚定路线的倾向,这种情形在喀琅施塔得叛乱这一实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②列宁强调,在同派别活动进行实际斗争中,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容许发表任何派别言论。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时,应当使一切实际的建议以尽量明确的形式毫不迟延地立刻提交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机关去讨论和决定。此外,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在批评的形式上应当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这一情况,而在批评的内容方面则应当通过自己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从实践中来检验如何纠正党或个别党员的错误。任何对党的一般路线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等,都决不能事先交给按某种“纲领”等形成的集团去讨论,而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③同时,列宁指出要对违反这一规定的党员进行严惩。他指出,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大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则可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在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党的负主要责任的领导者的全体会议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

^① [俄]列宁:“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1921年),《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页。

^② [俄]列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1921年),《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8页。

^③ 同上,第81~82页。

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那么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实行。^①

总之,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最根本的还在于坚持无产阶级纪律。列宁指出,党的“统一的基础是阶级纪律,是承认大多数人的意志,是同大多数人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地工作”^②。列宁坚决主张决不同取消派调情,决不同破坏整体的小集团进行外交式的谈判。他号召觉悟工人把强迫他们接受取消派意志的任何做法看作犯罪行为,把分裂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的做法看作犯罪行为。列宁要求:“凡是珍视党、珍视恢复党的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最坚决地反对一切纯粹从派别组织、小集团的角度和利益出发而竭力破坏党的人。”^③

2. 民主化、改革分歧与党内政治派别

然而列宁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却也正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带领的民主运动人士所要坚决反对的。无论是对戈尔巴乔夫还是对政治反对派来说,一个有着铁一般纪律的苏联共产党都是他们所无法战胜的。因此只有通过制造思想混乱、分化党内高层、恐吓党员群众、怂恿社会敌视等各种手段,才能彻底瓦解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使其成为一个丧失政治能力的普通政党。

从改革时期苏联共产党发展状况来讲,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反对派的目标达成了。事实上,到了1990年的时候,苏共内部已经是派别林立。初步统计,大概有8种主要流派存在。

1. 自由主义者。他们自命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其政治纲领是:混合经济、议会制的法制国家,瑞典或奥地利模式。其社会基础是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人赞成成立由社会精华组成的党,同时准备与工人运动的进步侧翼联合。

① [俄]列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1921年),《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页。

② [俄]列宁:“统一”(1914年),《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2页。

③ [俄]列宁:“论党内状况”(1910年),《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8页。

2. 社会主义者。他们赞成在党或与苏共激进派结合的非布尔什维克型政党领导下与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和左翼平民党运动结成联盟。他们的方针是：取消上级任命的职位表，混合经济、合作制、自治，特别强调市政自治的和生态的社会主义问题。

3. 马列主义的革新派侧翼。这种派别观点的基础是新经济政策，同时他们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文明的合作社工作人员的制度。其最重要的意向是完成苏共的民主化，使党的机关置于基层组织和经选举产生的机构的监督之下，同时保证革新后的苏联共产党在政治舞台上的主导作用。

4. 为使苏共重新成为先锋型工人政党而斗争的斗士。他们不相信知识分子，最多把知识分子当作出主意的谋士。他们反对合作社和租赁制，赞成将企业的所有权交给企业集体。

5. 劳动人民联合阵线。反对复辟资本主义，认为广泛推广租赁制和市场关系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赞成用生产原则代替地区原则来选举苏维埃，认为这样可增加工人和农民在人民代表中的比重。

6. “俄罗斯爱国阵线”“统一”以及其他保守分子的组织。

7. “左倾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等组织。

8. 沉默的大多数……^①

不过，根据活动频率和政治影响来看，苏共党内主要有以下流派：

苏共中央纲领派。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向苏共二十八大提交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这个纲领草案是在1990年2月5—6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通过的。《苏共中央纲领》认为：“我们重申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法的创造精神，并以这种忠诚为指导，坚决抛弃对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和不容忍态度。”“我们首先要与同社会主义原则不相容的专横的官僚主义制度决裂。我们的理想是建设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忠

^① 新华社莫斯科1990年1月26日电。

于社会主义选择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仍然是毫不动摇的。”^①

苏共民主纲领派。1990年1月20—21日,全苏党的俱乐部和党组织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102个城市和13个加盟共和国162个党俱乐部和党组织的代表。这个在党内首先提出的纲领反映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的观点。会议通过的《向苏共28大提出的民主纲领》认为:“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使用马克思主义遗产只在当代条件下仍然有意义的那些部分。”“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关于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关于没有政治多元化的人民政权的可行性,关于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必然增长,关于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和国际主义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等,这些教条主义的认识需要根本修改。”^②

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派。1990年4月14—15日,马克思主义的党俱乐部联合会在莫斯科市郊的贝科沃小城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54个城市的308名代表。会议通过了《苏共内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内“传统派”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纲领》认为:“我们赞成恢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它主张对自己的奠基者及其继承人的理论遗产采取批判态度,随着世界的变化不断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革命化。”^③它主张“消灭作为战时共产主义党的苏共现行模式”,但不主张消灭共产党本身。^④

苏共布尔什维克纲领派。1991年7月14日,自称为忠实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全联盟代表会议在白俄罗斯首都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苏共布尔什维克纲领派宣言。该纲领派的拥护者宣布自己是“苏共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方针的继承者、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坚定的反对者、同反共和反苏斗争的真正战士”。在代表会议所通过的政治文件中有:苏共布尔什维克纲领,告全体共产党员书、布尔什维克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呼吁书,关于对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政治不信任”的

① 路曼:《苏共党内三个纲领的比较》,《参考消息》,1990年6月5—6日。

②③ 路曼:《苏共党内三个纲领的比较》,《参考消息》,1990年6月5—6日。

④ 塔斯社莫斯科1990年4月14日电。

决议,罢免败坏名声的人民代表的决议。文件指出,必须破坏“苏共中央妥协的上层人物”促进的“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犯罪计划”。代表会议要求举行苏共非常代表大会。为了筹备代表大会,成立了以全苏争取实现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团结协会主席尼娜·安德烈耶娃为首的组委会。然而,在政治舞台上确立苏共布尔什维克纲领派的地位的前景并不太好,因为代表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老党员和退休人员。而且,到会议结束时,对会议的兴趣明显减少了——与会者和客人人数减少了50%。^①

除此之外,还有成立于1991年的共产主义倡议运动组织。苏共中央委员、共产主义倡议运动组织局书记谢尔盖耶夫在该运动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主义倡议运动组织是由于党内出现了社会民主倾向,实际上将党变成右翼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甚至是资产阶级政党这样的危险性的时刻而开始积蓄力量,并进而召开代表大会的。”共产主义倡议运动组织坚决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共产主义倡议运动组织局主席波洛沃多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严厉批评戈尔巴乔夫。他说:“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最初为完善社会主义和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而提出了改革的设想,但很快便抛开了国内至关重要问题的解决,大谈‘对我国和全世界的新思维’。由于无穷无尽的折腾,使国家尊严受到了损害,在国际上成了乞求者。现在人们清楚看到,现行的政治方针是错误的、反人民的,使国家蒙受了极其巨大的损失。”^②共产主义倡议运动组织号召:为了战胜坚持反人民方针的人,农村劳动者组成了农民联盟,并已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各加盟共和国劳动者联合阵线、马克思主义工人党等社会政治组织都挺身而出,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各创作协会、作家组织、杂志、报纸也奋起保卫党的光荣的历史。忠诚的共产党员们仍在坚持工人阶级立场,他们是共产党内部能够制止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康力量。

到了1991年7月,苏共中央内部形成了以戈尔巴乔夫、波洛兹科夫、沃爾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为代表的4个主要派系团体。

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60岁的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强

^① 塔斯社明斯克1991年7月14日电。

^② [苏]《苏维埃俄罗斯报》1991年7月3日。

调社会民主价值、放弃正统马列主义的新的长期政策纲领受到强硬派的攻击。强硬派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削弱了党的影响力,而戈尔巴乔夫则认为,党需要更新,以生存下去。戈尔巴乔夫在同7国集团首脑会晤时为把苏联经济与西方的金融体系联系起来而进行的努力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波洛兹科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68岁的波洛兹科夫对于许多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改革的强硬派来说是一名旗手。他认为,党应当坚持正统的马列主义原则,应保留某些戈尔巴乔夫试图摒弃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方法。他在不同的场合批评戈尔巴乔夫的领导。治安力量的某些高级官员同意他的看法,即:自由化改革导致了民族暴力冲突、生活水平下降、党的影响力下降以及苏联外交政策方面的过分退让。

普罗科菲耶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52岁的普罗科菲耶夫是越来越猛烈地批评戈尔巴乔夫的人物之一。普罗科菲耶夫越来越靠拢“强硬派”,他指责戈尔巴乔夫,说他现在已把党引向分裂,因此建议戈尔巴乔夫辞去党总书记之职。普罗科菲耶夫公开批评激进改革,但他也支持对市场经济采取谨慎行动。他认为市场经济对既当总统又当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是行不通的。

沃尔斯基,苏共中央委员、苏共“自由派”领导人之一,支持激进的改革。现年59岁的沃尔斯基帮助组织了民主改革运动。得到戈尔巴乔夫欢迎的这个民主改革运动公开主张有改革思想的党员退党,以便今年晚些时候组织一个新的改革的党。沃尔斯基是有影响的科学工业组织的负责人,也是准备接受戈尔巴乔夫新的党的政策纲领的100名中央委员会委员之一。

如果说上述流派还只是苏共内部对改革因思想分歧而产生的组织派别,那么,由俄罗斯副总统鲁次科伊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则在事实上成为俄罗斯联邦政府用以对抗俄罗斯共产党和苏共中央的强大组织力量。“党中之党”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

1991年8月2—3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成立会议宣布:在苏共范围内成立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共产党民主派”运动的领袖、44岁的俄罗斯联邦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当选为筹备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临时委员会主席。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俄

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是在法律范围内以议会党方式开展活动的社会政治团体,参与实现旨在增强人的幸福、使人受到社会保护、加强人的权利与自由、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睦社会、法制国家的民主改革”。鲁茨科伊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已经收到 7230 份要求加入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的申请书。这将有助于这个政党在共和国司法部登记注册。鲁茨科伊说,如不承认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党的成员有可能退出苏共。^①

面对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的公开挑战,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自称是代表的会议与会者的组成是随心所欲的,是与苏共章程相抵触的:他们既未经党的自治专区和基层组织选举,也未经区代表会议选举。苏共中央书记处强调:“成立新政党的做法客观上是旨在分裂苏共队伍。”^②苏共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表示,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的建立是“苏共分裂过程中一个可能方案”的一个阶段。其活动的几个阶段将是:鲁茨科伊的党加入俄罗斯民主运动和谋取苏共的财产,“然后,在俄罗斯民主运动宣布自己是新的政党之后,鲁茨科伊的党将成为谢瓦尔德纳泽的党”。普罗科菲耶夫说:“将完成对苏共的钳形包围,在苏共非常代表大会时将不断提出苏共自行解散和取消的问题。”^③

西方舆论普遍认为,在俄共内部成立民主党表明:苏共受到“非党化”与“党中之党”双重挑战。路透社认为:“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在苏共内部成立,使苏共面临着分裂。苏共在同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非党化”命令斗争时,又遇到了这个在苏共内部“党中之党”的挑战,从而使苏共进一步受到分裂的威胁。德国《总汇报》认为这是“分裂苏共的决定性一步”。“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正式成立,预计这是导致苏共在晚秋召开党代表大会之前就分裂的后果深远的一步。由俄罗斯联邦副总统鲁茨科伊领导的这个组织把由波洛兹科夫控制的保守的俄罗斯共产党视为主要对手,打算尽可能在苏共的范围内夺取其地盘。暂时还不能肯定苏共领导机关是否会容忍在自己的队伍中有这么一个反对派开展活动。它已正式谴责了这次据说得到戈尔巴乔夫默许的活动。该党组织者们打算先是作为“组成部分”在苏共

①② 塔斯社莫斯科 1991 年 8 月 3 日电。

③ 塔斯社莫斯科 1991 年 7 月 19 日电。

“纲领”(即戈尔巴乔夫不久前提出的激进的改革纲领草案)的基础上开展活动,使俄罗斯共产党失去组织基础。如果苏共领导拒绝这个打算,那么下一步就是在苏共以外建立一个新党。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现在就把自己视为俄罗斯联邦的“执政党”。^①

面对严峻的政治挑战,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全会于1991年8月6日作出决定,将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组织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和组织委员会委员瓦西里·利皮茨基开除出苏共。不过,俄共中央的决定遭到新党的坚决反对。8月9日,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它不承认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全会在解决有关苏共党员问题上的权力。在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的声明中特别指出,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是苏共组成中的俄罗斯组织。它是根据党章的基本原则组成的,所以没有把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党员从苏共队伍中开除的正当理由。声明说:“很清楚,这里是在企图对共产党人民民主派进行报复,因为他们坚决支持社会上和党内的根本改革……是企图为自己在选举中的惨败复仇,这种失败是我们和其他民主力量给俄罗斯共产党所支持的保守的和反动的候选人造成的。”^②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委员会号召志同道合者不要屈服于保守派的压力,支持建立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就组成地区性基层组织、准备俄罗斯共产党人民民主党一大和苏共二十九大进行工作,参加民主改革运动的组建和活动。

然而“八一九”事件的发生结束了纷纷扰扰的党内混战,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命运也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合谋下走向终结。

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俄罗斯议会签署了一系列命令,宣布封闭苏共中央总部、禁止在俄罗斯境内的苏军党组织活动、“在法庭确定俄罗斯共产党是否卷入政变前”,中止俄共的活动、禁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的党组织的活动。与此同时,莫斯科市长波波夫下令,从下午3点起封闭首都的所有苏共和俄共的办公楼,并切断通往这些办公楼和克格勃的电话线。波波夫还以参与政变罪逮捕了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尤

① [德]《总汇报》1991年8月5日。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8月9日电。

里·普罗科菲耶夫。俄罗斯检察院将开始对普罗科菲耶夫进行起诉。在吉尔吉斯,根据总统政令,共产党总部“大理石宫”被收归国有。独立主义的领导机构宣布立陶宛共产党非法,警察、议员和检察院人员包围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楼。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下令禁止任何政党在该共和国公共机构内活动。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三个共和国开始没收共产党的财产,而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完全取缔共产党。立陶宛人在打碎的列宁塑像碎片上跳舞。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人鲁比克斯已被捕,共产党总部也已被占领。除了个人责任以外,整个党现在也处于被告席上。

1991年8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书记职务。声明指出:“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政治局都没有反对过这次政变。中央委员会没有采取坚决的立场予以谴责和反对,也没有发动共产党员同违犯宪法的行为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委员会应该作出一项艰难但却是诚恳的决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内的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将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①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91年8月24日电。

第六章 苏共的对策及其政治失败

在戈尔巴乔夫不使用武力干涉的政治强制下,社会民主运动的迅猛发展及其表现出来的毁灭一切的破坏力量,使苏共中央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如果采取强硬措施,则会被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反对派视为试图维护极权体制的“保守力量”,从而在心理上遭受疯狂的社会舆论攻击和在政治上面临被解除职务的风险;如果放任自流,那么社会秩序的混乱、经济发展的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一系列社会现实紧迫问题都将被视为苏共政治无能的“罪证”,从而使政治反对派有了进一步攻讦的借口。可以说,在整个社会民主运动时期,“纠结”成为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共中央面对纷乱的政治局面时表现出来的政治常态。也正是这种丧失了根本政治立场的患得患失,最终摧毁了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力量。面对汹涌而来的社会民主运动,苏共中央在不断妥协之中主动交出了政治权力,自动走下了历史的舞台。

一、戈尔巴乔夫:不用武力解决政治

戈尔巴乔夫认为,要想使政权从苏联共产党手中平稳地移交给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包括其常设机构最高苏维埃),就必须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保证党内保守力量不使用武力来挽救党即将失去的政治权力。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就是他作为总书记的最大职责。不能使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成为戈尔巴乔夫的重要政治原则。“我生平的另一重要教训就是:作为达到政

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①马特洛克对此作出评价:“实际上,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不是把使用武力放在优先地位,而是把它作为最后手段的俄罗斯领导人。”^②

1. 重塑执政合法性需要

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自哪里呢?

这是戈尔巴乔夫在推进政治改革时,必须向他的政治局战友们解释清楚的一个关键问题。否则,失去了党的支持,改革就无法进行下去。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改革时代的苏联共产党,其执政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来源于真正民主,而不是形式民主。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要给社会输氧——民主。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例行会议上说:“民主化是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提供现实的权利。而谁将来实施呢?是否有能力的和勇敢的人来使用权利呢?要知道我们已经使他们不会使用民主了……我们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先是建立了铁一般的制度,尔后在这种制度下折腾活生生的人。在任何情况下,制度是第一位的!我们已经在代表大会上谈到了两院,甚至提到了选举制度。再次周密地考虑并付诸实施也是可以的……不应该害怕民主。不管任何地方,任何级别,从政治局到最小的集体,在家庭的圈子里都不应该害怕问题、难题和讨论。”^③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铁一般的制度”的借口就是“人民”现在还没有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高级智慧,只能一点点地“培养”。吉拉斯指出:“苏联的领袖们,只有在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不得不被迫东闪西让地允许‘将来’给人民以民主。但目前他们却干干脆脆地说,这种自由在苏联已经创立了。当然,甚至他们也感到自由已在他们下面发生作用。他们不停地‘提高’人民的意识,他们劝人民‘生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55页。

②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68页。

③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96页。

产’，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以及干燥无味的领袖们的政治观念，不断地填塞到人们的脑中。更糟的是，他们还不停地强迫人民承认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忠诚，并承认他们相信他们领袖们所作的一切允诺都永远不会错而且是切实的。”^①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戈尔巴乔夫在文章中说：“民主与自由是人类文明的伟大价值观，我们应当继承并用社会主义内容来充实它们。我们过去把真正的民主和形式上的民主对立起来，当然本身包含着某些理论内容。我们主张真正的民主，但是反对在此基础上摒弃民主的形式上的原则，因为法制国家本身必须包括这些原则，而我们自身经验证明，在社会生活中严格遵守一切法律原则是何等的重要。因此，我们可以有完全根据地说，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②应该说，这篇文章既是他对改革以来关于民主的政治思考的总结，也是对1989年上半年的苏联人民代表民主选举活动的政治实践的一个总结。

在对民主的政治思考中，戈尔巴乔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原则——“非意识形态化”。作为民主运动的第一场政治实验——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选举——则进一步坚定了戈尔巴乔夫捍卫的政治理念——人民权利。切尔尼亚耶夫指出，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结果发出的信号表明，冲出社会主义选择这一框架的形势已经极为成熟，选举结果反映群众对“责成”实现改革的那批人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不满，虽然当时党的州委、区委、国营农场、集体农庄以及苏维埃机关的领导成员有三分之二已经“更新”，但是他们远不是全部当选为人民代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各级第一书记和其他相当级别的领导人都遭到惨败。选举结果在政治局讨论了一整天。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说：应当在改革的具体背景下来审视选举。他把实行选举这件事本身评估为“实行政治改革和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重要步骤”。但是在这里，西方报刊和我国党的机关的公开出版物不谋而合。纷纷责难他是

^① [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5月内部出版，第175页。

^② [苏]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1989年11月），《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有意“作难”党的机关。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索洛维约夫在政治局说,中央已经把“他们全部”抛弃,任凭政治蛊惑家们奚落摆弄。卢基扬诺夫则号召要想方设法“从道义上支持并帮助”所有落选的人。戈尔巴乔夫驳斥了为落选辩护的人:“这是他们对待人民的报应,在他们眼里人民好比牲畜。我收到了数以千计的上告信,诉说虽已踏破了这些老爷的门槛,但问题多年来毫无结果,哪怕只是要求解决日常用品的供应问题。而党中央却应当去保卫和维护那些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让他们自己做出结论吧!同时我们也会对他们做出结论的。”他还警告说,从现在起所有选举都将照此进行——人们现在有权利认定并驱赶掉不中用的人。^①

其次,来源于竞争选举,而不是革命传承。戈尔巴乔夫认为,革命是布什维克党创造的最大政治遗产——统治国家的权利。但是,在改革的年代里,这些政治遗产却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他说:“我们逐步更充分、更全面地意识到,我们建造了什么,正在改造什么,我们走向什么样的社会,自然也就相当明确地认识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体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机制到上层建筑。不仅是说,而且要在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等方面实际实行步骤。”^②戈尔巴乔夫决心采取实际步骤破除这一强大“阻碍机制”。

戈尔巴乔夫开始对十月革命进行反思。他说,人们把革命称为被剥削群众的节日。但是,结果蒙受最大损失的不就是他们这些群众吗?更何况革命之后还常常会发生倒退。“热月”这个词作为这种倒退的象征已经确定无疑地被收入了学术和政治词典,“这种倒退同样是很痛苦的”。^③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当产生变革的需要,进化式的改革是符合公民利益的社会发展的最佳形式。正如经验所表明的,改革的速度要取决于许多因素,但主要是社

①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34~335页。

② [苏]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1989年11月),《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③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会公民的成熟程度、执政者的责任心、公众的相互宽容和不走极端。以上所述绝不是要否定法国革命或十月革命的毫无疑问的意义。它们已牢固地占有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但主要问题是：这些革命，首先是十月革命是否提供了最佳地解决当时已经或正在成熟的社会任务的范例？它们是否“提出了”最有利于社会的解决现实存在的各种矛盾的方式？还有，它们是否真正实现了所允诺的东西？戈尔巴乔夫发出疑问：1917年十月确实是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吗？我们建立的制度确实是社会主义制度吗？^①原来，建立起来的其实是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的却是专横的斯大林主义极权体制。这种体制强迫“人民”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党”，然后“党”就宣称它的权力是合法的。吉拉斯指出：“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所以有代议制度的存在，还有一个更深刻更重要的理由。党的高级官僚，或者新阶级的政治核心有必要批准其最高机关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共产党政府能够不管一般舆论，但不能不理党的舆论和共产主义的舆论。因此，尽管选举对共产党人没有什么意义，但党的最高集团对于议员的选择是郑重其事的。在选择时得考虑到一切条件，如个人在运动中和社会中的服务成绩，所担当的任务，所能发挥的功能，以及所代表的职业等。从党内的观点看，选举领导人物非常重要：领导人物分配着他们所视为党在议会中的最重要权力。这样一来，领导上就有了以党、阶级和人民名义行动时所需要的合法地位。”^②戈尔巴乔夫认为，这种极权体制造就下的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人民真正赋予的，而是布尔什维克党自身政治实践逻辑的产物。在倡导人民自治、人民政权的改革年代，必须使党通过真正的竞争性选举，重新获得执政的政治合法性。戈尔巴乔夫说：“党的处境并非毫无指望。要克服因告别牢固的权力垄断而引发的精神压抑症的机会是有的，时间也是有的。赢得人民的支持已经不能靠吃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老本了，而是要靠能够保障民主、公民权、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的有效政策。我相信，苏共改变自身面貌是有可能的。”^③

①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② [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5月内部出版，第121~122页。

③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

在1989年3月28日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代表面对党参与的苏联人民代表选举结果,大多数人的情绪都很压抑,一派天快塌下来的气氛。但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是,“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了极其重大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①。戈尔巴乔夫指出:“党通过改革政策培植自己的威信,不是用威胁和恐吓,而是采取公开贴近人民,而且号召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的方法。现在应当去争取另一个阶段的威望了,这是一个办实事的阶段,‘堵住人家的嘴巴’是得不到威信的。选举表明,改革需要维护,但维护的办法只能是深化和发展。现在,主要的就是办实事。不能光围绕自我分析转圈子,也不能成天价陷于内疚自责。我们应该让人们感觉到,对于他们所批评的那些弊端,我们是会作出回应的。我们准备满怀信心地、平稳地行动起来。我们将以此去迎接代表大会的召开。”^②1989年5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苏联选举制度改革”的文章。文章认为,党明确规定的改变选举制度的主要目的首先在于,把国家服从社会和社会利益的极为重要的杠杆交还人民手中。“这一目的只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选民的主动性、提名和选举代表的自由、提高公民对选举的兴趣的途径来实现。”^③

再次,来源于人民自治,而不是党的垄断。戈尔巴乔夫指出,真正的党的领导应该是人民自治的最高表现。这种最高表现不是说党要垄断社会生活的一切方方面面,而是说党的执政权力是人民自治权利的集中体现——人民赋权。戈尔巴乔夫指出,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人民”就成为党伸张权力的政治工具而不是权力的政治主体。他说:“斯大林善于利用群众的急躁情绪,利用一切群众运动所固有的空想和平均主义的倾向,利用先锋队急于达到预想目的的愿望。所有这一切都大大缩小了创造性讨论所出现的问题、选择的可能性,导致统一,在统一中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和党的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

② 同上,第195~196页。

③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53页。

纲领范围内的意见和观点多样性的余地。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紧密接近专制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改革,就是要破除这一行政命令制度。戈尔巴乔夫继续说:“改革,是一个完整的革命进程,它是人民用民主方法实现的,是为了人民的,党对人民表现为是他们的政治先锋队。而党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历史性创议是它的先锋队作用的自然反映。而党不垄断探索的权利。任何有益的创议,不问它来自何方,都是改革所需要的,因为,它的生命力在政治上取决于民主的发展,而民主的职能完全在于刺激人民的首创精神。”^①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维埃作为人民自治精神的制度体现,应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但是,自斯大林以来,苏维埃就成为党执政权力的“橡皮章”。按宪法规定,国家最权威的实体是最高苏维埃,理论上也应是“最高的”。其主席团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主席。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最高苏维埃与其说是个真正的组织结构,还不如说是个政治舞台。它的成员都身兼他职(常常是要职),他们每年定期召开两次为期三四天的会议,例行公事般地通过事先草拟的一些建议。这些成员都是从共产党机构事先准备好的单一候选人名单中“选举”出来的。因此,最高苏维埃所行使的职能纯粹是走形式。“真正的决策者是把书记处当作它的差役的党的政治局,它只简单地把立法权移交给最高苏维埃以便它通过已经作出的决策。因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大多是共产党员,他们必须服从党纪党规,在这种情况下,最高苏维埃不可能独立行使其职能。”^②然而,当戈尔巴乔夫开始选举运动后,他要求党必须高度重视,以保证权力真正归属苏维埃。“作为一种制度,一种体制,社会主义还没有彻底展现出来。劳动人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向新生活,走向普通人民感到自我良好和自信的生活,感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国家命运的主人。改革就是要民主,要公开性,要经济生活民主化,要把权力交给苏维埃。要使人们掌握精神文明,改革使人们高尚起来。这是最主要的。”^③

1988年整个秋冬,整个苏联共产党都在为有史以来真正的选举作准备

① [苏]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1989年11月),《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②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49页。

③ 塔斯社莫斯科1989年11月7日电。

工作。各委员会都基于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精神草拟了选举细则,并于12月上旬由最高苏维埃以法律形式予以通过。这些细则旨在对政府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对于这些改变,尽管党内有着不同意见,但大多数党的领导人仍然同意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方案。雷日科夫就指出,在1987年底,戈尔巴乔夫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如果脱离政治改革,在经济领域就不可能出现进步的变革。他们的形象说法就是首先一定要“把苏共闹个天翻地覆”。客观地说,党内早就出现了变革的必要性。党的确起过伟大的历史作用。在紧张到极点的20世纪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时刻,在伟大卫国战争岁月,在战后年代以及冷战时期,正是苏共在掌握着全国的命运。如果换了另外一种社会制度,那些年未必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可是时代变了,那么当然党的活动也应该出现重大的甚至方向性的变化。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负责的主要是政府,所以我认为党应该从直接管理经济的工作中摆脱出来,把这些职能交给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我的看法,意识形态工作和制订发展战略的工作留给苏共来做比较合理。同时还应该让它从停滞了几十年的理论教条和党务工作实践中解放出来。而且,早先的戈尔巴乔夫也是持这种意见的。例如,在苏共中央1988年二月全会上他就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走到必须改造我们的政治体制的地步了。这当然不是说要取代现行制度,而是要向其中引入质量上全新的结构和成分,要向它提供新的内容和动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涉及党和国家机构功能的划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应该以列宁主义为基础。党的指导和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挥作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①

2. 内外政策的理念展现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提出“新思维”,就是表明苏联的立场是要把全人类利益放在首位,而不仅仅是其过去所宣扬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因此,作为这一新的政治立场的政策延伸,戈尔巴乔夫要求在对外政策中放弃以武力对

^①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6页。

抗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实力政治原则,通过对话、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说:“对抗思维、对抗政治‘文化’是‘铁幕’双方大家都有的。但是我们清楚,很多事情是取决于我们的。在对抗年代,我们苏联以自己的核威力和自己的一些行动不仅在西方的官方圈子里,而且也在广大的社会舆论界引起了不信任。必须首先改变在实际事务中和对其他国家关系中的行为。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还是寻找崭新的对外政策概念,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整个政策的新的原则和范畴。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新思维——对世界事务采取新态度的哲学和方法论。”^①作为新思维的对外政策体现,1989年5月30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内外政策的基本原则的报告。他提出苏联外交政策的五项基本原则:一是在国际关系中实现非军事化、民主化和人道主义的原则;二是通过谈判销毁核武器,使裁军和国防能力削减到合理足够水平;三是不许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来达到政治、经济或其他目的,国与国之间应遵守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四是不以对抗,而以对话和谈判来确定利益平衡,以此作为处理国际问题和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五是在互利和平等的基础上使苏联的经济加入世界经济的行列,积极参加现代国际分工、科技交流和国际贸易,遵守有关规则。^②

不过,既然苏联主张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中放弃使用武力,那么,在国内又该如何体现政治的“新思维”呢?格拉乔夫就指出,戈尔巴乔夫在其联合国演说中作为未来世界公理提出的诸多新思维的原则,首先是其中的放弃使用武力原则,正在摇摇欲坠的苏联帝国的广阔疆土上受到极其艰难的考验。那些发生在第比利斯、卡拉巴赫、巴库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愈来愈难以说成是零零星星的事件,使戈尔巴乔夫面临一个不愉快的问题:“新政治思维是否适用于内政?如果不适用,那么运用其公理——从‘选择自由’到‘不使用武力’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③戈尔巴乔夫对此的回答是:在国内政治矛盾时不使用武力。正如马特洛克所言,戈尔巴乔夫“要想使改革获得成功,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关键,因此我坚信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将继

①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83~84页。

②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

③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

续强调保持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合作关系。这就意味着,如果东欧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不可能使用武力来镇压,那样只会牺牲他的国内政策,甚至是他的政治生命”^①。

3. 改革形象的政治保证

把“新思维”作为改革的政治理念,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不仅是他对苏联政治的贡献,也是对世界政治的贡献。与“公开性”“民主化”一起,“新思维”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标签。作为自认为有别于苏共前几任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来说,维护改革的形象,其实就是维护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生命。就像马特洛克观察到的那样,波罗的海三国的自治运动得到了当地共产党的广泛支持。这显然使戈尔巴乔夫处于困境。“如果他允许地方共产党支持自治乃至最终导致独立的要求,不就等于让它们脱离党在莫斯科的权威机构而自行其是吗?如果他坚持各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必须服从莫斯科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那他的改革与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政策又有什么两样呢?”^②戈尔巴乔夫决心树立新的改革形象。那么,在政治实践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形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就像他所主张的那样,就是自由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简单来说,就是党不要去干涉!更不能用武力去阻止!

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洪流中雪崩式垮台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仍然坚持这是东欧人民自己作出的选择,苏联绝对不会再像历史上那样出兵干涉。对戈尔巴乔夫来说,1956年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是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促因。“对于我来说,‘布拉格之春’更多的是人道方面的悲剧,而不是政治方面的。”^③在谈起这件往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说:“一般说来,匈牙利人特别尊重本国历史,这是一种神圣的情感。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特有的鲜明的民族主义都起源于这种情愫。理解并考虑到匈牙利人的民族主义,对于正确建立与该国的关系,正确

^①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17页。

^② 同上,第204页。

^③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2003年,第8页。

理解该国所发生诸多进程的实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谁对这些因素估计不足,谁就会最后错打算盘,这样的历史实例多得举不胜举。我们在1956年曾有过一次惨痛的教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我们自身的错误造成的,是因为轻视了匈牙利人民的感情和传统而受到的惩罚。”^①他在接受斯拉文采访时说,在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按照苏共政治传统,他的理解与党保持高度一致:这可能是我们的阶级敌人的“暗中破坏”。公开战胜我们无望后觉得尝试着从内部搞动作,通过意识形态的腐化作用。“1969年访问布拉格之前,我始终这样认为。”^②但是,在戈尔巴乔夫亲自到布拉格访问的时候,他认为他一贯坚持的党的“正确”看法却发生了变化。他说:“当时我们在尼古拉·佩特罗维切夫的领导下试图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同我们的青年组织建立联系。那时,我看到了普通人对五国行为的态度。当我们来到波尔诺工厂时,工人们都背过身去,不想与我们谈话。我觉得自己像在传染病房里一样。我当时想,不应该这样。正是1968年以后苏联开始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运动。这些都促使人们思考,令人难忘,后来这些东西都起作用了。”^③

显然,在后来他推行改革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起作用了”。面对社会纷涌的各种非正式组织狂妄的政治要求,戈尔巴乔夫不断呼吁甚至压制不要动用武力而要用谈话方式解决。1989年9月29日,戈尔巴乔夫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他呼吁共产党同各种政治组织进行对话。他说,共产党必须仍然是苏联社会的先锋队,但是,共产党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用武力取得公众对“公开性”改革计划的支持,“要么我们承认其他人拥有独立思想和行动的权力,并从事各种活动赢得公众舆论和公众同情;要么我们就一边声称起领导作用,一边成为一个被孤立的组织”。他还强调:“尽管某些新的政治组织利用比较自由的政治气候谋求共产党的瓦解,但决不能用武力来制止他们。”^④然而,不论是戈尔巴乔夫政治上天真也好还是出于政治

①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②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2003年,第8页。

③ 同上,第9页。

④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88页。

策略考虑,格拉乔夫却指出了戈尔巴乔夫这种做法带来的最大政治后果就是:苏共丧失威信!他说:“总书记以为不仅他自己,而且全党都能够适应新的政治土壤的希望,不久即化为泡影。残留的党的大树,如同加尔洵小说中那棵不幸地冲破暖房的屋顶以便呼吸新鲜空气、完全暴露在严寒之中的棕榈树一样,无法适应开放政治,开始发黄枯萎。戈尔巴乔夫依然给树培土、浇水,只是后来他承认说:‘人们一旦明白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不再通过暴力来加强,党立刻威信扫地。’”^①

4. 国内政治现实的妥协

随着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召开以及随之而来的猛烈的政治改革进程,使已经出现的反苏、反共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并在思想、舆论和组织上提出了废除宪法第六条,取消苏共法定领导地位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行动。在这种反共浪潮纷涌的政治危机时刻,戈尔巴乔夫仍然坚持采用对话的手段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

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脱离苏共的举动为例。1989年12月19—22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经过激烈辩论,大会通过决议,宣布独立,脱离苏共。决议说,立陶宛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党纲和党章的政治组织,它与苏共保持平等的伙伴关系”^②。1989年12月25—26日,苏共中央举行非例行全会,讨论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决议说,完全赞同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对此事所作的评价和结论: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从组织上和政治上脱离苏共的决定,是非法的。全会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中央工作小组,前往立陶宛,同当地党员、党组织和劳动集体代表举行会见,然后中央再举行会议,作出相应的决定。1990年1月3日,戈尔巴乔夫、麦德韦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同立陶宛党的19名政治局委员进行会谈,劝说他们改变两周前作出的立共脱离苏共的决定,但会谈没有得到成果。不过,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他们不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00页。

^②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00页。

会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① 1990年1月11—13日,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共产党决定脱离苏共、立陶宛要求脱离苏联等问题进行调查和劝说工作。但是,戈尔巴乔夫承认,他的立陶宛之行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他也不想采用强力手段来解决与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分歧。

面对叶利钦在政治上的咄咄逼人,戈尔巴乔夫也曾尝试过使用内务部的力量进行阻止。但是却遭到“民主俄罗斯”的强力反对。作为对戈尔巴乔夫的反抗,“民主俄罗斯”号召1991年3月28日在莫斯科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因为这一天将召开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叶利钦是否适合继续担任主席一职。据克留奇科夫回忆,当时戈尔巴乔夫的反应似乎很恐慌。莫斯科市当局拒绝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于是戈尔巴乔夫便颁布了一道总统令,命令莫斯科市内和附近州的警察听从苏联内务部的指挥,并且命令军队进入莫斯科,加强警察对市中心的保卫。但是,共有10多万人不顾官方不准游行的警告举行了示威游行。“当时,他们都很平静,大部分士兵的态度也比较温和。许多士兵还亲切地同示威者交谈。”^②当政府希望清场的时候,他们动用的是警察而不是军队。军队于3月29日撤走了。戈尔巴乔夫失败的意识根源就在于以“民主俄罗斯”为代表的反共力量成功地培养了社会对苏共的“恐惧感”。“培养恐惧是改革纲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目的,使用了一切可能的名目:1937年的镇压、饥饿、经济短缺、技术事故、犯罪、艾滋病、生态危险、各民族间的战争和警察暴力。同时,把每一个名目中的恐惧形象,利用国家宣传机器的所有工具以及‘独立’电视台,以难以置信的力量向大众意识灌输。”^③于是,激愤的人群走上了街头。

甚至于在最后挽救苏联的新联盟条约时,面对各共和国领导的集体反对,戈尔巴乔夫既不愿也不能动用军队来逼迫各共和国通过并签署新联盟条约。在同斯拉文的谈话时,斯拉文问:“当时应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说:“当时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各共和国已给自己的代表下了指

①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25页。

②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581页。

③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示,所以他们不会到莫斯科来的。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依靠某一部分军队,就会出现流血和国内战争。”斯拉文又问:“那么您当时是否控制着军队呢?”戈尔巴乔夫回答:“没有。应该说,当时在所有同联盟有关的原则性问题上,我们都征求叶利钦的意见。各共和国有这样的要求:在新联盟条约通过之前,中央的所有行动都要同俄罗斯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我请求军队的帮助,很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从另一方面来讲,当时这样做会被人看作是抓住权力不放的表现。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幻想。”^①

二、宪法第六条:从一党制到多党制

从一党制到多党制,涉及的最关键的法律问题就是如何对待1977年宪法第六条。这一条的内容是:“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苏联共产党之存在是为了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决定着苏联的对外、对内政策,领导着苏联人民的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她为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具有按计划的有科学根据的特点。党的一切组织都在苏联宪法的范围内行动。”^②随着苏联人民代表的民主选举以及代表大会的成立,新的政治权力机构已经形成。于是,在内政政治压力下,修改宪法第六条运动开始激烈展开了。

1. 危机与退让:从一党制到多党制

1989年5月25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萨哈罗夫在发言中提出要修改宪法。他说:“我建议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法令作为代表大会

^①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72~73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3~214页。

首先审议的一个议程项目。我们在经历一次革命,改革就是一次革命;而‘法令’是这种情况下最合适的字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专有权力就是通过苏联的诸项法律,任命最高的国家官员……据此应该修改苏联宪法中涉及苏联最高苏维埃权力的那些条款……”^①

1989年10月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麦德韦杰夫在电视讲话中说,应该严格区分国家和党的职能,使党摆脱对经济和其他过程的直接领导,苏共仍然是执政党,不过,它应当在法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行使这一职能,要通过被选进国家机关和在社会与经济组织中的共产党员,对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的活动施加影响。^②

1989年11月30日,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通过一项必须就该共和国共产党的地位进行讨论的决议。并决定成立起草拉脱维亚共产党章程和纲领草案的工作小组。会议还就39名党员的呼吁书进行了讨论。这39名党员中有8名是该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他们在呼吁书中主张放弃“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切实际目标,放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还主张,拉脱维亚共产党应当成为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独立的党,并作议会制拉脱维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放弃宪法保证的对权力的垄断地位。

1989年12月7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修改共和国宪法第六条的规定。原宪法第六条规定: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与指导力量,是苏联政治体制、国家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核心”;经修改后,这一条表述为:“政党、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根据立法程序规定的办法成立并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样,立陶宛就成为苏联各共和国中第一个修改宪法允许实行多党制的共和国。

1989年12月8日,《真理报》发表题为《关于苏共的先锋队作用》的社论。社论说,当前争论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党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党同苏维埃、社会团体和运动的相互关系。这是具有原则意义的一整套问题,这些问

^①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23页。

^②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190页。

题无疑值得公众广泛加以注意和进行全面讨论。应当十分清楚地说,不能死死抓住具体的表述形式不放。在个人崇拜和停滞时期形成和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正在成为过去。党的职能正在发生变化,党不再是行政命令体制的组成部分,而这种体制在国家的根本法中也有反映。很显然,在改革进程中,考虑到改革的教训和积累的经验,也需要仔细地完善我国的宪法做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宪法的任何条款,以及第六条,便可能重新评价、更新,直到取消。^①

1989年12月9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发表讲话。他强调,将同企图贬低党的作用、破坏党的威信的做法作坚决的斗争。在谈到修改宪法第六条的问题时,戈尔巴乔夫说,在已经开始的新宪法制定工作的范围内,任何一条都可以修改或取消。但政治改革的经验表明,宪法第六条本身并不妨碍实行自由选择。^②

1989年12月12日,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参加大会的代表有2106人。大会的第一天就在会议的议程上发生激烈争论。会议一开始就有一些代表要求将讨论、修改宪法第六条列入会议议程。但是经过一整天的辩论,大会否决了几位代表提出的把“讨论、修改宪法第六条列入议程”的建议。

1990年1月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卢基扬诺夫在莫斯科会见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时说,苏共决定对宪法第六条“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进行修改”,主张放弃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通过同其他政党“自由竞争”来获得共产党的执政地位。^③

1990年2月4日,“莫斯科选民协会”“莫斯科人民阵线”等非正式组织举行莫斯科20人示威集会。会上的标语口号有:“要把多党制写进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等。叶利钦在集会上发言说,苏共领导已经没有能力对苏共本身进行根本改革,因此,必须自上而下地彻底改革党的机构,取消

①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15页。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89年12月9日电。

③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26页。

宪法第六条,因为“权力不能垄断”^①。

1990年2月5—7日,苏共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通过了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作了报告,阐述了苏共中央将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的纲领草案的主要内容。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强调了共产党本身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必要性,并正式提出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他说:“在一个正在更新的社会中,共产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的组织力量才可以存在并履行它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意味着它的地位不应该由宪法条款来确立。”经过三天激烈的争论后,中央委员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提案。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作出的决议,“为在苏联数十年来第一次实行政治多元化铺平了道路”^②。马特洛克说:“这些提案完全是革命性的。如果这些提案能够得到落实的话,这些重大的改革步骤会创造一个完全独立于共产党的最高权威,共产党自身只有赢得选举才能继续掌权。我很清楚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提出这些提案。尽管他没有在公众场合如此讲过,但是正如叶利钦所指出的,共产党机关已成为改革的主要障碍。戈尔巴乔夫被迫抑制他的改革进程以免遭到没有同情心的中央委员会的驱逐。真正的选举的开始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创设,给他提供了一些赫鲁晓夫不可能得到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仍不够。如果由中央委员会选择的话,它会撤销戈尔巴乔夫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从而迫使他辞去国家元首的职务,因为他是共产党在人代会的代表。而总统有规定的任职期限,这样他就不会受到这种阴谋诡计的陷害。总统制的创设也为戈尔巴乔夫削弱共产党提供了一种动力,尽管他仍是共产党的总书记。”^③格拉乔夫对此作出评价:“苏共中央举起了白旗。‘开始改革’的党,在戈尔巴乔夫的催促下自己提出关于修改大名鼎鼎的苏联宪法第六条措词的建议,第六条从法律上巩固了共产党作为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地位。一个月后召开的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就只需‘满足’苏共关于‘根据本人的愿望’免去其苏联社会‘领

①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36页。

② 法新社莫斯科1990年2月7日电。

③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66~367页。

导和指导力量’的‘职务’的‘请求’了。”^①

2. 宪法修正案：多党竞争的合法化

1990年3月11—16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在没有经过激烈辩论后，全会决定将有关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作为立法倡议提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同时决定于今年7月2日举行苏共二十八大。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说：“无论在中央全会上，还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认真的辩论，这一点很有意思。大家对我们就第六条所提出的修正案大体上都较满意，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合宜的妥协。”^②对于中央全会出现的这种沉默现象，季诺维也夫指出：“很难说，在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人实行多党制、取代一党制的意图中，哪种成分更多一些：是普通的无知、弱智呢，还是早已深思熟虑确定要叛变性地摧毁苏联国家的基础。坚持消灭苏共对权力的某种垄断地位，就等同于某人开始坚持要取缔大脑管理肌体神经系统的垄断地位，并且要用大量的、大脑的代用品来取代它——而这些代用品又是都原本就不存在的。”^③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替代品就是总统制。

1990年3月12—15日，第三届（非常）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就实行总统制问题展开辩论。在13日对宪法作其他修改的表决结果显示，1771票赞成、164票反对、74票弃权。14日，人代会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该法对1977年宪法第六条作了如下修改：“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青年团、社会团体和公众运动，通过他们的当选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以及其他方式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并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同时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一切政党“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不允许建立以使用暴力改变苏联宪法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完整性、破坏国家安全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戩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6页。

③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2～23页。

和挑起社会、民族和宗教纠纷为宗旨的政党、团体与运动和开展活动”。对于会议结果,戈尔巴乔夫说,修改宪法第六条和设立总统职位是“有利于民主和捍卫民主的重大步骤”。外电评论: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清除了政治局内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的政治家,使议会变为一支能与苏共抗衡的力量。他还迫使党的领导人在竞选中面对选民,最终于上月作出放弃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的“历史性决定”,从而为多党制开辟了道路。^①

取消宪法第六条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对于苏联共产党来说:“作为各级地方政权的苏维埃,无人领导、无人照管,被弃置而任其自流,被放任而随其妄为,遭人侮辱。一方面,它们遭到严厉的非难;另一方面,也得不到任何支持。如果以前党组织是它们的支柱,那么在取消苏联宪法的第六款之后,它们也就失去了这个支柱。”^②

3. 多党的企图:苏联共产党的毁灭

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政治主张呢?戈尔巴乔夫进行了自我辩解。他说:

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一种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了。这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现,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的确,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可以易手了,从人民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推选的另一部分人手里。实际上,联盟协议签署后我是打算这样移交权力的。遗憾的是,由于八月和十二月的阴谋造成的结果,这种可能被破坏了。从那时起,俄罗斯再也无法回到政治稳定的轨道上了。此后一连串的动乱一直使俄罗斯不得安宁。我

^①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90年3月13日电。

^②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12页。

们未能完成的任务只能由下一代政治家们来完成了。^①

三、苏联共产党：“来自上面的革命”

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目前的改革“可以称作‘来自上面的革命’。是的，改革是根据苏联共产党的倡议开始并且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党认为自己有勇气，有力量制定新的政策，并能够领导和开展社会的革命进程。党首先是从自己，从纯洁自身开始的”^②。

1. 摆脱“永远不会犯错误”的观念

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在以前的年代里形成的思维。我们大家，从总书记到工人都应当改变这种思维。”^③那么这种“以前的年代里的思维”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主要是指苏联共产党“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刻板思维，主要是“那些曾经迫于形势而采取的和反映我国具体历史条件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式和方法，被奉为典范和被理想化了，并被当作普遍的不可更改的教条”^④。1986年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如果党自己能够不断发展，摆脱‘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一套观念，批判地评价所取得的成绩，清楚地看到还要做些什么，它能够卓有成效地解决新的任务。”^⑤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要对“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思维进行批判，是因为“党的力量在于，党感觉到时代气息和生活脉搏的跳动，永远活动在群众当中。每当国家面临新的任务时，党就寻求解决任务的途径，重新确定和改变领导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54～455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63页。

③ 同上，第76页。

④ 同上，第49页。

⑤ [苏]《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5～356页。

方法,显示出对国家命运、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承担历史责任的能力”^①。要增强苏共的力量和能力,必须打破旧的思维框架的限制。

首先,这种思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戈尔巴乔夫指出:“把我们所遵循的理论变成一套僵死的公式和万应灵丹妙药的任何企图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和精神极其矛盾的。”^②也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的。“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经常对发展中的生活现实进行客观、深入的科学分析。这是无所忌讳、无所隐瞒、不怕真理的批判性分析。只有这种分析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可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对认识社会的发展、对待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态度科学基础”。对苏联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必须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运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历史的基本问题。这种态度,“就其实质而言,具有人道的目标,是对现实进行创造性、客观的真实评价,严于求己和自我批评的一种态度”。因此,“真正科学的探索,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③

其次,这种思维不符合苏维埃政权发展的历史真相。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所走的开拓者的道路是艰难而复杂的。对它进行简短而又全面的分析简直是不可能的。在这条道路上,有旧世界留下的物质和精神遗产的沉重包袱,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和外来武装干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又有各项改造中的新颖事物、人们对改造所寄的希望,以及新生的、不习惯的事物闯入生活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使人往往没有时间回顾与深思。在这条道路上还有在革命风暴的历史时期一向起着特殊作用的种种主观因素。也有充满革命时期的极端主义而又往往被简单化、直线化了的对未来的设想。也有为新生活而奋斗的志士们想把一切都做得尽可能快些、好些和公正些的那种一片真心与满腔热情。”^④但是,戈尔巴乔夫强调,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里产生的专横及镇压行为。苏联人民为这种错误付出了昂

① [苏]《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5页。

② 同上,第273页。

③ [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革命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8年,第9页。

④ [苏]米·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第5页。

贵的代价。这些错误还给苏维埃社会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基于滥用权力的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①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威信。因此，“公开性”已经使重新评价苏维埃历史成为社会普遍共识的情况下，仍然抱着“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思维，不仅不能够增加党的威信，相反，只能更加地削弱和损害党的威信。

最后，这种思维不符合社会民主化时期的改革精神。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对革命的净化与复兴的希望是，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人的因素来挖掘社会主义的巨大社会潜力。通过改革，社会主义能够，而且必定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为人谋利和使人变得更高尚的现实人道主义制度的一切可能性。”^②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并不能马上被社会所接受。人们还没有做好理解这种变革的时代意义的思想准备。“我们已着手改革社会生活方式，破旧立新。变革触及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心理、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在劳动集体中的地位。无可讳言，甚至原来的许多好人对违法行为和各种缺点也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降低了自己的社会积极性。许多人没有马上理解变革的意义，没有马上看到改革为他们展示出的新的生活目的、抬高了他们自己，不知道改革完全符合他们的物质与精神利益。”^③这就是改革所面临的、不寻常的政治形势和思想意识状态。要想使人们接受和理解改革，就必须打破旧的思维桎梏，就必须在精神领域开始斗争。“党常常为了在生产领域以及精神领域中进行变革，不得不进行名副其实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不具有阶级对抗的形式，但却十分激烈。“在改革和革新我们生活的过程中，正在进行尖锐的、不总是公开的，但却是不妥协的思想、心理定向、思维和行为作风的斗争。旧的东西不经过斗争是不会投降的，它正在寻找新的形式来适应处于错综复杂情况下的生活进程。”^④生活表明，决不能用旧的公式来套今天的进程。必须通过各种观点的对比、辩论和讨论

① [苏]米·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② 同上，第29页。

③ [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改革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8年，第5页。

④ [苏]《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6—1987.6）》，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8页。

来打破老框框的束缚。结果，“几十年来，我们首次亲身体会到不同的思想见解如何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对此不习惯、评价也不一，因而需要加以研究、分析、辩明。但是，我们应该从这些事物中看到最主要的东西——改革政策日益得到人民的支持”^①。

2. 破除官僚主义行政命令管理体制

“力图用详细的集中计划和监督来囊括生活各个角落”^②的行政命令管理体制不仅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唯意志论和肆意妄为，也成为70年代末以来社会形成停滞现象的主要阻碍因素，更成为改革中的主要阻力。改革的目标就是要破除20世纪30—40年代以来确立的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式管理体系，以赋予社会主义更大的活力。

那么什么是官僚主义呢？

1987年6月12日的《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

是什么力量妨碍了及时扭转局面，促成了过去反社会利益的出现和存在，阻挠了今天我们社会的利益的和谐？答案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任何一种答案都回避不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即墨守成规者的心理。这种心理集中表现在官僚主义者的行为中。

马克思对官僚主义所作的评语有原则性意义。他认为官僚主义是国家的一种特殊的排他性的社会，是一个完整的小圈子。要知道，集团利益同小圈子利益完全不是同一回事。社会集团利益自然是必要的，小圈子利益则是另一回事。它具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任人唯亲、徇私、派别主义和集团主义的形式。它是极其自私的，想凌驾于任何其他利益之上，并且总是与社会利益相对立的。小圈子利益的感情气质，它的真正欲念，内在动机就是追求规矩，追求消灭差异，追求规格统一。

理解官僚主义为什么和如何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对立起来这一

① [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改革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8年，第6页。

②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39页。

点非常重要。这一理解本身就是战胜官僚主义势力和战胜从官僚主义势力演变而来的小圈子利益的必要条件。除了自己的生存和成就之外,官僚主义没有其他目的。对官僚主义者来说,首先是“谋前程”,在职务的阶梯上提升,当官以及每升一级就随之而来的物质福利和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在这个一切颠倒过来的“办公室”世界里,国家的真正目的被说成是违反国家利益的目的。而官僚主义正是同这些国家目的和全民目的的体现者展开了一场真正的战争。

官僚主义者不了解现实,盲目地相信从属关系和权威,盲目地相信硬性规定的形式主义化的行动以及现成的世界观和公式,就其本质来说它们是教条式的。对变革的要求他们特别反感,并疯狂地加以反对。因此,他们总是简单地回避问题,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用半心半意的和明知要失败的行动来消除问题的尖锐性。

官僚主义者最仇视公开性。只有在缺乏公开性的情况下,才使他们能把自己说成是国家最高利益的不可代替的、一贯正确的、专心致志的捍卫者,说成是人民福利的无限忠诚的保护者。公开性,公开地民主地讨论问题,就必然会使官僚主义失去其神秘之感和优秀性的桂冠。

官僚主义压制各种不听“上面”制裁而富有首创精神的人,不相信劳动群众的经验及其对国家大事的思考,所有这一切把相当一部分人引入迷途,养成不负责任的习惯。

“做官威风”,这就是投某些人所好的相当流行的人生哲学。但是,有这种哲学的人越来越难以生活下去了。时代在召唤和造就这样的人,他们体现了积极的首创精神,他们在探索,他们打破死水一潭的气氛,他们在克服惰性,他们在推动改革。^①

官僚主义的丑恶表现是:“在经济中,在社会和精神领域中采取强制手段和行政的肆意妄为做法;以官僚主义的冷漠态度对待人们的权利和需要;忽视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社会经验。”在停滞和民主制度受束缚的情况

^① [苏]《真理报》1987年6月12日。

下,官僚主义发展到危险的边缘,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官僚主义的扭曲,“尤其是政治领导中的扭曲,同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是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①。戈尔巴乔夫举例说,如果你直接了解一下管理机关的活动,你就会发现:“一些部长、总局和企业的领导人相互根本就不交谈,不建立直接的事务联系,一切都通过公文往来。”戈尔巴乔夫斥责说:“是同志们不能打个电话、碰碰头来解决问题呢,还是企图用公文来推卸责任呢?”^②

怎么才能克服官僚主义?才能摆脱行政命令管理体制呢?

戈尔巴乔夫认为:“根本的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党和社会中的民主化进程、公开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人民实际参加社会管理,正在从根本上摧毁官僚主义的阵地。”^③但是戈尔巴乔夫强调,关键还是在党,要从党开始。他说:“坦率地说,改变工作方式,摆脱行政命令的做法应该在各级进行——从基层组织到中央委员会机关都要进行。”^④只有各级党的领导参与全面的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工作,才能切实克服行政命令管理体制带来的弊病。“只有党在自身活动和党内生活民主化以及使党的活动和党内生活摆脱任何官僚主义积垢方面作出令人信服的榜样时,党才能引导一切社会力量同官僚主义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取得实际成效。”^⑤

具体来说,就是要进行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指出:“我国政治体制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要建立这样一种权力和管理机制:在那里可以周密地实行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定相应的法律程序,在解决重大政治和国家问题的过程中,大大减少乃至消除偶然性因素。在我国政治体制的各个层次中排除主观主义的可能性。必须做到,使人民能够积极参与原则性决策的制定与通过。这就符合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根本问题——党政职能划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戈尔巴乔夫认

①③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53页。

② [苏]《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6—1987.6)》,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④ 同上,第34页。

⑤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55页。

⑥ [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改革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为：“党的主导作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挥作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党从事制定和修正政治方针的理论工作。它把自己制定的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把他们组织和团结起来，实现它所提出的任务，并且实行相应的干部政策。其实就是党作为社会的政治先锋队的基本职能。目前，在改革和民主化的条件下，必须彻底恢复列宁关于党以及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活动的学说。”^①

实现这一主张的最主要的改革途径就是在政治体制的各个基本环节之间，首先是在党和国家之间正确地分配权限。简单地说，就是要恢复列宁主义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戈尔巴乔夫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党要学会在民主条件下工作。1991年6月4日，受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1991年）联席全会的委托，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员在人民代表苏维埃中的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改革苏联社会、确立民主和革新人民代表苏维埃的过程是复杂的和充满矛盾的。苏维埃成了紧张的政治斗争的舞台。在国内的许多地区出现了取消苏维埃的直接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中央机关、许多党委会和党组织并没有做好准备去进行积极的政治工作，迟迟未能采取实际行动以解决出现的问题。苏共中央政治局提醒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和国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和州委会注意，今后必须执行苏共二十大关于改革政治体制和坚决加强人民政权机关——各级苏维埃的原则性方针。政治局认为，苏共在苏联宪法和各项法律范围内应当更加积极地参加建立国家权力和管理机关的活动，对国家内外政策发挥有效的影响。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党委会和党组织的任务是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全体会议上集体制订极其重要的社会生活问题方面的政治方针，通过自己在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代表坚持这一方针、实施这一方针。建议各级党委会和党组织以及全体共产党员要坚决掌握议会工作方法，把议会工作看成是实现苏共政治职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党员代表工作的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有效地解决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建议苏共的舆论工具更深入地分析，客观全面地阐述苏维埃工作和苏共议员团工作的经验，不回避

^① [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革命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政治辩论,对那些不负责任的攻击和对某些代表进行的精神恐吓行为进行应有的反击。

3. 积极地培育发达的社会组织体系

戈尔巴乔夫指出:“没有发达的社会组织体系,不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工作内容和方法,我们所要建立的政治体制是不可想象的。”^①社会团体是苏联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社会上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工会、共青团、合作社、妇女组织和其他团体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社会团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按照旧章程办事、看党和国家机关脸色行事的习惯”^②。这种充满了官僚主义习气的社会团体已经丧失了公开性的改革年代的社会活动能力。

改革是什么呢?“改革既是我国以前社会经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结果,同时也是我们在清除一切成了阻力的东西时的一种‘否定的否定’阶段。如果从精神上来衡量改革——它是一次有决定意义的尝试,要在所有人面前完全恢复社会主义价值,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以劳动人民为对象。要清除附在社会主义价值与理想上的官僚主义积锈,除掉一切非人道的东西,解放人们的创造才能,保证个性的精神开放。”^③因此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团体的改革首先和最主要的就是要坚决支持社会团体的自治。对于代表多种多样的社会利益的社会团体的迅速增加,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人民的首创精神的出色表现,值得大力支持”^④。对于那些“利益远离改革的目标和人民的利益”的社会团体,戈尔巴乔夫认为他们“无关大局”。因为“党组织和劳动人民能够把更新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同那些遵循着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人区别开来”^⑤。

然而随着苏联共产党遭受越来越猛烈的政治攻击,戈尔巴乔夫曾经寄

① [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改革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②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71页。

③ [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改革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④⑤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76页。

予希望成为社会主义健康力量的社会团体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刻进程中,要么完全丧失了联系群众的能力而成为群众反对的官僚主义组织,要么成为权力转移过程中成为新的政治集团。1989年10月27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召开例行全会。会议指出,苏联的青年运动正处在发生深刻质变的前夕。共青团正经历一个危机时期。立陶宛共青团决定退出全国性组织,立陶宛共青团不仅希望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建立伙伴关系,而且希望同其他青年运动建立伙伴关系。国内先后出现各种青年协会,大学生联合会和自由参加的协会、“绿党”小组和儿童组织等青年运动越来越迅速地超出共青团的范围。^①

可以说,整个改革时期,社会团体的培育和发展呈现出“一边倒”的政治倾向,从一开始就掀起了反对现政权的政治高潮。

四、社会的狂热：“来自下面的革命”

戈尔巴乔夫指出,一切已知的“来自上面的革命”之所以存在弱点和不彻底性,正是由于缺少来自下面的支持,缺少与群众协调一致的行动。既然缺少这些,那就必然需要自上而下的、或多或少带有强制性的措施。结果就出现了改造过程中的不正常现象,因而也就付出了高度的社会政治和道德“代价”。这次改革的特点和力量在于,它既是“来自上面”,也是“来自下面”的革命。这是它成功和不可逆转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②

1. “公开性”与“民主化”:改革之力

“在民主的条件下工作”——这是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提出来的。戈尔巴乔夫说:“改造国家的任务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虽然我们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任务,但我们将奠定加速发展进程的基础。我们还能及时地吸收新鲜的、出色的力量。我相信,甚至在全部机制、全部民主的和道德的杠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89年10月27日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杆开始起作用时,党的任务也不能简化。党的工作将会增加。而且工作将越来越复杂。我们不得不改变方式和方法,因为我们将在民主的条件下工作。党有责任看到一切、抓住一切、总结一切,寻找有才能的人,把他们安排在需要的岗位上,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工作,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①在这一阶段,戈尔巴乔夫仍然相信改革——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它只有在业已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框架内才有可能;仍然相信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党依然是完善和加快发展这一制度的动力和主心骨,只有党才能将民主变成改造社会的工具。所以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反复提醒甚至警告党的干部,要学会在新的条件下工作。在1986年7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出:“对于所发生的,我们既不该吃惊,也不该愤怒,而应该看作正常的现象,因为这是客观进程所产生的。到处都在实行民主化。所以,当有人反对或者表示不同意时,不要不高兴。”^②7月31日,戈尔巴乔夫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干部,无论是党的干部,苏维埃干部,还是经济工作干部,应该学会在扩大民主、调动人的因素和发挥人民主动性的条件下工作。”^③

但是到了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开始感受到民主化进程越来越遭受来自党内的阻力。据他回忆,从1986年秋天起,戈尔巴乔夫开始筹备关于干部问题的中央全会,并决定在11—12月召开。但是由于党内的不同意见而没有按预定时间召开。于是,“西方开始喧哗:戈尔巴乔夫开不成全会了,他受到强烈的抵制,政治局内部斗争激烈。这是夸张,因为当时并不存在这些问题,政治局内部也没有分裂。当时大家都还认为需要新的干部。在起草中央全会的报告时,我碰到一个问题:对培养和教育干部的传统题目必须改变提法。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成为改革的命运问题”^④。

1987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在理论和政治问题上向前迈出了重要

①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41页。

② 同上,第104页。

③ [苏]《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6)》,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0页。

④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2003年,第18页。

的步伐,第一次对停滞时期进行了评价,对党内选举产生的机关的作用作出了评价,阐述了它们的作用是如何被贬低的,所有工作是如何被上面指派的一小部分人所操纵的。戈尔巴乔夫对全会的报告感到满意。但是令他惊奇的是,“这次中央全会实际上是为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为政治改革、为改革的战略和策略开辟道路的一次会议,但在现实中却被官僚们否认了,中央全会后一切照旧”^①。戈尔巴乔夫深切地感受到了为什么会出现阻力:一切都在权力的奥秘之中。“这并不是因为精英们完全因循守旧。他们已经看到,改革进程的逻辑必然会导致一个结局,那就是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有资格掌权。许多人已经感到,过去他们是从上级手里得到权力,但在民主条件下就未必能重新得到了。这是改革最富戏剧性的时期,尽管政治局内部还保持高度的和谐,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是一致通过。”^②于是,戈尔巴乔夫得出结论:“党本身在阻碍事业的发展,改革党的问题变成了最迫切的问题。应该通过民主化使党活跃起来。那时我几乎在每次全会上都说,号召民主——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都应该学会在民主条件下工作。如果不学会在新形势下生活,以为今后可以一切照旧,我们会输掉一切的。但是这些话没有得到重视!党内精英们听不进去这些话。不能说百分之百的人,但是大多数人都听不进去。”^③

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放弃,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政治局内的其他人都已经感受到:民主化的进程已经不可阻拦,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而已。不过,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他希望这个时间越短越好。在他的努力下,1987年6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一项重要决定——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应当根据中央一月全会的决定筹备,即采用民主程序——按差额原则提出候选人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按照这一精神,1988年6月28日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作出决定:成立新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取代原来的最高苏维埃。同时,更新选举制

①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2003年,第18~19页。

② 同上,第19~20页。

③ 同上,第19页。

度,规定人民代表的选举要实行“自由选举”。

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了!

马特洛克敏锐地观察到:“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无异于一场潜在的革命。1988年苏共代表大会确立了很多目标,如建立一个权力受到一定限制的政府;按步骤创设一个拥有真正立法权的、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允许大家对新观念进行公开讨论,允许大众传媒对新思想进行公开报道,正式抛弃与西方为敌的意识形态基础,等等。政府为实现这些目标正在付诸行动,而这些行动又将不可避免地打破旧的体制。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选正在筹备之中,不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苏联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①

1989年初,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运动正式拉开。根据最高苏维埃制定的选举细则,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由2250位成员组成。其中,1/3的成员按地理区域选出、1/3选自各联邦共和国内的“民族”地区以及其他形式上自治的实体,最后的750人则选自“公共组织”。细则中最重要的是采取多名候选人互相竞选以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进行选举。马特洛克解释道:如果了解一下新规则,哪怕是其中一部分,就会知道苏联公众将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行使选举权。即使大多数候选人是共产党员,但他们也不得不参加竞选,如果投票是不记名的,且选票的计算是公正的,那么那些不受欢迎的候选人就有可能落选。意欲反对当时“体制”的选民们被赋予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规则要求每一位获胜的候选人获得的选票必须过半数,不以票数多少为准。选民可以对所有候选人投“否决票”。这样,即使党控制了提名过程,但如果它所提名的候选人不受欢迎,人们也可以把他否决。苏联选民将拥有一项众多美国人梦寐以求的权利,那就是有权“不选名单上任何候选人”,然后还把选票捻成小棍。^②

1989年3月15日,苏联共产党开始在党内选举人民代表。结果显示,在有641名官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100名党员代表中9名政治局委员没有一个人获得全票。其中,利加乔夫有78张反对票,雅科夫列夫有

^①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16页。

^② 同上,第151页。

59 张反对票,尼科诺夫有 26 张反对票,扎伊科夫有 25 张反对票,梅德韦杰夫有 22 张反对票,斯柳尼科夫有 19 张反对票,切布里科夫有 13 张反对票,戈尔巴乔夫有 12 张反对票,雷日科夫有 10 张反对票。雷日科夫成为政治局中最受欢迎的人,利加乔夫成为最不受欢迎的政治局委员。^①

1989 年 3 月 26 日,选举在全国结束。但是,选举结果却让苏共领导人大吃一惊:约有 30 名左右的苏共州委书记与市委书记未能当选。一种从未有过的挫败感顿时在 3 月 28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蔓延。戈尔巴乔夫试图证明苏共没有输,因为 85% 的代表是共产党员。他指出:“选举运动的进程表明,我们已处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局面之中。一场为争取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为争夺电视节目的播送时间而展开的斗争显得很残酷。而在报刊上,在与选民会见时,争辩相当激烈,有时甚至表现得失态。从表现看来,有许多事情令人伤心,也有许多事情是先前所不知道的。某些领导成员对这一切感到气愤、不安,情绪上有点张皇失措。我倒觉得高兴,这说明我们确已把社会唤醒过来了,确已做到了我们前几年搞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让人民参与政治。自由选举发现了许多人才,弄清了社会各阶层的立场,我们过去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代表中,苏共党员占 85% (在过去的最高苏维埃里约占一半),而党的高层领导把选举的这一结果竟看成是党的失败,这岂非怪事?”^②

然而戈尔巴乔夫遭到了反驳,他被提醒注意“现在党内的纪律性比无党派人士还差”。雷日科夫指责道:“难道在这 30 个输掉选举的人当中,真的有谁是跟自己的幸运对手做过一番较量的吗?然后自己回答:没有。我看,他们恐怕还是以为一切就像过去那样,只要哪位党的负责人给基层下一道命令,叫大家给州委领导投上一票,那所有的人都会立刻乖乖地完成任务。可不是那时候了!选举恰似表明,那种享有说一不二的威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要想建立威望,就得天天奋斗,每个人都得这样干才行,党也好,领导人也好,谁都不能例外。可不能以为这场选举只是 30 个人输掉了。

^① 法新社莫斯科 1989 年 3 月 19 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1989 年 3 月 21 日。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93 页。

是党输掉了这场选战,因为它相信了这些人,把自己交到了这些人手上。”^①克留奇科夫指出,选举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党没有掌握民主条件下的斗争手段。“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公开的、通过合法途径建立的反党派,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行为上的唯意志论不受任何限制,对群众情绪不予理睬成了一条准则,少数社会政治力量的意见也未予考虑。各级领导人都未学会政治斗争的科学,而反对派力量却尽善尽美地掌握了这种艺术。”^②

1989年4月25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选举问题。一部分人认为,选举结果对党的和他们自己都糟透了。另一些人谈及此事时明显带有指责领导的语气,觉得是上面要进行民主实验而“把事情搞到了如此不成体统的地步”。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对于党来说,当前主要的就是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掌握新方法,“到人民中间去”,到群众大会上去,不要光坐在办公室里,要学习在民主条件下工作。^③

遗憾的是,党的领导——从区委书记到政治局委员——看来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相当普通的道理。选战之后的乐观情绪很快就消失了:87%当选代表中的大多数开始大张旗鼓、急急忙忙地退出苏共。雷日科夫肯定地说:“这种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决不是什么觉醒,而是彻头彻尾的叛变。不过这可是一个绝对令人不安的信号!它意味着做党员就得不到群众拥护。不过,从党内向党外的‘移民’直到变得规模吓人时,苏共领导还在稳坐钓鱼船,他们安慰自己说:耗子从船上逃跑怕什么?方向还是正确的嘛,航线还是清楚的嘛,前进的步伐并没有改变嘛……他们不是健忘就是不懂:耗子弃船逃跑,那是因为遇到了灭顶之灾……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自己‘正确’,宣称航线不会改变,毫无自我改革的愿望,过分自信,不善于聆听足够振聋发聩的报警信号,终于导致1991年8月共产党的毁灭。”^④

①④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

②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

③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9~200页。

2. 社会反抗的合法化:失控的“民主”

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和重新评价苏维埃政权历史的号召点燃了社会的激情。根据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在1987年苏联15个地区进行的全苏舆论调查结果表明,苏联人对国家各种问题的兴趣在不断增长。对1万人的问卷调查表明,约85%的人对国内事务始终感兴趣,而1983年在万名被征询者中,这一人数仅占60%。在被征询意见的人中,84.2%的人希望完善自己在政治问题上的知识,91.8%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苏联历史。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被征询意见者对社会生活中落实党的一些最重要的要求的程度给予高度评价。66.3%的人确信,公开性已普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持相反意见的人占8.1%)。^①苏联人的政治意识迅速活跃起来了。

然而在迅速活跃起来的政治意识中,一股否定历史、否定苏共、否定苏维埃政权的潜流已经借助“公开性”的旗号堂而皇之地变成了肆虐的政治意识洪流。戈尔巴乔夫曾经希望的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来“阐明数百万人民过去是怎样生活、怎样劳动的,他们信仰什么,阐述胜利与失利、发现与错误、光明与悲剧、群众的革命热情与违犯社会主义法纪和犯罪等是如何结合、同时并存”^②的主张遭到了无情的嘲弄。

面对这种“民主乱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发出严厉警告。他说:

在回顾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时,并不隐瞒这样的事实:苏联人民取得过不朽的成就,也经历过暂时失败的煎熬以及艰难而复杂的时期。一切都已过去,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一点是主要的:十月革命的70年,首先是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时期。任何人都不能抹煞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正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也正是由于有了苏维埃政权,我国才变成了世界大国之一。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87年12月2日电。

^② [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改革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8年,第9页。

真正充分而深入地宣传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为什么如此重要呢？这里有没有压制批评和公开性，有没有背离关于客观而勇敢地评价自己历史的号召？没有。我们主张诚实而公开地回顾过去，但我们坚决反对伪造我们的光荣的过去，反对把我们的历史描绘成充满错误和失望。

改革是创造，不是否定。我们不是从零开始改革，而是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胜利和几代苏联人的不可争辩的成就的基础上进行改革。

同时，在阐述我们的历史道路时应当记得过去的教训。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不要沉湎于搞周年庆祝活动。不要用某种模式来套历史。既不要文过饰非，也不要赋予它人为的光彩。它是我们革命的历史，所以不需要这样做。它是那样的英雄无畏，那样的富有教益，因此无须对它加以任何装扮。只有真情，只有诚实地回顾走过的道路，才能够也才应当激起新的热情，鼓励人们为使我们的祖国更快地沿着进步的台阶向共产主义迈进而努力。^①

但是，戈尔巴乔夫对此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是旧的生活方式向新的生活方式转化中必然要产生的现象。他说：“一些人的思想陷入混乱：正当采用新的不习惯的经营形式与社会生活方式时，怀疑我们是否偏离了社会主义立场，是否修正了马列主义学说？甚至出现了马列主义的‘捍卫者’，社会主义的哭灵者，他们认为两者都受到威胁。”^②戈尔巴乔夫斥责这些人“关心的是私人利益”。他向党内发出警告：“作为党员，特别是领导成员抱这种态度是不能容许的。”^③戈尔巴乔夫认为：“今天，最主要的是为不忙乱的客观的工作创造条件，保证这一工作公开化，这样还可以促使人民积极参加我国历史问题的讨论工作，从而有助于教育人民，有助于形成正确的历史观。”^④

于是，“公开性”变成了事实上的“单行道”。就像《真理报》总编辑维克托·阿法纳西耶夫批评俄罗斯联邦戏剧家协会理事会主席乌里扬诺夫时

① 塔斯社莫斯科 1987 年 8 月 23 日电。

② [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改革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8 年，第 6 页。

③ 同上，第 12 页。

④ 同上，第 10 页。

说：“我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除新经济政策以外的全部苏联历史，应以文件、事实和科学分析为基础，如实地反映历史，不能杜撰。”乌里扬诺夫（以扮演朱可夫和列宁出名）说：“我认为我们这儿对民主的进攻一共两次，一次是对沙特罗夫话剧《向前、向前，再向前》的批判，另一次是安德烈耶娃的信。这两次打击是沉重的，使改革队伍不知所措，惊慌不安。亏得形势变了，对该剧的批判一开始，就有反击的，包括我们戏剧家协会代表大会的反击。这一反击才使该剧得见天颜。外地到处演，只有莫斯科不演，不是禁演，而是想演的人在看风向，犹豫不决。”阿法纳西耶夫接着说：“我是批此剧的人之一，迄今仍不同意此剧。我不安的是看着我们今天的报刊，每天都是10—15个最积极的‘改革家’在发议论，电台、电视也全是他们的市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哪个问题都能发宏论，连足球也能评几句。他们批一切，批一切人。沙特罗夫为什么不能批？他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都能跟上潮流，奖励、称号都有。公开性不应成单行道。”^①

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在政治反对派的怂恿下，正是以“民主”为旗的社会民主运动在肆意地上演着“反民主”的暴力行径。

1989年6月2日，约四百名青年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费尔干纳州塔什拉克区聚众闹事，他们砸商店、烧住房，用石块和燃烧瓶袭击民警。3日和4日两天约四十座房屋被烧，一家商店被砸，数辆汽车和摩托车被毁，伤120人，五十多名肇事者被捕。这场动乱的矛头直对当地的麦斯赫基土耳其族居民。^②6月5日事态继续扩大，动乱蔓延到费尔干纳市、马尔基兰和库瓦塞等地，几乎席卷了整个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动乱震动了当时正在举行的首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尼沙诺夫和苏联内务部长巴卡京赶往费尔干纳处理这一事件。6月4日起在费尔干纳州实行宵禁。代表大会结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和主管政法

^① 新华社莫斯科1988年6月28日电。

^② 注：乌兹别克共和国有2000万居民，70%是乌兹别克人。居民中间有6万麦斯赫基土耳其人。麦斯赫基是格鲁吉亚南部的一个地区，16世纪被土耳其人占领，1829年并入俄罗斯。1944年土耳其人住在克里米亚、北高加索及黑海沿岸，1944年11月14日，苏联国防委员会决定，为了边境安全把土耳其人迁到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住着1.2万麦斯赫基土耳其人。近年来他们提出了返回故地的要求。在这次动乱中，他们已被紧急迁往俄罗斯联邦中部地区。

的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于6月12日专程飞往乌兹别克,亲临现场了解情况,处理问题。在这场动乱中死95人,伤1010人。受伤的人中有136名苏联内务部队的军人和57名民警。总共有676座民房被烧,26个国家机关被袭,186辆交通车辆遭到破坏。共逮捕了439名违法歹徒,没收了7718件武器。为了平息动乱,从苏联各地调动了1.1万名内务部队的官兵,当局吸取了第比利斯事件的教训,这次没有动用正规军。内务部队也受命非在紧急情况下不得开枪,只是当歹徒企图夺取装甲车时才开了枪。

暴乱发生后,苏联报刊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分析,普遍认为已远远越出了民族纷争的范围。《费尔干纳真理报》指出,这已不是个别流氓分子的行为,而是“早就计划好的。规模巨大的政治行动,其主要目的不仅使州,而且使共和国和全国的稳定遭到破坏”。《红星报》指出:“反对势力在共和国还很强大,他们准备随时在改革、民主和公开性的背上插上一刀。”^①

1990年3月26日,《真理报》发表“民主与反民主”的社论。^②指出:

关于群众集会和群众集会的自发性,《真理报》和其他出版物谈了许多。成千上万的正直人走上街头,为的是再一次“支持”加速改革的进程,“支持”民主的发展。不能不看到这一健康的来自下面,来自社会深处的意向。这些积极趋向中的许多东西也表现在莫斯科和国家其他地区2月群众集会的过程中。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另外的东西,这就是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越来越成为使极端主义合法化、使本来就复杂的社会局势“动荡”的形势。

2月底的事件又增加了一种令人忧虑的颜色。在许多机关刊物上出现了对政权和某些舆论工具的指责,说什么它们掀起了“吓唬”人们的运动,使人们对群众集会(请读作“民主力量”)更加恐惧的运动。愤怒的控诉指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政府、苏共中央,甚至是创作协会的领导,因为它们在2月25日群众集会之前发出了警告性的呼吁。

那么是什么使苏联最高苏维埃成员、国家领导有根据感到不安,认

① 新华社莫斯科1989年6月20日电。

② [苏]《真理报》1990年3月26日。

为有人可能利用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来挑起骚动,并使他们有根据号召国家公民保持克制、理智和责任感呢?

2月25日行动的组织者把经过周密协调的行动看作是向苏维埃机关、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施加政治压力的强有力手段。2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群众集会的决议,以及在首都和全国其他城市散发的许许多多的传单、呼吁书也谈到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地方出现了免于处罚刑事犯罪分子的要求。在这些刑事犯中间有投机倒把者、高尔基城爆炸事件的组织者等人。泽廖诺格勒的非正式团体、“俄罗斯人民阵线”“民主联盟”的极端主义分子声称,打算不惜一切代价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口号是“百万人是枪杀不了的,我们反正要迎着坦克前进”“我们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也要要求政治局辞职”。

即使这种呼声只是个别人或一小批人的挑衅行为,难道这不是使人感到不安的理由吗?何况,正如已经提到的早先大肆鼓吹的“新的二月革命”,消除现领导的权力、呼吁冲击克里姆林宫和卢比扬卡监狱,承认国家的宪法结构是“反人民的结构”……

即使2月25日的“全苏联行动”完全摆脱极端主义留下的最小痕迹,这样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行动(如最初计划的那样)在当前社会紧张、经济困难、混乱的背景下,总之是在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选举的背景下,也不能不起破坏稳定的作用。选举首先要求的是清醒的头脑和平静的思考,要求有政治文明和耐心,要求克制情绪。

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呼吁全国公民表现出克制和理智,支持国家领导在可靠的保证改革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结果是,这次群众集会风潮的组织者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能实现。行动的规模要比原先设想的小得多。未能像策划的那样促使人们建立所谓的公民行动委员会,加剧政治形势。

看来,苏联最高苏维埃、苏共中央和政府不许激化情绪的意志是坚定的,而中央和地方的预防性措施也起了作用。许多群众集会参加的人数不多,工人阶级实际上没有有组织地参加群众性活动。

群众集会的自发性的增长越来越使全国的社会政治形势极度紧

张。有人利用人们对经济中的危机现象、艰难的财政状况和市场的失调、纪律涣散和秩序混乱、投机倒把的盛行和犯罪猖獗的不满来加剧狂热情绪。公众意识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对官方政治结构和管理机关的不信任日益加强。对“党内权贵分子”的批评,以及通过集会施加压力要求地方机关辞职都具有示威和凶恶的性质。

族际关系的紧张状况没有减弱,对非本地居民的敌视和不友好的火焰延及越来越多的地区。全国不同地区的离心倾向日益增强。

各种破坏势力企图利用全国业已形成的局势。在把政权交给“自我组织起来的”社会的旗帜下,实际上是通过明显的反民主途径夺取政权,即通过群众集会施加强大压力和通过号召利用所谓的“圆桌会议”来攫取政权,似乎当局代表和反对派的代表应该立刻坐到圆桌旁。

在最近的一些集会上,发言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倾向更加露骨,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野心更加暴露无遗。例如,在斯维尔德洛夫举行的非法集会上提出过“共产主义是20世纪沾满鲜血的思想”之类的口号;在莫斯科祖博夫广场举行的集会上,“民主联盟”成员库兹涅佐夫宣称:“今天的制度是国家强盗行径,我们需要的是大震荡。”随后又呼吁抵制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一伙人企图捣毁第比利斯市中心的列宁纪念碑,格鲁吉亚一些居民点拆除列宁塑像又说明了什么?

当前的尖锐性已经不是单纯由于自发的过程而造成的。加紧拼凑有组织的反对派来对现存的国家权力结构的做法已十分明显。夺权的政治斗争已经具有公开的形式。

遗憾的是,一部分人轻易地上了平民党人蛊惑言论的当。跨地区议员团的一些成员积极参与和组织,是所举行的这些集会有一个特点。其中某些人,有的是苏共党员,踏上了公开的反对派政治斗争的道路,提出了与党的路线、宪法准则不符的口号,其活动方法背离了民主和党内关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同他们进行彻底决裂、展开公开辩论、揭露他们的真正意图和目的,揭开他们的真正政治和道德面目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苏共中的分离主义倾向正在加紧动摇政治稳定。显而易见,在实际政治多元论、多党制的条件下。要更加明确地确定立场,苏

共在思想和组织上要保持团结,任何带有宗派色彩的打算和行动,都将给苏共的政治活动造成严重损失。企图在党内建立拥有自己的纲领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小圈子的人都应意识到这一点。

鉴于国内经济、社会政治和民族紧张状况日益加剧,右的和左的极端主义相互勾结,社会健康力量坚决要求加强民主法制,在法律范围内采取坚决行动。

民主与法制和组织性是分不开的。因此,要坚决制止反宪法行为,本着有效保护公民生命、权利、自由和财产,保护其住宅和财产不受侵犯的必要性,广泛采取严厉措施,加强社会制度和法制。重要的任务是严格遵守集会、游行和示威秩序,对任何极端表现给予及时反击,对煽动社会和民族间仇视的人运用法律的全部效能。

结语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 和智慧深化改革

——执政党要有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勇气、智慧和胆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改革，难免触动一些人的‘奶酪’，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不可能皆大欢喜。突破既得利益，让改革落地，需要有勇气、有胆识、有担当。畏首畏尾，不敢出招，怕得罪人，是难以落实措施、推动工作的。”^①在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执政党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和政治胆略，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建立健全公正、合理、透明、开放的利益分配机制，使改革的红利普惠人民，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夯实社会稳定基础、重塑社会思想共识，确保改革开放的健康顺利发展。

执政党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勇气来源于坚定的政治立场。立场决定勇气。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勇气。利益固化筑起的藩篱，本质上是政治权力过度扩张和异化的产物。其带来的直接社会后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4年2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2页。

果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以致成为不可逾越的社会鸿沟。社会向上的流动性越来越小,社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窄,社会进步的动力越来越弱。最终,一个本应该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将会被板结固化的赤裸裸的利益社会所代替。这是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最大不幸!

苏联的瓦解崩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斯大林模式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在册权贵”及其掌握的政治经济利益构成了强大的特权利益阶层,成为苏联社会进步发展的绊脚石。“在册权贵”的形成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干部任命体制——“职务名册”制度。1923年6月12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同年10月,中央委员会又作出了关于登记分配工作基本任务的决议。1925年11月16日,中央组织局又通过了《关于选拔、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条例,并通过了一份重新修订的“职务名册”。“职务名册”各种各样,当时最重要的有3号:第1号“职务名册”是由中央委员会负责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第2号“职务名册”是中央组织分配部负责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第3号“职务名册”,各部委负责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其他则是地方各级机关的“职务名册”。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于8月23日宣布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职务名册”制度被彻底取消。苏联等级不等的“职务名册”在七十四年的历史中,造就了庞大的特权阶层:一方面,在这一制度下,“人只要一进入官僚系统,马上开始使用权利,发放食品购买证和进入各种基地的通告证”^①;另一方面,这一制度“通过这个官僚系统保护自己”^②,从而更加强化了制度的垄断性。然而在国家面临巨大变革的关键时刻,苏联的权贵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集体右转,从而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堂而皇之地实现了对苏联人民创造了七十四年社会主义成果的窃取和占有。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调查表明,截至1995年,在新政府中有75%的人是苏联的党政干部,他们曾是苏共、共青团、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高级领导人;有82%的地方领导人和61%的大工商业家来自苏联的官僚机构。俄罗斯新闻媒介便直言不讳地讲,俄罗斯的暴发

①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49~50页。

② 同上,第49页。

户中,61%的人靠的是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90%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工作小组负责人弗兰克·希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①

苏联剧变的惨痛教训警醒我们:党内决不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②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政治准则和发展导向。改革开放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其过程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重组的过程。三十多年的成功实践表明,什么时候正确处理好了社会利益关系,什么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能顺利进行;什么时候没有及时处理好社会利益关系,什么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遇到波折。今天,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的关键时刻,很多容易改的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留下来的大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甚至是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更需要执政党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极大政治勇气,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确立公开、公正、公平的社会利益新格局,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中国人民。那么怎样才能理顺社会利益关系,避免社会的负向发展,保证改革在健康发展呢?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执政的根本政治立场和政治目标。只有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才能正视利益固化带来的社会不良后果,才能有敢于担当、勇于任事,排除万难、奋发作为的政治勇气。具体来说,就是要始终扶持人民主体地位,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要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无论遇到什么

^① 《在自己葬礼上致富——苏共特权阶层腐朽生活》,《文史参考》,2010年第15期。

^②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页。

困难和挑战,只要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①

二

执政党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智慧来源于现代的政治精神。利益固化所形成的利益藩篱对社会危害甚大、对党的执政根基危害甚大。它不仅会在经济利益上造成社会分配的不合理、不公正,而且更会在社会心理上形成乃至强化人民对政权的冷漠感、疏远感,从而从根本上销蚀政权的社会根基。

1991年12月25日19时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19时38分,象征红色政权的镰刀锤子旗从克里姆林宫徐徐下落,俄罗斯的三色旗随之升起。聚集在红场上的人们意识到,苏联从地图上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然而令世人意外的是,无论是苏联共产党的党员干部,还是苏联社会的普通大众都平静地接受了苏联消亡的现实。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在一个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大党大国消亡的时候,社会竟是如此的平静?27日的《俄罗斯报》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在苏联人民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实质性的好处,还带来了持续的混乱和不安,其改革的结果是,“留下了一个分裂的帝国,这个帝国曾有一个名字叫苏联;留下了无法遏止的通货膨胀、街头乞丐;留下了百万富翁和据说达到80%的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民”^②。可以说,对改革的彻底失望,最终造成了在苏联共产党最需要人民支持的时候而被人民所抛弃!探究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苏联共产党远远地落后于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对执政党的现代政治要求,即人民对公正、自由、民主

^①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3年11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1页。

^② 俄罗斯政治与经济历史中心:《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政治对抗1500天》,王南枝译,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的精神需求和现实渴望,仍然沿袭斯大林模式的治国理念,最终使党丧失了对社会的敏锐观察能力和战略适应能力。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绝对大的政治勇气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让人民充分享受改革成果,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命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刻关怀的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这种政治智慧源自于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执政条件下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把握基础上而形成的现代政治精神。现代政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现代认知和自我完善。这一精神分别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体现出了极强的现代制度精神、现代社会精神和现代公民精神:

(1)从国家层面来看,现代政治精神体现为始终坚持中国的根本制度与不断发展完善具体制度相结合的现代制度精神。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进行改革开放,既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件,又是一项极富挑战的艰巨任务。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这场革命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这就是我们始终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可以说,只有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为中国制度的现代创新提供坚定的政治基础。

(2)从社会层面来看,现代政治精神体现为调整完善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规范与培育组织自治相结合的现代社会精神。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改革开放是一个充满活力、富于创新的历史活动,也是一个不断释放动能、社会重组的实践过程。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多元发展过程中蕴含的内在变革要求,又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型政党实现现代转型的必然选择。双重转型的内在要求与现实压力,都表明了在现代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国家—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党必须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积极主动推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可以说,只有遵循现代社会的治理规

律,才能在正确处理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提供绵绵不绝的社会动力。

(3)从公民层面来看,现代政治精神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引导与尊重个体利益相结合的现代公民精神。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改革开放既是现代中国的发展战略,更是现代中国社会凝聚共识和价值重塑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面对这一新情况新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把它作为塑造公民精神的主要思想资源。在这二十四字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实现了国家、社会和个体价值追求的有机融合,成为中国现代公民精神的集中体现。只有尊重、关怀公民个体的独立精神和利益选择,才能在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体的关系中,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生生不息的现代精神素养。

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进程中所形成的上述现代政治精神,使党能够更加自觉、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利益固化藩篱在现代社会的危害,也促使党积极主动行动起来,坚决予以破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推进改革必须一鼓作气、坚定不移,必须坚定信心、增强勇气,不可迟疑、不可退缩。我们要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①

三

执政党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胆略来源于强大的政治自信。“不谋

^①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0~41页。

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利益固化所形成的利益藩篱,往往涉及领域广、牵扯部门多、社会关注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越来越深的水中前行,遇到的阻力必然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可能越来越多。因此,我们不仅要有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勇气,要有破除利益固化的政治智慧,更要有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胆略。所谓政治胆略,即是说做事情,既要有胆识,又要讲方略,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这种敢于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胆略源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多年来的强大政治自信。

一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理想信念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社会的团结纽带。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广大党员干部是党执政的组织行动力量和可靠政治保证。只要我们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高昂的进取精神,就一定能够实现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政治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言:“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做到的。”^①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团结纽带。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政治前提和组织纽带。这是任何别的力量都无法替代的!

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治国理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执政经验和执政智慧。执政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治国理政实践,使中国共产党积累了足够丰富的处理棘手问题的方法与经验,并逐步形成了现代条件下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因此,中国共产党有充分的信心、有足够的力量、有多种的办法,能够打破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观念机制束缚,在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综合平衡中,稳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实践证明: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

^① 习近平:“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2013年6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5页。

康社会,就一定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

可以说,强大的政治自信和高超的政治艺术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
现代升华。它使中国共产党在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时,具备了应对各种错综
复杂局面和突发情况的政治能力,能够确保在利益格局进行深度调整的关
键时期,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只要
中央政治局坚定这个信心,只要中央委员会坚定这个信心,只要全党坚定这
个信心,只要全国各族人民坚定这个信心,不论遇到什么风雨、困难、挑战,
我们都能够坚定不移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①

列宁说,党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历史的担当、复兴的使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政治智
慧和政治胆略,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
会创造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
清前进中的阻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所言:“我
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一定要不负重托,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以自
己的最大智慧、力量、心血,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
业绩。”^②

^①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习近平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0~141页。

^②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各个方面工作”(2012年11月),《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军队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第114页。

参考文献

一、资料汇编类

1.《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年)》,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

2.《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6—1987.6)》,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

3.[苏]米·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

4.[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改革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8年。

5.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

6.康绍邦等编:《苏联东欧近期资料选编(1989—1990.3)》,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内部参考资料。

7.柯燕编:《苏联东欧近期资料选编(1990.4—1990.8)》,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内部参考资料。

8.辛华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

9.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

10.苏群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 《赫鲁晓夫言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
12. 《勃列日涅夫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13.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

二、期刊杂志类

1. 《参考消息》(1985—1991)。
2.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5—1991)。

三、政治传记类

1.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
2. [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潘兴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
3.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4.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
5.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全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6. [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7.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8.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9.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10.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

11.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

12.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张达楠、王器、徐志文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

13.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患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14.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5.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

16. [俄]A. B. 科尔扎柯夫:《我所知道的叶利钦——俄罗斯总统安全局前局长回忆录》,杨藻镜、葛澹云、王文静译,外文出版社,1999年。

17.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王为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

18.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东方出版社,2000年。

19.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

20.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焦广田等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

21.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张达楠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

22.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

23.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24. [俄]Ю. В.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
25. [俄]亚历山大·佩日科夫:《“解冻”的赫鲁晓夫》,刘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
26. [意]维·维达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王德树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
27. [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
28.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
29. [俄]维·戈·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贾泽林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
30. [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
31. [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尤颢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
32.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33.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34. [美]戴维·阿尔贝尔、兰·埃德利:《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孙成昊、张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35.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时事出版社,1997年。
36. [俄]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瓦西里·米特罗欣:《克格勃绝密档案》,王振西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

四、学术著作类

1.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

2.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3.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

4. [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张达楠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

5. [俄]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著:《克里姆林宫秘史》,徐芳夫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6. [俄]B. A. 利西奇金、Л. A. 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7.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8.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

9. [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2002年。

10. [英]阿奇·布朗:《改变世界的七年》,韩凝等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

11. [英]奥兰多·弗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2.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沈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3.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马细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4. [美]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孟鸣歧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 [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16. [美]丹尼斯·K. 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陈德民、陶庆、薛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17. [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8.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9. [法]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20. [德]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冯文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21.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
23. 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人民出版社,2013年。
24. 李永忠、董瑛:《苏共亡党之谜——从权力结构之伤到用人体制之亡》,商务印书馆,2013年。
25. 李永全:《俄国政党史——权力金字塔的形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26. 谭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7. 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
28. 郝宇青:《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